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茅盾传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 茅盾传

没有青山，却有水乡灵秀。  
古往今来，风流人物尽风宜。  
水乡、古镇，近百年来最为辉煌的文化带状上的一颗明珠！  
文豪的出现，是自然的事，是意中事；新星迟早要升起。

## 第一章 地灵人杰

茅盾，1896年7月4日诞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一个姓沈的家庭里。取名德鸿，字雁冰，小名燕昌。“茅盾”是他写作《蚀》三部曲时用的笔名，也是他120多个笔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有国际知名度的笔名。

一颗种子降落在地上的时候，因土地肥瘦的缘故，往往影响以后的生长和果实的成熟。所幸的是，茅盾降生在一个有文化底蕴、物产丰富、较早具有开放意识的地方。这个地方，人杰地灵！茅盾自己也颇自豪：“我的故乡向来是一个鱼米之乡。”

乌镇，地方不大。但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铸成了它那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在茅盾出生时，乌镇为两省（江苏、浙江）三府（湖州、苏州、嘉兴）七县（乌程、归安、石门、桐乡、秀水、吴江、震泽）的错壤之地。所以当地方志上讲它是“镇虽一隅，实三郡六邑之屏藩也。”乌镇又是杭州到苏州的水路中间，距上海嘉兴也不过是半天的路程。因此，这个水乡小镇，却常能得大都市的风气之先。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开放的风气，较早地在乌镇萌发，规模也日渐大起来，到上世纪初，这个小镇，已经颇具规模，全镇东西长7华里，南北也有7华里。一条市河（其大名叫车溪）由南而来，穿镇而过，浩浩荡荡北去。河东叫青镇；河西称乌镇。茅盾家在青镇，但习惯上统称乌镇。当时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杭嘉湖平原，水乡小镇的繁荣，都是靠附近农村来支撑的。所以乌镇的“乡脚”特别远，十里之内，赶集进镇都到乌镇。而附近乡里，又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水稻和蚕桑成了乌镇农村里的主要支柱产业。这些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往镇里，又换回农村必需的日用品，从而活跃了镇上的经济。千百年来，年年岁岁，岁岁朝朝，慢慢使乌镇这个小镇，变成有文化有历史的水乡古镇，成为江浙交界的一个重镇。

悠悠岁月，涤去尘埃，留下的是丰厚的文化积淀；历史的进步和开放，也使茅盾祖辈和先贤十分崇尚知识和文化，形成了良好的氛围。镇上，除了穿镇而过的市河外，还有两条名字很典雅的河，绕镇而过，一条叫澜溪塘，一条叫紫云塘，与镇内的市河一水相连。镇内小河纵横蜿蜒曲折，临河而起的水阁木楼，绰影幢幢，河面不大，小桥轻卧，垂柳依依。浓郁的水乡风味，在乌镇发挥到极致。后来茅盾走遍大半个中国，对水乡这种独特的风韵，无限依恋，他曾说：“住在西北高原的人们，不能想象江南太湖区域所谓‘水乡’的居民生涯，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鸟乱飞’，也不是江南‘水乡’的风光。缺少那交错密布的水道的西北高原的居民，听说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欸乃飘然而过，总有点难以构成形象的罢。”

特殊的地理条件，温和而又四季分明的气候，吸引了不少文入学士，尤其是宋南渡以后，一大批来自中原的皇亲国戚和饱学之士，来江浙一带择地落户，加速这一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何况乌镇这个地方，早在梁朝，就有

昭明太子在乌镇苦读成大器的记载。南宋著名诗人、政治家陈与义（简斋）在绍兴五年出任湖州知府时，特地在乌镇芙蓉浦上筑室读书，并取名“南轩”。两年后，他又到乌镇，并与乌镇叶天经、高僧大、圆洪智三人过从甚密。因此，陈与义在《简斋集》中有不少诗作是与天经、智老赠与之作。后人为了纪念陈与义等三人的友谊和文学上的贡献，特地在“南轩”旁修筑了“三友亭”。在乌镇先贤中，一个叫严辰的人是咸丰九年（1859年）的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因为文章中用了“女中尧舜”四个字，触怒慈禧太后，严辰便辞归故里。回乌镇办学堂，修桥铺路，行善济贫，修县志。严辰这种传统的儒家风范，在乌镇为人传颂和仰慕。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之间，乾隆开“四库全书”馆，乌镇一个叫鲍廷博的藏书家，专门进献孤本藏书，深得清朝政府嘉许。后世刊印的“知不足斋丛书”就是这位茅盾故里先贤所奉献。

这些故里先贤，可以说在国内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也给小镇添了不少文化色彩。因此，小小水乡古镇，也很时髦地定八景之类的东西，如曾定：古山云树，双塔凌云，文石流觞，双溪皓月。自然，这些都是文化人的雅事。也正因为文化经济的发达，镇上也添了不少私家园林，据不完全统计，有50多处。有唐代的丞相裴休府、宋代安定郡王赵伯府、秦申王桧园、太师何恭敏铸宅、安抚王彦宅、尚书顾岩宅、节度丁胜宅、诗人丁南宅、沈知丞宅、沈左藏宅、六杉园、尚书莫泽宅、东皋园、张抡宅；元代的员外颜旒宅；明代的竹深处、横山堂、桂月轩、春晖楼、宝岷楼、听风楼、少司寇沈应龙宅、真君子第、参议王隆德宅、琪园、灵水居；清代的师俭堂、高节寒香圃、宝敕楼、副宪徐世峰宅、蠡勺园、宜园、半亩园、给谏陆秉枢宅、同知张廷杰宅、肖家花园、孝廉李日曦宅、翰林第、颐园、庸园；及近现代，又有适园、梅花馆、柯亭别墅，以及丁家花园等。这一大堆园林，在历史沧桑中，毁兴更替，留下的，却是丰厚的文化底蕴。

自然，丰厚的文化氛围，也留下不少带有儒家风骨和爱国风范的故事和传说。镇上有一棵唐代银杏，留下一个悲壮的故事。唐代宪宗元和年间，浙江刺史李琦步安禄山后尘，举兵叛乱称霸，结果把富庶的江浙一带搞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朝廷派乌赞将军带兵讨伐，一路杀来，打得叛军鼠窜，打到乌镇时，叛将李琦突然要求休战求和。不料，当夜李琦乘风高月黑，偷袭乌赞将军营寨，乌赞将军披衣迎战，跨上他那南征北战的战马青龙驹，追到市河边，突然青龙驹长啸一声，跌进李琦设置的陷阱，并被李琦乱箭射死。后来，援兵赶到，杀退李琦，重葬乌将军和战马青龙驹，这棵银杏，就是从乌赞将军坟上长出来的。为纪念乌将军和那战马青龙驹，这个地方也就叫作乌青镇，后来一直传下来。自然，这是一个悲壮的传说。还有一个勤奋好学的故事，也在乌镇流传着。梁朝昭明太子少年时，曾随师沈约在乌镇苦读，小小年纪，便通晓古今，终日诵书不辍，在文学上终有成就。后人为纪念这位勤学的太子，特在乌镇辟读书馆，并立牌坊：“梁昭明太子和沈尚书读书处”，至今仍在。

茅盾降生的故乡，就是这么古老，这么神秘，这么富有文化！仿佛历史注定乌镇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代文豪和大家。然而，茅盾呱呱坠地时，小镇依然是那样平静，河水依然是往浩淼的太湖静静地流去。

茅盾出生时，位于观前街的沈家还是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曾祖父沈焕在外地闯荡大半辈子后，晚年捐官在梧州府供职，祖父是个秀才，兄弟间有开店经商的，只是生意不大。父亲是个中医郎中，母亲则是乌镇名医的

千金，知书达礼。祖父子女六个，此时都还生活在一起。因此，茅盾的家庭里，几代婆媳、叔侄共同生活在一起。而操持这个大家庭的，不是茅盾的祖父，而是茅盾的祖母——一个来自乌镇农村的勤劳的女性。

茅盾的出生，给沈家带来欢乐。茅盾的父亲沈永锡给远在广西梧州府供职的祖父去信，报告这一喜讯：沈家长房又添长子。茅盾的曾祖父沈焕，字芸卿，早年在宁波安记山货行当伙计，学习经商，负责采购和推销。时常在汉口、天津、保定等地来往，待稍有积蓄以后，便与宁波安记合股经营山货，后来宁波安记者板退休，沈焕便独立经营山货行，这“山货行”也由安记改为“沈记”。晚年，沈焕觉得自己经商精力日衰，又无后继之人，便出资捐个广东候补道。在广州闲居候补，三年后赴任广西梧州府同知。茅盾出生时，这位老太爷还在广西梧州任上。沈焕有三子一女，茅盾的祖父沈恩培，是其长子，茅盾还有二个叔祖父和一个姑祖母，此时大概都还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老三房”还未分家。而茅盾祖父膝下，除茅盾父亲以外，还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

然而，这个大家庭并不富裕。在乌镇这个小镇上，也算不上富裕，有钱的富户在乌镇有的是，这些大户一般有田地、有工厂、有商店，在上海等地还有公司。而茅盾一家，除了曾祖父沈焕在梧州任上有些积蓄外，沈焕的儿孙们都不会作赚钱的买卖。从磨难中出来的人，自然要瞻前顾后，沈焕稍有积蓄，便汇款给儿子让儿子在乌镇开两爿店，一爿是京广杂货店，主要经营日用品之类；一爿是“泰兴昌”纸店，主要是针对桑蚕用品的桃花纸、蚕花等。但这个店开始还有些生意，后来由于两个儿子都不善经营，就渐渐清淡起来。对此，老太爷沈焕十分不满，认为儿子“没有出息”。但茅盾祖父是个乐天派，对父亲的训斥和不满，并不放心上，依然故我，我行我素。每天玩牌，喝茶，听唱昆曲，义务帮镇上一些人家写对联等。因他是秀才出身，无心功名，而字却写得很好。沈恩培娶乌镇农村高家桥的一个地主的女儿为妻，高氏嫁到沈家以后，依然十分勤劳，不忘农村风情，春来桑叶发芽后，便开始掸扫屋子，弄来蚕种，养春蚕，率儿女们开始饲蚕，她以为这是个根本。她看到有米泔水等，便在后边院子空地上，搭个猪棚，买来一头小猪，正正经经地养起猪来。

茅盾的一个二叔祖生性耿直，是个不善理商的人。但他与街坊邻里关系不错，后来也在镇上做些公益事业。茅盾的四叔祖沈恩增，字吉甫，小名阿海，他比茅盾父亲沈永锡还小两岁，毛笔字写得十分漂亮，因而老太爷沈焕在广西梧州任上时，将这个小儿子接去，代写书札信函。

在沈恩增上面，有一个姐姐，叫沈恩敏，即茅盾的姑祖母。这个姑祖母后来出嫁给本镇卢家，为卢福基的继室，卢福基与元配所生的儿子即是卢学溥，就是茅盾的卢表叔。卢家本是乌镇望族，在缙绅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而茅盾祖辈中，也与缙绅结上这一层姻缘，跻身缙绅这一层社会关系里。

但是，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沈家的经济并不宽裕，这也决定了沈家在乌镇社会地位也有限度。曾祖父在广西任上，要考虑自己任满后的生活，不可能给家里寄很多钱，在乌镇开的两爿店，却因经营无方而仅微利。另外没有田租、又没有地租，因而家庭的经济开支只好由祖母精打细算了。幸好她很勤俭，把这个大家庭操持得有条有理。

此时，清政府日愈腐败，甲午一战，军事上的败北，连许多有识之士的心也都散了。政治无能和腐败，军事落后和贫弱，使广大有识之士觉得中国

要强大，必须发展实业，以壮大国力。自然这些愿望是善良的，想法是初步的、改良的。16岁中秀才的茅盾的父亲沈永锡和乌镇其他一些秀才们一样，满腹抱负。一种世纪末的悲怆，一种救国拯民的理想，和家庭、社会强烈反差，深深地刺激着他。和茅盾母亲订婚后，他便到岳父——一个驰名杭嘉湖的妇科名医陈我如那里学习中医。这，既作为今后谋生手段，又保持传统的士大夫风范，以便在老太爷那里取得同意。但内心深处，这个年青的秀才十分崇尚实业救国。他订阅上海的报纸，关心国家大事；自学数学、声、光、化、电，以期在国家强大过程中施展自己的抱负。自然，这代表了底层一批知识分子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史学中称为“维新思想”。在茅盾的父辈朋友中，有不少富有才华、勤奋好学，又富有维新思想的人，如卢学溥、沈听蕉、徐晴梅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茅盾的老师。茅盾的父亲沈永锡去岳父那里学了几年中医以后，回家开个小小门诊。但乌镇的中医师太多了，沈永锡虽是陈我如的正宗徒弟，又是名医的女婿，尽管这样，求诊者还不如老中医郎中的多。据说，沈永锡还在门上贴上“僧道无缘”四个字，以示自己笃信唯物和敬业。

茅盾的母亲陈爱珠和沈永锡志同道合。她出生在中医世家，只不过到茅盾外祖父时，陈家已是从辉煌到没落了，陈爱珠出生时，陈家尚兴旺，求医求治者接踵而至，甚至有专门供陈我如出诊用的轿子和船，轿有轿夫，船有船家，子弟七八个人，煞是热闹。茅盾母亲4岁时，因陈老先生看病事多且烦，便托一个姓王的连襟代为管教。这个连襟是个秀才，很会教育孩子，又有知识，因陈爱珠小小年纪，十分聪明，学会了读、写、算，还念了不少古书，跟姨母学会做菜和缝纫。当陈我如向连襟打听女儿情况时，这个连襟很自豪很自信地回答：如果朝廷开女科，我这个姨外甥女肯定能考取秀才。于是陈老先生精力日衰时，便将14岁的女儿陈爱珠接回来，让她管理陈家这个乱哄哄的家庭，很快，他发现了女儿的才干和治家的本领。所以，1894年陈爱珠与沈永锡结婚以后，陈我如仍让女儿回娘家帮助照看这个家庭内外事务。茅盾出生以后，沈永锡夫妇觉得沈家住房器闹拥挤，不如西栅陈家厅宁静和宽敞，因而常常住在陈家。

乌镇的水依然那样忙碌地往太湖流去，年年不息；唐代银杏春枝发芽、长叶，依然苍劲和有力；镇上农历三月初三开始的“游西寺”——香市，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只不过一年不如一年，连振兴市面的愿望，也远远达不到了。

农历五月底边了，天气日渐炎热，沈永锡快信寄到梧州，报告老太爷，重孙已经出世，并十分敬重地请老太爷给这个刚出世的孩子取名。

沈焕看到家信，十分高兴，忽又想起梧州百姓反映这几天燕子特别多，是个吉祥的好兆头。沈焕持了捋胡须，心中升起一阵欣喜。对小儿子说：“给伯蕃（茅盾父亲）去封信，沈家这个长房长孙长子，叫燕昌吧，名字么，让他们按我们沈家谱里金木水火土的要求给取一个吧。”

于是，沈永锡的长子便起名德鸿，小名燕昌。自然，沈家添个男孩子的喜悦，没有几天，就过去了。因为沈家不乏男孩子，茅盾的几个叔祖和茅盾父亲一般大，而茅盾的几个叔父，也仅仅分别比茅盾大4岁，8岁和10岁，因此添个男孩子，对经济状况并不好的沈家来说，欣喜仅是一阵子而已。

太阳已经升起，新的一天又在这古老而神秘的小镇上开始。

匆匆忙忙的人们，走在观前街这石板小街上，发出的笃的笃的响声，沿

街店里的小伙计也在吆喝着，招呼着每一个相识或不相识的顾客；认识的人，在相互打招呼，相互探询，问候。而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观前街这幢临街楼上，已经诞生了一个男孩子，同样，谁也没有料到他日后会成一代文豪。

本世纪初，乌镇上的一个瘦弱的孩子，貌不惊人，

老师却为他作了肯定的预言：

小学老师：“小子可造”，“勉成大器”。

“生于同班年最幼，而学能深造，  
前程远大，未可限量！”

中学老师：“是将来能为文者”

## 第二章 学生时代

幼年的茅盾，大部分的日子是在外祖父家里度过的。母亲陈爱珠虽然嫁到沈家，但娘家的事还要她去操劳。此时，茅盾的外祖父年老且忙，无暇顾及家里的一切应酬；外祖母钱氏因身体有病，时而亢奋，时而消沉，也无法料理家务；而茅盾的舅父陈长寿尚小，体质孱弱。所以陈爱珠只好带着儿子回娘家去住，好在都在一个小镇上，来往方便，走过市河，穿过一片桑地，一会儿功夫就到了。

在外祖父家里，幼年的茅盾受到一种岐黄氛围的熏陶。高大宽敞的厅屋，夏天凉风习习，柱上写着对联：“自南渡以来，岐黄传世。……”屋后的那一片竹林、桑园，也成了茅盾眼中的乐园。自然，幼年的茅盾生活在外祖父一家的岐黄氛围里，养成了他爱整洁的习惯，也受到中医世家中那勤奋好思对人负责习惯的影响。

1900年6月23日，弟弟沈德济出生时，茅盾虚岁是5岁。弟弟的出生，茅盾仿佛自己长大了许多。父母亲也在商量，是否可以给茅盾启蒙了，“让谁来给儿子启蒙呢？”茅盾父母颇费心思，但想来想去，还是认为自己来启蒙最合适。于是，茅盾在5岁那年，由父母启蒙，开始认字和写字。教材是父亲沈永锡自己挑选的，有《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由母亲来施教。所以，茅盾自己称：“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其实，当时茅盾家里人多，“老三房”联合起来，在自己家里办个家塾，茅盾的三个叔父及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拉在一起，由茅盾祖父沈恩培教授。但茅盾祖父教书并不认真，有时学生来了，他自己却出门打牌或会友去了，丢下儿子、侄子不管，而且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一类书，所以茅盾父母怕茅盾进家塾，会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便自己动手动口来教育儿子。

后来，茅盾祖父沈恩培以茅盾父亲行医并不忙为由，让茅盾父亲来担当教家塾的事。茅盾父亲不好意思推辞，只好接受了下来，并把儿子茅盾也带进家塾。但茅盾学的课本，乃是新学，其他叔辈孩子仍学《三字经》一类书。茅盾父亲教书十分认真，对儿子也概莫能外，他每天亲自节录课本中四句，要年仅5岁的茅盾读熟，并对茅盾说：“慢慢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幸好茅盾天资聪颖，一经教授，便记住了。

不到一年，茅盾父亲病倒了，四处求医无效，躺在床上，无法再教私塾了，只好将茅盾送到本镇一个亲戚王彦臣办的私塾里去，并叮嘱王彦臣，要给茅盾讲新学。当时这个私塾里，同学年龄都比茅盾大，只有王彦臣的女儿王会悟的年龄和茅盾的差不多。王彦臣虽和茅盾父亲既是亲戚又是有维新思想的年轻秀才，思想很合得拢，但他怕麻烦，没有给茅盾单独讲授新学。茅盾父亲知道后，也不好再说什么。

在茅盾幼年，沈家似乎衰落得特别快。在广西梧州做官的沈焕在茅盾出



生后第二年，即 1897 年告老还乡。见过世面的老太爷回到乌镇一看，十分失望，觉得儿孙辈都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那样有作为，连开店、造房子都没有替他办好！因此老太爷终日悒悒寡欢，足不出户。据说在乌镇那么多青年人当中，他最看得上的只有卢学傅，认为他有出息。这样过了两年后，经商做官的一些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他于 1900 年秋天逝世。

茅盾的曾祖父去世以后，曾祖母王氏便出面主持分家，茅盾祖父分到一片泰兴昌纸店，仍居住在观前街。她见分家已定；便召集儿子儿媳，当场宣布：“现在手头还有现金不到三千，老太爷遗命给长子长孙一千，现在就给了完事。余款作为老太爷除灵和葬费，包括我自己的后事。”说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你们做儿子的，就尽这二千两光景办吧，你们愿意办得好些，行；愿意省俭些，也行；有余钱，你们三房分了吧。”王氏是个知书识礼、办事果断的人，为沈家上下所敬重。她在丈夫沈焕死后第二年，也撒手西归。自此，沈家经济上也日愈困顿。

在沈家发生变故前后，茅盾外祖父一家也急剧衰败，老中医外祖父陈我如在茅盾 3 岁时去世，顿使陈家大厦失去一柱，一下子冷落起来，经济来源只能靠几亩桑地和几间房租。在茅盾曾祖母王氏逝世的第二年。即 1902 年，茅盾唯一的亲舅舅陈长寿也病逝。这一联串亲人逝世，使茅盾父母陷入手忙脚乱之中。

世俗的眼中，沈家还是陈家，已经败了。原先热热闹闹的沈家大家庭，分家以后，各归各，自顾自；茅盾祖父又不善经营，父亲病倒，生活更为艰难，吃肉也只能选择日子了。据说只有在初一、初八、十六、二十三才吃肉，而且用小碗，只有薄薄几片！而陈家原来是人来人往，船来轿来，请老先生先诊治，老先生一去世，徒弟星散，立刻车马稀少，少人问津。这些，给茅盾父母刺激不小，年幼的茅盾仿佛也尝到了人间冷暖的滋味。

茅盾在王彦臣那里读了半年光景，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观前街立志书院由卢学傅一班年轻人改造，创办起一所立志小学，专门按新式教育方式教学。病恹恹的茅盾父亲便让茅盾从王彦臣那里回来，到隔壁的立志小学，成为立志小学的第一班学生。

立志小学刚开学，分甲班乙班，年纪大一些的分到甲班，年纪小的分到乙班。后来上了一个星期课以后，把成绩好的分到甲班。茅盾年纪最小，成绩却好，也就转到甲班。立志小学聘的教师都是些年轻、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甲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茅盾父亲的朋友沈听蕉，教国文、修身和历史。国文课本是《速通虚字法》和《论说入门》；修身课本是《论语》，历史课本是沈听蕉自己编写的。教算学的姓翁，是卢学傅从邻镇聘来的。

经济上困顿的事，由大人撑着；而茅盾父亲病倒在床上，却直接连累童年茅盾。茅盾曾回忆说：“那时候，父亲已卧床不起，房内总要有人侍候，所以我虽说上了学，却时时要照顾家里，好在学校就在我家隔壁，上下课的铃声听得很清楚，我听到铃声再跑去上课也来得及，有时我就干脆请假不去了。母亲怕我落下的功课太多，就自己教我，很快我就把《论语》读完了，比学校的进度快。”也许是天资的缘故，茅盾这样既要回家侍候父亲，又要去上课，一心二用，功课仍然比年纪大的同学还好！每月的考试，发榜以后，茅盾都能得到奖赏；每周的一篇史论文章，使茅盾居然在立志小学出了名。每次发榜和得奖，茅盾拿回家给日愈消瘦的父亲看。30 多岁的父亲，瘦得活像一个 50 多岁的老人，撑起病体，苦涩地笑了笑，鼓励几句，又拿来看看，

还给茅盾。病魔折磨得他十分痛苦，脸色蜡黄，消瘦。只有儿子得奖回家，他脸上才浮起笑容。有一次，茅盾独自在楼上侍候父亲看书。忽然，父亲把书朝床角落里一丢，忿忿然说，“不看了！”正专注地替父亲翻书的茅盾吓了一跳，“怎么？”“拿把刀来。”茅盾起身把桌上那把西瓜刀拿来给父亲。“刀，做什么？”茅盾有些怯生生地问，眼神里露出天真的惊讶。“唉，剪指甲。”茅盾父亲拿着刀看了半天，叹口气，放下。“去将你妈妈叫来。”茅盾不明白父亲的用意，忙下楼去喊妈妈上楼，还在河边洗衣服的母亲听得儿子说，忙上楼去侍候丈夫。茅盾则回学校去上课了。这天放学回来，茅盾上楼去见父母，见母亲坐在父亲的病榻边垂泪，眼睛红肿着。父亲则闭着眼，疲倦地躺着，脸色蜡黄。事后，母亲偷偷告诉茅盾，那天他父亲要刀，原来想自杀。后来经母亲劝说，他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茅盾听说，心里着实一惊，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直到晚年，依然鲜明地记着父亲想自杀这件事。

在茅盾 10 岁那年，茅盾父亲沈永锡病逝了。那时，弟弟沈德济 6 岁。茅盾母亲担起抚育两个儿子的责任，望着丈夫的遗像，泪如断了线的珍珠滚下脸颊，她含泪恭写了一副长联，表明自己的心志：

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誓言，管教双雏。

母亲的一片苦心坚志宏愿，在茅盾昆仲兄弟心里，印下了深深的烙印。茅盾父亲逝世后，茅盾依然在立志小学读书。有一次，因为学校教算学的老师病了，学校提前放学，这时一位大同学要拉茅盾去玩，茅盾却急于回家。于是那个大同学追过来，结果自己不小心绊了交，擦破点表皮。那个大同学知道茅盾母亲管教严厉，便拉着茅盾到隔壁茅盾家里，反咬一口，说是茅盾绊了他一交。茅盾母亲见状，安慰那个同学，并给他几十个制钱，说是医治他那个早已血止的手腕。这时，茅盾那位最爱挑剔的二姑母说了几句讥讽茅盾母亲的话，母亲脸色铁青，拉着茅盾上楼，关上门，拿起戒尺，便要打茅盾。茅盾满腹委屈，见母亲受屈要打自己，便夺门而逃，奔下楼去。背后传来母亲那忿恨声：“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儿子了。”这事惊动了茅盾祖母，祖母让叔庄（茅盾三叔）去找，三叔回来说没有找到。一时全家人急得团团转。茅盾在街上走了一会儿，觉得还是回校请沈听蕉替自己辩诬。沈听蕉听了茅盾诉说，就陪茅盾回家。进门后，沈先生站在天井里，朝楼上喊，请茅盾母亲出来说话。茅盾母亲开了房门，走到窗口，却不下楼。沈听蕉就站在天井里对茅盾母亲说：“大嫂，这事我当场看见，是那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交，反诬告德鸿。怕你不信，我来作证。”茅盾母亲坚强的性格和知书达礼、办事果断的作风，在乌镇青年中是出名的，深得大家的敬重。沈听蕉把情况说了以后，又想起刚才德鸿出走之事，又说：“大嫂知书达礼，岂不闻孝子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乎？德鸿做得对。”茅盾母亲在楼窗口听了，默然片刻，说了句“谢谢沈先生。”回房去了。沈听蕉后面这句话，茅盾母亲是听懂的，沈先生引用孔子的话，来赞扬茅盾夺门而逃的举动。古人有“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但这个出典，茅盾祖母听不懂，见沈听蕉说了几句后，茅盾母亲便进房去了，以为媳妇的气还未消，于是送走沈先生后，便亲自拉

着茅盾上楼去。推门进去，见茅盾母亲背窗而坐，祖母忙让茅盾跪在媳妇面前，茅盾知道今天的事伤了母亲的心，跪着哭道：“妈妈，打吧。”茅盾母亲转过身来，扶起茅盾，泪如雨下，只说了句“你的父亲若在，不用我……”哽咽着说不下去，拉过儿子，搂在怀里，泪水滴在儿子的脸上。

这一件事，在童年茅盾的心灵里，留下了创伤，他第一次自己直接感受到社会的险恶，也直接体会母亲哺养两个儿子的艰辛。

1907年，茅盾从立志小学毕业，升到乌青镇高等小学继续读书，后来更名为植材小学，地点在北宫。校舍是由道教场所改建的。这个学校当时除讲授古文外，还开设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课，英语采用《纳氏文法》为教材，所聘教师，大都是从上海、日本进修回来的高材生。教国文的是王彦臣和张济川，及本镇两个老秀才。植材小学是1907年3月27日开学，茅盾便进了植材小学读书。或许由于家境日愈衰落的缘故，茅盾对悲壮歌曲印象特别深，对忧国忧民的英雄特别崇拜。同时，茅盾的作文也大有长进，步入少年时代的茅盾，心底里萌生出救国拯民的进步思想，也萌生出成名成家以报答父母的愿望。

有一次，植材小学上音乐课，老师教唱一首叫《黄河》的歌，少年茅盾一听，觉得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这首歌里，驰骋在祖国旷远大漠之中，昂扬悲壮，很有民族风骨，与茅盾思想一唱即合，这首歌词是这样的：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河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饶吹，观我凯旋。”

这首歌的歌词是杨度所写，沈心工谱曲，是当时的一首校园歌曲。沈心工，名庆鸿，号叔逵，字心工，上海市人，生于1869年。1903年曾东渡扶桑，考察教育，回国后一边在南洋公学执教，一边创作了大量校园歌曲，为当时学校传诵一时。这首歌，反映出来的气势，十分契合茅盾当时的心态，但少年茅盾对歌词内容却不甚了了。于是放学回家，他去问母亲，请母亲作详细解释。

几乎和在立志小学时一样，茅盾的作文仍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赏识。他在作文《武侯治蜀王猛治秦论》中，老师称赞他“思想深沉”，认为他写此文“确是史论正格”。在作文《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中，老师在批语中称赞少年茅盾“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在《祖逖闻鸡起舞论》中，老师给予评语是：“慨祖生不遇其主，壮志莫酬，确有见地。行文之势，尤蓬蓬勃勃，真如釜上之气。”在作文《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论》中，老师的评语是：“目光如炬，笔锐似剑，洋洋千言，宛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国文至此，亦可告无罪矣！”这些史论作文，大都是写有作为的英雄；而这些英雄，又大都是从磨难中来。因此，当少年茅盾了解了这些史事以后，同情，感慨，仿效，构成了少年茅盾内心世界的一部主旋律，形成了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所以老师对他寄以厚望。在议论《学部定章学生毕业以学期为限论》中，老师兴奋无比，评价茅盾“生于同班年最幼，而学能深造，前程远大，未可限量！急恩升学，冀着祖鞭，实属有志。”

在史事议论中，对时事也十分感慨，其中一篇《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道出了少年茅盾对清王朝政府的不平和不满，这篇作文是这样写的：

警察，有益之事也；茶室，消耗之所也。以消耗无谓之钱，办有益地方之事，亦其宜也。吾青镇茶室，因捐罢市，论者汹汹，以为茶室乃无谓空费之地，本应出捐以助公款，何其无良狡猾，一至于此？然余以为茶室业小资薄，一日所赚之钱几何，既担任城镇学堂之捐，今再益之以警察费，宜其不能任其职矣。且加一捐，其茶之价亦必增一倍，吾恐吸茶少而益致亏矣。吾故谓警察之抽茶捐，事出苛求，而茶室之罢市不从，不得谓以私念而败公事。且办警察非一二千元不能，则区区茶捐，何足敷用？况警察非所以卫大商及富家耶，则此款宜大商家出之，又何必与小民缠扰不已哉？（眉批：不错！不错！）

老师在文后批语道，“办地方之事，必宽以筹之。作者谓与小民缠扰不已，至论至论！”当时学校里的民主空气由于受老师维新思想的影响，还是非常浓厚的。因此，针砭时事能有此深刻，实属难得。有一次，卢学溥主持乌镇各学校的童生会考，题目是老气横秋的《试论富国强兵之道》，茅盾觉得这个题目正好抒发自己的宏愿大志，最终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结尾。卢学溥见了，十分认真，立刻批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生发一番自己的感叹。

茅盾在植材小学时，不仅对史事作文娴熟深刻，而且对记叙叙事也已十分老到，这期间写的《选举投票放假纪念》、《悲秋》两篇作文，无论叙事状物言情，都达到生动和新颖的水平，不能不说其文学天才初露端倪，这里不妨把这两篇作文辑录下来以共赏：

其一是《选举投票放假纪念——四月十五日浙江咨议局初选举投票日期》：

四月十五日，天晴气朗，风气宜人。有绅士数辈，奔走慌忙往来之人，皆喜色满面，欢声雷动。嘻！今日何日，而士民之喜若是？今日乃咨议局初选举投票日也。学堂某门洞开，龙旗高悬，学生出入，问之，则放假日也。问何以放假？则亦因选举投票而然也。有学生数人，晤言一室之内，谈论雄豪，其兴转浓，春风满面而喜气扬，欢溢眉宇而谈愈雄。移时一学生自外来，举手道喜曰：“恭喜今日咨议成立矣！今日咨议局之成立，即他日我党享自由之幸福，敢为诸君贺。”于是众人益喜，互相庆贺，有曰：“今日实行预备立宪，选举投票，实乃我国四千余载未有之盛举。从此我国民可以脱离苦海，而跳出专制范围，享自由之福，可庆！可庆！”有曰：“恭喜！恭喜！我国黑暗已至极点，而近日实行预备立宪，乃我侪所额手相贺。今日之放假，乃选举投票之纪念。”一时庆贺之声，不绝于耳，良久始各散去。余睹此情状，不觉大悦。深念近日之咨议局，即他日之议院可知。如是，则民情可张，舆论必重矣！思己更喜，时已至家，乃默坐复思，愈觉可喜。乃援笔记之，以为纪念。

这一篇记述乌镇选举的作文，写得活灵活现，神态毕至。状物状情，已相当娴熟了。

其二是《悲秋》

紫燕去，鸿雁来，寒蝉互噪，秋虫凄切，衰草遍野，木叶尽脱悲夫！何秋声秋色之伤怀欤？忆夫！艳李红桃，芳草绿荫，春光明媚，藻丽可爱之际，忽焉秋风萧萧，荔丹蕉黄。曾几何时，万物肃杀之秋至矣。呜呼！人孰无情，谁能遣此！而况万里长征，远客他乡，又何能禁秋风雨之感其怀抱。（眉批：语可动人）伤矣哉！秋之为秋也。夫秋，天地肃杀之气也。故国家行刑，而草

木残凋，雷始收声，阳气日衰，天道循变，人亦何悲乎秋乎？然万物寂寥，满目凄楚，对此秋日，能不伤怀？虽然，人生过客耳！幻梦耳！有悲于怀者，岂惟秋哉！秋之悲，其小焉者也！

这篇作文显示了少年茅盾把握状情摹景，生发感慨的本领。其中的谋篇布局，立意引题，都显示出一般少年无法达到的水平。茅盾小学时的同学沈志坚曾回忆说：当时植材小学老师张济川看了茅盾作文后，曾拍着茅盾的项背鼓励道：“你将是了不得的文学家呢！好好地用功吧。”有一次，茅盾和沈志坚两人互诉抱负，茅盾表示，将来能著一伟大小说，成一名家，于愿足矣。沈志坚也表示同感。

1909年冬，茅盾从植材小学毕业。毕业后去哪里升学？茅盾母亲颇费思量。杭州、湖州、嘉兴都有中学。就当时的家境，街坊熟人曾劝茅盾母亲，让他去念杭州的师范，那里不收食宿费，还发制服，但毕业后得回乡当教员。茅盾母亲觉得这样一来，钱是省了不少，但茅盾父亲曾有遗嘱，让茅盾兄弟俩念工科，学实业，如果念师范，有悖于沈永锡遗愿了。所以，茅盾母亲决定让茅盾念中学，正好一个姓费的亲戚在湖州中学堂念书，便让茅盾去湖州读中学，插班三年级。

1910年春，茅盾第一次离家，去湖州过寄宿生生活。母亲、弟弟沈泽民、舅母陈宝珠都到小火轮码头为他送行。舅母是个聪慧而又十分漂亮的少妇，在其夫陈长寿逝世后，一直与茅盾母亲共同陪奉婆婆，并视茅盾兄弟俩为儿子一般，常常帮助茅盾母亲教育茅盾兄弟俩。陈宝珠美貌而善良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少年茅盾的脑海里，直到晚年，还清晰地记得陈宝珠那音容笑貌。茅盾在小火轮舱窗口，望着自己的母亲、弟弟及舅母陈宝珠，小火轮离岸了，茅盾的双眼有些湿润。

突突突的小火轮把茅盾送到湖州。原想插班中学三年级。结果到校经过插班考试，他的算术完全做错了，只好插入二年级。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学生生涯。

湖州府中学堂坐落在市中心，这所中学堂建于1902年，利用原来的爱山书院旧址改建。于同年6月17日开学。到茅盾进校读书时，先后有姚学仁、朱廷燮、王树荣、俞宗濂、沈谱琴等担任过校长。茅盾进湖州府中学堂时，校长是沈谱琴。校长是清末举人，又是秘密的同盟会会员，与孙中山等人有交往。由于校长有革命思想，所聘的教师也都有学问，其中国文教师杨笏斋，给少年茅盾很大影响。杨老师特别推崇恣肆汪洋的庄子，常对学生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矫变化，不可猜度。”对《庄子》，茅盾受杨笏斋老师感染，觉得读过以后，天地顿时开阔，明亮。除国文课以外，茅盾在湖州府中学堂里，对地理课也感兴趣起来。原来，地理老师善于把自然地理和历史人物、名胜古迹糅合在一起向学生讲授，因此听起来生动有趣、易记。所以，在湖州府中学堂里，茅盾的国文成绩名列第二，仅次于一个叫陈辅屏的同学。当时，杨笏斋给茅盾他们讲授中国文学史，讲解《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从此茅盾开始接触许多古典名著，如《楚辞》、《昭明文选》，也知道了建安七子，知道了陆机、陆云两弟兄，知道了嵇康、傅玄、鲍照、庾信、江淹、丘迟等文学史上有名的人物及其作品。而且，茅盾在杨笏斋老师的指点下，练习写骈体。杨笏斋老师向学生灌输“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的观点。杨老师的做法，使茅盾得到了系统的学习。茅盾有一次用骈体写一篇作文，题目叫《记梦》，讲自己回家去，

见了宝姨和母亲，宝姨考茅盾一副对联。正考问之中，外祖母在堂上叫“来吃西瓜。”于是宝姨拉了茅盾跑去，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就跌醒了。此时“檐头鹊噪，远寺晨钟。同室学友，鼾声方浓。”这篇有情节有人物，有对话的习作，可以看出茅盾作为小说大家的端倪。杨笏斋给予“构思新颖，文字不俗”的评语。

在湖州府中学堂，茅盾向同学学习篆刻，操刀弄笔，陶冶性情。尤其给少年茅盾产生影响的，是钱念劬先生来湖州府中学堂临时任校长后，亲自教茅盾他们作文课。钱念劬先生学识渊博，清末曾随薛福成出使欧洲，先后在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等使馆任职，因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教育上倡导平等自由。这时，他返故里湖州小住，沈谱琴便恭请他代理校长，于是他当起临时府中校长，并走进课堂，亲自执鞭教学生作文。其时，作文大都是命题作文，而钱念劬先生教作文，只叫大家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的人，写一篇作文。一时，班上做惯史论的同学都茫然不知所措，而茅盾想起用寓言体，写了《志在鸿鹄》的作文，五六百字，借鸿鹄自诉抱负。钱念劬先生在茅盾作文后面写了“是将来能为文者”的评语。大概钱老先生从茅盾的作文中，看出茅盾的文学天才。预言成了事实。这恐怕连钱老先生都没有想到吧。钱念劬先生代理校长期间，还邀请茅盾等同学去陆家花园游玩，并给这些莘莘学子观赏他自己出使外国的照片。这些，给茅盾大开眼界，感到在钱念劬先生面前，有一种平等感。而钱念劬先生聘来教茅盾的钱夏先生，年纪很轻，但胆子很大，亲自教茅盾他们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教《太平天国檄文》，教黄遵宪的《台湾行》及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灌输反清思想，使茅盾他们这些学生感到天地为之一新！也十分兴奋。

在湖州府中学堂，茅盾不仅接触了大量文学史上的名作名著，也直接感受到反清力量的影响，一种革命的萌芽，在湖州府中学堂里悄然生发。1910年秋天沈谱琴组织师生去南京参观中国最早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在南京，茅盾又一次感受到实业救国思想的教育，领悟到父辈们的苦心和真诚。也知道了故乡浙江的名产名物。这个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于1910年6月25日开馆以后，参观者空前。内容有教育馆、工艺馆、农业馆、美术馆、卫生馆、武备馆、机械馆、通运馆、水族馆等，而且各省也布出16个省馆，专门介绍本省特产，浙江馆除丝绸织品外，也展出绍兴黄酒，金华火腿，杭州剪刀，天竺筷等。所以，当初南洋劝业会轰动全国，不少地方，尤其是学校，专门组织学生去参观。茅盾看过展馆，大开眼界，“大为惊喜。”

在湖州府中学堂，最为少年茅盾头疼的功课是体育，因为沈谱琴把府中作为他反清革命行动的据点，因而他有意强化学生的体育课，列队、操练、远足，都是有意为之的活动。但身体单薄的茅盾，无法适应学校这种强度很大的体育训练，闹了许多笑话。但更使茅盾烦恼的是，比茅盾迟一个学期进校的一个姓张的新生，因为与茅盾友善，而遭到其他同学的奚落。这个新生年纪比茅盾大，但声音似乎尚未发育一般，女腔音很重，所以与别的同学难相处，而与寡言少语的茅盾却投机。因而连累了茅盾，使茅盾在学习上有分心，十分苦恼。

后来，茅盾与母亲商量，决计转学嘉兴。1911年暑假，茅盾转学嘉兴，进嘉兴府中学堂，插入四年级继续读书。嘉兴位于杭嘉湖平原腹地，地处沪杭铁路中间，物产丰富，风光旖旎。城南有湖名“南湖”，又名“鸳鸯湖”，

风景之美，可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相媲美。沿湖垂柳依依，秋风掠过，婀娜多姿，十分妩媚；宽阔的湖面，碧水红舟，粼波荡漾；时而，一对浮在碧波里的鸳鸯惊水而起，传来咻咻的击水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过嘉兴时，曾作诗：“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夜傍鸳鸯起。”诗人吴梅村也有“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的诗句赞美南湖。湖中有岛，岛上有建于五代的烟雨楼，楼上红栋飞檐，楼旁古树参天，显得灵秀而幽静，是江南名胜之一。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每每不忘到此小憩，留下“六龙曾驻”的匾额和两块镌刻着他题诗的御碑。从此，南湖名声大振。

嘉兴府中学堂坐落在嘉兴城里小西门内，规模有百亩之大，分南北两院，南院为旧鸳鸯湖书院故址，北院为旧秀水县署故址，当时学堂宿舍在一河对岸，中间有一石桥，名“齐云桥”。嘉兴府中学堂校长方青箱，年轻有为，早年上海中西书院毕业后，曾游历美国、加拿大、日本，受世界潮流影响，秘密加入光复会，立志反清革命。他所聘教师，也都年轻和有学问，并都倾向革命。当时的国文教师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教数学的计仰先、体育老师范蒲英等，都成了方青箱校长的“同志”。但是，这些国文教师，虽是校长“同志”，并不像湖州中学堂的国文教师那样，公开教反清课本，而是仍教一些旧书，如朱希祖教《周官考工记》和《阮元车制考》；马裕藻教《春秋左氏传》；朱蓬仙教修身，教材自编，通篇是集句。另一位不是革命党的教师朱仲璋，是桐乡人，也是茅盾父亲生前的朋友，虽不是革命党却不反对革命，常常关心茅盾在嘉兴府中学堂的学业。

嘉兴府中学堂除了教师阵容强大外，对数学特别看重。茅盾从看重文科的湖州转到嘉兴以后，大家知道他的数学没有学好，都主动帮助他补课。新来刚到的他，感到了一种新的气息。但是，这种同学温暖时间不长。1911年10月10日，震撼世界、震撼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的枪声，也使嘉兴府中学堂热闹和动荡起来，此时校长带领同学投身光复杭州，嘉兴的战斗了，朱希祖老师回老家海盐当民事长（县长）去了，学校处在无序状态之中，只好放假各自回家。

当辛亥革命胜利，杭州、上海、嘉兴都光复之后，学堂来通知，重新上课了。结果到校一看，原来熟识的、革命党教师都走了，连校长方青箱也荣任嘉兴军政分司了。校务由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陈凤章在辛亥革命后复课时，强调要整顿校风，并亲自巡视自修室，规定学生自修时，不准谈笑。自由惯了的同学，很为此而忿忿不平，认为革命成功了，反而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于是几个胆大的同学去找陈凤章评理，结果这几个学生受到记过处分。茅盾也十分不满这个学监，他拾来一只死老鼠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上《庄子》里的一段话：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写毕，封好，悄悄地塞进陈凤章的办公桌抽屉里。茅盾这种书生气的反抗，得到的，同样是记过处分。后来几个同学在大考之后结伴上南湖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咒骂陈凤章。又乘酒兴回校内砸告示牌，几个满面通红的同学还赶到陈凤章家里质问。茅盾虽未动手砸告示牌，也未去陈凤章家里质问，因在其中附和，也在寒假里收到学校的“除名”通知。

一场久盼的革命却给茅盾带来了失望和失学的结果，这是当时少年茅盾万万没有想到的。怎么办？茅盾母亲感到十分为难，回湖州？不可能。回嘉

兴？刚刚除名，也没有办法可想。茅盾在嘉兴府的反抗和不满，并不是不愿读书，而对学监那种专制作风的不满，是渴望在自由气氛下读书！所以，茅盾母亲问情情况后，没有追究下去。但茅盾一连几天，愁眉苦脸。最后在母亲的支持下，去杭州考插班，结果，茅盾考进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并于1912年春到杭州，修完中学阶段的功课，1913年夏毕业。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里，茅盾依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兴趣从古文、数学转到诗词知识的学习上。当时，私立安定中学当局把杭州学问最好的人都聘来教书。其中有一个叫张相的先生，诗词底子特别好，人称“钱塘才子”。他教茅盾他们作诗、填词。而且作诗填词都从基本功做起，并示范给学生看，又布置学生作业练习，然后自己给予修改。茅盾晚年还记得张相先生，“他常常写了上联，叫同学们作下联，做后，他当场就改。”张相先生绝顶聪明，博闻强记，他能将昆明大观楼的长联一字不漏地在黑板上写下来，并以此为例，向学生讲解如何欣赏长联，又信手拈来杭州风景名胜的名联，作诗词范本，有肯定、有批评，十分引人入胜。因而茅盾十分敬佩这位老师。其实，茅盾佩服的张相先生，在世上和茅盾有许多相同之处。张相早年家境贫寒，父亲早故，全靠母亲替人家缝缝补补的收入来抚养。张相天分很高，初涉试场即中秀才，后来潜心研究旧学。不久又受维新思想影响，悉心自学日语，曾译《十九世纪外交史》，为当时时人所推崇。后来，他在安定中学、杭州府中学堂、宗文学堂担任文史讲席，成为杭州城里有名的才子。

在私立安定中学里，茅盾打下扎实的诗词基础知识。后来茅盾创作并流传下来的150多首诗词，皆源于此。另外，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还夯实了记忆的基本功。当时，安定中学有一个教国文的老师姓杨，杨老师教中国文学发展史，比湖州府中学堂里那位杨笏斋先生更有系统性，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杂剧、明前后七子复古运动、明传奇，直至桐城派以及晚清的江西诗派之盛行，都作系统的介绍。但他的教学方法也特别，在黑板上只写人名、书名，每日讲一段，叫学生做笔记，然后批改笔记。因此，茅盾干脆上课时专心听讲硬记，课后把杨老师所讲的内容默写出来，久而久之，竟然把自己训练出来，增强了自己的记忆能力。故后来茅盾能背《红楼梦》的传说，大概也得益于此时的训练。

1913年夏，茅盾毕业于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离开西子湖畔，回到乌镇。他的母亲告诉他，凭手头的钱，茅盾还可以去读三年书。并告诉茅盾，卢学溥表叔在北京，希望他能考北京大学。说完，把一张刊登北京大学招生广告的《申报》递给茅盾。茅盾一看，《申报》有“北京直辖各校招生一览表”，招生分“大学预科、法政专科、工业专门、医学专门”四类，其中北大预科又分第一类和第二类，各招80名；考试科目有历史、地理、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博物、图书。学制三年。但考第一类，“理化、博物、图书”三门中免试二门。茅盾和母亲商量，决定报考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1913年8月11日，茅盾到上海澄衷学堂赴考，三天之内，考了历史、地理、国文、英文、数学、图书等六门功课。考完后，茅盾即返乌镇，等候录取通知，不久，《申报》登载录取名单，竟没有沈德鸿，只有一个叫沈德鸣的人，把全家吓了一跳，茅盾母亲猜想是报馆印错了的缘故。幸而没有几天，正式书面通知也寄来了。茅盾母亲笑着对茅盾说：“果然是报馆印错了。”

9月，茅盾风尘仆仆地去北京大学求学。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由湖州人胡仁源代理，预科主任是留美归来的沈步洲先生。茅盾这一届预科新生约



200 余人，宿舍在译学馆楼上。当时教师中中外合璧，古今通用，教师思想观念十分杂乱，真可谓新旧兼容。教史、地的是桂蔚丞和陈汉章：教国文的是年轻而又思想进步的沈尹默、朱希祖、马幼渔和沈兼士等，这些教师都是浙江人。因而被世人称为北大文科浙江人取代桐城派而兴盛。然而，一些教师个性怪癖，也给茅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教本国地理的教师桂蔚丞，以古代今讲地理，并用考证方法讲授，他一袭长衫，一壶茶，一只烟袋，依照大清一统志，参考各省府、县志，乃至《水经注》自编地理讲义，他在言谈中，视学生为私塾弟子，编讲义的参考书从来秘不示人。所以茅盾讲他“可谓用力甚劬，然而不切实用。”教历史的陈汉章亦是北大一个有名人物，他是浙江象山人，是俞曲园的弟子，也是章太炎的同学。他早就在京师大学堂教授，因为当时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中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于是他放弃教席，宁作学生，期望得个翰林。辛亥革命后，他的翰林梦打破了，改北大后仍聘他为教授。他表面看来落拓不羁，但内心依然十分困惑，他讲授历史时，自编讲义，别出心裁地从先秦诸子的作品中搜罗片段，证明欧洲近代科学所谓声光化电，在我国早已有之。还煞有介事的告诉学生，欧洲的飞机，在我国先秦就有了，《列子》上说的飞车，便是明证，还自豪地说，“那时候，现在的欧洲列强还在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呢。”满堂学生常常听得瞠目结舌。但后来陈汉章因茅盾当面说他是“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而和茅盾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他对茅盾说：“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二千年前我国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但为什么要这样编写呢！扬大汉之天声，说对了一半。你可知道，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畏洋人如虎，士林中养成一种崇拜外国的风气，牢不可破，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实在可耻！忘记我国是文明古国，比洋人强得多。我要打破这个风气，所以编了那样的讲义，聊当针砭。”一席话，茅盾听得肃然起敬，佩服这位老师的骨气。

在北京大学预科的三年中，茅盾在外籍老师的辅导下，较为系统地阅读了外国文学，学习了世界历史，如司各特的《艾凡赫》、狄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及莎士比亚的戏曲等，使茅盾的外国文学作品理论有一个全新的接触，茅盾感到眼界大开。

因为北京离乌镇太远，茅盾母亲去信关照茅盾，寒假不必回家。正在财政部当公债司司长的卢学溥便热情地邀请茅盾住到他的公馆里。并在卢表叔的指点下，研读二十四史。当时，卢学溥十分器重茅盾，鼓励茅盾研读二十四史，告诉茅盾，这二十四史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因而引起茅盾的兴趣。在北京的寒暑假中，茅盾一头钻进卢公馆，认真系统地读二十四史，收获不小。

然而，转眼春暖花开时，京城的谣言四起，说袁世凯不惜和日本背城一战，因而许多人都离开京城，远走他乡，以避战火。茅盾的一些同学也离开北京了。面对这些情况，茅盾心神不定地找到卢表叔，把听到的、见到的情状述说一遍。卢学溥笑道：“可惜总统年老，不是当年小站练兵的时候了。”茅盾一听，恍然大悟，袁世凯用了“将要与之，必先取之”的方法在愚弄京城百姓！茅盾悬着的心，又放下了。

茅盾在北京大学预科的最后一次考试时，袁世凯死了。在袁世凯死之前，袁世凯称帝不成，便把原先打算登基时用的广东焰火拿到社稷坛放掉，茅盾曾和同学夜里翻过宿舍的围墙去观看，看到焰火中有“天下太平”四个字，十分新奇。

茅盾在北京三年，完成了全部学业，于 1916 年 7 月返回家里。但日后工作、生活怎么办？对茅盾来说，真的一点预感都没有。

涉世不深，却把世相看得一清二楚；  
一封信引出一个机遇。  
身居大都市，渐入佳境。  
人们至今还在说，假如他在乌镇，  
晚年至多是个县政协委员；  
机遇——天赐奋斗的人

### 第三章 为新文学奠基

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生活之舟驶向那里？年青的茅盾还十分茫然！回乡当教师，还是托卢表叔在银行界做事，如果像茅盾这样年青、有知识的大学毕业生，欲进银行界，捧金饭碗，真易如反掌！比茅盾稍大的二个叔父及乌镇几个亲戚的孩子，都由卢学溥荐进银行界做事，何况一向受卢表叔器重的茅盾。

茅盾离开北京后，卢学溥接连收到茅盾祖父和母亲的信，希望卢学溥给茅盾安排个工作。当时茅盾的富有远见的母亲陈爱珠，在给卢学溥信中，特地提到不要在官场和银行界给茅盾介绍工作。所以茅盾回到家后，母亲与他商量职业事情，并告诉茅盾，耐心等待卢表叔的回音。其时，正在财政部任公债司司长的卢学溥，正受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巴结，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希望公债司的公债券能在他手下的京华印书局承印。如果争取得到这笔生意，那将是一笔可观的利润。所以，卢学溥打算将茅盾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那里既可以作学问，又是知识人才荟萃之地。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伯恒一听，一口应承下来，并立即去信上海；把茅盾推荐给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并说明这是卢学溥推荐的。7月27日，张元济收到孙伯恒信以后，立刻复信，答应可以“试办”，“月薪24元，无寄宿。试办后彼此允诺再设法。”孙伯恒收到张元济的信以后，立刻交卢学溥，并嘱早日去沪面见张元济。

茅盾在乌镇收到卢学溥从北京寄来的信并附孙伯恒函后，便径直去上海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本人又是翰林出身，知识渊博，爱才惜才，同时又受维新思潮影响，思想进步、开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有作为的文化企业家。茅盾后来成名，也得益于当时张元济的开明。所以茅盾曾评价张元济：“在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中，张元济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初进商务印书馆，茅盾一介年轻书生，碰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使年轻茅盾有一种既新鲜又陌生的感觉。求见张元济时，门口门卫拉住茅盾反复盘问，连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话都不曾听过说的人，竟然在总经理门口负责登记。当茅盾掏出北京分馆经理的介绍信，在这些人面前一抖，他们立刻换了一副笑脸，恭谦有加。这些世态，茅盾忽然想起自己家庭在失去父亲以后的遭遇，何乃相似！但初见张元济，双方，起码在茅盾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济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洋

式的、圆形，当时上海人称之为圈椅，因为它的靠背只是一道木圈），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济微微欠身，手指那圈椅说：“坐近些，说话方便。”我就坐下。张先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罢？”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却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找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对我说：“你听得了罢？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小张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罢。”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了躬，就走出他的所谓办公室。

这就是茅盾走出校门要见的第一个人！张元济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茅盾的脑海中。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茅盾一如既往地敬重张元济，视为师长。

茅盾第一个就业的部门——编译所英文部，部长是邝富灼，是个华侨，原籍广东，是在国外读大学，得了个博士学位，此时也只有40多岁。茅盾进英文部时，正巧英文部开办一个“英文函授学校”，函授的学生把作业寄来，而茅盾则改学生寄来的作业，所以，刚进编译所，茅盾的工作并不繁重。但在与同事接触熟悉过程中，他也了解了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内幕，了解了学术机构内部的派系，知道了社会的复杂。商务印书馆实际上也是不是官场的官场。他向母亲，向卢表叔写信，诉说了进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感想，一方面感到这个地方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感到商务印书馆是个变相的官场，处处讲资格，讲人情，“帮派”壁垒森严。卢表叔给茅盾来信，告诫他：只要有学问，何愁不立事业；借此研究学问是正办。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有个图书馆，叫“涵芬楼”，藏书十分丰富。星期天，茅盾常在那里度过。由于平时的工作很轻松，因而他常常可以在宿舍里看书看到深夜；在编译所，茅盾英语水平也大有长进，特别是口语训练。英文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在办公室里，同事之间的交谈基本上是英语。因而在这样的氛围里，茅盾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

有一天晚上，茅盾回到宿舍，见同宿舍里的辞典部谢冠生那里有一本新出的《辞源》，很厚，引起茅盾的兴趣，茅盾向谢冠生借来，在灯下读起来。忽然，茅盾发现这部作为商务印书馆重点产品的书，里面谬误百出，不足之处显而易见。血气方刚的茅盾此时心血来潮，闪念之间，冒出何不给总经理写封信，把想法告诉他的念头。于是，在更深夜静的时候，茅盾提笔向张元济写了一封信，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出版这样规模的辞书，商务在出版界开风气之先；但对条目引出处，有认错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同时，认为《辞源》所收新词不多，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等。信，第二天上午交茶房送去。

茅盾将信送出，也就过去了。这对青年茅盾来说，实在是一时冲动而已。他并非认真对待这件事。不料，当天晚上，同宿舍的谢冠生悄悄告诉茅盾：“德鸿，你那封信，总经理已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请编译所长高梦旦核办

了。”茅盾一听，大吃一惊，一封平常的信，会引起总经理那么大的注意？

其实这封信在茅盾文学创作生涯中，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成为青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崭露头角的一个转机！因为这封信，青年茅盾的才识引起商务当局的注意和重视！

第二天上午，编译所长高梦旦约见本在一起办公的茅盾，并开门见山地对茅盾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你意下如何？”茅盾表示同意，并特地去向邝富的告别，感谢邝富的一个多月的关照。于是，茅盾离开那机械的改卷子工作的英文部，与孙毓修合作译书。直接归编译所长高梦旦管辖。

50多岁的孙毓修起初瞧不起20出头的青年茅盾，认为这个桐乡小青年稚嫩，根底浅。然而，当茅盾很快将《人如何得衣》（卡本脱著）译完以后，孙毓修自负之气矮了一半，因为茅盾的译文无论如何要比孙译得好。而且当孙毓修征求茅盾如何在译作上署名意见时，茅盾表示可以不署名。孙毓修对这个年青小伙子有了好感。当后来发现茅盾在看《困学纪闻》时，他又吃了一惊，考问茅盾读过那些书？茅盾答道：“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昭明文选》、《资治通鉴》，《昭明文选》曾通读两遍。至于《九通》，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只是偶然抽阅其中若干章段而已。”一席话，孙毓修听得瞠目结舌。过了好一会儿，又问：“你的令尊在何供职？”家父早已去世。”茅盾恭恭敬敬地回答。“那你……”孙毓修更惊讶了。“主要得之于家慈的教育。”茅盾又说。孙毓修不再问了。他的名士派头收敛了。从此，对青年茅盾另眼相看。

随后，茅盾用三个多月时间，完成美国卡本脱的有关衣、食、住三本书的翻译，这是茅盾最初译著工作。但这三本书的真正出版，是在1918年4月，作为“新知识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发行。在译完衣、食、住以后，已是年底。老先生孙毓修找到茅盾，问茅盾下一步有何打算？茅盾想了一下，知道老先生孙毓修是中国编译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便说，“是否可以编几本童话或少年丛书？”孙毓修一听，摇了摇头，“我们要编一本开风气的书：中国寓言。但编此书须对古书有研究的人，你正合式。”孙毓修也觉得茅盾是个人才，因而觉得这个选题正可发挥茅盾的才能。向来谨慎、尊重人的茅盾也表示同意，因为借此可以系统阅读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部之书。后来，茅盾用半年多时间编成《中国寓言初编》，孙毓修作序，1917年10月出版。在动手编纂《中国寓言初编》之前，茅盾抽空翻译科学幻想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并刊发于《学生杂志》第四卷第1—4期，这是茅盾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译文。

正当茅盾埋首于古书旧著之时，母亲从乌镇来信，告诉茅盾，沈泽民已从省立三中毕业，投考何校，让茅盾在暑假回乌镇一道商议。因此，7月的一天，茅盾冒着酷暑，赶回乌镇。见弟弟也从湖州市立三中毕业回来了。弟弟把毕业的成绩单拿来给茅盾看，茅盾一看，发现泽民的成绩，尤其是数理化，在全校名列前茅。泽民还告诉茅盾：他想报考刚开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因为这个开办于1915年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专门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兄弟俩的想法向母亲讲了以后，茅盾母亲想了想后说：也好。这样，你

们两个当中，有一个当工程师，一个学文，也许符合你们父亲的心愿。于是，泽民专门赴南京去考试，不久便被录取。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开学时，茅盾和母亲决定陪泽民去南京。兄弟俩也正好陪母亲游览一下上海和古城金陵。那时，乌镇到南京，只有转道上海，因为乌镇到上海有小火轮，上海到南京则有火车。茅盾偕母亲、弟弟泽民先到上海，游览了上海城隍庙、外滩。茅盾母亲是第一次到上海，也觉得新鲜，但最为茅盾母亲所吸引的，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书，她买了林译小说 50 种，买了四大本《西洋通史》，二卷本《西史纪要》以及《东洋史要》、《清史讲义》等，茅盾母亲年轻时受其丈夫的影响，对中外历史一直怀有兴趣。在上海游玩几天后，母子三人才乘火车送沈泽民去南京。回上海时，茅盾母亲想坐轮船回上海，也可欣赏中国第一大河的风采。于是，茅盾选了一艘几千吨的豪华的大客轮，并定了个官舱。轮船航行在浩荡的长江里，茅盾扶着母亲到甲板上散步，这时，江风习习，大江东去，浩浩荡荡，远处白帆点点，茅盾见母亲遥望江天，神色凝重。忽然很有感触地回过头来对茅盾说：“你父亲一生只到过杭州，我今天见的世面比他多了。”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慨然说：“他的遗嘱我尽力做到了，你兄弟二人还算有出息，他死而有知，大概也是快活的。可惜一个人死了没有鬼，他再也不知我们现在干什么，将来还要干什么。”茅盾望着母亲，听了那番肺腑之言，感动万分，忙扶着母亲，安慰道：“妈妈放心，我们会记着爸爸的。”

茅盾送母亲到乌镇，回到上海，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些变化。原来，编《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的朱元善向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提出，要茅盾去他那个部门工作，协助他编杂志。因此，高梦旦找孙毓修商量，孙却以茅盾还要编《中国寓言续编》而不肯放，结果只好由高梦旦出面协调，让茅盾半天协助孙毓修编《中国寓言续编》，半天协助朱元善编《学生杂志》。从此，茅盾迈出编辑生涯的第一步。

《学生杂志》，1914 年 7 月创办，是一本以增长中学生课外知识为主的刊物。茅盾接手后，朱元善放手让他编辑，当时编了几期后，正巧《新青年》杂志打响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枪，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在中国文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善观风色，勇于趋进的朱元善便打算在《学生杂志》小试改革，并和茅盾商量，先从《学生杂志》开始，而《学生杂志》则从“社论”开始。因而朱元善操着浓重的海盐方言的上海话，让茅盾动手写一篇不同于该杂志以往社论的短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学生杂志》1917 年 12 月号上，题目为《学生与社会》，文章从探索德国兴起之原因谈起，借德人的话说：“学生为一国社会之种子，国势之强弱，因以社会之良肃为准，而社会之良窳，又以其种子之善否为判。”文章最后要求“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而处事不可不慎；处世宜乐观，而于一己之品行学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先事骄矜、蔑视他人。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恶运，以建设新业。”文章对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朱元善对青年茅盾的这篇社论十分满意，又鼓励他再写一篇社论。于是，茅盾又写了一篇，题目为《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发表在 1918 年 1 月 5 日的《学生杂志》上，这篇文章，比上期的文章更进一步，大胆地议论起时政来了，倡导革新思想，奋斗自立，并大声呼吁学生“翻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并要求学生“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和“奋斗主义”。其实，茅盾的这些思想并

非创造，而是受《新青年》的启发，从而把《新青年》中一些思想融会到自己的文章里，而文章又紧紧联系当时学生的实际，从而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也得到朱元善等人的关注。青年茅盾也在静静的气氛中，悄悄地崭露出来。从1917年到1921年，茅盾以沈雁冰、佩韦、雁冰、Y.P等名发表的作品中，有包括创作、作家传记、文艺论文、汉译文艺作品、科学、实用工艺及社会运动等方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学生杂志》是茅盾为营造新文学而进行操练的地方。

少年时代的生活磨难，深深地刺激着茅盾，也深深地激励着茅盾，“将相本无种”，促使青年茅盾加倍刻苦和努力，虽在花花世界的上海滩，却无暇去闲逛，整天埋首于工作之中，为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分卖力。表现了青年茅盾自强不息的个人奋斗精神。因此，他在编《学生杂志》时，十分看重地位低卑，经过奋斗而出人头地的故事。在《学生杂志》上，茅盾从涵芬楼丰富的藏书中，撷取材料，编写一些从低微的鞋匠、裁缝变成名人的故事。从这些篇什中，反映了茅盾崇尚奋斗、力倡革新的思想，他在《履人传》前言中，表明自己的心愿：“吾愿其效卡莱之好学，百折不回；学乔治之束身，不为众涅。效萧物尔之见义忘生，约翰之贫而好善，……。”和茅盾自己的经历不无关系。茅盾晚年回忆往昔峥嵘岁月时，曾说：“《履人传》和《缝工传》都是赞美大丈夫贵自立，这与《一九一八年之学生》论文所提倡的革新思想，奋斗自立的精神是呼应的。”其实，这是和茅盾当时思想相一致的。

在编辑《学生杂志》过程中，受《新青年》的影响，茅盾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世界，尤其注意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他如饥似渴地寻觅着苏俄材料，包括各类文学杂志。发表在1919年4月《学生杂志》上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是茅盾第一篇文学论文，在这篇文章中，茅盾预言“今俄之BOLSHEVISM，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而托尔斯泰实其最初之动力。”一种青年人特有的雄心壮志，和《新青年》遥相呼应。这篇富有鼓动、煽动性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北京的知识分子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以及陆宗舆等革命行动，但对遥远的上海震动不大；直到北京师生南下宣传，茅盾才从编译所里跑出来，去听演讲。但尽管如此，五四浪潮波及全国时，青年茅盾也受到震撼，章宗祥、陆宗舆都是杭嘉湖一带的人，陆宗舆的家乡海宁县举行全县人民公决大会，开除卖国贼陆宗舆的海宁县籍，并在县城立碑存志。这些举动，茅盾在《申报》上都看到了。湖州也举行大会，声讨章宗祥的卖国罪行。茅盾猛烈地感觉到：时代在变，思想观念也将发生变革。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茅盾开始作深层的思考，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在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实际的奠基工作。尤其可喜的是，青年茅盾不再局限在《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开始向《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投稿，也开始翻译外国小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就是他翻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第一次用白话翻译的小说。

同时，茅盾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接触大量西方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学说都有接触，茅盾曾回忆那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在这样的大背

景，大时代里，茅盾受时代使命感的驱使，阅读大量西方哲学，社会学著作，并在对众多诸学说比较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时已是1919年年底。

在这之前，受《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影响，茅盾和弟弟沈泽民、同乡萧觉先、王敏台、杨朗垣、曹辛汉等发起成立“桐乡青年社”。这个青年社成员都是桐乡籍的知识分子，他们成立这个社团的宗旨，是宣传新思想，抨击恶势力。并出版《新乡人》杂志，在家乡桐乡县内及邻近地区发行，成为浙江省五四运动以后第一个宣传新文化社团。在桐乡青年社内，茅盾是主要骨干。后来由桐乡青年社出面，曾在桐乡、屠甸、乌镇等地组织过暑假讲习会之类活动，也曾在嘉兴南湖开过大会。兴旺时，达到五十多人的规模，后来因为内部思想分歧而自动解散。作为在商务印书馆前程看好的茅盾，曾在桐乡青年社办的《新乡人》杂志上发表短小的文章，如《我们为什么读书》、《骄傲》等，宣传新文化，倡导新思想。显示了青年茅盾的热情。1919年的下半年，中国文化在《新青年》的推动下，经过艰难的发轫，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一个文学革命态势已经形成，并开始冲击那些封建、守旧文化观念和文化杂志。北方出现鲁迅的白话小说，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新诗，这使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学开始新生，开创20世纪新文学的新纪元。这些文化现象，使上海文化界出版界当权者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但出路何在？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只有施行改革，才能使一些文化企业的刊物走出老路和困境。这一年的11月，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的王莼农找到茅盾，说《小说月报》打算改革，并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并新辟一个栏目，叫“小说新潮”，请茅盾来主持这个栏目。但茅盾此时正同孙毓修搞《四部丛刊》，又帮助朱元善编《学生杂志》，现在又冒出个王莼农来，拉着茅盾去编创作的专栏，茅盾心里还没有底，便问道：

“是看稿子，并决定取舍么？”

“也要出题目。”王莼农回答。

“出什么题目，那个方面的？”

“比如要翻译什么作家的作品。就要出题目给作者译者。”“噢。那么创作怎么样？”茅盾又追着问。

“这个小说新潮专栏专登翻译的西洋小说和剧本。”王莼农又回答。

这时，茅盾觉得这样去接手，未免太没有意思了。沉思一会儿，便推托说：“王先生，我现在手里的事太多，抽不出时间帮忙。”王莼农一笑，说：“知道沈先生事多，我已和孙毓修老先生商量好了，《四部丛刊》的事可以不管。”“我在《学生杂志》也还有点事。”茅盾继续推托。不料王莼农又说：“我也和朱元善先生商量过，请你分心照顾我这里一下。”说完，望着茅盾，眼睛里露出一种期待的目光，等着茅盾回应。“那好吧，不过我还得跟孙老先生和朱先生说一下。”茅盾再不好意思推托了，便答应下来。

时间十分紧迫，此时已是11月了，要在明年第一期作改革，必须立刻动手，才能赶上排印。于是，茅盾在两个星期之内，设想了《小说月报》中“小说新潮”栏的改革框架，写了《小说新潮栏宣言》和《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前者讲“小说新潮栏”的设想和要求，并按照王莼农所谓“出题目”的要求提出急需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共20位作家的43部作品。并把欲介绍的作家分出二步来，第一步介绍写实派自然派的作品，第二步介绍问题著作。最后，茅盾认为，把国外的作品拿来，“然后我们创造自己的新文艺有了基础。”

从茅盾接手《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进行改革，使得十年之久的



《小说月报》作为顽固派堡垒，已被打开一个缺口，成为茅盾改革旧文学的“试验田”，并立即在上海文坛引起注意，引起读者的热烈反映。后来茅盾成为打开旧文学堡垒缺口的先锋！因而同时他也成为顽固派文人的对头。这也是事实。因为《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一本文学月刊，它创刊于1910年，距今已有十年，在旧派文人和市民阶层中有一定影响，先后有恽树珏，王蕓农任主编，而这些主编本身都是旧式文人，像王蕓农是无锡人，南社社员，懂英文，善骈文、词曲。因而用的稿件，大都是林琴南的译文，包天笑等迎合小市民兴趣爱好的“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及“东方福尔摩斯探案”之类的侦探小说。“小说新潮”栏一改革，青年茅盾仿佛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在上面亲自撰写倡导新文学的文章，翻译苏俄作品，引起了广泛注意。不久，茅盾主持的这个专栏，便一举成功，慢慢地，连整个《小说月报》用稿，也在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了。

但是，总体上看，茅盾这一时期的吸收和写作，是比较庞杂的。有讲文学思潮，文学作品，作家生平的，也有讲社会思潮问题，妇女问题、学生问题的，但一个总的目标似乎很明确，就是此时的青年茅盾，在求新求变上作努力。自然，在新文学的倡导中，谈何容易，阻力很大，许多旧文人认为这个青年侵占了他们的地盘，因而他们感到愤怒；商务当局中某些守旧人物，却觉得非常为难，杂志发行量在下降，直接影响利润，青年茅盾又得罪了许多有名的文人。王蕓农这种折中做法，进入了两面都不讨好的窘境！王蕓农感到无能为力了。

此时，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商务印书馆一些刊物销路的下降，如《小说月报》销路已跌至二千。引起商务当局的严重关注。张元济、高梦旦商量后，寻求北上走访文学界和学术界，寻求商务印书馆新的发展机遇。张元济在1920年10月6日到达北京，4天后高梦旦也随后而去，张元济先生拜访在京的同乡著名军事家、文学家蒋百里。蒋百里则向张元济推荐郑振铎、周作人。并说这些文学青年准备办文学刊物，成立文学社团等。高梦旦到京后，便去北京大学拜访胡适，胡适也热情地赞同高梦旦他们的做法，并推荐文学研究会成员来负责编辑《小说月报》。此时，张元济、高梦旦又多次和郑振铎、耿济之等接触，磋商。张、高等商务当权者，都希望郑振铎去上海主持《小说月报》的编务，此时郑振铎与茅盾虽未联系，却从文章中知道沈雁冰的才识学问。郑振铎因尚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学业未满，不能去沪上办刊物，便竭力推荐沈雁冰（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并说他主持的“小说新潮”很有起色，是可胜任此职。

正当张元济、高梦旦在北京物色人才时，王蕓农觉得自己再撑下去，已没有什么意思了，在高梦旦回沪后，便向当局辞职。此时，张元济、高梦旦心里已有底，虽然去北京没有请到人才，却发现了身边一位青年。因此，商务当局准许王蕓农辞职。同时在11月下旬的一天，专门找茅盾谈话，想让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同时与高梦旦一起和茅盾谈话的，还有高的同乡陈慎侯。高梦旦告诉茅盾，王蕓农辞职，王原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两个杂志的主编，当局考虑后请他担任。茅盾则表示，自己年轻，只宜担任一个杂志，即《小说月报》的主编，而《妇女杂志》则不能兼任。高梦旦也同意了，又问：“全部改革《小说月报》的具体办法如何？”茅盾答道：“让我去了解《小说月报》存稿情况以后，再提办法。”开明而自信的高梦旦望着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青年人，连声赞同。

他当时说：

“我不要伊，别人要伊么？”

“解放了伊，做个‘人’！”

他后来说：

“我那时全神贯注在我的事业上，老婆认字问题，觉得无所谓”。

命运的安排，新式、旧式，都是缘分。

#### 第四章 当新郎

茅盾在文学事业上，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战士；但他的婚姻却是传统的，也是名副其实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情况，在茅盾那一代倡导新文化的青年人中间，并不鲜见。鲁迅与朱安，胡适与江冬秀，都是这样的情况。因此，茅盾与孔德沚的婚姻，在那个时代里属于正常。从深一层看，茅盾受母亲教育、训导，对母亲敬爱到言听计从的地步。同时，从小学中学至大学，茅盾所受教育，也是传统的，基本上是儒家那一套。只不过是程度深浅而已。因此，儒家的传统文化，在青年茅盾潜意识里起了很大作用。

而更为传统得令外人咋舌的是，这个新文化战士的婚姻，还在他幼年时，就为祖父、父母们所“钦定”！事情的原委，还得从两家世谊讲起。

茅盾沈家与妻子孔家，都在一个小镇上，双方的祖辈早就稔熟。那时，茅盾祖父沈恩培和茅盾妻子的祖父孔繁林俩人常到东栅钱隆盛南货店喝茶聊天。开南货店的钱家与茅盾的四叔祖是亲戚（钱家是茅盾祖父沈恩培弟媳的娘家）。所以，久而久之，沈恩培和孔繁林很谈得来。有一年初夏，温和江南暖烘烘的，百花竞开，万物竞长。午后，沈恩培背着5岁的孙子茅盾，照例去钱隆盛聊天，正和店主钱春江闲聊的时候，东栅孔繁林抱着仅4岁的孙女来了。两个孩子在店堂里玩耍，三个大人却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笑着，说着说着，店主钱春江忽然看着两个在店堂里玩耍的孩子，对沈恩培和孔繁林说：“这两个孩子真般配，你们两家本来是世交，定个亲吧，门当户对的。”孔繁林和沈恩培听罢，相视而笑，连连说：“好，好。”大家又说笑一阵，然后各自回家去了。

当沈恩培抱着孙子回家，与儿子说了在钱隆盛店里，钱春江作媒，孙子和东栅孔繁林的孙女订亲，并说自己已经答应。茅盾父亲一听，沉吟一会儿，说，“也好。不过此事还要同爱珠商量商量。”茅盾父亲同意了，后来与茅盾母亲陈爱珠商量这件事。茅盾母亲一听，摇摇头说：“现在两边都小，长大以后是好是歹，谁能预料？”表示不同意。

茅盾父亲听了以后，笑一笑，敛起笑容，解释说：“正因为年纪小，定了亲，我们可以作主，要女方不缠足，要读书。”并向茅盾母亲讲了藏在他心里的一件往事：他在和陈家订亲以前，曾有媒人拿了孔繁林的女儿的庚帖来说亲，不料请镇上有名的看相家排八字，竟说女方尅夫，因此不成。这时，他也已经十六七岁，并中了秀才。女方也已十五六岁，听说自己命中尅夫，觉得永远嫁不出去，心头悒结，不久成病，终于逝世。茅盾父亲讲完十多年前的一桩往事，看了茅盾母亲一眼，叹口气，觉得欠了人家一笔债似的，心里觉得愧疚。茅盾母亲知道丈夫有偿债心态，觉得有道理，口气也软了下来，但仍担心地问：“如果这次排八字不对，又是相克，怎么办？”“此事由我作主，排八字不对头，也要订亲。”茅盾父亲心情沉重而又坚决地说。茅盾

母亲不再多说了。于是，茅盾祖父在趁去钱隆盛店喝茶时，才正式给个回音。不久，女方孔家送来庚帖，茅盾祖父仍请镇上那个老星相家去排八字，结果竟是大吉！后来茅盾才知道孔家已将女儿的八字都改过了。

孔家与沈家联姻订亲以后，茅盾的父亲让钱春江传话过去，要孔家不要给女儿缠足，要让女儿念书。但此时孔家还十分古板和守旧，孔繁林经商有方，有些积蓄以后，便整修荒圯已久的孔家花园，它的雅号叫“庸园”，园内有“壶隐厅”，有假山“美女峰”，美女峰上有人寿楼，楼上挂有太史公俞樾手书“花好月圆人寿”的横匾，园中还有“放鹤亭”、“鱼乐池”、“皓皓轩”、“养性居”、“步矩亭”等景亭轩。因而孔家这个大家庭（比茅盾老三房时代还人多），十分封建，他们老辈人还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念什么书？而缠小脚也是为你们好，现在你们沈家大人说不缠脚，将来孩子长大后，认为大脚难看，这不又出一道难题了么？孔家老辈人听了沈家要求，思忖道：才不上你们沈家的当呢！缠足，照缠；念书，不念。把沈家要求当作耳边风！而茅盾父母以为讲过后，孔家会重视并照办的。不料后来一打听，仍没有让孩子上学。后来茅盾父亲一死，沈家的意见更不被重视了。

茅盾进中学，上大学，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后来在上海崭露头角。此时，茅盾母亲牵挂的，正是儿子的婚事。唯恐儿子在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沾上坏习气、轧坏道，把自己的苦心培养付之东流。因此，母亲在茅盾1917年春节回家时认真地盘问他，“你有女朋友么？”茅盾腼腆地说：“没有。”“真的没有？”茅盾母亲又紧逼着问。“真的没有。”茅盾坦然地答。停了一会儿，茅盾母亲说：“女家又来催了，我打算明年春节前后给你办喜事。”说到这里，茅盾母亲停了一下，看了一眼红着脸、腼腆的儿子，又说：“从前我料想你出了学校后，不过当个小学教员至多中学教员，一个不识字的老婆也还相配，现在你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过半年，就受重视，今后大概一帆风顺，还要做许多事。这样，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就不相称了。所以要问你，你如果一定不要，我只好托媒人去退亲。不过对方未必允许，说不定要打官司，那我就为难了。”

当初茅盾听了母亲这番肺腑之言，十分体谅母亲的苦处和难处。在母亲面前，茅盾绝对是个孝子。自然，花花世界的时髦女性，对青年茅盾来说，并非没有吸引力。但此时的茅盾，似乎一心扑在作学问上，还没有多余时间去想个人婚姻大事。为了替母亲分忧，分担一些劳累，茅盾向母亲表示，识字不识字，也无所谓，嫁过来后，孔家管不着了，母亲可以教她识字，也可以让她进学校。茅盾母亲听罢儿子的诉说，颌首赞同。

婚礼是在1918年春节后举行。茅盾母亲嫌观前街老屋太小，腾不出一间像样的房间，因而与茅盾四叔祖商量，租借四叔祖家余屋作新房，此时四叔祖家住在乌镇北花桥东堍的北港，与王会悟家为邻，洞房在楼上。结婚仪式完全是旧式的，花轿、嫁妆一路从东栅抬来，迎亲、拜见长辈等一应繁琐礼节后，又开始宴会和闹洞房。此时青年茅盾虽说在上海崭露头角，但对小镇上这些礼节，似乎也并不太认真。几个亲戚家的小客人追着他要糖吃，他便躲进床里，扮着和尚打坐状，逗引得表弟陈瑜清等小客人笑弯了腰。

茅盾见新娘子生得并不漂亮，却十分健壮。见了茅盾家那些从未见过的亲戚客人，也不怯生，而是谈笑自如，很大方。但新婚第二天，却发生一桩使茅盾母子都惊讶、又不便直说的事。原来，茅盾母亲对孔家情况，虽然在一个镇上，却并不了解。所以她问了新娘子的一些情况，包括新娘子读过

那些书，认得那些字，会不会写信等等。结果，这位刚嫁给中国文坛青年骁将的新娘子，只认得一个“孔”字和1—10的数目字！闲谈中，新娘知道茅盾曾去北京念书，现在又在上海工作，便问北京离乌镇远呢，还是上海离乌镇远？问得茅盾母亲目瞪口呆，想不到孔家如此闭塞守旧！沈家几次三番传话给孔家，让女孩子去读书，结果沈家的这些要求，竟都成了耳边风了。但茅盾母亲没有再说什么，觉得新娘子是无辜的，责任在孔家长辈身上。此时，聪明的夫人觉得自己没有念书，在丈夫和婆婆面前矮三分，心情十分沉重。茅盾望着夫人淳朴的面庞，聪明而渴望知识的眼神，陷入了沉思：中国妇女解放的任务是多么艰巨呀！现在，茅盾亲身体会到在中国，妇女解放的迫切性。所以，他后来发表的一系列妇女解放的文章中，竭力主张“把踹在地下的女子扶起来，一同合作，向前猛进。”并提出“提高女子的人格和能力，便和男子一般高，便成促进社会进化的一员，那便是我们对于女子解放的理想的大标帜。”并提出妇女解放的新理想标准：“就是要把女子看作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要尊重伊们的意志，我们要还伊们自由，同时我们也要把从伊们那里揽来的责任归还伊们。”茅盾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深深感到妇女解放运动的紧迫性和严重性。

按乌镇婚嫁习俗，茅盾结婚三日后，偕新娘去岳父家拜见长辈，因岳父无心铺张，仪式相当简单，只是见个面，略备茶点招待，盘桓半天后，即偕新娘回家。在岳母家里，茅盾却发现新娘治家有方，两个调皮弟弟见她十分听话，心中暗喜。但回家后，茅盾母亲便发现新娘子两眼红肿，便究问起来，才知道新娘子回娘家与她母亲吵架了，埋怨母亲不让她念书。害得她在婆家成了十足的乡下人！茅盾母亲便开导她，用苏老泉的例子激励她可以重新学习。并表示，只要新娘子肯学习，她愿意教她识字读书。并又让茅盾为新娘子取名为“德沚”。

新婚的日子似乎过得特别快。茅盾想到编译所还有不少事要等他去做，想早点回上海，以免耽误那边的事情。他对母亲讲了自己的想法后，母亲表示：“你回去吧，德沚，我来教她。”此时，在旧俗气氛十分浓郁的小镇上，有新婚一月不能空房，空房则不吉的说法。茅盾母子却不信这个俗理。但茅盾去岳母家向岳母辞行时，却遭卧病在床的岳母的反对，“该过满月才走。你们新派也太新了。”茅盾只能点头安慰几句，没有再解释。

茅盾回家乡过年并举行婚礼后，没有度完蜜月，便匆匆坐船回到上海。而夫人则由母亲教识字教写字。每天上午、下午各写两个小时字。这样学了一两个月，孔德沚倒识了五六百字。但茅盾母亲发现儿媳一个人在读书时，心神不定。问其故，也无结果。有一天茅盾的二婶谭谱生来串门，与茅盾母亲聊天时，说到德沚读书，谭谱生告诉茅盾母亲：石门（离乌镇二十里路）丰斛泉的大女儿在办一个小学，专收女生，叫振华女校，如果德沚能进学校，和同学一起听课，效果就不一样了。于是茅盾母亲托谭谱生去石门商量一下，像德沚这样年纪，学校能收否。后来，振华女校答应接收孔德沚去那里读书，在振华女校，孔德沚读了一年半，认识了张琴秋（后来成为她的妯娌）、钱青等年纪比她小的同学。

此时茅盾在上海，参与《小说月报》的改革，并日夜用心在工作上。后来因岳母病重，孔德沚只好休学回家侍候母亲，再加上她对校长的态度看不惯，便干脆辍学回乌镇，再不去石门读书了。茅盾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再由自己教儿媳。孰料，孔德沚识字渐多以后，心思也活了。正在湖州湖郡女校

读书的邻居姑娘王会悟回乌镇时，向孔德沚宣传湖州那所学校如何如何好，也劝孔德沚去那所教会办的学校念书。孔德沚在乌镇住得发慌，也正想去外地读书，和王会悟的建议不谋而合。孔德沚不等与婆婆、丈夫商量，便答应去那里。茅盾知道后写信给母亲，请母亲劝孔德沚，不要去那种学校读书。固执而求知心切的孔德沚还是去了。茅盾母亲觉得没有办法，只好让她去试试。

可是，没有多久，孔德沚自己逃回家来，原来这湖郡女校因是教会办的，学校里都讲英语，孔德沚因从未学过，自然无法上课，哑巴一般无法交流了。因而自己大呼上当，忙逃回乌镇。

这时，茅盾母亲觉得儿媳一人在乌镇寂寞，不如早点让她搬到上海，与儿子团聚。于是私下写信对儿子讲了自己的想法。并让儿子在上海找住房。其实此时，茅盾母亲还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想法：常常看报纸的茅盾母亲知道，许多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常常鼓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也发现许多年轻人以搞“家庭革命”为时髦，抛弃糟糠之妻，另寻新欢。因而她担心儿子在上海这花花世界，会出什么事。所以，茅盾母亲希望儿子在上海找好房子，和媳妇团聚，也好让她放心。

茅盾和孔德沚的婚姻，因为当时茅盾还没有出名，因而显得十分平常，无论在商务印书馆，还是在乌镇这样的小镇上，都没有引起特别的注目和议论。后来孔德沚一生和茅盾风雨同舟，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而茅盾在人生道路上，虽偶然有过闪失，但综观其一生，道德文章，也堪称楷模！

青年文人的锐气得革命家的关注；  
日夜奋斗竟忘了母亲的关照，果是如此，还是别有原因。  
“钟英”小姐的故事，更具有神秘性，  
他难以说清。

## 第五章 参与建党

正当茅盾为妻子读书、识字的事而被敬爱的母亲“逼”得来不及招架时，他又被商务选为对《小说月报》进行改革的最佳人选。所以，那天高梦旦等找茅盾谈话后，茅盾答应了解一下《小说月报》存稿情况后再说。当局同意了。于是茅盾先向王莼农了解《小说月报》的存稿情况，发现王莼农已买下了而尚未刊出的稿件，足够用一年，而且全是礼拜六派的稿子。茅盾又问了其他一些情况后，心想，“要改，就顺应时代潮流，彻底改，否则不如不干”。茅盾在向高梦旦、陈慎侯回话时，提出改革《小说月报》的三条原则意见：

一是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二是全部从四号字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给全权办事，不得干涉主编的编辑方针。

商务当局高梦旦等人研究后，同意茅盾意见，但要求1921年的第一期，按新方针及时发稿，不能延误出版。因此，茅盾完全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连家里的信也忘了回，全身心地投入了筛选稿件、编辑《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期的工作。

在编第一期《小说月报》时，一个偶然机遇，茅盾认识了郑振铎。并通过郑振铎得到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等作家的大力支持。同时，又逢在北京发起的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因此正当《小说月报》编就时，郑振铎又将文学研究会的章程、名单等寄来，这犹如一缕春风，给《小说月报》注入了清新、活泼的风采。稿件编就，茅盾挑灯撰写《〈小说月报〉改革宣言》，提出革新办法，表明革新之心志，介绍新栏目等，立论气势，都显出虎虎生气。他在“宣言”中提出：“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而对写实主义，虽在世界范围内“已见衰歇之象”，但在中国，“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同时认为“一国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唯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之地。”在这个改革宣言中，茅盾对旧文学也不绝对否定，认为“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所以，综观宣言全文，茅盾的锐气十分强烈，倾向也十分明朗，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公允。因为刊物毕竟还属于商务当局主办的。改革后的第十二卷第一期《小说月报》除了两页彩插，三幅铜版纸精印的图片外，内容上完全是全新的感觉。茅盾撰写的《改革宣言》，用四号字排了两页多，紧接着是两篇论文：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和沈雁冰的《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的身份的误认》，在《创作》专栏里，有冰心的《笑》、叶绍钧的《母》、许地山的《命命鸟》、慕之的《不幸的人》、潘垂统的《一个确实的消息》等等。在《译丛》专栏里，有果戈里的《疯人日记》、托尔斯泰的《熊猫》、泰戈尔的诗等，还有剧本、海外文坛消息等，可谓蔚为大观，给人以耳目一新。因此，第一期一出版，立即在上海及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时事新报》、《学灯》立即发表文章，评介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时，商务印书馆各

地分馆纷纷向上海总馆来电，要求《小说月报》下期多发。结果，第一期 5000 册，第二期发行上升到 7000 册，到年底竟翻到一万册。茅盾在改革《小说月报》中，一炮打响。

在这之前，因茅盾当时编《小说新潮》栏时，尚有余暇，便写了大量文章，在《东方杂志》、《学灯》、《解放与改造》、《新青年》上发表，引起北京陈独秀等人的注意。他们发现茅盾思想进步、敏锐，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因此，1920 年初，陈独秀到上海以后，约见沪上有关人士，秘密会谈。陈独秀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同时被陈独秀约见的除了茅盾外，还有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人。茅盾久闻陈独秀其人，觉得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但进屋见到其人，却发现四十多岁的陈独秀，头顶微秃，举止随便，说话和气，竟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大家谈了一阵后，茅盾便告辞。陈独秀给茅盾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1920 年 7 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并秘密办了个刊物《共产党》，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第三国际、苏联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主编是李达。同年 10 月，茅盾和邵力子去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当时第三国际代表威庭康斯基也在座。陈独秀征求邵力子、茅盾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意见，茅盾表示赞同。于是，茅盾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邵力子也同时加入共产主义小组。

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共产党》杂志任主编的李达，立即向茅盾约稿，此时，茅盾尽管因编《小说月报》忙得焦头烂额，但对政治热情仍十分高，既然加入组织，那应该为组织办事，而且借此也可研究马克思主义，从政党理论上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因此，李达约稿，茅盾便欣然允诺，一口气翻译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 IWW 的恳请》、《美国共产党宣言》四篇译文，发表在 1920 年 12 月 7 日出版的《共产党》杂志第二期上。后来，又陆续翻译了《共产党的出发点》等文章，发表在秘密刊物《共产党》杂志上。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建设，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2 月 16 日，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的邀请，去广东办教育。临行，茅盾和李汉俊等都去送行。而陈独秀则把《新青年》的编务交给陈望道。陈独秀走后，上海共产党小组李汉俊等人，开始筹备起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务来。因此，当时上海共产党小组在秘密状态下，活动异常频繁。此时，茅盾又刚接手《小说月报》，千头万绪的事务和写作编务，真的无暇顾及妻、母了。母亲在乌镇连连来信，责问茅盾为何迟迟没有找到房子？是不是……。一定要茅盾在上海找房子，她也好将带儿媳孔德沚来团聚。茅盾不能向母亲、妻子明说自己的政治活动，三言两语也讲不清自己编《小说月报》的忙碌，接到母亲几次来信后，茅盾托编译所宿舍的管理人员福生，去外面寻租。结果，三个月后，即 1921 年 2~3 月间才在鸿兴坊找了一座带过街楼的房子。经过装修后，茅盾才把母亲、妻子接来，又雇了一个专管洗衣买菜的佣人。妻子孔德沚则进爱国女校读书。茅盾母亲到上海新居一看，茅盾两只大书架上放满了洋装书，知道儿子忙在学问上，以前的疑虑，顿时冰释。一个小家庭，在忙碌中总算安定下来了。但茅盾的社会活动，此时却有增无减。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和嘉兴召开。茅盾、陈望道等都不是代表，均未到会。“一大”以后，根据会议通过的中共党纲规定，凡有党员 5 人的地方，

可建立地方委员会。“一大”还选举陈独秀为中共总书记。但陈一直在广州，于是在上海的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力主陈回沪负起总书记的责任。同年9月，陈独秀回上海。不久。根据中共一大党纲规定，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任书记，茅盾为委员。

自陈独秀回上海后，商务当局为了招徕名流，让茅盾去设法聘请陈独秀为馆外名誉编辑。此事正中陈独秀下怀。于是，陈独秀定居上海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支部会议就在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家里召开，每周一次，主要讨论分析形势，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等，参加的人中，有邵力子、杨明斋、陈望道、张国焘、俞秀松等。大都是年轻人。因这些人白天都有工作，因而每次开会，都在晚上8时以后，直至半夜。这在过去，茅盾是毫无问题的，熬夜本来是茅盾家常便饭。但此时，茅盾已举家迁沪，妻子、母亲及刚出世的女儿都在身边，而自己除了《小说月报》大量编务外，还要从事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参加支部会议，而这种秘密活动是有很大风险的，甚至有生命之虞。对当时情景，茅盾有一段很平白的回忆：

“我去出席渔阳里二号的支部会议，从晚8时起到11时。法租界离闸北远，我会后到家，早则深夜12点，迟则凌晨1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是假托是在友人家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家来开呢？我说，如果这样，支部里别的同志就也要像我那样很远跑来，夜深回去，这也不好。所以，暂时仍旧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渔阳里二号开会，深夜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德沚瞌睡，而且第二天要去读书，母亲体谅她，叫她早睡。”

茅盾除了每周有一晚上秘密活动外，还要每周参加一次白天的政治学习。除过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外，还请从苏联回来的杨明斋、经济学家李达等讲课。自然，这一切都是在秘密进行。但共产党的这些活动，频繁地出出进进渔阳里二号，引起法国捕房的注意。后来在一次小聚会时，陈独秀高君梅夫妇和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被法国捕房拘捕，后经营救，才以罚款了结。

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在1920年暑假前，因言论激烈而受当地军阀的注意，幸而校长惜才，让他和张闻天逃出南京，然后一道东渡日本。半年以后，即1921年1月返回国内，走其胞兄的路：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和文学研究，另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1921年4月，茅盾在自己家里召开的支部会上，介绍沈泽民加入共产党组织。中共中央考虑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有利条件，便决定由茅盾担任中共中央的交通员，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外地党组织人员到上海找中共中央，先找茅盾，然后由茅盾报告中央后，再通知来人去某处汇报工作。因而，商务同人看来，年青的茅盾活动能力很强，人缘很好，外地朋友也特别多。同样，外地党组织向中央送报告，也不直接送给总书记，而是寄到茅盾那里，信封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然后由茅盾转送中共中央。这些来信一多，引起商务印书馆同事的注意，这位“钟英小姐”是谁？是不是茅盾的情人？同事都摸不透内情，去问茅盾，茅盾总是支支吾吾，避而不答。因此大家更觉得蹊跷。一天，刚进商务印书



馆不久的郑振铎见邮差送来一封“沈雁冰先生转交钟英小姐玉展”的信，见茅盾不在，便偷拆开来看，因为他想抖开这个“情人谜”。哪知道拆开来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共产党福州地方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钟英”乃“中央”之谐音。郑振铎等几位同事都是茅盾的朋友，彼此都十分信任。现在内情既已窥破，大家都替茅盾保守秘密。从此，编译所内再也没有人议论茅盾的这些信了。茅盾在编译所工作时，担任中央联络员（交通员）一直持续到1925年春天。

当时，年轻的茅盾精力充沛，像一头牛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但是家中事务，却无暇顾及，全仗母亲料理。1921年女儿沈霞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生气。1921年10月间，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李达提议创办一所旨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这样，既可培养中共妇女干部，又可安排中共党员家属，为地下机构掩护。陈独秀、李达他们的设想，得到中央的批准，并要李达及其新婚夫人王会悟具体筹办。后来这所学校，就是平民女校。李达任校长，有学生约30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设高级和初级两个班，一个工作部。高级班有蒋冰之（丁玲）、王一知、王剑虹、傅戎凡、傅一星、王醒锐6人；李达夫人王会悟、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为高级班的旁听生，同时兼初级班教员。此时，正忙得不可开交的茅盾，又被拉去平民女校教书，一星期去3个晚上。其他，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泽民等都去讲课。此时，茅盾夫人孔德沚的一个在家乡石门振华女校的同学张琴秋也来了上海，进平民女校读书，她在这里与沈泽民相识，后来和沈泽民结婚，成为茅盾的弟媳。

1922年，茅盾讲了半年课后，因李达去湖南自修大学教书了，平民女校的日常工作交给蔡和森和向警予，但由于人少，经费少等原因，平民女校便很快结束了。恰在这时，国民党打算把上海原东南高等师范改名为上海大学，并让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校长。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后，决定让“上大”成为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于是大量共产党人进入这所学校，并成为这所学校的中坚。如邵力子实际负责，邓中夏负责担任总务长，瞿秋白从苏联回来后，也被聘来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聘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只有英国文学系何世桢是国民党右派。但教员中的共产党员更多，像茅盾、沈泽民、蒋光慈、侯绍裘等都去上大任教。此时，茅盾内弟孔令俊从乌镇到上海来，投奔姐姐和姐夫，茅盾见他聪明，思想也很进步，便介绍他进上海大学中文系。从此，茅盾一家又多一个革命者。

随着共产党组织的扩大，投身中国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1923年7月8日，上海全体党员开会，传达中共三大会议精神，决定国共合作，各地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上并成立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取代原上海地方委员会。职权除上海外，兼管江苏、浙江两省发展党员，成立小组及开展工人运动等。会上，对组织也进行调整和改选，选出徐梅坤、沈雁冰、邓中夏、甄南山、王振一五人为执行委员，张国焘、顾作之、郭景仁三人为候补委员。7月9日，执委召开会议，王荷波、罗章龙、彭雪梅也来列席会议，会议决定邓中夏为兼区委员会委员长，徐梅坤为秘书兼会计，王振一、甄南山为劳动运动委员、沈雁冰为国民运动委员。全上海分四个小组：上海大学为第一组，其中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施存统、王一知、许德良、林蒸等，林蒸为组长；商务印书馆为第二组，其中有董亦湘、徐梅坤、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张国焘、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傅立权、刘仁静、

张秋人、张人亚，董亦湘为组长；第三组是上海西门，其中有林伯渠、邵力子、雷晋笙等。第四组是虹口区，其中有甄南山、王荷波等。因此，投身实际斗争中的茅盾，忙得不可开交，以前是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而现在连白天都搞政治！

在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茅盾见到了年轻的中共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后，他还和毛泽东在广州共事过。

由于中共初期缔造者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在行动上也出现了不一致。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先后退党。中央指定茅盾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退党。结果，除邵力子外，都没有劝过来。这些具体而又具体的党务工作，茅盾始终无怨无悔地埋头苦干着。他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相信中国的解放，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因而在人生追求上，表现了一种理性的自觉；而同样，在文学追求上，也是那样执著和自觉！

《小说月报》的改革打响之后。  
商务当局是开明，还是拜倒孔方兄面前。  
学者王云五更多的是官气。  
三国烽火：多方论战，伤了感情，但也明了是非。  
他走出商务印书馆大门，走向社会，却未能成为宣传鼓动家，这也许是天意。

## 第六章 文学骁将

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坛上，新旧文化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日愈白炽化。但在最初，茅盾与商务印书馆同仁胡愈之等倡导新文化的战士们，面对汹涌而根深蒂固的旧文学，自己写白话文还不敢用真名呢，而是写了以后，用笔名投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当时五四的旋风，上海似乎锋面并不大，对旧文化的冲击，也没有北京那班文人那么有闯劲和锋芒毕露。那时，商务印书馆里那些整天与书打交道的人，都以为这是一场政治事件，与文化无关。后来，当北京南下宣传五四的演讲队到上海宣传鼓动时，向来不喜欢走动的茅盾也去听演讲，事后茅盾感觉到这“讲演空空洞洞，思想性不深刻，只是反复喊着几句富有煽动力的话，例如反对军阀混战，要求结社、言论自由，要求有示威游行的自由等等，没有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当时上海一般学生也不懂什么叫反帝、反封建。但是应该承认，他们起了鼓动人心的作用。”这应该是当时上海那些新青年们共同的心态。所以茅盾在“五四运动”热火朝天时，并未积极投入，而真正投入这个洪流，是在两年以后。

在这场文学革命中，茅盾不仅在上海崭露头角，而且还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并成为战友，共同在这条战线上奋斗。在改革《小说月报》时，茅盾通过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周作人，与鲁迅（周树人）相识，两人信往稿来十分密切。鲁迅不时向茅盾提供作品，或推荐，或自撰，从作品上支持茅盾改革《小说月报》；而茅盾对鲁迅的作品推崇备至，当鲁迅的《阿Q正传》在1921年12月4日以巴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以后，立刻引起轰动，而茅盾以深刻的审美目光读了前四章以后，立刻评论道：“……《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力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悔。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茅盾的这个评论，为《阿Q正传》评论史上，开了先河。以后不少论者，都以此为蓝本。在茅盾主持改革《小说月报》的1921年，从4月份开始，茅盾和鲁迅直接通信，到年底，两人书信往还50余次，平均5天就通一次信！在新文学共同的使命中，开始了两人的友谊！

如果说，茅盾和鲁迅在沪京两地频繁书信往来，加深友谊的话，那么，茅盾与郑振铎，则直接共同战斗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等文学阵地上。茅盾在《小说月报》改革之初，就得到郑振铎的支持，当时郑振铎还在北京读书，知道上海沈雁冰希望北京新文学界朋友支持时，立刻代为约稿，赶在《小说月报》1921年第一期发稿前，给茅盾寄去冰心、叶圣陶、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周作人及耿济之等人的小说和译文，给茅盾的改革最有力的支持。不久郑振铎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上海铁路西站当见习。茅盾把郑振

铎推荐给《时事新报》、《学灯》当编辑。5月11日，郑振铎进了商务印书馆，筹办《儿童世界》杂志，从而两人朝夕相处，共同在新文学这个园地辛勤耕耘，成为文学研究会上海的台柱子。另外如叶圣陶等友人，也坚决地和茅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因此，20年代初的上海文坛，新文学的崛起，挖了旧文学顽固派的祖坟，引起盘踞上海文坛的那批文人的愤怒和不满，《小说月报》一出版，就受到上海鸳鸯蝴蝶派出版的《红玫瑰》，《快活》等刊物的围攻，当时商务书馆的名流陈叔通，愠怒茅盾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将照例寄给他的《小说月报》原封不动地退回编辑部，表示不满。尤其《小说月报》在改革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表示要倡导为人生的文学，给那些消遣、无聊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礼拜六》是个杂志名称）文人以致命打击。此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深感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在新旧文学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自己因不懂外文而日感紧迫，甚至无法再驾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样一个学术机构，觉得在东西、新旧夹缝中，实在很累。于是他征得张元济同意，亲自去北京请年青的名人胡适来担任所长，胡适答应先到上海编译所看看。1921年7月16日胡适到达上海，就将编译所一间会客室作为办公地点，并轮流“召见”编译所高级职员。茅盾是18日、22日两次被“召见”，胡适问了茅盾的一些工作情况后，就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提倡“新浪漫主义”、“表象主义”等问题，发表意见，他告诉茅盾：“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并劝告茅盾“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指出“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现实主义的洗礼。”向来说话办事谨慎的茅盾一边回答胡适的一些询问，一边静静地听胡适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表示什么。

不料，在商务印书馆呆了一个多月后，胡适向商务当局表示自己不干了，却把自己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老师王云五推荐给商务，说自己是个书呆子，不善于应付人事关系，而王云五则有学问，也有办事能力，比他强。因为是胡适推荐，商务当局不敢怠慢，高梦旦带了郑贞文一起去请王云五“出山”，担任编译所长。1922年1月王云五正式取代高梦旦任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其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新文学人士，称其为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因此，王云五的上台，给茅盾等新文学倡导者们，添了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烦。

1922年7月，也就是王云五上台半年时，茅盾针对鸳鸯蝴蝶派一年多来对《小说月报》的攻击以及他们的许多荒谬的论点，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从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文学思想、创作思想、方法及社会效果，给予义正词严的评论和批判。此文没有他们攻击茅盾、攻击《小说月报》时所用的谩骂的方法，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因此礼拜六派通过各种关系，向商务当局施加压力。王云五等商务保守派认为这是个时机，这样可以教训教训茅盾等新文学战士了。当时，王云五派了一个姓李的人专门去找茅盾：“沈先生，《小说月报》销路很好，影响也大，这次第七期上您的大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反响也大，尤其是《礼拜六》听说他们准备提起诉讼，告《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说到这里，李某停了停，看看茅盾没有答腔，又说：“这件事，云五先生也担心，弄得不好，我们要吃亏，名声也不好，从商务利益考虑，是否请沈先生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道歉如何？”

年轻的茅盾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断然拒绝写文章道歉的要求，对来人严正地说：“李先生，你也应该知道，不是我破坏它们的名誉，而是礼拜六

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半年之久，你们不吭一声；如今，我才从文艺思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你们就那么‘重视’？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商务印书馆早就应该控告他们了！况且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敢做北洋军阀还不敢做的事情？”来人阴险地一笑，“沈先生言重了，言重了，我也是替沈先生着想。”茅盾一听，更气了，连瞧都不瞧来人一眼，气愤地说：

“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务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看‘礼拜六’还敢不敢打官司？”

那个姓李的人一听，吓坏了，他知道此时的茅盾完全能做到这一点，知道年纪不大的茅盾在全国文学界的影响，因而连连说：“沈先生，此事不可闹开，不可闹大。”说完便灰溜溜地走了。由于茅盾态度坚决，王云五等人也只好变换手法，通过内部审查的方式，控制《小说月报》。这件事被茅盾发觉后，十分气愤。正式向王云五提出抗议，指出当初接编《小说月报》时，曾有条件是馆方不干涉我的编辑方针，现在你们既然背约，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馆方取消内部检查，二是我辞职。茅盾的这个“抗议”，对新上任的保守派王云五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商务当局研究后，同意茅盾辞去《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但又考虑《小说月报》的销路，决定由郑振铎继任。同时，商务当局又坚决挽留茅盾在编译所工作，因为商务当局怕茅盾走出商务另办刊物，影响商务利益。茅盾将商务印书馆情况向中央党组织汇报后，共产党中央觉得如果茅盾离开商务印书馆，一时难以再找一个合适的中共中央交通员，陈独秀也劝茅盾留在商务，以便更好地为中央工作。当茅盾知道商务当局同意他从十四卷（即1923年）起辞职后，又向商务当局提出，在主编十三卷内任何一期内容，馆方不能干涉，不得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除任何一篇，否则，我仍将在上海与北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及其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王云五听了，沉吟一会儿，表示同意。

茅盾在主编最后几期《小说月报》过程中，对礼拜六派的反击，更加猛烈。在《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一号的社评栏里，发表了《真有代表旧文学旧文艺的作品么》的短评，借北京《晨报》的文章，抨击礼拜六派。文章说：“北京《晨报》副刊登着子严君的一段《杂感》说：这些《礼拜六》以下的出版物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这是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很重大而且可怕的事。”“‘礼拜六’（包括上海所有定期通俗读物）对于中国国民的毒害，是趣味的恶化。”“‘礼拜六派’的文人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他们并不想享乐人生，只把它百般揉搓使它污损以为快，……这样下去，中国国民的生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去了。”“英人戈斯德在《善种与教育》上称英国的坏人为‘猿猴之不肖子’。”“我们为要防止中国人都变为‘猿猴之不肖子’……，有反抗‘礼拜六派’运动之必要；至于为文学前途计，倒还在其次。因为他们的运动在本质上不能够损及新文学发达的分毫。”茅盾把这激烈的话写进自己的文章里，商务当局也无可奈何。另外还有题为《反动？》也是批评“礼拜六”的，也登在同一期《小说月报》上。茅盾自己认为，“同一期的《小说月报》连载两篇《社评》都正面抨击‘礼拜六派’，可以说是在离职前对王云五及商务当

权者中间的顽固派一份最后的‘礼物’。”

在茅盾及其他新文学战友和商务当局顽固派及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等开展激烈斗争之时，侧面又受到友军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主持的创造社突然袭击。创造社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创立起的新文学团体，稍晚于文学研究会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一批作家诗人组成，1922年办《创造》季刊，接着又出《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等刊物，艺术主张中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倡导积极浪漫主义。同时，又表现出浓厚的对旧社会的反叛精神。1922年5月1日《创造季刊》上发表了郁达夫的《艺术私见》和郭沫若的《海外归鸿》，公开批评文学研究会茅盾、郑振铎等人“党同伐异”和压制“天才”。其实当时茅盾对郭沫若等人还是十分钦佩的，认为郭沫若诗集中公然说自己“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在当时还没第二人。”《女神》中作者的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也是第一人”，并称《女神之再生》为“空谷足音”，因此，茅盾和郑振铎一见这两篇文章，大吃一惊，感到十分委屈，于是愤而起而答辩，写了《“创造”给我的印象》，一场持续3年的两个新文学团体的论争，拉开了帷幕。

这场论争，双方都是年青气盛的青年理论家，青年作家，青年诗人。因此，激烈程度也非常，但平心而论，这场论争，对促进新文学的繁荣，历史地来看，也不无积极意义。但如果仔细考查，这种论争，实际上是这两家代表五四时期大多数新作家共同主要气质的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与社会互相交织的人本主义的气质，但经常以强烈的感情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研究会方面，这种人本主义气质较多地从社会和人道主义的方面表现出来，而创造社方面则集中于自我倾向，所以事后，茅盾和郭沫若都非常宽容地回忆这场论争。茅盾说：“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论战的原因，主要是对文学与社会的不同的看法。换言之，我们所争的是：作品是作家主观思想意识的表现呢，还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创作是无目的无功利的，还是要为人生为社会服务？”茅盾还认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一条路上走的人，应当互相扶持，互相容忍，……。”郭沫若也说：“我们当时主张，在现在看起来自然是错误，但在当时的雁冰和振铎也不见得有着正确的认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论战，一直持续了3年，直到1924年7月20日，茅盾和郑振铎首先挂起“免战牌”，表示“本刊同人与笔墨周旋，素限于学理范围以内，凡涉于事实方面，同人皆不愿置辩，待第三者自取证于事实”。今后“郭君及成君等如以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差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

在与创造社论战的同时，茅盾和郑振铎、鲁迅、叶圣陶、沈泽民等人，还要和南京《学衡》杂志的论战。刀来枪抵，十分激烈。“学衡派”是南京东南大学的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教授，以出版《学衡杂志》而得名，这些留过洋的教授，在五四以后，来反对新文学，提倡复古，标榜“国粹”，攻击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他们在《学衡》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文学进化论，白话不能代替文言，文言不应合一，主张摹仿古人等。由于南京“学衡派”的倒行逆施，当时出现一股“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的逆流。针对这股逆流，茅盾奋起抨击，先后写了《评梅光迪之所评》等七、八篇文章，给

予复古势力有力的抨击。其时，茅盾的胞弟沈泽民 1921 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新文学运动。在反对学衡派复古的斗争中，他和胞兄并肩战斗，撰写了大量笔意锐利的论文，反击学衡的复古。在其中一篇《文言白话之争底根本问题及其美丑》文章中，深刻而又明了地阐述了白话代替文言、言文合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指出“因为文字是传达国民思想情感的工具，所以必须包具几个要点：一、是与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因而二、是容易普及，容易为全体国民所了解的；因而三、是最适宜表出现代思想和情感的。就这三点看来，文字就有采用日常用语之必要。所以我们主张废止文言改用白话。”茅盾昆仲共同为营造新文学大厦所作的努力功不可没。

在反击“学衡派”的过程中，鲁迅也挥枪上阵，撰写《估学衡》，深刻地揭露了学衡派们的浅薄与无知，他说：“学衡派”自己还没有弄通古文，却自谓肩负捍卫古文的重任来教训新文学者，这是不知羞耻。还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与此同时，郑振铎也和茅盾、鲁迅等联袂，对“学衡派”进行驳斥和批判。不久，“学衡派”在新文学者的批判下，便败下阵去，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插曲。

茅盾在与创造社论争，反击学衡派的斗争过程中，仍在百忙中为《小说月报》写稿，编海外文坛消息，同时，大量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务工作，又亟待茅盾去处理。此时的茅盾，工作几乎是连轴转。但是，纷繁的事务，复杂的斗争，茅盾仍没有忘记译介国外弱小民族和被损害民族的作品。

还在 1921 年时，茅盾在编《小说月报》过程中，发现中国在倡导新文学过程中，亟待引进国外民族作品，以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借鉴。于是，他发起组稿编辑两期专号，一期“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专门介绍欧洲等少数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吸纳不少新文学作家翻译家共同关注这种新文学奠基工作，茅盾自己则写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引言》、《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背景的缩图》两文，刊于专号。不久，茅盾又主持编辑了《小说月报》号外“俄国文学研究”，把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鲜的文学作品及十月革命前反映俄国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作品，介绍给国人。其中茅盾不仅主持编辑，而且还亲自动手，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如他在号外中，发表了《失去的良心》、《看新娘》、《蠢人》、《杀人者》、《伏尔加与村人的儿子米苦拉》、《孟罗的农民英雄以利亚和英雄斯维亚多哥尔》及《赤俄小说三篇》的前言等，充分反映了茅盾当时那种对新文学忘我的奉献精神和对社会使命感、责任感。

1923 年，茅盾为反抗王云五违约而辞去《小说月报》主编后，在译介、标点外国文学的同时，又给《国学小丛书》编选《庄子》、《楚辞》、《淮南子》等，因而，茅盾能以深厚的古文基础，在倡导新文学的前沿，立于不败之地。

这一年的暑假，茅盾应侯绍裘的邀请，专门去松江私立景贤女中讲演，讲题是《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这是茅盾继上年暑假与郑振铎在宁波四明暑假教育讲习会之后，又一次外出讲演，宣传新文学。去年去宁波之前，也曾去松江景贤女中讲演《文学与人生》。因为茅盾在上海新文学界，名气如日中天，所以，外地邀请他参加公开的社会活动也多了，茅

盾乘这机会，宣传新文学。

与此同时，茅盾的社会活动也日愈频繁。1923年11月27日，在上海的浙籍人士陈望道、茅盾（沈雁冰）、杨贤江等致电浙江省省长、教育厅长，抗议浙江省议员罗织罪名提出查办省立五中校长案。同年12月上海成立东方艺术学校，聘定陈望道为教务长兼美学教授，茅盾为现代文学教授，甚至在中华书局编辑程本海1924年3月3日下午的婚礼上，茅盾也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说。1924年春，茅盾、杨贤江等人发起，成立闸北市民外交协会，反对外人扩大租界。7月18日，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将闸北市民外交协会改名为上海市民对外协会，并聘请恽代英等为协会顾问。这些活动，也反映了青年茅盾既是一个在新文学疆场上驰骋的骁将，而且又是一个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从而使他的革命和文学活动，和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紧紧地联在一起了。



血与火的洗礼；  
走向街头，直面民众怒潮，他感慨万端；  
《公理日报》讨还公理；  
商务印书馆罢工浪潮里他唱主角，但出了个意外的插曲。

## 第七章 在罢工洪流中

1923年8月5日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出席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第六次会议，这是茅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1924年春，作为上海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长的茅盾，直接参与和策划组织上海工人纪念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大会。

在这之前，茅盾的胞弟沈泽民，于1921年从日本回国以后，以饱满的热情、旺盛的斗志，投身新文学运动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立志当革命家和文学家，先后奉党组织命令去安徽芜湖五中任教，并在那里发展革命同志，组织芜湖学社，创办《芜湖》半月刊；后来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1923年8月，中共派沈泽民到南京建邺大学任教，并要求他们到南京以后，负有发展中共组织的使命，不久，组成南京党小组（直属上海第六组）。在南京期间，沈泽民与同乡张琴秋有更多的接触和联系，两人志趣相投，终于在1924年结为伉俪。在这期间，茅盾除了政治活动工作之外，仍创作、译编了大量作品。他研究希腊神话，1924年9月发表了《普洛米修斯偷火的故事——希腊神话之一》至1925年1月先后发表了十篇研究编译文章，在《儿童世界》上发表，之后，茅盾又开始研究北欧神话，1925年2月发表《喜笑的金黄头发——北欧神话之一》，至4月已发表《为何海水味咸——北欧神话之六》，但后来因为五卅运动的爆发，没有能像研究希腊神话那样，一篇一篇地写下去，只好戛然而止。

在五卅运动前后，有一篇反映茅盾文艺思想的文章，也因五卅运动的爆发，而分两段来完成。这篇文章就是《论无产阶级艺术》。这篇长文的写作起因，是因为1924年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等人提出革命文学口号，沈泽民连续发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和《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两篇文章，指出“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着手枪和炮弹这一类名辞，并非像《小说月报》所为标语的血和泪，”“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的气概的问题和作者的立脚点的问题。”但是，茅盾在这场热烈的讨论中，没有在前几年与创造社论争时那么尖锐和冲动，而是在一边思索，一边观察，一边读书。当时，茅盾“翻阅了大量英文书刊，了解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艺术发展的情形。”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消化，茅盾觉得有必要对无产阶级艺术的各个方面试作一番探讨。同时，也觉得有必要清理一下自己过去曾热烈鼓吹过的文学主张，以便用“无产阶级的艺术”来充实和修正“为人生的艺术”的观点。于是，《论无产阶级艺术》这个长篇论文的前半部分，发表在五卅运动前的《文学周报》5月10、17、31日，后半部分发表在10月24日《文学周报》上。

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在新文学界成了“旷野的呼声”。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全面地论述无产阶级文艺的论文。文章分5节，首先从西方文艺发展史中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的历史形成，其次论述了无产阶级产生的条件，提出一个艺术产生的公式：“新而活的意象+自己批评（即个人选择）+社会的选择=艺术。”令人耳目一新，

并第一次提出在阶级社会，社会的选择又是阶级的选择这样的观点；第三节探讨了无产阶级艺术的范畴。详尽地分析无产阶级艺术与农民艺术的不同，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艺术非即所谓革命的艺术，”“非旧有的社会主义文学”，作了界定和缕析。第四节以苏联文艺现象为蓝本，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最后一节中，茅盾又分析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的形式，以及文艺的历史继承等问题。这篇论文，既是茅盾在五四运动以后对自己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一次清理，又是他往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但现实给茅盾的系统思考的时间非常吝啬，刚写完一半，一场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茅盾只好放下笔，投身于五卅洪流。

1925年年初，上海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指挥下，开始涌动，出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外商在中国开厂并严重剥削工人等情况，引起广大工人的强烈不满。1925年2月2日清晨，上海内外棉第八厂发生日本领班毒打一个女童工的事，引起该厂男工的愤愤不平，他们据理同日本领班争论。不料，老板把粗纱间值夜班的50个男工全部开除。于是这个厂的日班男工自动罢工，抗议厂方的处理。当时沪西工友俱乐部主持人刘华出面调停，结果，厂方又没收工人工资，勾结捕房逮捕工人代表。2月9日，内外棉第八厂全厂工人开始罢工，接着是第五厂、七十二厂的工人也跟着罢工，燃起上海工人运动的烈火。当时，茅盾与邓中夏、杨之华一道，组织工人罢工大会，在谭子湾广场上，有万人参加。

万人大会以后，上海迅即有22个日本纱厂响应，罢工人数达35000多人。并成立罢工委员会。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经过十多天的较量，迫使日本资本家接受罢工条件。于是，内外棉各

厂全体工人开会庆祝罢工胜利。这场罢工运动，为稍后的五卅运动，积累了经验。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有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自从2月的罢工以后，上海工人大批参加了工会，工人的斗志更坚强了。同时，也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软硬兼施的两手，企图扼杀尚在摇篮中的革命形势，他们要求取缔工会，并扬言，如果工人罢工，立即关闭工厂。与此同时，日本资本家大批开除工会的活动分子，逮捕工人代表。于是，内外棉十二厂的工人首先罢工，十二厂是纱厂，是一些织布厂的前道厂，因而影响到一些织布厂。由于十二厂的罢工，5月15日七厂（织布厂）的夜班工人去上班，工厂却紧闭大门，宣布：没有纱，工人统统回家去。工人据理力争，但厂方不理。于是，顾正红带领工人撞开厂门，夜班工人涌进厂内，与看守厂门的日本人发生冲突，此时，内外棉的副总大班和七厂的大班带领许多打手，手持武器，赶来现场。看见带头的正是他们久已注意的顾正红，便朝顾连开四枪，顾正红当即倒在血泊中，第二天下午伤重不治而光荣牺牲。

“顾正红事件”激起上海工人的极大愤怒，16日，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一万余工人全部罢工，并组织罢工委员会、设立纠察队、交际队、演讲队、救济队等，提出“惩办凶手，承认工会”等八项要求。5月24日，在谭子湾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会后，进入扩大宣传，组织全市的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准备阶段。

事态的发展，激起全市人民的愤怒，茅盾既是组织领导者之一，又是直接上街参与者。一浪高于一浪的罢工浪潮，终于在5月30日全面爆发了，30

号下午罢工的工人，罢课的学生从四面八方会合在南京路，东一堆，西一堆地在演讲宣传，都大喊“打倒帝国主义”。一时间，南京路成了一片反帝的海洋，涛声四起。茅盾和夫人孔德沚及邻居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从闸北顺泰里赶到南京路，在先施公司门前，忽然听得前面传来“砰、砰、砰”的枪声，南京路上示威的人也从前边潮水似地退下来，茅盾忙问退下来的人：“怎么回事？”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愤怒地说：“巡捕开枪了！”演讲队有几个人被捕房抓进去，工人学生涌到捕房，要求放人。结果，捕房的巡捕开枪，打死上大学生执行委员何秉彝、交大学生陈虞钦。这时，先施公司已经拉上铁栅门，把茅盾他们关在公司门里，出不去。正在焦急时，杨之华认出一个熟悉的先施公司的小职员，由这个小职员带路，从后门走了。

当天晚上，茅盾和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等在闸北宝兴里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发动全市的三罢运动，并研究拟定要求：租界须承认此次屠杀的罪行，负责善后；租界统治权移交上海市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并立即组织上海总工会，并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为这次“三罢”领导中心。至于罢市，决定由总工会、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出面，与总商会谈判罢市问题，并派妇女群众包围总商会所在天后宫。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茅盾拖着疲惫的身子，两眼布满血丝，回到家刚睡了一会儿，天已大亮，此时又接到通知，“十二点钟出发，齐集南京路。”这天中午，春雨潇潇，开始是小雨涟涟，不久雨点越来越粗，飘飘洒洒。南京路上的群众热闹异常，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工人，散发、张贴标语，发表演讲，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茅盾夫妇和杨之华也冒着危险，跻身于游行队伍。

6月1日，上海实现了“三罢”，各阶层的反帝斗争达到高潮，但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也更加疯狂，他们任意搜捕群众，解散学校，枪杀无辜，引起全市人民更强烈的愤怒。也引起全国各大城市的声援响应，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南京、济南、青岛、杭州、福州、郑州、开封、九江、南昌、镇江、汕头、广州等地，也纷纷示威游行，发动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声援上海。6月4日下午，茅盾等30余人，发起成立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并在小西门立达中学召集筹备会，会后发表宣言。6日，茅盾、杨贤江、侯绍裘三人对外发表谈话，声明成立教职员救国同志会的目的、任务。后来，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借中华职业学校举行讲演会，一共定了8个讲演题，茅盾也亲自去讲演了《“五卅”事件的外交背景》。

茅盾正在忙得不可开交时，乌镇的表兄陈蕴玉找到茅盾家里来，他在乌镇看到《申报》上关于五卅运动的报道后，发现一个叫陈虞钦的人牺牲了，他以为自己的胞弟出事了，便心急火燎地赶到上海，原来是个误会。茅盾有个表弟，叫陈瑜清，此时正在上海立达念书，所以表兄在乌镇见到报道，便以为是陈瑜清出事了。送走表兄，茅盾又投入为《公理日报》的写作中去。因为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上海许多媒体都不敢如实报道，或者歪曲事实真相。因此，中共中央在6月4日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主编；而商务印书馆同人在6月3日创刊了《公理日报》，由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编，编辑部、发行均设在宝山路宝兴西里九号郑振铎家里。因此，在这段时间，茅盾夜以继日地写作，全身心地投入五卅洪流。《公理日报》因资金拮据、

承印困难而于6月24日被迫停刊。《公理日报》停刊后，茅盾又回到商务印书馆的日常编辑中。选注《楚辞》并写下了不少记载五卅运动的散文。

此时，商务印书馆因受五卅运动影响，工人力量日愈壮大，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于6月21日借虬江路广午台成立了工会。从此，商务印书馆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党派徐梅坤在罢工委员会内组织临时党团，实际领导罢工斗争，茅盾亦是临时党团负责人之一。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党的组织由茅盾和杨贤江负责。稍后，商务当局有裁减职员之议，被职工所知，8月20号，茅盾、廖陈云（即陈云同志）等在天通庵路德兴里三民学校内秘密召开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即印刷所、编译所、发行所、总务处）约40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研究分析形势，商量罢工事宜，并要求加薪。工人的要求被商务当局侦知，于21号发出布告，叹了一口气，一番苦经，要求公司同仁同舟共济。当天晚上，茅盾等避开军警于深夜易地，在上海大学附中开会，有168人到会，由廖陈云同志主持。直至22日凌晨结束，决议罢工，提出复工条件十二项，职工工会章程草案，罢工宣言等。并推选15人为临时委员，廖陈云为委员长。天亮以后商务印书馆的罢工序幕，由发行所拉开，紧接着商务印书馆全体工人都纷纷响应，商务印书馆当局惊慌不已。8月24日，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的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修改复工条件，茅盾综合大家意见，亲自起草供正式谈判用的复工条件。25日又召开会议，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定为13人，茅盾为其中之一，并决定由茅盾负责罢工总撰稿和对外发布消息的“新闻发言人”。

8月26日上午，商务印书馆劳资双方代表在总务处会客室谈判，正在激烈进行时，忽然一个自称淞沪镇守使派来的一个营长，带了几个卫兵闯进会议室，说是奉命来调解，此人神气活现，边说边走向上座，命资方代表、劳方代表各坐一边。自己拿起放在桌上的文件，扫了一眼，大声对劳方代表说：“你们不是要加工资么？我说可以，商务印书馆有的是钱。”说完，咳了一声，环视一下面面相觑的双方代表又说：“你们工人又说要成立工会么？哼！那不成，联帅命令取缔一切工会，几千人罢工，地方治安就不能维持了，限你们双方今天即签字复工！”此人的举动，大家都怔住了，面面相觑，没有作声。这个一脸横肉的营长一见劳资双方不吱声，勃然大怒，桌子一拍，吼道：“明天我派兵来，一定要复工！”说完，起身朝外走去。这时，商务印书馆资方代表王云五突然快步上前，拽住那个营长的衣角，噗地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道：“请营长息怒，宽限一两天，我们自己解决，千万不要派兵来。”说完声泪俱下。营长愠色依然，不为所动，一甩手，扬长而去。跪地痛哭的王云五转身对大家说：“我们双方都让步一点，免得外边人来干涉。”

于是，大家在惊疑中散会，谈判又陷入僵局。直到27日，商务印书馆当局鉴于开学在即，再拖下去损失巨大，只得让步。晚上九时，茅盾等13名罢工中央执委和资方代表高翰卿、张元济、王云五、鲍咸昌、高梦旦、王显华等在协议上签字。

8月28日上午，商务全体职工大会于东方图书馆的广场上举行，王景云任主席，茅盾代表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了谈判经过，解释协议内容，指出复工条件之主要项目如增加工资，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改良待遇，优待女工等。茅盾报告完毕，受到商务全体工友的热烈欢呼！商务印书馆的罢工胜利，又推动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罢工胜利之后，茅盾又投入文学和正常的政治活动中去了。

此时，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逝世后，活动猖狂，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在孙先生墓前，公然反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会后夺取了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他们在上海的总部。公开宣布开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恽代英等人是第一批被开除者，茅盾是第二批被开除者。中共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指令恽代英和茅盾筹备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12月，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恽代英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茅盾为宣传部长，张廷灏为青年部长。

正当国民党右派势力猖狂进攻时，帝国主义仍对中国工人罢工耿耿于怀，举起了屠刀，11月29日，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的刘华被密探逮捕，并于次日引渡到军阀孙传芳处。12月17日，刘华被军阀秘密杀害。这一事件在英文《大陆报》上披露后，立刻引起广大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上海的许多文化人纷纷签名，要求保障人权，制止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破坏国法。茅盾、丁晓先、叶圣陶、郭沫若、陶希圣、樊仲云、郑振铎、丰子恺、徐调孚、胡仲持、李石岑、周建人、王伯祥、蒋光赤等44人签署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权保障宣言》，发表在1924年1月13日的《民国日报》上，抗议军阀杀害刘华。不久，茅盾又和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郭沫若等联名于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济难会，这个济难会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群众性救济组织，主要目的是营救五卅运动后被中外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救济其家属。因该组织公开是群众性的，所以成员来自各个方面。

在五卅洪流中，茅盾的政治才能得到一次展现，其政治热情得到一次强化，茅盾觉得少年时代那种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在为共产主义奋斗中，寻到了一种途径。

历史到达沸点；  
去广东、武汉寻找自己的价值坐标。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都可发挥才智；  
却因时局多变，英雄事业未成，怅然上庐山。

## 第八章 大革命风暴

1925年10月的一天，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夫妇来到茅盾家里。茅盾母亲见小儿子、儿媳难得一起来茅盾家，十分高兴，表示今天一定要弄些好吃的菜来招待。沈泽民不见哥嫂，见母亲带着侄女侄儿在家里，便用乌镇话问道：“妈妈，阿哥阿嫂呢？”

“还没有回来，你们先坐一会儿，帮我看看小孩，我去买点菜。”茅盾母亲说。

“妈妈，不要去买菜了，有什么随便吃点就行了。”梳着短发，一张圆脸，一笑有两个酒窝的张琴秋忙拉住婆婆。

“也好，估计德沚回来会带些菜来的。你们也好长时间没有来了，最近忙些什么？”茅盾母亲端详着小儿子、儿媳，问道。

“妈妈，最近，我和琴秋要出去，估计时间不会太短，今天来，也是来告诉妈妈，也和哥哥嫂嫂告个别，以后可能在几年时间里，只能写信了。”沈泽民沉吟俄顷，对母亲说明了今天的来意。

“去那里？”茅盾母亲敛起脸上的笑容，问道。

“去苏联。”沈泽民笑笑道：“党内已经作了安排，要求我们两人等通知，去那边主要是进中山大学读书，同时研究他们的革命经验。”

“琴秋也去吗？”茅盾母亲一听去苏联，心里放下心来，同时担心小儿媳怎么办？“是，我也和德济一道去。不过，什么时候可以动身，现在还不知道。”张琴秋也笑吟吟地对婆婆说。心里漾起一股幸福感。

“也好。一起去，可以有个照顾，去那边，增长些见识，还是大有用处的。”茅盾母亲鼓励儿子儿媳去苏联。

正说着，茅盾夫人孔德沚提着篮，背着包回来了，她此时正在一所中学工作，下班回家时，顺便买些蔬菜回来，今天还买了一条鱼来。见沈泽民、张琴秋在，十分兴奋地说：“阿二，琴秋，你们什么时候来的？”说完，菜篮刚放下，又立刻被琴秋拎进厨房去。茅盾母亲立刻起身，对琴秋说：“你和你阿嫂说话去，这里的事，我来做，今天烧几个乌镇菜给你们吃。”

张琴秋退出来。对德沚说：“阿嫂，家里人多事多，还要在外边做事，忙累了吧？”

“还好，你知道，我憋在家里，反而要生病，不如去外边干事。”孔德沚快人快语，妯娌间关系也非常好。

这时，茅盾从外边回来了，见沈泽民夫妇在，也非常高兴。大家吃过饭后谈些家乡事、家里事，沈泽民见没有外人在，便压低声音对茅盾夫妇说：

“阿哥阿嫂，我和琴秋最近已被决定派去苏联学习，现在已经在待命，什么时候动身还不知道，因此，今天是来向你们辞行的，以后恐怕只有写信来联系了。”停了一会儿，又说“今后妈妈全靠你们照顾了，阿嫂又要工作又要管家，也够辛苦的。所以你们也要保重啊。”

茅盾一听，心里一怔，但心想去苏联那个光明的地方，也还是好的，因而听完沈泽民的话，便说：“阿二，琴秋，从中国现在的情况看，党派你们去，是对的，去那边可以学习那边的革命经验，学习建设经验，回来指导中国的革命。现在我观察，中国革命缺少的是人才。”茅盾为弟弟、弟媳去苏联而高兴。“到那边，你们两个的英语都很好，对学俄语也有好处的。不过，去苏联太远，不比阿二去日本，说回来就回来了，以后只有多写信，好让妈妈和我们放心。”

1925年10月28日，沈泽民夫妇先后坐船经海参崴，取道西伯利亚，直奔莫斯科。同去的有蒋经国、乌兰夫、张闻天、王稼祥等。在赴苏途中，沈泽民给兄嫂写来“莫斯科通讯”，告诉沿途境况，以慰兄嫂挂念。

12月底，北风伴着雪花飘飘洒洒地落在江南。不多时，东方大都市上海一片银装素裹。雪停了，清冽的寒风把上海的家家家户户都关得严严实实，大人们搓着手、跺着脚，在屋里运动着暖和着。这时候，茅盾踏雪秘密出席上海市党员大会，这次大会除了报告形势外，主要是要为选举出席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上，热烈的气氛与室外寒冷的天气，形成两个世界。会上，茅盾、恽代英、张廷灏、吴开先等5人被选为出席广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会后，茅盾他们买了1月7日去广州的船票，订了个官舱，这艘名为“醒狮号”的轮船，是当时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开办的三北轮船公司的。还在月底时，茅盾他们得到广州电报，说大会元旦开幕。茅盾他们觉得十分无奈，开幕式是肯定赶不上了，如果会期长，还会赶上后期几天。因为当时上海到广州，轮船一般要走6天。

船徐徐离开上海码头，茅盾和恽代英等5人，站在甲板上，午夜的寒风冷得侵肌入骨。夜幕下的上海，在昏暗的灯光里，徐徐在视野里消失。在路上，茅盾望着无边无垠的大海，湛蓝湛蓝，海鸥起伏，引来茅盾的无限遐思，回到官舱，茅盾写起了“南行通讯”。此时，茅盾对革命前途充满乐观，充满信心，同时，这是第一次远行南方，自然一切都新鲜。

1月12日，茅盾一行到达广州，报到，安顿好后，茅盾和恽代英便去文德路见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延年向茅盾他们讲了中共中央的三点意见，即这次会议是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打击西山会议派；党不在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时争席位。

茅盾他们还知道，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已在4日正式开幕，258名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对优势。此时的广州，全国许多政治精英都汇集在一起，给青年茅盾大开眼界，在“二大”，他认识了不少政治名流。会议一直开到19日才结束，足足开了半个月。会议的声势非常大，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对外政策决议案”，发表了致苏联及致世界被压迫民族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友好电文。大会又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并给林森等人以书面警告。同时，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日大会结束后，茅盾正打算整理行李回上海。陈延年派人来找茅盾和恽代英，要求茅盾和恽代英都留在广州工作。茅盾问在哪里工作？答曰：“沈先生留在中央宣传部。恽先生去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茅盾没有二话，放下正在整理的行李，他知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是汪精卫兼的，而汪认为工

作忙，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毛泽东，茅盾早几年就认识了，也听他谈过对形势的看法，十分深刻。这时，茅盾对来人说：“那好，但我要与上海家里打个电报，说一下。”“应该，应该。那请沈先生稍候，我去叫车，送沈先生去住处。”

一会儿，车子来了，茅盾提着行李，随来人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住处——东山庙前西街38号，原来，毛泽东带家眷就住在那里，也是《政治周报》的通讯处。在这幢简陋的楼房里，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楼下住着女仆和麻面黑脸的肖楚女。

茅盾到了那里，毛泽东、肖楚女在迎接。茅盾与肖楚女是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已是老朋友了，毛泽东告诉茅盾说：“中央宣传部在旧省议会二楼，离这里较远。”“没有关系。”茅盾笑笑。又问：“工作上有什么要求。”

“过两三天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开会，到那时，我将提出任命你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毛泽东认真地说。

茅盾一听，有些惊讶，不解地问：“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

“当然，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其他如妇女部、青年部也都如此。”

“那我，恐怕不能胜任吧。”茅盾一听秘书是在部长之下，觉得担子很重。

“不要紧，不要紧，”毛泽东连忙摆摆手，宽慰道：“肖楚女同志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又说：“我呢，有个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而《政治周报》的编务也由沈先生你来主持了。”毛泽东交待着宣传部的有关工作。

2月8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宣传部提出沈雁冰为秘书”等议案。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1925年底创刊。茅盾从毛泽东手里开始接编第五期。茅盾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办公。汪精卫、毛泽东都作了指示，茅盾和肖楚女还亲自动手，写了宣传大纲。

2月16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决定在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沈雁冰代理。由此，茅盾更加忙碌了。

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茅盾又奉命回到上海。接替茅盾编《政治周报》的是从上海来的张秋人。

张秋人是浙江诸暨人，和茅盾一样，也是中共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和宣传鼓动家，早期一直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1926年3月21日，张秋人到达广州，茅盾交代张秋人后，去拜访汪精卫，汪精卫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言辞之间，十分感慨时局的变化。临走，茅盾又去向刚刚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来的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希望茅盾回上海后，替广州国民党中央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茅盾一一答应。

茅盾依旧坐“醒狮轮”回上海。他站在甲板上，浮想联翩，他目睹国共两党中那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也目睹了广州那种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感慨万端。碧蓝碧蓝的大海，涛声依旧，革命的热情依然，但革命的前途如何？茅盾回忆3个月之前，5人共赴广州开会的热烈情景，今天是一人归沪，心中自然又万般惆怅。

茅盾回到上海，一回到家，商务印书馆的朋友郑振铎便来看望茅盾，郑振铎告诉茅盾：“当地驻军派人到编译所问过几次，我们回答说，从前在这



里工作，现在到广东去了。”“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茅盾疑惑地问。“香港报纸上说你是赤化分子，过去做过什么事，说得很详细，他们自然知道。”郑振铎只好如实回答。茅盾听说后笑道：“本来我也不想在编译所工作了，现在我就辞职。”郑振铎一听，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

第二天，郑振铎又到茅盾家里带来一张九百元的支票，告诉茅盾说，这是退職金。同时又从袋里摸出一张商务印书馆的百元股票，说是商务当局报答茅盾十年来在商务的贡献。自此，茅盾彻底离开自己工作、生活了十年的商务印书馆，几乎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于是，茅盾开始积极为实现毛泽东的嘱托而奔走。茅盾离开广州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于4月13日上午和5月4日开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同志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委托柳亚子、沈雁冰为正副主笔，和“宣传部请委托驻沪编纂国民运动丛书干事案”，决议“委沈雁冰同志担任”。因此，茅盾为办报奔波出眉目后，终因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不同意而搁浅。茅盾转而编辑国民运动丛书，这套丛书是为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训练及介绍国际政治经济状况而编辑的，当时，茅盾列出五辑书目，分别由一批革命同志撰写或编译。丛书只出一部分，后因形势发展飞速而告结束。

由于恽代英留在广州，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交通局的工作没有人主持了。这个交通局主要是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所发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他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因此，交通局工作十分重要。上海市特别党部请示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后，便决定由茅盾代交通局局长。

茅盾到交通局了解情况后，发现人手太少，便向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说明情况并要求派人。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要茅盾提出人选。于是茅盾根据交通局的工作要求，向市委推荐家乡植材小学的教师郑明德和梁闰放夫妇，结果，引起交通局内部中共党员同志的不满，认为郑梁两人是茅盾的私人，后经特别市委出面解释才算平息。6月25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委正式任命茅盾为交通局局长，并规定了每月一千元经费，后来，茅盾物色到林华，曾派他去沿江各省视察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况。

在1926年繁忙的地下政治斗争中，许多革命女性成为茅盾夫妇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在与这些革命女性接触熟悉过程中，茅盾仿佛有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几次想动手把这些富有时代色彩的女性写成小说。但是，形势发展迅捷，北伐军从广东一路北上，到茅盾正忙碌时，已顺利地克复武汉，浙江省也宣布独立，省长夏超和沈钧儒等都同意茅盾为独立后的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但沈钧儒的省政府组阁计划尚未实现，因夏超被孙传芳赶出杭州而告吹。因而浙江形势一片混乱。此时，武汉形势却十分喜人，武汉来电上海，要求派人去那里工作，中共中央便决定茅盾不去浙江，而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茅盾接到命令，便与夫人孔德沚准备去武汉。

这时，包惠僧从汉口给茅盾发来电报，要求茅盾在上海为武汉分校招生，并汇了钱来。茅盾又忙碌起来，亲自任考官，为武汉军校录取了200来名学员，物色了3名教官，陆续送走以后，已是1926年12月底了，茅盾将两个孩子和母亲安顿好后，才和夫人孔德沚坐英国轮船直奔武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校本部在两湖书院。蒋介石为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当时蒋汪都不在武汉，所以同时任命邓演达、顾孟余分别代理蒋、汪的职位，但实际上，军校的日常工作是茅盾的老同事恽代英主持。他

是军校校务委员，又是军校的总教官。茅盾到达武汉后，住在武昌阅马厂福寿里 26 号，离军校不远。到军校报到后，茅盾去向周佛海请教上政治课的内容，周告诉茅盾，政治课内容没有一定章程，暂时用瞿秋白早几年在上大用过的社会科学讲义。后来，茅盾经过研究，确定给学生讲些基本的常识为好，于是他选了“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封建主义”，“国民革命军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等等。过了几天，即二月上旬，武汉分校正式发布了 75 项委任令，其中第 71 项委任是委任茅盾的，其令为“委任沈雁冰为本校政治教官，支中校二级薪，此令。”

但是，茅盾的政治教官只做了一个多月，在春暖花开时节的四月，中共中央又决定茅盾去《汉口民国日报》任主笔，这张报纸的实权掌握在党的手中，茅盾进去时，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茅盾是接替高语罕任主笔的。茅盾进报社后，家也从武昌搬到汉口歙生路德安里一号报社编辑部内。因为报社归宣传部负责领导，而宣传部主要是瞿秋白在负责，因而这段时间，茅盾和瞿秋白往来较密切。恢复在上海时的状态。“四一二”前夕，政治形势非常复杂，秋白指示茅盾，报纸宣传要着重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这些指示，给茅盾认清形势作了及时点拨。在《汉口民国日报》任主笔时，茅盾主要是审稿定版面，然后写一篇千字社论，或斥责蒋介石，或鼓吹革命。以致后来陈独秀碰到茅盾时，要求茅盾少登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登多了，觉得太红。茅盾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董必武和瞿秋白。

此时，蒋介石的反共决心已下，汪精卫从法国回来后，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蒋介石不肯让步，汪精卫回到武汉，受到武汉群众的欢迎。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屠杀中共党员，继而在南京、广州大肆捕杀共产党员，茅盾昔日共同进行革命活动的朋友侯绍裘、肖楚女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消息传来，茅盾悲愤不已，感到十分痛心，因而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通电之类，声讨蒋介石。在蒋介石屠杀革命党人的形势下，土豪劣绅也乘机蠢动，向如火如荼的农会反扑，报社天天收到各地这类消息，湖北钟祥县农会遭血洗的报道，更是令茅盾悲愤，这些血的教训，茅盾刻骨铭心。

正当武汉掀起声讨蒋介石的浪潮时，又传来夏斗寅叛变，通电联蒋反共，讨伐武汉政府的消息，给武汉带来一片恐慌，5 月 17 日夏斗寅部队占领汀泗桥，叶挺部队奋起讨伐，击溃夏逆。待武汉稍为缓口气的时候，又传来长沙的“马日事变”，许克祥独立团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但长沙的消息真相很迟才传到武汉。茅盾等怒不可遏，连续写了四篇揭露长沙“马日事变”的社论。使长沙“马日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革命的急风暴雨，使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间，发生急剧变化，敌乎友乎，友乎敌乎，杀声喊声，在这场很有希望很得人心的北伐革命中，搅成一片恐怖，许多充满幻想的革命青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产生惘然，许多革命偶像如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此时已被他们自己的表现击得粉碎，革命的现实告诉云集在武汉的共产党人，武汉不是久留之地。6 月底边，天气日渐炎热，夫人孔德沚已经怀上第三个孩子，而且快生产了。于是，茅盾先把妻子送上去上海的英国轮船。自己则在 7 月 8 日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后，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辞去主笔。当天就和毛泽民一起转入“地下”，“失踪”在一个栈房里。隐蔽了半个月光景，

茅盾和宋云彬等人奉命去九江，在九江与茅盾接头的是董必武。董必武告诉茅盾：

“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上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

茅盾领受中共的指令后，转身去火车站买票，果然去南昌的火车已停开。无奈，正在车站徘徊时，又碰见许多熟人，都是要去南昌，又都无法去，于是有人建议，可以上牯岭后再翻山下去。茅盾只好决定绕道庐山，再去南昌。此时，同乡宋云彬他们听说茅盾要上庐山，也要跟着去玩，茅盾不好明说，只好同意。

第二天，茅盾他们上庐山，住在庐山大旅社。放下行李，茅盾在牯岭大街碰见熟人夏曦，夏曦告诉茅盾，昨天翻山下去的路是通的，今天又不通了。恽代英是走这条路去南昌的，郭沫若迟来一步，今天他下山回九江去了。茅盾请夏曦给想想办法。夏曦答应第二天让茅盾再去找他。

第二天，凉风习习，鸟鸣幽幽，茅盾再去找夏曦，夏告诉茅盾，现在去南昌没有办法，这地方不宜长住，你还是回去罢。茅盾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南昌之路，已经封锁。茅盾回到旅馆，准备下山。忽然，肚疼难熬，茅盾对庐山水土似乎有些不服，腹泻起来，岂料，一个晚上泻了七八次，泻得茅盾软瘫在旅馆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脚一下地，像踩在棉花堆里一样，摇晃起来。只好让茶房去买止泻药来服。而一同上山的宋云彬他们，玩完庐山以后，就先离茅盾而去上海了。

茅盾病在旅馆四五天以后，才知道南昌在八月一日发生了暴动，南昌已经由共产党领导的贺龙、叶挺部队控制了。这时，茅盾才知道党组织要他去南昌的目的；但他却因交通不通失去了时间。稍有力气后，茅盾挣扎着起床，在街上走动，忽然碰见在武汉认识的范志超。范志超把自己知道的南昌消息告诉茅盾，并说，山上有许多熟人，不要在外面跑。有消息由范到旅馆来告诉茅盾。

困在旅社的茅盾，十分孤寂，他拖着病体，翻译西班牙玛萨斯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儿子》并写了几篇通讯打发日子，在12日那天，又写了自己第一首白话新诗《留别》，写就就寄给中央日报副刊。诗是这样写的：

云妹，半磅的红茶已经泡完，  
五百支的香烟已经吸完，  
四万字的小说已经译完，  
白玉霜、司丹康、利索尔、  
哇度尔、考尔辨、班度拉、硼酸粉、白棉花都  
已用完  
信封、信笺、稿纸，也都写完，  
矮克发也都拍完，  
暑季亦已快完，  
游兴是已消完，  
路也都走完，  
话也都说完，  
一切都完了、完了，

可以走了！

此来别无所求，  
但只饮过半盏“琼浆”，  
看过几道飞瀑，  
走过几条乱山，  
但也深深的领受了幻灭的悲哀！  
后会何时？  
我如何敢说！  
后会何处？  
在春申江畔？  
在西子湖边？  
在天津桥畔？

这首诗是作者此时心情的真情流露。这样一边养病一边译书写作，一直养到8月中旬，茅盾才托范志超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坐日本轮船转道镇江回到上海，所有行李则托同船范志超带回上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茅盾经历了全部过程，给他留下的，是悲愤、迷惘、失望，大革命的场面和所有的热烈的革命参加者一样，茅盾绝没有想到，但今后革命的路该怎么走？从热烈中过来的茅盾也同样无法预测到。茅盾躲开熟人回到上海后，发现自己已经是被蒋介石通缉的人了，就闭门谢客，过着隐居生活，反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幕。

风暴过后的平静，充满着矛盾。

写刚刚发生的这悲壮的一幕，对他来说是个回归。在创作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坐标。动摇于成功与失败之间；他回归文学，成功了。对自己曾经孜孜以求过的事业惨遭失败的回忆，令人痛心、扼腕！在中国现代的小说中，有人说“能真正反映出当代历史，洞察社会实况的，《蚀》可算是第一部。”

## 第九章 《蚀》的前前后后

茅盾是带着那首《留别云妹》诗下山的。这首留别诗，用一个“完”字，寄寓自己灰丧的心情，对自己曾付出心血，为之追求的大革命，遭到如此惨重的打击和挫折，他感到失望，失望不是来自敌人，而来自革命阵营里的，原来都是朋友和偶像！这首“留别诗”并非诗人诗情喷发的产物，而是苦闷心情的宣泄，从喧闹的革命漩涡中心武汉，来到清凉世界庐山，静寂的山涧，伶仃的孤寂，茅盾只好以译书为打发日子，因而，奔泻的思绪，失衡的情绪，流淌的，是一二首诗。一二首借爱情外衣，抒发内心的苦涩和孤寂及革命的失望情愫，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挫折？越思想，越觉得革命前程的迷茫。后来，茅盾曾对此作这样反思和自白：

“我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要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1927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休止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

这一番经过思考后的自白，很能说明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在1927年夏季这个历史横断面上，后顾前瞻，这种思想是极正常的。

茅盾从庐山秘密下山，乘船去上海，因为怕船上熟人多，他在镇江就上岸，坐火车到无锡，又转夜车去上海。一路上，曲曲折折，回到上海东横滨路景云里家里时，已是半夜。悄悄叩门后，不见夫人出来，而是母亲来开门。见是儿子回来，自然十分惊喜，没等母亲问，茅盾却边进去，边问母亲：“妈，德沚和孩子都睡啦？”

“两个孩子都睡了，德沚还在福民医院里。”茅盾母亲一边关门，一边

说。“什么事？”茅盾一怔，他知道夫人即将生产，忙急急地问。

“都是那个姓宋的不好，自己家里钱那么多，偏偏要住在这里，还要德沚腆着大肚子，替他拉蚊帐，自己坐在一边看，结果德沚跌了一交，小产了，已经送医院好几天了。”茅盾母亲忿忿然地告诉儿子。“宋”就是宋云彬，他先于茅盾下山，在给茅盾家里捎个信后，就躲在茅盾家里。宋家在与茅盾故乡乌镇相距几十里地的硖石镇，素有“宋半城”之称。

“那我去医院看看她。”茅盾问清德沚病房号码，乘月色朦胧时直奔福民医院，看望夫人。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朦胧中惊醒的孔德沚见丈夫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惊喜不已。

“刚刚到家，妈妈说你小产了，我就赶来。”茅盾用手按着妻子的额角，又关切地问：“现在怎么样？”

“好了，就是力气没有。”孔德沚脸上露出笑容，回答道。“路上有没有麻烦？”停了停，又问。

“还好，我都避开了一些熟人。本来去南昌，路不通，就想翻过庐山去南昌，结果那条路也封锁了，在山上又突然泻肚子，躺在山上的旅馆里，不能动，所以能走动，就赶快下来，路上怕熟人见，就绕到无锡过来。”茅盾简单地把自己和妻子分别后的经历说了一下。

“听说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中，有你的名字，所以我每天都提心吊胆。支部里的人也替你担心。不少熟人碰见我，就问你在那里，我对他们说，雁冰去日本了。现在你回来了，如果熟人见了怎么解释？”孔德沚躺在床上，把自己的忧虑对茅盾说了。

茅盾听妻子这么一说，陷入沉思，现在一时这么混乱，自己也需要作番调整，而且一旦传出去，难免不遭国民党的毒手。因而，他对妻子说：“在武汉我写了那么多文章骂蒋介石，通缉也是意料之中。所以，你干脆仍对外说，我去日本了，我在家里不出门就是了。”

“也只好这样了。”德沚苦笑一下，说。孔德沚此时脑海里，着实为茅盾的安全担忧，也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而苦恼。其实，早在两个多月前，南京政府主席胡汉民就签发通缉令，共有88人被通缉，其中茅盾被列为第58名。这是国民党的秘密，外界不得而知。

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从旧报纸上发现形势比想象的还要黑暗！上海地下党机关被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连自己介绍来上海的郑明德、梁闰放也被捕了。他大吃一惊，急忙把这张8月11日的《民国日报》上的《清党委员会破获共党秘密机关》一文往下看，该文报道了郑明德、梁闰放、顾治本、曹元标在7月6日夜被捕的情况后写道：

“7月7日晨，该社又派员3人，驰往闸北公兴路仁兴坊45号、46号前楼，皆铁锁严扃，于是毁其锁进内一窥，除少数木器外，累累者皆印刷品，共50余大包，又觅得藤箱一只，内藏去年跨党分子提取款项之支票存根簿4册，中央交通局各省通信留底全部，汪精卫致沈雁冰函三通，日记数册。其他共产党书籍不计其数。乃雇大号运输汽车一部满载而归。”

茅盾又发现8月13、23、24日的《民国日报》上3篇题目相同的报道，都是对茅盾曾主持过的交通局破坏后的披露。8月20日《民国日报·党务》上也报道：“十五年四月中央交通局设于上海，主持者为著名跨党分子沈雁冰，兹搜得该局各省通讯留底二十三本，书籍无数，支款存根四本。取款者

皆著名共产党人，如罗亦农、侯绍裘、高尔柏、沈雁冰、宣中华、梅电龙、赵醒侬、刘峻山、徐梅坤、邵委昂、蒋裕泉等，……。”

茅盾看着这些报道，心潮久久不能平静，他感到痛苦、愤怒，也感到心血付之东流的失望。整整一个晚上，茅盾彻夜未眠。其实，上海这形势的险恶，已经容不得他跨出家门一步了。

上海已变得不认识了。

第二天，妻子回家了，也给他带来许多未曾知道的昨天来不及说的消息。知道好友郑振铎因其岳父高梦旦怕他被蒋介石留难，已于5月20日离开上海，去法国、英国了。住在隔壁的叶圣陶接替郑振铎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经历了这场大变动后，经过近十年的文学活动的茅盾，突然冷寂下来，大革命中各种各样的人的音容笑貌，特别是许多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前后过程的变化，或亢奋，或悲观，或厌世，或逃遁，喜怒哀乐，像电影一样，在冷寂下来之后的茅盾的脑海里发酵、过影。于是，面对生活无着，不能出门的现实，茅盾决心把大革命中热辣辣的一幕记录下来，艺术地再现刚刚发生的这悲壮的一幕。这种选择，对茅盾来说，实在是个回归举措，他原先在这场政治活动寻找自己的价值，寻找自己的位置，但大革命的失败和崩析，茅盾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已任的宏愿，一盆水凉到脚，因而，这个富有社会责任感、富有历史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又选择了文学这个途径，继续着自己的奋斗和追求。尽管此时上海整个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党员，被杀的、叛变的、逃逸的，四处云散，各奔东西，但茅盾通过文学，寻求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寻求真理的追求，依然是那样执著！因而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说：

“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过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

往日生活中积储的素材，一下子在静寂的脑海中闪现，一种难以遏制的创作激情，在孤独的茅盾心里燃烧，他在这种热烈的激情中，时而兴奋，时而悲愤，时而迷惘和困惑。往日的激情此刻即将化为行动——从茅盾笔端汹涌而出。几年前的情景，正好印证了茅盾对大革命的认识。去年秋天，茅盾听到当时团中央负责人梅电龙追求一位姓唐的姑娘，追求到发疯的程度。有一次梅问唐，究竟爱不爱他？唐答“又爱又不爱。”因此，梅电龙从唐的宿舍出来，坐人力车，老是在研究“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到了入神的地步，乃至下车时竟把随身带的团中央文件留在车上，走了一段路才想起那包文件，结果晚了。茅盾听到这桩事，觉得反映大革命前中国青年中一部分人的典型思想，而且情节曲折，富有现代意识。这是极好的小说材料，当时因忙于工作没有动笔，现在这情景又重新浮现在自己脑屏。

茅盾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茅盾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茅盾和唐棣华共持一伞，送她回家，路上，茅盾脑海里浮现出各种各样现代女性的形象，忽来忽往，或隐或现，此时，听不到雨打伞的声音，忘记了还有个同伴，完全进入忘我的创作激情状态，写作冲动异常强烈。

茅盾还记得在武汉时，在与自己宿舍隔街相对的一个宿舍里，住着3位既漂亮又有活动能力的革命女性黄慕兰、范志超等，她们的革命热情令人钦佩，她们单身的生活、漂亮的姣容，又令不少革命青年倾倒和追求。还有军校里那些追求革命而来的大批女生，她们的革命热情以及随着形势的变化而

变化的情绪，也深深地印在茅盾脑海里。

茅盾还清楚地记着，大革命因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受到极其残酷的挫折，许多满腔热情、富有思想的革命家，却因此而惨遭杀害，其中有曾共事过的、相知甚深的肖楚女和侯绍裘等。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后，又落低潮，各地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以十倍的疯狂，向农会反扑，惨无人道地对革命者进行报复。在革命发生逆转时，许多原先叫喊得很响的国民党左派人物便发生动摇，“躲进租界者有之，化装潜伏者有之。”他们都感到幻灭，原来革命美好的希望，已成泡影。这种中国 1927 年的现状，汇成一曲中国革命悲歌，这歌，茅盾是听到了，看到了，现在隐居在上海家里，耳畔还在回响着。

酷暑盛夏的上海，热浪一阵一阵，景云里的邻居们，一到晚上，便带着蒲扇、桌椅去门外纳凉，谈笑。男女老小，笑声哭声和这热浪混成一片。而茅盾则在家里，不敢出门去享受深夜里吹来的凉风，在家里或坐或躺，任凭脑海里那四海翻腾的风云起伏。大革命啊，大革命，茅盾此时脑海里尽是大革命的时代风云，溽暑里，茅盾在清理自己脑海里的万般素材，那些是云，那些是雨，那些是肉眼看不到，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风！想着想着，脑海里正在过电影，突然，一墙之隔的大兴坊住户在牌桌上用力一记，闷重的声音仿佛攻克汀泗桥的一枚炸弹，突如其来，真有些心惊肉跳！

茅盾把这些热辣辣的材料经过梳理后，选择了从五卅到大革命这段令人兴奋令人失望的岁月，选择了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小说人物原型，写他们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把自己所见所感写成小说。第一部《幻灭》，茅盾在妻子的病榻边，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写完了。他把自己写的第一部小说取名《幻灭》，用意是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前夕的亢奋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在况人的同时，又是自况。因为茅盾当时也只是个 30 出头的青年知识分子。

小说《幻灭》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主要写两个女性——静女士和慧女士。着重描写女主人公章静的一段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即双重幻灭——为了追求恋爱自由、爱情幸福、妇女解放的所谓个人的完善和报效民族、国家的双重理想所做出的努力，及这种理想的无法实现，这种努力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无情吞噬，展示出一段人生之旅和人生之梦。静女士从某小镇到上海念书，因在初恋时遭军阀暗探抱素欺骗，感到幻灭；后来大革命兴起，到武汉投奔革命。但是，实际斗争使她厌倦，誓师北伐典礼又给了她勇气。不久大革命失败，静女士又感到失望、幻灭。而静女士的朋友慧女士则是一个见过世面、看透人生又到法国念过书的女性，因而在静女士纯洁的感情被青年学生抱素（一个暗探）玩弄后，形成了一个貌似三角恋爱的关系，最后，静女士在武汉当看护，认识了连长强惟力，后来强惟力奉命归队，静女士又陷入幻灭之中。

茅盾那如火如荼的创作激情，大胆地批判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揭露大革命前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的黑暗，热情地讴歌北伐战争的胜利，同时又把发生不到一个月的南昌起义写进作品，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幻灭》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十分成功，极为真实地写出了那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内心世界。小说语言绚丽、犀利、清新。

《幻灭》写到一半，茅盾从稿纸堆里抬起头来，发现酷暑已经消去，书中人物的各种纠葛和矛盾却依然没有理清，随手便在书名“幻灭”下面署了



个“矛盾”的笔名，准备让隔壁的小说家叶圣陶看一下。为什么茅盾当时取了个“矛盾”的笔名，作者后来有过一段解释：

“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的“矛盾”一词的实际；1927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茅盾的这段解释基本上是真实的。茅盾当时让妻子将部分稿子送给叶圣陶看，第二天，叶圣陶就到茅盾家里来，兴奋地对茅盾说：“写得好，写得好，昨天夜里，我一口气读完你让德沚嫂送来的稿件。我准备登在这个月的《小说月报》上，马上就发稿。”

茅盾听后，吃惊道：“我还没有写完呢，送给你的，也有一半。”

“没有关系，九月登一半，十月登一半。”叶圣陶也信心十足地说。

茅盾觉得这样也好，也可及早给家里补贴些油米钱，便说：“这倒也是个办法。”

“只是沈先生用的那个笔名，恐怕再改动一下，用‘矛盾’二字作笔名，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个假名，而且内容又是写这场大革命的，万一国民党方面来查问，就不好说了。所以，我想了一下，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头，这样，姓茅的人很多，人家就不会引起注意，而且口音上依然是‘矛盾’，不失沈先生本意，不知您以为如何？”

茅盾一听，笑道：“还是你想得周到。”

岂料，“矛盾”这个笔名一一起用，竟成了茅盾一生中和本名齐驾并驱的一个笔名，也是最为辉煌的一个名字！

《幻灭》在《小说月报》九、十月号上发表以后，书中清新绚丽的语言，热辣辣的题材和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立刻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不少人写信给《小说月报》，追问“矛盾”是谁？茅盾故乡邻镇的著名诗人徐志摩看了茅盾的《幻灭》以后，写信给叶圣陶，打听“矛盾”是谁。叶圣陶回信说：“作者不愿意以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茅盾决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徐志摩知道叶圣陶不肯告诉，但凭自己聪慧与敏感，一定是参加过大革命沈雁冰。所以，后来在一次看戏时，他对同乡、茅盾的朋友宋云彬说：“绍钧兄不肯告诉我，我已经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宋云彬一听，颌首大笑。

当茅盾交出《幻灭》后正打算写第二部时，不料叶圣陶来对茅盾说：鲁迅从广州到上海来了，你最好写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文章，算是我们对鲁迅的欢迎。经过叶圣陶的劝说，茅盾同意了。但过了几天，叶圣陶来取稿时，却不是评议鲁迅的，而是一篇《王鲁彦论》，在叶的催促下，茅盾再写了《鲁迅论》，两篇作家论，是茅盾回到文学界后的新奉献，而叶圣陶仍坚持先发

《鲁迅论》，在 11 月的《小说月报》发表了，署名方璧。

茅盾知道鲁迅 10 月 3 日到上海了，8 日住在茅盾近邻，但一直不敢轻易出门去看他。10 日那天晚上，鲁迅由周建人陪同访问茅盾，茅盾十分歉然地说：“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然知道你已来上海，且同住隔壁，却未能来拜望，很过意不去。”鲁迅却摆摆手，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茅盾和鲁迅各自说了武汉和广州的情况，周建人也讲了上海的事情，三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未了，鲁迅说：“看来革命现在是处于低潮了，但我们的有些人却仍在唱革命不断高涨的论调，这就令人费解了。”茅盾一听，接着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茅盾问鲁迅今后的打算，鲁迅表示来上海住下去，不打算再教书了。茅盾苍白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临别鲁迅握住茅盾的手，用语重心长的口气说“多保重。”

送走鲁迅，写完两篇作家论文章后，茅盾又着手写第二部小说：《动摇》。《动摇》是茅盾经过冷静思考，比较有计划地来写的，杂取茅盾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所见所闻，基本素材，取之于发生在湖北钟祥县的大革命失败和反革命的胜利。小说借此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以一个县城的变化来以小见大。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国民党左派人物方罗兰和土豪劣绅的代表胡国光。方罗兰这个县国民党党部委员兼商民部长，在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上和对待爱情问题都异常动摇、软弱。因而其结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错乱。而土豪劣绅代表胡国光，混进革命队伍后，却以极左的面貌大肆活动，他们用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面貌出现，从而破坏革命，破坏共产党的声誉，血腥镇压革命。在《动摇》中，茅盾第一次塑造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李克。但在这部小说中，茅盾从史实出发，没有浓墨重彩去描写，因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李克也无回天力，责任只在方罗兰们。

回忆有时是美好的，有时也是痛苦的，尤其是自己孜孜以求过的事业惨遭损失的回忆，更是令人扼腕！茅盾在写作《动摇》时，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曾说自己创作心境：“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所以，茅盾写作《动摇》是非常痛苦的事。这自然是不以茅盾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1927 年底，茅盾的《动摇》方始改定。望着这一大握和着血和泪的稿纸，茅盾松了一口气。而此时，妻子孔德沚和母亲她们已经忙着准备过年了。

写完《动摇》，茅盾有意观察一下当时文坛的反映，发现有部分评论《幻灭》的文章，对《幻灭》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茅盾觉得这个批评就作品而言，也许是对的，但从作者个人主观上而言，这种反映并非本意，大革命的失败使自己悲痛消沉，同时又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又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完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依然没有变，相信革命还会起来。总归要胜利。这一点，茅盾是坚信的。因此，茅盾转而写些文艺论文、散文、神话研究以及翻译一个中篇。借以调整自己那陷于悲观状况的思绪。同时，他为了对这些批评辩解，也是为了表白自己的这种信念，戏用欧洲古典主义戏曲的“三一律”形式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创造》，这个短篇小说是茅盾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君实和娴娴夫妇的故事。君实是个“进步分子”，是“创造者”，而娴娴是个“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

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结尾是娴娴让家里的女仆传给丈夫一句话：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赶上来吧。其实，这篇小说，故事情节非常简单，生动性也很缺乏，但构思非常经济，寓意也深邃，作者借小说暗示自己的一个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自然，茅盾这篇小说，也不可能给革命者指一条路，不可能写出娴娴上山之类的途径来暗示革命，只是表明作者的信念，来回答那些对《幻灭》责难的评论家们。后来《幻灭》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时，茅盾借《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表明自己的心志和信念。

茅盾经过短暂的心理调整，从1928年4月开始动笔写《追求》，原来想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和动摇后，现在重新点燃希望之炬，去追求光明了。但革命发展的事实，并没有茅盾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单纯。动笔之后，茅盾从妻子孔德沚那里听到许多迟到的消息，这些关于中共内部的消息，使茅盾感到悲痛、苦闷、失望，一些熟识的朋友，莫名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因而，写着写着，茅盾原先调整好的情绪，又回到原先那种困惑、失望的情绪里去了，并表现在小说中。以至写到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在追求，然后都失败了。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计划。因此，茅盾的《追求》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小说用放射性结构，采用多线索多人物平行推进的方法，塑造了一群身经大革命洗礼、现在已经幻灭、失望了的青年男女知识分子，他们精神苦闷，思想混乱，却又不甘了此一生，在幻灭的痛苦中各自有所追求。张曼青决心通过教育，寄希望于新一代，但社会现实让他的理想粉碎了。王仲昭想改革报纸并借此获得理想的爱人，当婚期将近突然传来爱人病危的消息，从此一蹶不振。女青年章秋柳想竭力振作，追求光明，但又自暴自弃，把追求享乐和肉欲刺激作为她向她所厌恶的现实报复的手段。厌世主义者史循经过坎坷人生不仅革命理想已经幻灭，而且完全丧失了生活信念，只求以自杀了此一生。从而使作品蒙上了一层深厚的悲观色彩，成为一部缠绵幽怨的哀伤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共存的乐章。《追求》在《小说月报》19卷6至9号上发表后，依然是一片轰动。连一些中学生上课时，也在偷看刊有《追求》的《小说月报》。

1930年5月，茅盾把《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合成一书，题名为《蚀》，由开明书店出版。之所以取名“蚀”，茅盾说，其寓意在暗示小说中的人和事，正像月蚀和日蚀一样，只是暂时的，而光明则是长久的。出版时，他特地在卷首写了几句话，作为自白：

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

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而自励。

《蚀》三部曲的问世和出版，轰动了文坛，对认识当代历史，再现刚刚过去的大革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而茅盾十多年来的文学理论积累和写作训练，为这部作品带来绚丽的文采和细腻的描写，从而又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所以，《蚀》使茅盾奠定了文坛上的地位，赢得了声誉；但长期的足不出户的隐居生活，也损害了茅盾那本来孱弱的身体。

意外的风波，是天意还是人意？  
漂泊的生活，却创造出令人叫绝的作品。  
党依然关注着他。  
晚年没有提及她，自然有其中原因。

## 第十章 日本之行和《虹》

久困斗室的茅盾，写完《追求》以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总算把刚刚过去的大革命时代风云，作一鸟瞰式的描绘。妻子孔德沚则心疼地对茅盾说：“你看你看，人瘦成这个样子，脸色也不好看。这几天，你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弄只鸡来，给你补补。”孔德沚一口乌镇话，说得茅盾心里热乎乎的。

白天，妻子要去上班，远离组织的茅盾，心里格外孤独。原先在上大、平民女校、编译所、广州、武汉时，时代是何等地热烈，与茅盾现在的处境，形成强烈的反差。失眠、精神痛苦，时常折磨着三十出头的茅盾。

有一天，陈望道来看望茅盾，一见茅盾那苍白的脸色和疲惫的神气，十分吃惊，忙问：“沈先生身体有何不适？”茅盾苦笑道：“足不出户，能不生病么？”陈望道说：“也是，但现在沈先生的书已杀青，何不休整一下，养养身体？”茅盾依然苦笑一下：“老蒋的通缉令还在那些刽子手手里，他们对去年武汉的事，是不会忘的。”

陈望道点点头，呷了一口茶，沉吟一会儿，说：“对，有了，沈先生去年就对外讲已去日本，既然国内时局不允许你出门，那么干脆去日本休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也可在那里写文章的。”

茅盾一听，眼睛霎时亮了起来，心想，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当时中国人到日本，日本人到中国，都不用护照，十分方便。但自己不懂日语，恐怕到日本去生活有困难。“办法倒是个办法，不过我不懂日语。”茅盾说。陈望道忙说：“吴庶五到东京已有半年，她可以招呼你。”吴庶五是陈望道的女友，和茅盾也认识。

“这倒好了，那么去日本的手续、兑换日元等，可能还要拜托老兄，我现在还无法出门去。”茅盾觉得去日本休息的办法可行，便请陈望道代为办理有关手续。陈望道也爽快地答应了。陈望道又谈了些外界情况后，便告辞了，临走，对茅盾说：“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妻子下班回来，茅盾把陈望道来一起商量去日本休养的事，告诉孔德沚。孔德沚一听，立刻表示同意，说：“这也好，你整天在家里，身体也越来越差，不如去日本休养休养。”

隔了几天，陈望道又到茅盾家，告诉茅盾，手续和船票，日元兑换，都办得差不多了。并告诉茅盾，“原来平民女校的学生秦德君也和你同船去日本，这样，你也有个伴。”

“噢，秦德君？她怎么也要去日本？”

茅盾感到有些突然、惊讶。

“她从江西经南京来上海，让我帮她找组织接关系去苏联，我劝她去日本，那里也有中共组织，可以从那里去苏联。所以，她同意去日本。”陈望道简单地说了下秦德君的情况。

“这样也好，秦女士一起去，我们也可作个伴。”茅盾知道了秦德君的目的，淡淡一笑。

行期确定以后，孔德沚忙着替茅盾整理行装，把四季衣裳，一件件地理挺，放进皮箱里，又当着茅盾的面一样一样关照着，生怕茅盾在岛国受凉受冻。又关照茅盾一日三餐。絮絮叨叨，却一片深情。

七月初的一天，茅盾提着箱子，辞别母亲、妻子和儿女，在陈望道的指引下，偕秦德君女士悄悄地登上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小商轮。这条船没有客舱，床位也没有等级，只是船顶上有一宽敞的大房间，摆有十几个床位，每张船票二十五日元。十人左右的乘客，除茅盾、秦德君外，都是日本人，只有秦德君是女客。茅盾化名方保宗，秦女士化名徐舫。

船在大海里航行，碧蓝的大海，万顷碧波，茅盾和秦女士日夜相处一起，望着这碧蓝的大海，碧蓝的天，海天一色，回忆起这几年的人生沧桑，政治硝烟，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似乎一种同是天涯沦落的孤寂感，涌上二人心头。望着波涛浪海，秦德君娓娓而谈，向这位昔日的老师、新出现的作家茅盾，诉说自己那凄苦的身世和坎坷的爱情婚姻。

秦德君于1905年出身在四川省忠县，是明末抗清女英雄秦良玉之后。父亲是纨绔子弟，母亲是农家女，被秦家选美选进秦公馆，但在怀孕时，又被秦家扫地出门，秦德君出身在秦公馆门前的野地里。后来，秦德君和母亲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忠县读完小学，便去万县、成都读书。“五四运动”时，秦德君是成都第一批三个剪发的女子之一。“五四”以后，她被学校开除了，她便去了重庆。在一次酒会上，她醉后失身于穆济波，当时她只有15岁。第二年，恽代英在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务长，她和穆一同去那里教书，并公开同居，不久生了一个女儿。在川南师范，秦德君认识了胡兰畦，并成了好朋友。1925年，秦德君被邓中夏派到西安，以教书作掩护，继续做秘密工作。这时，原来熟识的刘伯坚从苏联回来，也在西安，当上了冯玉祥西北军的政治部主任。于是秦德君把两个孩子抛给在西安中山学院任教的穆济波，随刘伯坚出走，并怀上刘的孩子，1927年11月，生了刘伯坚的孩子。1928年春，她带着女儿辗转南昌、南京，结果都因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破坏严重而未能接上关系，所以她又把孩子托付给东南大学的朋友，只身到上海寻找组织。孤身一人，哪里去找组织？她只好找到原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平民女校的老师陈望道。

茅盾听了秦德君的诉说，唏嘘不已。素来感情丰富的茅盾，此时也动了真情，他也向秦女士讲述自己这几年的奔波，这几年的奋斗，讲述自己在广州、在武汉的经历，也诉说自己对妇女解放，家庭婚姻的看法、感受。

也许是政治上共同的挫折，对生活上有许多共同语言的缘故，几天下来，两人内心已经掀起阵阵感情涟漪，而船上其他的日本客人，又视他们为“夫妻”，常常用日语称呼秦女士为“方太太”。船到神户，上岸接受海关检查，当海关人员检查完茅盾那箱子行李后，指着秦女士，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是你的夫人吗？”茅盾也顺水推舟，用英语回答：“是，是我亲爱的夫人。”秦女士则微笑着点点头。海关检查官让秦女士随茅盾入关，连行李都不检查了。

茅盾踏上这异国他乡的土地，一股自由的感觉从心里升起，几百个日日夜夜，躲在阁楼里，埋首于纸笔之间，总算有了自由！他用年轻人的兴奋，挽着秦女士，上了去东京的火车。

火车开动不久，一个身着西装的日本人过来和茅盾攀谈，当这个日本人发现茅盾不懂日语以后，忙改用英语，请教茅盾的大名。茅盾微笑着应酬这

个日本人，把上船前就印好的“方保宗”名片递给他，那个日本人拿着名片看了一下，笑了笑，放进西装袋里，然后用英语问茅盾，东京有没有朋友，打算住哪儿，去哪些地方游玩。茅盾因为秦德君在身边，只是爱理不理地应付日本人的询问。

车到东京，陈望道的女友吴庶五已在车站迎接。秦德君住进吴庶五已经准备好的白山御佃街中华女生寄宿舍，茅盾则住进附近的“本乡馆”。不料，刚刚住进本乡馆；车上见到的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又出现在茅盾面前，像老熟人一样，用英语问茅盾，到这里，要不要帮忙？茅盾正要回答，忽见门口进来一个穿和服的熟悉的身影，并用中国话招呼茅盾，茅盾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年多不见的武汉时期的《中央日报》总编辑陈启修！陈启修见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似乎明白了什么，便用日语向那个日本人说了几句，那个日本人笑笑，并向茅盾说了一句“打扰了，”便走了。

茅盾见是陈启修打发了日本人，十分惊奇，便问道：“这个古怪的日本人是干什么的？”陈启修笑笑：“他是日本警视厅特高科的便衣。”

“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茅盾觉得刚刚踏上日本土地，就被盯上了，不可思议。

陈启修笑道：“你还不算有名么？中山舰事件时你在广州，去年你在武汉，都是被人注意的目标之一，日本人的情报部门怎么会找不到你！他们一定有你的相片，大概你到神户时，他们就知道了。不过，不用担心，你来日本，如果是避难，没有其他活动，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

茅盾一听，舒了一口气。又问道：“你怎么认识他？”陈启修把自己刚来日本时的情形说了一遍。茅盾心想，原来如此。

到日本后，茅盾面临着生计问题。原本想学习日文由于生计问题他只有写作。当他提起笔来时，脑海的人物故事便一个个地跃出来，尤其是那秦女士的生活，本身就是小说素材。去日本写的第一个小说是《自杀》，时间是7月8日。

由于和陈启修住在一个旅馆里，二人一起谈天，一起外出，陈启修便成了茅盾的翻译。有一次，二人去逛地摊，茅盾买了一本关于北欧神话的英文书，使茅盾的孤独有了一丝慰藉——可以借此消磨岛国的寂寞！寄出《自杀》以后，茅盾又写了《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对前段时间文坛上对“幻灭”、“动摇”、“追求”的批评，来个答辩，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自己创作思想情绪，和对文艺的看法。认为革命文艺必须是革命的文艺而不是革命的标语口号；其次是读者对象问题，即阅读革命文艺的读者是哪些人？或者更清楚地说，是哪个阶级或阶层的人，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文艺技巧问题。茅盾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从牯岭到东京》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以后，立刻引来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们的围攻。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称茅盾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自然，他们也不知道此时的茅盾，已是亡命日本。

冬天来了，岛国的冬夜是何等的漫长，冬天的雾更令人愁肠百结，茅盾写了不少从秦女士那里听来的故事小说，也从地摊上抱回一些神话书籍，关上门研究，晚上请陈启修给教日文，没有多少时间，背了50音图，会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在本乡馆住了5个月，“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抱火钵打瞌睡而已，更无何等兴感。”在这样的心情氛围里，茅盾和23岁的秦德君同居了。这时，

在京都的老同事杨贤江来信，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说那里生活比较便宜，而且他们住的高原町远离尘嚣，附近有余屋可以出租。杨贤江原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学生杂志》，同时参加上海共产党的活动，大革命时期，被党派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革命军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党的指示，于上年底带着新夫人和儿子到京都，担任中国留学生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以研究教育，著述为主。杨贤江十分同情茅盾和秦德君的处境，因此，热情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茅盾收到杨贤江的信，便和秦德君商量，二人都认为还是去京都好，或许那里可以静心创作，或许那里能圆秦德君的苏联梦。

1928年12月初，茅盾和秦德君告别陈启修，双双坐火车去京都，在火车上，半年前的那个特高科便衣又来和茅盾攀谈。实际上是把茅盾移交给京都的特高科监视了。

到了京都，茅盾他们才知道，在京都避难的，除了杨贤江夫妇外，还有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周宪文夫妇，四川学生漆湘衡夫妇等。茅盾和秦女士住四号门牌的那套平房。隔壁三号是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有一段时间三号四号合在一起开伙食，高尔柏夫人唐润英买菜，秦德君掌勺下锅。对这个居所，秦德君和茅盾都有回忆。秦女士的回忆说：

“我和茅盾住的第四号门牌，建筑质量的低劣，看起来风吹得倒，东窗都是纸糊的，尽可夜不闭户，即使闭也无济于事。进门走道，是厨房，有煤气设备，最后是厕所；靠近厕所的是一间光线不太充足又潮湿的六铺草席的一间房，没有什么用场，只有空着，作为去厕所的过道。中间三铺草席的通道一小间，夜来我们把蚊帐挂在中间过道小房间的四个屋角的铁钉上，……外面一间六铺草席的阳光好一些，屋檐下是过往行人的街道，道旁是樱花园地，每逢樱花盛开时节，抬头就看见日本国花。”茅盾对这个地方也有回忆：

“我的寓所离杨贤江的寓所有一箭之遥。这是面临小池的四间平屋，每间约有八铺大小；当时我与高氏兄弟为邻，各住一间，另两间空着。房东就住在附近，亦不过一箭之遥，这里，确实很安静，从屋子的后窗，看得见远处的山峰，也不是什么高山，但并排有五六个。最西的一峰上有一簇房子，晚间，这一簇房子的灯光，共三层，在苍翠的群峰中，便像钻石装成的宝冕。

小池子边有一排樱树。明年春季，坐在屋中便可欣赏有名的樱花，想到这，便觉得我的新居确实是富有诗意；对写作十分有利。”

由于秦德君在身边照料，茅盾那苍白的脸色也红润起来，精力也十分充沛，因此，在日本期间，茅盾的小说、散文创作达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浪漫的丰收季节。其中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7个短篇小说，12篇散文。而且，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部分是精品，在各自的体裁中，都是有较高的品位。

茅盾在日本的散文，我们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抒情的，如《雾》、《叩门》、《卖豆腐的哨子》、《虹》等，反映了茅盾在特定环境里的特定心情，抒情性很强。作品中暗示、象征色彩比较浓烈，文字比较曲折隐晦，但这些散文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极高。

“——因为是虚空，所以才有那样的巨声呢！我哑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我睁大了眼，紧裹在沉思中。许多面孔，错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许多人声，嘈杂地在我耳边争论。蓦地一切都寂灭，依然是那答，答，答的水声从窗边传来，像有人在叩门。”（《叩门》）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对革命

形势的怅惘、惶惑和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文坛的“争讼”的厌烦，种种矛盾心理交织地反映在字里行间。“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泣似的声调在诱发我漂泊者的乡愁；不是呢，像这样的 OUTCAST，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作‘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颇小规模悲壮的颤音，使我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卖豆腐的哨子》）茅盾的这种情绪，似乎有一种欲掩还露的窘态。在文字中片段流露的，是旅日的飘零感和对风起云涌大革命的怀念和痛惜情绪，茅盾这里是用否定来表达自己的肯定，卖豆腐的哨子声，太撩得令人怅惘！“这怅惘是难言的”。“然而每次我听到这呜呜的声音，我总抑不住胸间那股回荡起伏的怅惘的滋味。”“我猛然推开帐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

孤独的散文家似乎对周围事物特别敏感，连捉摸不到的自然现象，也可寄寓自己的情感。日本，是个多雾的国度，海洋性气候带来诗一样的雾，也带来白茫茫的愁雾。各人的心境不同，眼中雾也不同，“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奋斗。雾，雾呀，只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像陷在烂泥淖中，满心起挣扎，可是无从着力呢？”（《雾》）作者借自然界的自然现象——雾，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从火热生活中冷寂下来的孤独，有一种离群索居的苦闷，这又是和茅盾的生活经历有关的。——惨云愁雾，历来是文人们比喻的一种心绪，在茅盾心绪里，雾是可诅咒的，同样，在一篇题为《虹》的散文里，茅盾把向来作为美的象征的虹，也一改常规，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

另一类散文是游记见闻，是茅盾作为旅日华人，在日本时所见所闻，主要有《速写一》、《速写二》、《红叶》、《邻一》、《邻二》、《樱花》、《风化》、《自杀》等。这类散文同样具有较高审美认识价值。《红叶》记叙了作者在秋色里去山上看枫叶，但茅盾没有写枫叶如何，却写了人，写了场景，也表达了“原来只是如此这般一回事”的思想底蕴。而《速写一》、《速写二》作者写在日本进浴室洗澡时的见闻，写得精密，写得细腻，比如在写水龙头时，“这是个擦得耀眼的紫铜质的大家伙，虽然关着嘴，可是那转柄的节缝中却哧地飞出进出两道银线一样细水，斜射上去约有半尺高，然后乱纷纷地落下来，像是些极细的珠子。”樱花是日本国花，大凡从日本回来或偶尔路过日本的人都要记述所见樱花或想看樱花的愿望，茅盾也不例外，在日本期间，他写的《樱花》散文，就是记叙自己结伴去岚山观樱花的盛事。但他用经济的笔调写在岚山的游览，而大量笔墨在渲染樱花的影响、吸引力，写自己寓所门前的树，想象着这是樱花树（其实就是樱花树），春天来临，这几棵樱花树正蓓蕾着，不久便烂漫一片，在这样的基调色彩里，结伴去游山。然而到了岚山，吸引作者的不是樱花而是岚山的自然景观，这种活泼写法，令人击节。《邻一》、《邻二》则写出寓所邻居的孤愁美貌的少妇和活泼可爱的日本小孩，散文写得幽怨缠绵，情意缱绻。《风化》是茅盾就在日本所闻而写的一篇散文，议论日本警察的腐败，讽喻日本军警制度。当时日本报载一个负责巡查有伤风化的警察的一桩丑闻，说那个警察半夜里抓住一对并头而睡的男女，在带往警察署的途中，那个负责巡查有伤风化的警察放走男的，让女的跟他走，半途强奸了那女侍者。报上一登载，舆论大



晔。茅盾也就此写下了这篇散文，揭露了日本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另一篇《自杀》同样也是茅盾根据报载材料写成的一篇暴露日本社会黑暗的散文。

据不完全统计，茅盾在日本期间共创作了《自杀》、《一个女性》、《诗与散文》、《色盲》、《县》、《泥泞》、《陀螺》等7篇短篇小说。这些长短不一的短篇小说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大都用现代女性作主人翁（个别除外），大都偏重于情感世界的展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观照，茅盾在日本期间的短篇小说，虽然是《蚀》三部曲底蕴的延长，但无论题材和描写方法都和《蚀》相似而和《虹》不一。这样说，并不否认茅盾在日本前所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作为茅盾思想转折点的作用——因为创作方法上的转换，似乎有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即使在思想苦闷期过后，还在有意无意地起作用，制约、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如《自杀》这篇小说，是茅盾去日本后写的第一篇小说，《自杀》里的环小姐，是一个表面为新潮女性，而本质上是一个受封建伦理思想毒害较深的青年女性，她和一个愿为大多数利益而奋斗的革命者相爱后，发生了肉体关系，后来那个男子革命去了。环小姐却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苦闷、惶惑，羞愧、孤独一古脑儿地从心头涌起，不能自拔，最后以自缢来解脱。这个环小姐没有能从革命高潮跌落后振作起来，而在跌落后失望到绝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尤其是女性，从大革命高潮中热烈的爱恋到大革命失败后心理负重，都得到真实的表现。茅盾笔下的这位环女士，在《蚀》中就有踪影，但一般而言，《蚀》中的这类女性，作者是用客观笔调来写的，而《自杀》中，却带有某种批判意味、警世意味。茅盾在谈到《自杀》创作动机时说：“我觉得‘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许多向来不知‘人生为什么’的青年，但是被唤醒了青年，此后所走的道路却又各自不同。像娴娴那样性格刚强的女性。比较属于少数；而和娴娴相反，性格软弱的女子，却比较属于多数。写这些‘平凡’者的悲剧或暗淡的结局，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在这一念之下，我就盘腿坐在铺席上写了短篇小说《自杀》。”

和环小姐不同，茅盾在《一个女性》中，塑造了另一类型的女性——琼华。琼华出生于破落望族，但她没有“时代女性”那样追求“性解放”，放浪形骸，追花逐蝶，在大革命后自甘堕落下去。她不卑不亢的个性，使她在小镇上成为中心，傲视那些卑琐的“小人”，后来，家庭发生变故，父亲酒后失火，葬身火海。从此，家庭一落千丈，来琼华家的人，只有一个郎中，后来连郎中都少来了。后来，琼华生病，奄奄一息中，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真的爱情。最后见到心底里藏着的恋人张彦英，才“软倒在母亲的怀里了”。这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的根源在社会，杨琼华因同情同学张彦英的身世，为社会所不容，受到流言的攻讦。张彦英被逼出走故乡后，杨琼华受到一批卑琐的人捧颂，而家庭变故后，琼华又被社会遗弃。但好强的琼华不甘心就此败落，决意报复。社会又不允许、世态炎凉，给琼华一副清醒剂，但毕竟迟了，待爱恋的张彦英赶到时，她已是弥留之际了。从人物形象来说，杨琼华和《自杀》中环小姐都是在五四精神孕育下成长起来的年青女性。但性格不同，结局却都是悲剧性的。这种社会题材对初到日本后的茅盾来说。确实是驾轻就熟，《蚀》中未表现的女性形象，带到日本表现，但没有日本风味，而全是中国气派。《色盲》是茅盾1929年3月初作毕的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一个男主人公林白霜和李惠芳、赵筠秋两个女性的恋爱心理过程。林白霜是经过大革命经历后失去方向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政治色盲者”，而李、

赵两位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官僚。因而这篇小说是茅盾借恋爱外衣来揭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迷惘意识的一个侧面。小说中大量真实的、准确的意识流从茅盾笔下汨汨而来，显得十分真实。小说的象征手法，中国革命最壮丽的一幕落幕后的心态，曲致出来，散出无尽的韵味。《诗与散文》这篇小说的主人翁也同样是女性，但她身处逆境却性格刚烈，无所顾忌。故事虽然是儿女私情，却也是表现同时代女性的一种类型：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一种心理扭曲的典型代表。《昙》中的强女士却又是另一种典型。她虽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但她依然是过去那种优柔寡断性格，她不敢爱所爱。当父亲把她当筹码嫁给新贵作姨太太时，她只有逃避。总之，茅盾在日本时，精雕细镂，营造了一座丰富的艺术长廊，创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们性格各异，出身不一。但似乎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激动过，参加过，面对大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她或沉沦，或奋斗，或追求，或放浪形骸，从而构成了不同性格的女性系列形象。

茅盾在日本时，除写了一系列女性题材的作品外（《陀螺》也如此），还写了一篇风格迥然不同的小说《泥泞》，这篇小说没有像《自杀》、《诗与散文》那样，字里行间透出一种飘逸，芬秀的书卷气，而满篇都是泥土气，正像题目所揭示的，弥漫了一种湘鄂农村的泥土气。作品描写了一个村子里农民运动兴起时人们从怀疑到参与，以及农民运动失败后农运骨干被杀的事实。作品是大革命时期湘鄂农村革命的一个缩影。它把大革命从兴起、高潮、失败的过程，浓缩在几千字的短篇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革命在农民意识没有觉醒，对中国革命没有认识的情况下，难免不失败，因此，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同时又揭示了：革命队伍本身的不纯和单纯，又是造成农民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因而，茅盾这个可以作为《蚀》背景看的短篇小说，基调灰暗，充满恐怖、怀疑、血腥。这种情况，在日本写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尽管这些散文、短篇小说，不减写《蚀》三部曲时的风采，但在日本时创作影响最大，也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长篇小说《虹》。

《虹》的故事主人梅行素原型，是秦德君的女友胡兰畦，在与秦德君的共同生活中，听秦德君多次讲述这位女友的坎坷经历和个性后，逐渐了解了胡兰畦的生平，了解了胡兰畦的经历，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形象在茅盾脑海中形成。

胡兰畦是1901年生于成都的一个反清世家，母亲粗通文墨，因而她从私塾到新式女校，受过良好的教育，16岁时，母亲病重，便把女儿许配给常常关照胡家的一个小商人杨固元，但杨是个没有文化、粗鲁、品行不端的人。五四以后，胡受新思潮影响，追求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爱上表兄魏宣猷。1920年农历10月，魏鼓动胡兰畦一起去重庆，当时为了能出走，胡牺牲自己，与杨固元成婚。婚后不久，胡说服丈夫，去重庆巴县教书，实际上是去寻表兄。不料，魏在重庆病重，正在往成都赶，而胡则往重庆赶，结果胡兰畦的轿子与魏宣猷的轿子在中途擦肩而过，致使胡兰畦与心中相爱的表兄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后来胡知道实情后，决心脱离家庭，先后在巴县女校、川南师范附小作教员，后来又曾在杨森家里作家庭教师。不久，脱离杨森，出川到达上海，结识了陈望道、吴庶五、孔德沚、张人权、恽代英等革命者，后又到广州、武汉投身革命，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胡兰畦其人，茅盾认识，但她的经历，却是听了秦德君的叙说之后，才了解的。于是，茅盾从1929年4月到7月间，用心写了《虹》这个长篇小说。

由于有生活原型，包括听过陈启修对三峡之险的描绘，所以《虹》无论从人物、风光上都较胜《蚀》三部曲；在茅盾长篇小说中，是成功的作品。尤其是前七章，梅小姐的性格、环境都写得神彩飞扬，楚楚动人，成功地刻划了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的倔介的性格发展成为坚强的反抗侮辱、压迫的性格，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同时，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也倾注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因而更真实。至于题目《虹》，茅盾认为“‘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照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座桥，‘虹’又常见于傍晚，是黑夜前的幻美，然而易散；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这些便是《虹》的命意：一个象征主义的题目。”

此时，一个意外，茅盾自己也没有感觉到。当时党组织对茅盾的关注依然，组织关系也秘密地转移着。几十年后，才发现这样一个材料：

东京市委：

收到你们的来信，兹特答复如此：

……

四、沈雁冰过去是一同志，但已脱离党的生活一年余，如他现在仍表现得较好，要求恢复党的生活时，你们可斟酌情况，经过重新介绍的手续，允其恢复党籍。

……

中央 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

但让人遗憾的是，日本经过 1929 年的大检举后，党组织被破坏殆尽，如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反日大同盟”组织委员会主任黄鼎臣，因开展爱国反日活动被日本警视厅拘留并遣送回国。杨贤江等也被迫回国。在茅盾看来，恢复组织生活也都成了泡影。但是在日本与秦德君女士同居的消息，却传到上海，夫人孔德沚和母亲也都焦虑万分，期盼着茅盾回到夫人身边，回到母亲身边。

1930 年 3 月底，茅盾和秦德君结束了那一段浪漫而又苦涩的亡命生涯，从日本坐船，秘密地抵达上海，茅盾回到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秦女士则回到了四川。

不尽人意，而又积极投入，其中也有积极的消极。  
风风雨雨，耗去他不少精力，苦劳？功劳？  
是否是左翼文化人的生存方式。

## 第十一章 “左联”

茅盾和秦德君坐春风雨飘摇的船，1930年4月5日秘密地回到上海。好友叶圣陶赶到码头去迎接，并对这对漂泊归来的情人，作了安排。

回到上海的当天晚上，茅盾面带愧色独自悄悄地回到家里，还是母亲来开门。在昏暗的灯光里，见母亲咳得厉害，知道母亲为这家、为孩子劳累了，加上这几天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容易犯气管炎。母亲到厨房里一会儿，就给茅盾端来热腾腾的饭菜，她看着儿子那疲惫的脸，絮絮地告诉说：亚男和阿霜已在尚公小学读书，亚男是三年级，阿霜是一年级。德沚是在一所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同时在工人夜校工作。末了，还劝茅盾，“与那个女人早点分手，这个家少不了你的。况且，现在你也正要做事业的时候，纠缠在这种纠葛里面，恐怕你今后的路更难走”。茅盾是孝子。母亲那番语重心长的话，茅盾听得心里七上八下，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便说：“妈妈说得对，我回来，就是和妈妈商量这件事的，既然妈妈有这个意思，我想办法尽快回来。”茅盾母亲一听，叹口气说：“德沚一个人在这里，也够艰难的。我老了，也离不开她了。当初你们结婚时，我就讲过，我没有女儿，我是把德沚当女儿看的，也当作女儿一样调教她的。”说到这里，停一下，又告诉茅盾：“冯雪峰住在这里。”

这时，孔德沚推门进来，她刚刚从夜校里回来，见茅盾回来，满脸惊讶，“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茅盾讷讷地说：“刚刚到。”这时，茅盾母亲接上儿子的话，对德沚说：“德鸿回来，还要避人耳目，这几天家里准备准备，准备好后，德鸿就回来。”这时，气氛轻松了许多，话也多起来了。

“目前我要找公开职业不容易，妈妈刚才说得对，我还只好蛰居租界，继续卖文为生，好在文章写出来书店老板还肯要。但景云里这个地方大家已经都知道，因而这个家要搬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这样倒安全些。”过了一会儿，茅盾带着歉意的目光，对夫人说。

“这样也好，换好地方后，我也回乌镇去了，两个孩子，德沚自己可以带了。”茅盾母亲进房间替两个孩子盖好被子后，出来听茅盾这么说，果断地同意儿子这个想法。

德沚吁了一口气，“让妈妈作主吧。”也同意茅盾母亲的主意。这时，茅盾母亲见德沚也转过弯来了，十分高兴，说：“现在时间还早，你们两个去隔壁看看叶绍钧先生，德鸿走后，他对我们非常照顾的。”于是，茅盾和孔德沚一起去隔壁拜访叶圣陶。感谢他两年来对茅盾家里的悉心照顾。叶圣陶是个厚道人，待人真诚。叶圣陶说：“应该应该”。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什么，对茅盾夫妇说：“雁冰兄回来，鲁迅还不知道，现在已是深夜，和你们一起去看望他一下。”茅盾和孔德沚都表示同意。于是，茅盾夫妇和叶圣陶一起去拜访鲁迅。

鲁迅家就在后面，转个弯就到，鲁迅正在灯下写文章，见茅盾从日本回来了，非常高兴，问了不少关于日本的情形，因为鲁迅离开日本后，还没有回去过，他回忆了在仙台读书的情形，描绘东京上野樱花烂漫的情景，回忆

藤野先生的为人和教学方法。茅盾问鲁迅先生，近来在写些什么？鲁迅告诉茅盾，近来在翻译法捷耶夫的《毁灭》。

刚刚从日本回来，对国内的情况已经有些隔膜，因此，茅盾一回到上海，没有立即埋头创作，而是秘密拜访了一些熟人、朋友和亲戚，从他们那里打听一些 1930 年中国上海的情况。当时，茅盾的表叔卢学溥（鉴泉）去慕尔鸣路用 12 万银元向同乡富翁徐冠南购得一座花园，这座花园占地方不广，却有楼台亭阁，水树回廊，还有荷花池、九曲桥、假山瀑布之类造景，内有一座五开间的中式厅楼，后进筑有一个小戏台。所以，茅盾首先去拜访他，走进这个气魄很大的花园，一种大户人家的特有氛围扑面而来。已在这里作寓公的卢学溥满脸红光，把茅盾让进客厅，一坐下，卢学溥朗声说道：“我听说你要回来，果然！”茅盾一怔，心想刚回来几天，怎么卢表叔就“听说”了呢？因而茅盾一笑，转而问道：“表叔何时听说我回来？”卢学溥捧起茶，吹了吹，微微一笑道：“不是汪精卫叫你回来的么？”茅盾一听，更为惊讶，连连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此时汪正联合冯玉祥、阎锡山以北平为大本营，号召“讨”蒋，两方军队，正沿津浦路作战。卢学溥也觉得奇怪，没等开口，茅盾又解释道：“如果是汪精卫叫我回来，那么，我该从日本直赴天津再进北平，何必绕道上海？”卢表叔点点头，说：“如今捕风捉影的谣言很多，不理它算了！”

后来，茅盾成为卢公馆的常客，茅盾从卢公馆来往的客人中，了解到南京政府的动向，也从南京政府的动向中，了解到中共土地革命战争的一些零星情况。但不久，茅盾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又和中共秘密组织来往。成为“左联”的成员之一。

有一天，老友杨贤江悄悄地问茅盾，“有人想同你谈谈，你愿意否？”“是谁这么认真，见面还要先征求我意见？”茅盾一听，疑惑地问。

杨贤江一笑，认真道：“是冯乃超。他说两年前曾与你打过文字仗，怕伤了你的感情，不敢贸然来访，只好先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冯乃超？”茅盾想起来了，虽未见过面，但知道他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文章写得很尖锐，很有火药味。茅盾沉吟有顷，道：“好，什么地方见面，由你给安排吧！”“在我家如何？”杨贤江说。“可以呀”。茅盾也一脸正经地说。

第二天，冯乃超准时来到杨家，二人一见面，茅盾才知道冯乃超是日本留学生，因此两人便谈起了在日本见闻和感受。在闲谈中，茅盾又知道冯乃超的女友李声韶是李汉俊的侄女、李书城的女儿时，十分感慨，他告诉冯乃超，他和李汉俊是老朋友了，“汉俊绝顶聪明，我编《小说月报》时，唱独脚戏，汉俊帮了我不少忙。我们又经常在一起开党员会。知道他留学日本，除日文外，又通英德法三国文字。在上海时，他自奉甚俭，除香烟瘾特大外，别无嗜好，衣服朴素，像个乡下人，乍见时，谁也想不到他是通晓几国文字的留学生。他那时的理论水平很高，他给《小说月报》写稿，介绍欧洲文学运动，很受读者欢迎。可惜他个性很强，因不满陈独秀的作风而脱离组织回武汉去了，后来我去那里，又见面了。汪精卫叛变之后，汉俊在湖北省当教育厅长，他力持正论，为共产党辩护，揭露汪派反动实质，同时又与财政厅厅长詹大悲二人天真地认为，国民党右派只是杀共产党人，没有躲避，结果他们还是被杀了。可惜呀可惜。”

冯乃超听了茅盾那番话，沉吟了一会儿，接着茅盾的话说：“他是上了

南京政府通缉令的，所以被杀害了。他还不到 40 岁呢。”

茅盾点点头。

冯乃超掉转头，问茅盾：“沈先生知道不知道上海成立了‘左联’？”

“左联？”茅盾说：“听朋友谈起过，但具体情况不知道。”

“今天我就是代表‘左联’专程来邀请沈先生参加‘左联’的。”冯乃超又说。接着，冯乃超又向茅盾介绍了“左联”的筹备和成立经过，已参加的人员情况，并拿出一份油印的“左联”“纲领”递给茅盾：“沈先生看一下，看有什么意见。”

茅盾仔细看过材料，便说：“不错，很好。”

“那你是否愿意参加？”冯乃超接着问道。茅盾莞尔一笑，沉吟一会儿，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依据‘纲领’的规定，我还不够资格呢。”

冯乃超不知道茅盾心里在想些什么，便笑道：“沈先生过谦了。”说完，拍拍手里这份材料：“这份纲领是大家奋斗目标，只要同意就可以了，你不必客气。”

茅盾不好再说什么了，便点点头说：“那好吧。”冯乃超自己任务完成，十分高兴。接着又向茅盾介绍了“左联”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茅盾听来，“左联”似乎很活跃。

对“左联”，茅盾后来有很高评价。

30 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伟大的功绩。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奠基者和播种者。这个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而“左联”则是它的核心。“左联”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创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培养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的文艺队伍等方面，都作出了辉煌的成就，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抗日战争中，以“左联”为核心的这支队伍撒向全国，成为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革命文学运动的中坚。全国解放后，这支队伍又成为全国各条文艺战线的骨干和核心。可以说，无视“左联”的作用，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现代和当代文学史。

然而，当时茅盾对“左联”的一些作法，由于经历过大革命那样风风雨雨之后，在政治上更成熟了，因而保留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对左联那种类似政党活动的一些活动，茅盾并不热心参加。因为这些文人的热心，在茅盾看来，幼稚和可笑。而他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当面反对，会挫伤这些文艺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有违组织原则，所以茅盾采取不热心参加这样一个办法。比如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等本不该左联成员做的事情，茅盾从未参加，当时一些年轻的左联成员，对茅盾这样的态度不以为然，甚至很有意见。而冯雪峰却对那些年青朋友解释说：“茅盾年纪大，身体不大好，不必要求他也和大家一样去上街游行。”实际上，茅盾当时亦只有三十多岁。茅盾听到冯雪峰有这样一个解释时，哑然失笑。

参加“左联”一些会议之类的活动，还是必不可少的。因而离群索居两年多的茅盾，仿佛又忙碌起来了。刚答应冯乃超参加“左联”不久，“左联”就通知茅盾，让茅盾去福州路参加一个“左联”大会，冯乃超在会上作政治形势报告，说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要求大家毫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会上，茅盾发现“左联”成员都以青年作家为主，而且郑振铎、叶圣陶都没有参加，感到

很纳闷。事后问冯雪峰：“西谛兄和绍钧兄怎么都不参加‘左联’？郁达夫倒是其中成员，是何缘故？”冯雪峰说：“振铎和圣陶他们，主要是多数人不赞成，所以没有进来；郁达夫是鲁迅介绍的，所以大家才同意。”说到这里，冯雪峰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圣陶那里，我已经去做过解释工作，免得他多心。”

“这样做，总不好。把这样优秀的作家关在门外，不利于工作的。”茅盾表示反对这种关门的做法。“鲁迅也反对这样做。”冯雪峰接着茅盾话茬说。

五月下旬，“左联”又召开大会，主要是组织号召参加“五卅”纪念示威的事，会上，通过了盟员一致参加五卅纪念示威的决议，并把盟员分成小组。鲁迅也来参加会议，他用浓重绍兴口音说：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主要“左联”每个成员思想要坚定。他还针对“左联”成员的思想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茅盾发觉鲁迅讲话和他的文章一样，非常尖锐深刻。

“左联”的激进的活动，使茅盾认识了胡也频等青年作家，但它同时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唯恐这些年轻的作家们再闹出一个五卅、五四来。9月30日，国民党秘书长陈立夫便签发了“取缔”左翼作家联盟、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等组织的密令，12月又颁发了《国民政府的出版法》四十条，对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发行施加种种限制。

自然，国民党的这些伎俩，对茅盾来说，并无惧怕，对“左联”那些类似政党的做法，也不以为然。茅盾和鲁迅谈到“左联”时，也交换过这些看法，鲁迅听后，有同感，淡淡一笑，说：“所以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

这时，茅盾秘密搬家到了静安寺附近，刚刚安顿好，同乡老友徐志摩却带了一个外国女人找到茅盾这个秘密新居。听得叩门声，茅盾见是徐志摩，吓了一跳，这次秘密搬家，志摩怎么就知道了？忙问：“志摩，你怎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徐志摩依然那么潇洒，活泼，看到茅盾那一脸惊讶，没有正面回答，却说：“我给你带来个客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北平的记者，叫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是个非常爽朗的人，立刻伸出手，用英语对茅盾说：“对不起，打扰了。”茅盾也用英语回答：“欢迎欢迎。”忙请大家进屋去谈。

进屋后，茅盾为徐志摩、史沫特莱沏上茶，徐志摩忙说：“这几年老兄转到文学上，成就很大，早几年我见到《幻灭》发表，就猜出是出自老兄之手，后来，果然！让我猜中了，连云少爷也不得不承认。”茅盾笑着点点头。讲起《幻灭》，史沫特莱知道茅盾的三部曲，合成一集，以《蚀》命名出版。便说：“沈先生的《蚀》出版，能不能送我一本呢？”话语里，十分直率。

茅盾点点头，“可以可以”。忙起来，去房内取来两本书，签过名后，分别送给史沫特莱和徐志摩。史沫特莱拿起《蚀》，翻了一下，看见扉页前的作者的照片，端详一会儿，抬头看看眼前这个小个子作家的模样，笑道：“Like a young lady。”意思是说像个年轻的太太。说完，茅盾和徐志摩都笑了起来。

大家又谈了些北平、上海文艺界的形势，徐志摩和史沫特莱便告辞了，但茅盾和史沫特莱的友谊，却从此开始了。

1930年8月，茅盾的老友瞿秋白夫妇从莫斯科归来。并用暗号给茅盾写

了一封信，约茅盾夫妇去聚谈。茅盾夫妇和秋白夫妇已是多年不见，便按约去秋白秘密住所拜访，旧友相聚，自然十分欣喜，茅盾向秋白诉苦道：“自从日本回来，发现国民党仍耿耿于怀，称我的文章‘不无宣传共党嫌疑’，所以只好当专业作家了。”茅盾显得十分无奈。二人谈起往昔峥嵘岁月，都唏嘘不已。茅盾向秋白打听胞弟沈泽民在苏联的情况，秋白告诉茅盾：“泽民、琴秋不久就要回国了，琴秋生了一个女孩。”茅盾、孔德沚听了，都十分高兴。停了一会儿，秋白问茅盾：“打算写哪些小说。”茅盾说：“想写些历史小说。”秋白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不错，写历史小说，也可以反映现实斗争。”秋白还为茅盾讲述了当时的革命形势。

从秋白那里回来没有几天，茅盾得知胞弟沈泽民化名李明扬，秘密回到上海了，但中共的交通员没有接到沈泽民，十分焦急，便到茅盾家里探听，茅盾夫妇才知道沈泽民已回上海。

没有找到沈泽民，中共中央十分焦急，因为知道泽民带有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示，即后来史称“十月来信”。于是，茅盾和中共组织商议，拟个只有泽民才知道的启事，启事如下“阿二，家庭小事口角，何必出走，慈母以只生我兄弟二人而不和睦，甚为焦急。兄现已来沪，暂寓某某处，以十日为限，见报速来相见。”这条启事登遍上海各报，但仍不见泽民踪影。于是，茅盾又和中共交通员商议，再发一个启事：“罗美老弟，有事相商，请来某某处，博古。”这里的“罗美”是泽民的笔名。但这则启事登出后，也没有回音。所以中共组织急得团团转，生怕出意外，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和杀害。后来，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茫茫人海中，杨之华在一个工厂门口，碰到沈泽民。才算又和中共接上头。原来泽民回上海后，对国内情况不了解，不敢去找熟人，因错过接头时间，他只好去租一个住房，伺机与组织联系。时间一长，他想进工厂做工，以便找到组织。所以，他在一个工厂门口徘徊时，被杨之华碰见，遂接上组织关系。胞弟沈泽民回来不久，弟媳张琴秋也转道东北回到上海，泽民进中共宣传部工作。琴秋做女工工作。

此时，“左联”内部决定办一个刊物，并定名为《前哨》，由鲁迅、冯雪峰和茅盾负责编辑，在筹备过程中，“左联”发生五作家被害事件，消息传来，“左联”成员都义愤填膺，把披露五烈士的工作，作为《前哨》的第一期内容。茅盾他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秘密印刷，左联烈士的照片，都是印好后，用手工贴上刊物内页的。茅盾和鲁迅共同起草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全国革命文化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发表在《前哨》上，通过秘密渠道，向全世界控诉。

由于《前哨》直露的政治态度，秘密发行，也立即遭到查禁。于是第二期改为《文学导报》，继续顽强地出版。

1931年春暖花开时，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夫妇奉命去鄂豫皖苏区开展工作。从此，茅盾和胞弟成为永诀。沈泽民后来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两年后，1933年11月20日牺牲在苏区。5月下旬，冯雪峰到茅盾家里，要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茅盾表示推辞，雪峰告诉他，这是经过研究后的决定，并宽慰茅盾：“试试吧，反正是轮流担任，工作也是大家做的。”茅盾默认了。不久，瞿秋白因在党内遭到王明的排挤，表示想搞文学，所以，他有更多时间来领导“左联”工作，而茅盾则有更方便的机会去和秋白、鲁迅等商量“左联”工作。



1932年底，《申报》的老板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回国的黎烈文，改革《申报》副刊“自由谈”，茅盾、鲁迅、瞿秋白三人支持黎烈文，茅盾接连写《“自杀”与被“自杀”》、《紧抓住现在》、《血战一周后》等文章，在“自由谈”上发表。1933年1月30日，“自由谈”在《编辑室读者书》中说：

“编者为使本刊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

这里的“何家干”是鲁迅先生，当时秋白因政治原因，许多文章和鲁迅商量后，也用“何家干”的笔名发表，而“玄”先生，则是茅盾。因而这段时期，茅盾和鲁迅、秋白三人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加深。

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以后，茅盾的活动就多了，会议也多了，并且经常出没在左翼人士的活动场所，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次，茅盾和冯雪峰等到北四川路附近的一所中学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出来，立刻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梢了，幸亏茅盾发觉，后来转换了几辆车，又走进一家银行兜了个弯，才甩掉那个尾巴，终于脱险。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左联”五烈士的被害，使上海革命作家们处在极度危险之中，1932年3月3日的《社会新闻》刊出《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一文，点名揭发茅盾、鲁迅：“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1933年4月，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回到上海，此时因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小说月报》被毁，就合计办一个《文学》刊物，郑振铎活动能力强，由郑振铎出面，请傅东华任主编，由生活书店出版，并成立一个由名人组成的十人编委，即茅盾、郑振铎、鲁迅、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洪深、徐调孚、傅东华。到7月，出版第一期《文学》，立即引起轰动，在上海沸沸扬扬起来，各种带恐吓性的谣言公开在一些刊物上。上海艺华影片公司主办的周刊《微言》首先推出“茅盾被捕说，确否待证”的消息。过了几天，这个消息传到北平，北平的左翼刊物《文艺日报》在7月11日也登了这个消息：

“中国著名小说家茅盾氏于6月27日在上海被捕，是否被害尚不明。近日上海作家相继被杀，已成恐怖世界。此种无理陷害已引起一般人之非难。”

当时，茅盾被捕之说是误传，但茅盾在“左联”的一系列活动，以及文学创作上的强烈的社会意识，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倒是事实。因为7月14日伊罗生的《中国论坛》第二卷第八期上登出的当局要暗杀的黑名单上，就有茅盾的名字。不久，国民党对文学实行高压政策和暴力手段。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查禁普罗文学的密令，责成内务部审查刊物，“须更严密，毋使漏网”。而后又下令禁止出版“反动”书刊等，上海艺华影片公司、神州国光社、良友图书公司，光华书局相继被捣毁。所以，茅盾在“左联”的活动天地里，面临的还是一片白色恐怖。但此时的茅盾，政治上更成熟，而方向也更明确，斗争也更策略，尤其与鲁迅、瞿秋白等思想家在一起，对形势的分析和观察，似乎更准确还在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之前，茅盾觉得自己的位置还在文学这个领域，用小说创作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小说又必须从生活中提炼，选取素材的，因此只好从自己熟识的生活写起。1930年11月至次年2月8日，茅盾写了中篇小说《路》，写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在写作过程中，他多次和秋白交谈，秋白对形势的分析，启发了他的思路。在这之前，中国革命已经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各地红军的壮大

和游击战争的胜利，以及七月红军攻入长沙等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上海，消息向来灵敏的作家，自己也风闻了，而且秋白也证实了。这些，极大地鼓舞了茅盾，激起茅盾的创作欲望。因此，《路》的写作意图，就是想指出在这样的政治军事形势下青年的出路。《路》中的主人翁叫火薪传，名字本身暗示革命火种正在蔓延，必将成燎原之势，火薪传也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写完《路》，茅盾编了一本集子《宿莽》，书名暗示蒋政权压迫左翼文艺，虽甚残酷，然而左翼文艺必将发皇张大，有如宿莽是冬生不死或遇冬不枯的意思。

写完《路》，茅盾又接着写《三人行》，但《三人行》是个不成功的作品，它没有达到作家预定的目标，所以当时瞿秋白读了这个《三人行》之后，对茅盾开玩笑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你这《三人行》是无我师焉。”这话茅盾也认了。

在这期间，茅盾搜集材料，更理性地研究了一些理论和现象，尤其在秋白的建议下，写了探讨“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和文学现象的文章，即《“五四”运动的检讨》和《关于“创作”》，这两篇文章，有力地促进了“左联”的理论建设。与此同时，茅盾和瞿秋白、鲁迅等一起，在“左联”内刊《文学导报》上写了不少富有战斗意义的文章，批判民族主义文学。

到了1931年10月初，茅盾向冯雪峰提出辞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专事创作，结果，左联没有批准，却同意茅盾请长假，从事创作。至以后来，茅盾依然一如既往地“左联”中工作，茅盾还和鲁迅一起，为“左联”提供活动经费，鲁迅每月20元，茅盾每月10元。写《子夜》、编《文学》时还支持《北斗》，为“左联”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一直到1936年2月“左联”解散，茅盾始终是一个“左联”带头人。而且，“左联”时期，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多产期。

《子夜》的问世，成为 30 年代初中国东方大都市的一道风景线；在这道风景线上，映出芸芸众生，映出时代风云。他以大师的才智，创作出《子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 第十二章 都市风景线：《子夜》

还在 1930 年夏秋的季节里，茅盾搬过几次家，最后住进了静安寺附近愚园路口的庆云里的一个三楼厢房带过街楼，共有三间房子。楼下住的是二房东，茅盾称自己是教书的。而此时，茅盾的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并作，医生要茅盾少用眼多休息。茅盾的表叔卢学溥此时也在家赋闲，他对晚辈茅盾十分赏识，小学时代显示出来的聪慧，就认为自己这个表侄能成大器，曾作“12 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的评语。卢学溥与茅盾谈起往事，还十分得意。另外，此时茅盾虽加入“左联”，但对“左联”的做法、“左联”的左和幼稚，都十分不理解，但又不便反对，只好作逍遥派。因而，这个时候，茅盾有事无事都往卢公馆跑。

卢学溥在沪上作寓公，又有这样有气派的大宅，因而许多同乡故旧人来人往，当中有开工厂的、有卢表叔的银行同僚、有公务员、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搞投机的，高谈阔论有之，慷慨激昂有之，切齿痛陈有之，窃窃私语有之，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中，茅盾听到不少关于中国形势的种种内幕。这些同乡故旧当中，茅盾也大多认识，他们都认为茅盾是个文人，因而政界、军界、金融界、商界上的内幕，并不避嫌，都乐意和茅盾谈。这些同乡故旧还热情邀请茅盾去他们那里玩，于是茅盾又有参观丝厂、火柴厂、纱厂、银行、商店的机会。在参观中，茅盾自己也感觉到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日本时那种灰暗的情绪、不稳定情绪，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他看到了世界经济萧条，向中国倾销商品时，中国民族工业的衰败以及一些同行老板的艰辛。他看到证券交易所那“搏斗”的场面，股票指数的上扬下跌，对那些在股市“搏斗”的人们，也带来了兴奋、沮丧。那些兴奋和沮丧的面孔后面，茅盾似乎感觉他们更关心股市之外的形势——战争的胜负；政界变幻，直接影响着股市交易的人们，而操纵这些场面的人，是从来不在交易所里露面的，他们住在豪华饭店，带着情人，或者带着姨太太，出入交际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谣言、谎言，操纵着股市风云。这些操纵者，都有外国势力作后盾，实际上在充当买办的角色。因此，茅盾在与这些故旧同乡的周旋中，了解到不少经济与整个社会形势相联系的东西，这些老板们的“悲欢离合”，最为集中表现在交易所这个小天地的大世界里，包括人情世故，也似乎和整个经济相联系。同乡一个老板，曾告诉茅盾这样一个可耻的故事。有个小老板因为打听股市发展趋势内幕，不惜让自己的女儿去充当股市操纵者的情妇，让女儿把情报弄到手，再决定抛还是收。结果，女儿不谙世事，失身于操纵者，“情报”又没有弄清，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小老板觉得无脸见人，就上吊自尽了。这个细节，给茅盾心灵十分震撼，金钱让人灵魂堕落到这个地步！在卢公馆，茅盾听到作公债投机的人曾以 30 万元买通冯玉祥部队，在津浦线上北退 30 里，以蛊惑市场，投机人乘机活动得利十分丰厚，这又是给茅盾心里一次震撼。因此，茅盾对中国社会现象看得更清了，“中国的民族

工业在外资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破产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同时，茅盾又从不同渠道，听到工农红军的消息，这个消息，对茅盾这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来说，自然十分高兴。

在卢公馆里听到了许多新鲜的消息，茅盾又忽然想起不久前学术界人们很热闹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当时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中国社会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是当前革命的任务，领导这一革命的是无产阶级。另一种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承担。第三种观点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茅盾从自己大量耳濡目染的现实和材料中，觉得完全可以证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然，茅盾觉得这些素材，不宜写论文去证明，而宜写小说去证明，因而茅盾打算写一部都市、农村交响曲，而且都市部分可写三部曲，并着手拟大纲和梗概，定名为《棉纱》、《证券》、《标金》。茅盾还读了周培兰的《中国纺织业及其出品》等专业书，深入研究中国棉纱业的历史和现状，为使小说更具有坚实性。

但写完提纲以后，茅盾又觉得都市部分好写，而农村部分十分为难，二者的配合、呼应等都会产生轻重不当的感觉。因而茅盾把这个已拟提纲的写作计划放下，转而去写中篇小说《路》。不料，《路》只写了一半，眼疾发作，只好遵医叮嘱，不看书不写作，休息三个月。但用茅盾的后来说，眼睛不能用，大脑却异常活跃。他在眼睛休息时，反复比较思考，决定改变原来写城市农村交响曲的计划，专门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同时，把原来的一些分散的故事选取之后，集中在这部长篇之中，在重新构思时，茅盾又仿佛重温素材，心里觉得更加有底了，并把纱厂改为丝厂。于是，茅盾又去重访故旧，有目的地进一步搜集素材，在这些同乡故旧中，茅盾了解到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的缩影——丝厂的情状，上海倒闭30家，无锡、广东、苏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各丝厂十之八九都倒闭，同时，茅盾也了解到，由于国际竞争而使中国火柴厂大面积破产，因而坚定了茅盾原是以内销为主的火柴厂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受日本、瑞典的同行竞争而在国内不能立足的计划。

茅盾带着眼疾，又参观同乡人创办的丝厂和火柴厂，实地观察。正在这时，卢表叔的继母，也就是茅盾的姑祖母要做“还寿经”，在卢公馆举行盛大的场面。茅盾执晚辈礼，去参加了卢家的“还寿经”，在那里，茅盾又目睹了举行还寿经这样的场面，还到寺里参观那制作冥器的工程，目睹那些现代迷信的时代特色。

茅盾列了详细的提纲，设计了人物和情节，此时，一年多的搜集和调整，人物、情节等，基本上在茅盾头脑里形成了，甚至这部长篇小说的题目，也拟了三个：“夕阳”、“燎原”、“野火”等，后来才定名为《子夜》的。

《子夜》是1931年10月正式动笔写的，到1932年12月5日脱稿，历时一年多，其间，在与瞿秋白长谈以后，又改变计划，缩小范围，强化作品的时代性。当时，秋白在茅盾家里避难，两人天天谈《子夜》的故事，谈情节结构。革命家瞿秋白的文人本色，此时也得以充分展示，秋白在听了茅盾的构思和看了已写的几章后，帮助茅盾从政治上分析当时形势，建议茅盾在小说

中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代表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茅盾连连点头称是。秋白看了初稿后，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雪铁龙，而不是时下社会上通行的福特车。根据秋白的观察，大资本家愤怒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茅盾听了秋白的分析，十分新鲜，后来都作了改动。对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秋白也向茅盾作了介绍。但后来茅盾觉得自己不了解实际情形。凭耳食描写风景可以，凭耳食去取故事材料，觉得没有把握。因此，只把第四章保留下来。

和瞿秋白作长谈以后，茅盾掂量着已经写的部分稿子，重新对全书大纲结构进行调整，于是便成了现在这个《子夜》的样子。

《子夜》于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至此，一部巨著诞生了。它的诞生，凝聚着作家的社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子夜》的第二章以《火山》的题目，先行发表在《文学月报》一卷一期上。第四章以《骚动》为题，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二期上，全书以1930年上海这个大都市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影响下，奋斗、挣扎、直至破产的必然命运，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品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矛盾冲突，并以此为主线，描写了吴荪甫与同行，与裕华丝厂工人，与双桥镇农民及家庭内部的种种矛盾和纠葛。书中的人物，个个有血有肉，吴荪甫的果断又刚愎自用的性格，赵伯韬的财大气粗和一批小老板的走投无路的神态，几乎都栩栩如生；周仲伟、王和甫、陈君宜、朱吟秋等老板之间的金钱至上，勾心斗角，都活灵活现；与这些相匹配的，还有一批以吴府为中心舞台的各式公子小姐、少妇、交际花、诗人、学者、政客、军人以及土财主冯云卿父女等形象，都作了周到而逼真的刻画。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茅盾这一部近40万字的小说里装进了1930年前后中国都市及部分农村的庞杂的内容。其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先验的政治主题，选择好并精心塑造的人物，及独具匠心的结构，使小说具有宏大的气势，成为多声部、多色彩的都市交响曲，并历史地、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动荡时代的风云和人们的活动、情绪、心态，成为一部活的历史。”

这部《子夜》是茅盾心血的结晶，也是他广泛收集，耳闻目睹的生活的流露。作品里，到处都可以见到作家熟悉生活的影子，吴府大宅，实际上就是以其表叔卢鉴泉大宅为原型的；双桥镇的原型，来自作家故乡乌镇。因而，《子夜》恢宏的气势中，处处有生活，有真实。因而一出版，立刻轰动中国文坛。

茅盾在《子夜》出版后，送的第一人，是鲁迅。一月份出版，茅盾在开明书店拿到几本样书后，于2月4日立刻偕夫人、孩子去鲁迅家拜访，并送上还飘着油墨香的《子夜》，并应鲁迅的要求，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上：

鲁迅先生指正 茅盾 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

从鲁迅那里题字送书以后，茅盾送书都题字签名，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逝世。《子夜》一出版，立刻脱销，不到3个月，重版4次，初版3000部，再版5000部，当时北平某书店于一天之内售出“子夜”100多部，这在当时实为少见。茅盾见到大江书铺的主持者、老友陈望道时，陈望道告诉茅

盾：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小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子夜》写到她们。茅盾到卢公馆去，表妹宝小姐告诉茅盾：她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看了表哥写的《子夜》，发现《子夜》里的吴小奶奶，就是以她为模特儿的。茅盾听后，笑笑，不置可否。

一时间，争阅《子夜》，成为上海市民的一个时髦，不少人还组织“子夜会”进行学习讨论。甚至连舞女也谈《子夜》。因而当时有人冒充茅盾下舞池，与舞女跳舞这样的怪事也随着《子夜》的出版而出现了。在《子夜》风行时，瞿秋白等一评论家撰写评论。《子夜》一出版，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国内文坛除了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寄上），计30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子夜》出版，鲁迅是引以为豪的。瞿秋白在《子夜》一出版，最早发表评论，他在3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子夜和国货年》一文，高度评价《子夜》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他还预言：“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后来，瞿秋白又写了《读子夜》一文，认为“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的新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朱自清也在评论《子夜》时也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起来了，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当年和茅盾打过笔仗的吴宓教授，在研读了《子夜》之后，用“云”这个笔名，在天津《大公报》副刊发表评论文章，称赞《子夜》：“吾人所为最激赏此书者，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吴宓对《子夜》的文字也极为赞赏，“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薄，不可控搏，而其微细处复能宛委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茅盾当时见到这篇评论，虽没有公开表态谈什么，但内心极为佩服吴宓的细微。晚年回忆此事时，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后半年内，“评者极多，虽有亦及技巧者，部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子夜》热的出现，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149种著作，茅盾的包括《子夜》在内的已经出版的7种创作，全部都在被“查禁”之列。后来经一些书店老板的力争，《子夜》列为应删之列。国民党的检查人员在《子夜》这部书下面用朱笔批道：“二十万言长篇创作，描写帝国主义以重量资本操纵我国金融之情形。P97至P124（即第四章）讽刺本党，应删去。十五章描写工潮，应删改。”于是，从第五版起，《子夜》便以肢解的形态与读者见面了。但令茅盾欣慰的是，在国民党查禁《子夜》之后，巴黎进步华侨办的“救国出版社”却全部翻印了这本书，并在前言中高度评价了这本书。

《子夜》成为30年代中国东方都市的一道风景线，在这道风景线上，映出芸芸众生，映出时代风云，映出中国社会的另一面。也映出茅盾作为一代大师的地位和才智。《子夜》的出版，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是，茅盾没有停止自己的探索和努力。他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和评

论，也和上海的朋友们一道，参与社会活动。他依然在“左联”的大旗下，奉献自己的才智。

故乡情结的现代观照；引出无数故事……  
乡镇风景线的营造，都市人的审美观照；  
篇幅不长，却道出了他创作生涯的真谛……

### 第十三章 《林家铺子》和《春蚕》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大上海，茅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黑乌鸦似的纸片灰撒遍半个上海城。茅盾原先拟在杂志发表的《子夜》部分章节，也在这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面对日寇的暴行，上海军民奋起抗击；茅盾与鲁迅等上海文化界人士连续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等，义正词严，谴责日寇的暴行。不久，茅盾在一篇评论《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中，大声疾呼，我们的文艺创作要为反帝斗争服务，作家一方面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阴谋，另一方面要唤起民众，投入“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

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天气也暖和了，桑树暴出指头大小的嫩叶，油菜花也金灿灿地散布在上海郊区及杭嘉湖平原。和茅盾住在一起的母亲，此时执意要回乌镇去住一段时间，那里还有老屋在，还有一些亲戚，虽不大走动，但也十分热络，这也是茅盾母亲的惯例——天气暖和时，总要回乡住一段时间。

5月初，杲杲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大地上，软软的春风随意吹拂细柳。茅盾带着上海的战争硝烟味，陪伴母亲回乌镇。从上海坐火车到嘉兴，一路上，被践踏的油菜田里，一群一群士兵，百无聊赖有气无力地在挖战壕。火车上，一些人都在看从上海地摊上买来的“推背图”、“烧饼歌”等预言书，茅盾也带了一本金圣叹手批的《中国预言七种》，车厢里议论的，不是斗志昂扬的抗战，而是预言书里那些“天意”。

一个坐在茅盾边上的人说：“不错，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蔡廷锴、蒋光鼐，《烧饼歌》里都有呢！——上年的水灾，也应着《烧饼歌》里一句话……。”

一个老者环顾左右后，一本正经地说：“你看，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不过，国人先笑而后号咷，东洋人倒灶也快了呀。”说到这里，他咳了一下，往地下吐了一口痰，接着又说：“不过，中原人大难当头，今年这一年能过得去就好！今年有五个‘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里——咳，《烧饼歌》上有一句，——咳，记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罢。总而言之，人心思乱。民国以来，年年打仗。前两年就有一只童谣：‘宣统三年，民国二十年，共产五年，皇帝万万岁！’要有皇帝，才能太平！”

“可不是宣统皇帝已经坐了龙庭！”有人顺着老者的话，附和着。不料那老者，很不以为然，哼了一声，说：“宣统！大清气数已尽，宣统将来要有杀身之祸，另是一个真命天子，还在田里找羊草！”

于是车厢里热闹起来，旅客们都争先叙述自己听到的“真命天子”的故事，活灵活现。而车厢外，依然是零乱的油菜花香，依然是一队队看上去懒散似的恹恹的士兵，打堆在昔日整片的菜花田里。

车到嘉兴，茅盾陪着母亲换乘去乌镇的小火轮。在小火轮船里，茅盾听到的，依然平民百姓对刚刚过去的战事的议论，各有所见，十分热烈。一个



坐在茅盾边上剃着平头的旅客，操着浓重的乌镇话，说：“定规还要打！不打，太嘅交代。东洋小鬼子就是几只飞机兵船厉害，东洋兵是怕死的！东洋兵笨手笨脚，不及中国兵灵活，引他们到里厢，东洋的兵船开勿进来，飞机不认识路，东洋兵一定要吃败仗！”

“蛮对蛮对，松江造好一个飞机场了。火车来时，你看见铁路旁边掘战壕么？松江落来，一连有四道战壕已经掘好了。”另一个30多岁的瘦子旅客衬上去赞同道。

这时，另一个旅客却叹口气道：“打，定规要打，不过，一路过来总不见兵，奇怪，……。”没等他说完，那个30多岁的瘦子便截断他的话，插进来说：“啊，老先生，你弄错了，中国兵不是沿铁路驻扎的，都藏在乡下。——为啥？避避国联调查员的眼睛呀！你不相信，去看！嘉兴城里也不扎兵。不过，落去到陶家泾，就驻扎了两万多兵，全是驻扎在茧厂里！”

大家一阵默然。茅盾问身边一位老乡绸缎店经理：“照你看来，是再打好呢，还是不要打？”

“论理呢，一定要打。不过我们做生意人日子难过：上海开了火，钱庄就不通，帐头又收不起，生意上的活路断得干干净净了；近年来捐税忒重，生意本来难做，乡下人穷，乡庄生意老早走光；现在省里又要抽国难捐，照旧捐加二成，听说就是充作打仗的军饷，你想，不曾开火，先来从生意人头上抽捐了！”

没等茅盾说，另一个旅客立刻接上去诉苦说：“抽捐去真和东洋人开仗，倒还嘅啥，就恐怕捐是抽了，仗又勿打。”

“一定要打！伊拉勿抵桩打东洋人，调啥格兵！”那个瘦子旅客抢着表示自己的看法。

茅盾一听，笑了笑，给这几位同乡分析形势，最后坦率地说：“老百姓尽管一腔热血主张打，那结果是一定不再打了。老百姓要的事，恰就是当局所勿要。现在的事情就是这么着。”

掌灯时分，茅盾陪母亲回到故乡乌镇，黑乎乎的小镇，似乎更衰败了，一些大的商店已经倒闭，几家几十年历史的当铺，也已歇业，只剩下市中心的汇源当了。

在乌镇的那些日子里，茅盾目睹了1932年故乡的衰败，也目睹了乌镇四乡村的丰收成灾的惨痛事实，目睹了一些店铺的努力和失败。

清晨，还是春寒料峭，街上也相当冷清。但离茅盾家不远的汇源当大门前，却已人头攒攒，等候开门。茅盾特地起个早，赶到那里观察了解，发现在这青黄不接的五月里，许多人天不亮，就守候在那里。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身上刚剥下来的棉衣，或者预备秋天嫁女儿的几丈土布，偶尔也有去年留下来，嫌亏本而不卖的几斤丝，也拿出来送进当铺了。

一直等到9点钟，当铺才开门，这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就拼命的挤轧，一片混乱。因为当铺每天只用120元的钱来营业，当完就停。因此，那些衣衫褴褛等候当了钱去买米吃的乡下人，就不能不拼命挤上前去。但就是这样，当铺连农民自己觉得最宝贵的蚕丝都不要！

这一幅景象，引起茅盾不胜感慨和忧思：

“把蚕丝看成第二生命的我们家乡的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第二生命已经进了鬼门关！他们不知道上海银钱业都对着受抵的大批陈丝陈茧皱眉头，是说‘受累不堪’！他们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战争更使那些搁浅了的

中国丝厂无从通融款项来开车或收买新茧！他们尤其不知道日本丝在纽约抛售，每包合关平银五百两都不到，而据说中国丝成本少算亦在一千两左右呵！”

茅盾回到家里，过去常常来替沈家帮忙的老熟人——一个住在乌镇东栅的农民，茅盾称他为“丫姑老爷”，知道茅盾母亲从上海回来了，便进镇来看她。恰巧茅盾从外面进来，这个“丫姑老爷”向茅盾这个“沈家少爷”诉说农村的艰辛，他说：“少爷你看，我这个人向来不喝酒，不吸烟，连小茶馆都不上，而且种的是自家的田。这二年来，也拖了债了，在村里也不算多，百把块钱。”茅盾一听，兴趣来了，忙问：“那你怎么还债呢？”

“打算在‘头蚕’里还呀，今年‘头蚕’养得好，还清这点债是不成问题的。”丫姑老爷胸有成竹地回答。

茅盾笑了笑，说：“养蚕？卖给谁？你的这点桑叶，不如卖叶，不要再去养蚕。”茅盾又把养蚕的危险说了一遍。

丫姑老爷听着觉得有道理，但沉默了半晌，摇摇头说：“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想。卖叶呀，廿担叶有四十块卖得算是顶好了，一担茧子的‘叶本’总要廿担叶，可是去年茧子价钱卖到五十块一担。只要蚕好！到新米收起来，还有半年；我们乡下人去年的米能够吃到立夏边，算是难得的了，不养蚕，下半年吃什么？”

“可是今年的茧子价钱不会像去年那样好了！”茅盾说到这里，望了一眼这个丫姑老爷，又说：“你是自己的田，去年这里四乡收成也还好，怎么你就只够吃到立夏边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几十块钱债？”

“有是应该还有几担，我早已当了。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里种出来的东西却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又比前年贵，——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了。我们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撑着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洋钲新债。今年蚕再不好，那就——”丫姑老爷苦着脸，向茅盾诉苦到这里，便嘎然而止。

茅盾点点头，又安慰他几句，丫姑老爷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向茅盾告辞。

茅盾在乌镇这几天，忽然对小镇经济有了新的认识。在研究上海金融经济过程中，本来缠绕心头的农村、乡镇的经济状况，总算有了一个大概的比较，也有了许多令人心酸的例子。镇上几个熟悉的小商人告诉茅盾：“市面已经冷落得很，小小镇头，旧年年底就倒闭了廿多家铺子。”诉说时，个个都哭丧着脸。茅盾在故乡的半个月时间中，所见所闻所感是一幅30年代悲剧画面，从这幅画面中，茅盾深深感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了，人情世态发生了变化，农村状况、小镇经济状况也同样发生变化，而且这变化是惊人的。茅盾安顿好母亲，只身回到上海。隔了两天，《申报月刊》的主编俞颂华来向茅盾约稿，并告诉茅盾，这稿子要在创刊号上发表。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此时，回乡半个月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幼时在乌镇生活时的商店情景，像放电影一般，在脑海里出现，忽然发现在这些见到的故乡商人形象中，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又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形象。于是，茅盾构思好后，于6月18日写完这个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小说写了一个姓林的小店老板，小本生意，因为不堪新军阀的压迫和苛捐杂税的逼迫

破产出走，这又给小债户一击，形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小说写好后，茅盾题上《倒闭》二字，作为小说题目，交给俞颂华。俞颂华连夜拿回去审读，发现这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但一看题目叫《倒闭》，便皱起眉头，觉得在创刊号上，恐怕老板会不开心，于是，便跑去茅盾家里，和茅盾商量，是否题目改一下，并建议用小说故事里主人翁的店铺，并虚化一下，叫“林家铺子”。茅盾一听，也觉得有道理，同意了。

《林家铺子》刚刚在《申报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乌镇拍来电报，谓茅盾祖母高氏去世了。于是，茅盾冒着8月的酷暑，举家返乡奔丧。

因祖母已80高龄，子、孙都长大了，手头也不拮据，所以丧事办得十分有排场。在3天的丧礼日子里，亲朋故旧，来吊丧者络绎不绝，茅盾又碰到春天见到过的丫姑老爷。那个丫姑老爷也是来吊唁的，沈太夫人生前待他们不薄，所以他即使家里再穷，也要来吊唁。

茅盾问起他养蚕的情况、问起他还债的情况，这位丫姑老爷连连摇头，说“没有听少爷的话，养蚕丰收了，但却亏了本，不仅老债没有在春蚕里还掉，还添了新债。”言下之意，不堪回首。丫姑老爷还向茅盾讲述了养蚕丰收后，如何更加辛苦地去无锡等地卖茧，最后有的人得了病，雪上加霜等。茅盾听完丫姑老爷的叙说，唏嘘不已。他又忽然发现，农村也因一二八战争的影响，经济崩溃，引发出一系列矛盾和困惑。

回到上海后，茅盾写完短篇小说《右第二章》以后，十月开始短篇小说《春蚕》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茅盾调动积储在脑海里的儿时信息，小时他随祖母养蚕，知道了不少养蚕的艰辛，今年的几次回乡所见所闻，又如烂断电影，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因此，《春蚕》写得非常顺利，到11月1日，已经杀青。这篇小说叙述了发生在江浙蚕乡的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叫老通宝的蚕农，辛辛苦苦地养春蚕，并取得了丰收。虽蚕茧丰收了，茧厂却关门，原因是茧子受日本白厂丝的倾销，不值钱了。因此，老通宝一家劳顿一场不算，还因买叶借了债，蚕茧丰收了，生活却更艰苦了。老通宝气得一病不起。小说的结构灵巧又绵密，语言精巧秀丽。恰似一幅江南春蚕风俗图。

《春蚕》脱稿以后，茅盾接着又写了《冥屋》、《秋的公园》、《光明到来的时候》等散文。

《春蚕》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后，立刻引起广泛的赞扬，朱自清肯定茅盾的创作路子：“我们现代小说，正应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也有读者认为：“作者处处从侧面入手用强有力的衬托，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到农村，以及数年来一切兵祸、苛捐……种种剥削后的农村的惨酷景象，尽量暴露无余。”由于《春蚕》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夏衍化名蔡权声把《春蚕》改编成电影剧本，并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成同名影片。这是茅盾的作品第一次上银幕。

由于《春蚕》这个短篇小说的出现和启发，继《春蚕》后，这类丰收成灾的题材，也在新文学阵地上发展起来；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即《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夏征农的《禾场上》；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一时间十分热闹。

见《春蚕》叫好，《申报月刊》俞颂华又来找茅盾，要茅盾写农村题材

的作品，茅盾答应了，故乡农村的艰辛，连上海一些报纸上也都见报了，加上自己对故乡的了解和把握，茅盾便顺着《春蚕》里的情节，在 1933 年 4 月写了《秋收》，写老通宝的稻子收成好反而又欠债，农民走投无路，自发吃大户；后来又写了《残冬》，描写农村经济破产，农民们自发斗争已经爆发，显然，《秋收》、《残冬》的创作，有受《水浒》的影响，农民斗争有逼上梁山的感觉，但这在杭嘉湖蚕乡来说，倒是十分真实可信了。

茅盾为营造这乡镇风景线，短篇、散文、速写诸文体方面，一齐努力，使这道真实的乡镇风景线，更加绚丽、更加可爱。1933 年，他的小说《当铺前》，以乌镇所见的真实情景为背景，记叙了这人间惨剧的一幕；他的《老乡绅》、《速写》、《香市》、《乡村杂景》、《陌生人》、《谈迷信之类》，都是 1933 年茅盾的乡镇风景线上多彩的一笔！次年，即 1934 年，江浙遭受百年未遇的旱灾。乌镇四乡出现河流干涸的灾情，民谣有“民国廿三年，河港朝天”的说法，茅盾回乡，也目睹这些旱象和灾情，于是，茅盾又写了纪实性小说和散文《赛会》、《大旱》、《戽水》、《桑树》、《人造丝》、《疯子》等，这些作品，反映了 30 年代初，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破产的状况，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农村破产的原因，也揭示了政府的腐败及农民那种固执愚昧落后的一面。

重涉白话话题，虽热烈却收效不大，奈何。  
胞弟献身鄂豫皖，母亲深明大义；他刻骨铭  
心手足情；夫人泪涟涟，从此不离左右。

## 第十四章 文化风暴：多事岁月

30年代初，茅盾的文学活动仿佛又恢复了20年代初那股活跃的劲头，“左联”的事，报纸约稿，出版社要书，杂志社要文章，无聊文人的攻击，犹似一场文化风暴，铺天盖地，把茅盾整个儿都淹没在文化之中。因此，30年代前5年，是茅盾创作的黄金时期，《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1932年底，茅盾写完了《子夜》的后记之后，乘兴又写了一篇《我的回顾》，对自己5年来的创作道路，作一个简要的回顾。短短的5年当中，茅盾在革命的高潮之后，冷静思索，勤奋创作，写出了三个长篇，两个中篇及十几个短篇，奠定了茅盾在新文学上的地位。5年中，茅盾左冲右突，努力“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不断改换题材：知识分子题材、都市题材、乡镇题材、历史题材等，这些都显示了作家的努力和追求。在回顾自己5年来走过的历程，茅盾谦虚中充满自信，他说：“1927年9月，我开始作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5个年头。5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上。”接着又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他还说：“我永远自己不满意，我永远‘追求’着。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从某种意义上说，茅盾在政治与文学的天平上，似乎文学创作更有成绩，似乎更有发展前程。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驱使茅盾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因此，瞿秋白、鲁迅等友人和茅盾来往十分密切，包括许多左翼文化人士，来往十分频繁。而茅盾的论人论文的尺度，政治、社会功利方面，尽量和党当时的要求相近。所以，茅盾当时曾向瞿秋白提出，要求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希望在党内受到直接指挥。瞿秋白无论在经历上、志趣上，和茅盾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人十分投机，共同语言也较多。听了茅盾的要求，秋白表示尽快向中共核心组织反映。但此时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王明夺取了上海党中央的领导权，秋白被排挤出党的核心，因此对瞿秋白转述茅盾的要求，中共中央似乎不大在意，竟没有答复。

一天，“左联”成员阳翰笙来到茅盾家里，拿出他在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地泉》说，出版社要再版，希望茅盾给这部小说作序。《地泉》是包括“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作品反映农村革命的“复兴”。但由于这部作品写作时正受太阳社朋友倡导革命文学的影响，小说的概念化缺点十分明显。茅盾在前段时间，对这种所谓的革命文学作过批判。其中包括阳翰笙的这部长篇小说。

于是茅盾对阳翰笙笑道：“你要我写序，我就要批评这部作品。”阳翰

笙点点头，认真地说：“我知道，我也想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1928年发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5年的历史，正在走向成熟。这本书是几年前写的，本不打算印了，现在既然有书店肯再版，就借再版的机会，请几个朋友写点文章，也算对这本书作个定评。”

“有那些朋友写了序？”茅盾听说阳翰笙请几个朋友写序，问道。

“瞿秋白、钱杏邨。”阳翰笙回答。

“那好，我也写，不过您不要动气啊。”茅盾笑道。

“哪里，哪里。”阳翰笙忙说。脸上一脸虔诚。

后来，茅盾写了一篇《地泉读后感》，从扭转革命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入手，评论阳翰笙的《地泉》的缺点。直言不讳地批评《地泉》“亦浓厚地分有了那时候同类作品的许多不好倾向。”什么“不好倾向”呢？这就是“缺乏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指出《地泉》“本书只是‘深入’、‘转换’、‘复兴’等三个名词的故事体的讲解。而本书的作者，恰就先给我们三篇故事体的讲解。”“惟在已有政治认识的人们方能理智地去读完这本书而有所会于心，或有‘画饼充饥’地聊一快意；至对于普通一般人，则本书只是白纸上有黑字罢了。”

后来，茅盾这篇直言不讳的文章，被阳翰笙一字不改地编进湖风书店1932年7月出版的《地泉》内，并作序言刊布。茅盾后来感叹，“这种接受不同意见的雅量是令人钦佩的。”并进一步加深了茅盾和阳翰笙之间的友谊。

左联成立以后，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多次，第一次讨论时，茅盾刚刚回国，环境的适应，家务事的分心，茅盾只看了一些讨论发言的文章，发现许多文章都十分中肯，鲁迅的话尤为精辟和深刻：“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所以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热闹一阵子以后，也就偃旗息鼓了。

1932年夏天，茅盾写完《林家铺子》之后，“左联”又发起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起因是瞿秋白在《文学》半月刊上发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在6月又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当时发表文章的《文学月报》认为秋白的文章很重要，便约请茅盾、陈望道、夏衍、周扬、郑伯奇、田汉等人写文章，参加讨论。

当时，茅盾看到瞿秋白的《论文学的大众化》，观点十分新颖别致，见解也非常独到，但秋白对白话的估价，茅盾认为不敢苟同，因为秋白认为：“五四”式的白话是非驴非马的文字，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的混合体；号称“白话”，实则是“新文言”，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从前的文言一样，劳动大众是读不出，听不懂的。……因此现在必须发动一个反对“死的语言”的革命运动。革命文学要用现代中国活人的话来写，尤其要用新兴阶级的话来写。……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速用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

但茅盾也发现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些似是而非。因此，乘刊物约请茅盾写文章参加讨论的机会，针对瞿秋白的论点，写了《问题中大众文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文分四节，分别为“旧”文言与“新文言”，“技术是主，文字本身是末”在第二节展开讨论；第三节是现代中国普通话怎样估价；第四节是“到底用什么？”这篇讨论文章，有事有据，令人信服。茅盾用了“止敬”这个笔名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随后，瞿秋白又发表了答辩文章《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分三个方面进行答辩，即解释一些误会，二是讲明原则分歧，三是提出了认字拉丁化问题。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茅盾读过这篇文章，发现自己与秋白是从不同前提来争论的，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而茅盾的理解是前者，瞿秋白的理解是后者。因此，茅盾没有接着瞿秋白的文章来继续讨论。

也许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当时文人圈子里，只是一个时髦。因此，“左联”中人都热心于文艺大众化的宣传和讨论，但所化的力气和收到效果很不相称。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制度不允许文人们这样做。

1934年夏秋间，上海进步文艺界又掀起第三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这之前，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强制推行以封建道德“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5月份，国民党教育部汪懋祖等掀起“文言复兴运动”，在国民党的《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大肆鼓噪。因此，上海“左联”同仁决定以汪文为靶子，开展第三次文白之争的讨论。当时鲁迅、茅盾、陈望道、胡愈之、魏猛克、陈子展、傅东华、许杰、乐嗣炳等人纷纷写文章，抨击复古逆流，维护五四成果。

到了8月份，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正酣，达到高潮，这时，陈望道、乐嗣炳就打算乘势办一个刊物，力倡大众语运动。也抨击林语堂等人提倡的小品文。陈望道为此还在“一品香”餐厅请客，茅盾出席了。9月3日陈望道又请一批作家聚餐，茅盾和鲁迅都去作陪客。当时，陈望道对《太白》刊名有了解释，他对鲁迅、茅盾说：太白太白，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话文还要白的意思；还有，太白二字笔划少，符合简化的原则；还有太白是太白星，在黎明前出现，又名启明星，表示天快亮了，又暗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即将结束。鲁迅一听陈望道这个解释，掸了掸手头的香烟，点点头，对大家说：“这只能我们自己淘里知道，不能对外讲，防备被审查委员会的老爷们听了去。”茅盾也点点头，表示赞同。陈望道想请鲁迅、茅盾参加《太白》编委会时，鲁迅说：“还是暗地里支持你好，公开列名，恐怕反而于刊物不利。”茅盾也赞同鲁迅的这个意见。

后来，茅盾和鲁迅一道，用实际行动支持《太白》。《太白》半月刊从1934年9月创刊，到1935年9月停刊，茅盾共发表了23篇文章。应该说，茅盾在文艺大众化方面功不可没。

正当茅盾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左联”书记处又办起《文学月报》，茅盾又被推为编委。于是，茅盾既忙于给《文学月报》写文章，又忙于替《文学月报》审阅小说稿件，在审阅小说稿中，茅盾发现一个很有才华的新人——沙汀。当时，周扬把沙汀的《码头上》、《野火》两个短篇送给茅盾，茅盾看后，在退给周扬稿件时，对《码头上》一篇写了几句审读意见，大意是：写得还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有才华的，小说可以发表。不过结尾的写法我不喜欢。当时，周扬把茅盾的意见转告诉沙汀，沙汀感动不已，十分振奋。后来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小说集出版后，茅盾撰文高度评价。

1933年春节，已在北平的郑振铎回上海过春节，在与茅盾晤面时，二人都十分怀念过去在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时那段生活，十分感慨。郑振铎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在感叹现在没有一个自己的刊

物时，忽发奇想，建议茅盾把《小说月报》办起来。茅盾笑道：“你丈人虽是商务元老，但是复刊《小说月报》，恐怕他也作不了主。商务当局是越来越保守了，他们是怕我们的，如果要办刊物，倒不如另找一家出版社来出版。”郑振铎点头赞同，于是二人又具体策划杂志的具体内容，包装和发行等事。郑振铎说：“找书店出版的事交给我来办，刊物的名称就叫《文学》如何？至于主编一职由你来担任。”茅盾一听，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是被戴上红帽子的，我当主编，不过三天，老蒋的手下就找上门来了，还是另找一个不被他们注意的。你本来是《小说月报》的主编，由你来担任，倒名正言顺，可是你又在北平教书。”郑振铎一听，也觉得有理，便说：“如果是这样，我只能顶个虚名，帮忙拉拉稿子，实际办事，总得在上海找一个人。”

“谁合适呢？”茅盾也沉思起来。

“傅东华怎样？”郑振铎像发现什么似地说。

茅盾一听，沉吟一会儿，说：“人倒还合适，不过他会答应吗？我怕他舍不得丢开商务这个铁饭碗。”

“那我先动员动员再说，其他的事，您多费心再考虑一下。怎么样？”郑振铎自告奋勇。

过了两天，郑振铎来告诉茅盾，傅东华已经同意担任主编了，出版《文学》的书店也找到了，生活书店愿意出版。茅盾一听，也非常高兴，便和郑振铎一起研究编委名单，除茅盾和郑振铎之外，还列了鲁迅、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等。后来傅东华又要一个年轻人来协助他编辑，于是请黄源来协助编《文学》杂志，等筹备完毕，郑振铎便回北平教书去了。

《文学》杂志终于在1933年7月1日创刊，发行后立即受到欢迎。4天后又再版创刊号，一个半月后，已经再版4次，可见欢迎程度。

《文学》是继《小说月报》之后，抗战之前，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大型杂志，为办这个杂志，茅盾不仅是个主策划人，而且又是一个撰稿人，他运筹帷幄，呕心沥血，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又发表了不少好作品。

193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刺骨的北风紧刮着。茅盾正在灯下看《文学》的稿子，突然传来咚咚的叩门声，夫人孔德沚出去开门，原来是鲁迅家里的女佣送信来。信是鲁迅写给茅盾的，信中写道：有一熟人从那边来，欲见兄一面，弟已代约明天午后×时于白俄咖啡馆会晤。

第二天，茅盾按约准时来到咖啡馆，鲁迅已在那边等候了。刚进门坐定，茅盾便问鲁迅：“大先生，那边谁来了？”

“成仿吾。”鲁迅正在抽烟，掸了一下烟灰说。

“谁？成仿吾？”茅盾有些疑惑。因为茅盾虽与成仿吾等创造社朋友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却从未见过面，前两年又听说他去苏区了。

“不会错的，他去找过内山，内山认得他；还有郑伯奇也要来，他们是熟人。”鲁迅见茅盾有些疑惑，解释道。

正说着，郑伯奇来了，大家寒暄过后，郑伯奇告诉茅盾，他已见过成仿吾。这时，咖啡馆门口进来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郑伯奇忙起来招呼，原来这就是成仿吾！茅盾和鲁迅都是第一次和成仿吾见面。

成仿吾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一边说自己是鄂豫皖苏区过来的，是到上海来治病的。问鲁迅能不能帮他找到党方面的朋友。鲁迅沉吟一会儿，说“可以，你来得正是时候，过几天就不好办了。”并记下成仿吾的住址。



成仿吾敛起笑容，对茅盾说：“沈先生，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今天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令弟泽民在鄂豫皖苏区病故了。”

“什么？不可能！”茅盾猝不防成仿吾会带来这样一个消息，心骤然缩紧，脱口否认这个事实。

鲁迅和郑伯奇在一边也惊呆了。

“那边的环境太艰苦了，担任鄂豫皖边区中央分局委员、苏区省委书记以后，泽民的工作十分繁重，他身体本来单薄，肺病又复发了，加上在那里又得了严重的疟疾，就支撑不住了。”成仿吾又说。

“是哪一天？葬在哪里？琴秋呢。”茅盾心头像塞了一块东西似的，说不出话来。

“11月20日牺牲的，大概就地埋葬了，琴秋不在身边，她随红军主力去路西了。”成仿吾说。

4个人都默不作声，呆坐在那里。这时，鲁迅打破了这压抑的气氛，站起来说：“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茅盾也站起来，向成仿吾告辞，“仿吾先生，我也走了。”

茅盾和鲁迅一起走出咖啡馆，步行回家。途中，鲁迅问道：“令弟今年三十几了？”“虚岁三十四。”茅盾戚然地回答说。“啊，太年青了！”鲁迅转过身来，无限惋惜地说。

又走了一阵，茅盾想起成仿吾的事，问鲁迅：“你说的党方面的朋友是指秋白吗？”鲁迅点点头，说“秋白几天以后就要去江西了，所以我说过几天就不好办了。”

“这件事我让德沚今天晚上去通知之华，你就不必自己去了。”茅盾说。鲁迅说：“也好，那就拜托你了。”

第二天，茅盾才把泽民去世的消息告诉夫人孔德沚，并叮嘱她不能让母亲知道。德沚听到这个消息，眼泪潸然而下，连声否认“假的假的，谣言！”她待这个小叔，像亲弟弟一样，泽民的聪颖和好学，泽民的进步和外出，都让这位嫂嫂牵挂。去苏区之前，来家里告别的情景，还像在昨天一样，怎么突然会去世呢？孔德沚从痛苦的思绪中拉回来，抬起泪眼：“琴秋呢？”

茅盾闷头抽烟，见夫人问，就说：“琴秋随部队走了，不在鄂豫皖。”

“这怎么可以呢！她为什么不留在身边照顾他？”孔德沚一听，火来了，叫道。

“大概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茅盾吐了一口烟，说了一句。

“难道留在那边就不算革命工作的需要？”德沚悲恸而又激动地叫着。

茅盾没有再说什么，苦笑一下，又提醒夫人：“不要让妈妈听见了。”这时，孔德沚才平息下来，低声抽泣着。

过了几个月，又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有一天，茅盾母亲突然问茅盾：“阿二怎样了？”“很久没有接到他的信了，邮政不通，但听人说，他身体还好。”茅盾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口回答。

这时，茅盾母亲一脸严肃地说：“你不要瞒我了，告诉我吧，我不会难过的。”说着从藤椅坐垫下面拿出一张国民党办的小报，递给茅盾。茅盾一看，上面有一则消息：沈泽民在鄂豫皖苏区死了，他的哥哥最近在上海某大佛寺里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

茅盾知道母亲已经知道，只得告诉说：泽民真的死了，是得病死的，“不过说我请和尚念经则是国民党小报造的谣。”

茅盾母亲眼睛有些湿润，过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说“我不会难过的，阿二从小身体单薄，三岁那年得一场大病，死里逃生，活到了现在，总算还做了一点事情。我就当作他小时候那场病死了，也就想开了。”

茅盾听到这里，大为感动，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过了元旦的一天，瞿秋白突然出现在山阴路大陆新村三弄九号茅盾家里。秋白是来向茅盾辞行的。“沈先生，我已接到通知，就要去那边了。”言辞间，露出依依不舍的情愫。

“什么时候走？”茅盾没有想到这么快。

“近几天就走。”

“东西部准备好了吗？之华去不去？”茅盾神情中流露出一丝孤独的凄然，问道。

“准备好了，之华组织上没有批准。”秋白讷讷地说，也有些怅然。

在谈到泽民牺牲的时候，秋白神情怆然地说：“前年泽民去鄂豫皖时，曾与他长谈过，我们曾相约革命胜利后，在上海相会，谁料那一夕谈竟成永诀！”泽民与秋白是好友。

讲到文艺上的事时，秋白不无惋惜地说：“沈先生，看来，只有等到革命胜利后，我再来弄文艺了。”

茅盾送走秋白，独自伫立在门口，凛冽的寒风吹来，茅盾感慨万端，在这革命的岁月里，文化上奔忙，胞弟的献身，朋辈的聚散，何日是云开日出，光明重来？！

在敌、我夹缝中，可以同仇敌忾；在朋友夹缝中，他费尽心血。瞿秋白被捕，鲁迅和他木然相对。

曲曲折折，本是世间常事，也是烦事，但他依然成果斐然。

文坛上的是是非非，并不是从今日始。

## 第十五章 夹缝中的努力

正当茅盾和郑振铎策划创办的《文学》首战告捷后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召集出版商和杂志主编开会，提出今后不准出版和发表“反动”书刊和文章。书籍杂志和原稿要预先审查以后才得发表或出版。茅盾听到这个消息，预感到国民党反动派又要对进步文化进行围剿了。

不久，《文学》编辑傅东华来找茅盾，说：“据说生活书店出的《生活》月刊和《文学》月刊都在被禁之列。”茅盾心里一怔，果然不出所料“消息可靠吗？”傅东华说：“我再去探听探听。”说完，又行色匆匆地走了。

过了两天，傅东华又来找茅盾，告诉茅盾说：“国民党市党部提出三条继续出版《文学》的条件，一是不采用左翼作品，二是为民族文艺努力，三是稿件送审。”

茅盾听完傅东华的话，脸色严峻地说：“他们是逼我们。用送审办法来压我们杂志。”

没有几天，通知来了，除了从第二卷起，每期稿子要经过检查官的检查通过，才能排印外，版权页上还不能笼统署“文学社”名称，而署主编姓名。

1月8日，茅盾通知刚刚从北平到上海的郑振铎，一起去找傅东华商量研究对策。商量结果，决定从第二卷第三期开始，连出四期专号，即出翻译专号，创作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以对付国民党检查官的检查。茅盾这个办法，实际上是借用自己十多年前编《小说月报》出专号的办法，不过那时不是为了对付检查。商量以后，茅盾他们立即在《文学》二卷二期发一个广告：“今后的《文学》连出四大专号，预定概不加价。”

在这之前，为了更巧妙地与国民党检查官斗争，茅盾他们召开编委会，决定版权页上改署傅东华、郑振铎名字，主编由傅东华实际负责，茅盾则退入幕后。所以，当出专号的打算决定以后，茅盾和郑振铎曾专门去鲁迅那里汇报，鲁迅听了茅盾他们的打算，认为这是目前应付敌人压迫的可行办法，表示赞成，但对四个专号以后《文学》能继续出下去，表示怀疑，认为国民党的压迫只会愈来愈烈，出版刊物、写文章也只会愈来愈困难。“他们是存心要扼杀我们的。”鲁迅未了补了这么一句。

不料，鲁迅的担心，在《文学》登出广告之后，在上海那些小报上出现了。这些小报造谣说：《文学》内容“与前完全不同”，并说：《文学》出二期翻译专号，一期中国文学专号之后，即暂停刊，其原因即为补足订户。茅盾、傅东华他们见到这个谣言，十分气愤，又立即在《文学》翻译专号上登个辟谣启事，指出这消息“全与事实不符。本刊自入二卷，亦已出版二期，内容是否与前完全不同，读者有目共睹，无待声辩。至于今后连出专号之用意，无非使读者注意集中，期可将目前文学建设所需商讨之种种问题逐个解决。且本刊提出的专号，系连续四期，并非三期。”“至谓本刊专号出齐即行停刊，则更属捕风捉影之谈。本刊自始即以促进文学建设为职志，苟为环

境所许，俾本刊得效棉薄于万一，本刊自当不辞艰险，奋斗图存，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停刊。”与那些御用报刊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茅盾就是在这样夹缝环境中作斗争，作努力。

5月的一天，茅盾拿着新出版的《文学》翻译专号到鲁迅家里商量工作。鲁迅告诉茅盾：《文学》出翻译专号，对作家的翻译热情倒是个刺激。鲁迅又感叹说：“这几年来介绍外国文学不像从前那样时兴了，译品的质量也差，翻译家好像比作家低了一等。其实要真正翻译好一部名著，不比创作一部小说省力。”

茅盾深有同感，一听鲁迅这话，笑道：“这叫媒婆不如处女。”

过了一会，鲁迅点点头，对茅盾说：“我倒有一个想法，我们来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这杂志，译品要精、要高、印刷也要好。”

茅盾一听，当即表示赞同，并说：“目前作家们有力气没处使，办这个杂志，可以开辟一个新战场，也能鼓一鼓研究外国文学的空气。”说到这里，茅盾停一下，又问道：“如果这样，只登翻译小说么？”

鲁迅似乎胸有成竹，说：“不，不仅登小说，也登论文、杂感、回忆等。”鲁迅看了一眼茅盾，又说：“对了，黎烈文不编《申报·自由谈》了，把他也拉进来，作为发起人如何？”茅盾点点头，知道黎烈文在层层压力下，刚刚向史量才送了辞职书，此时正想回湖南老家，正在踌躇未定中。没等茅盾开口，鲁迅又说：“发起人算你、我、烈文三个，过几天有空，我们三个人再碰个头。”

不久，鲁迅、茅盾、黎烈文三人在鲁迅家里正式商议《译文》事宜，杂志名称是黎烈文提出来，鲁迅茅盾肯定同意的。并商定由鲁迅作《译文》主编。先与生活书店联系。由于鲁迅对木刻和外国的绘画有偏爱，提出在未来这个杂志里，可以多翻印些外国的绘图和木刻。茅盾担心成本高，书店老板不愿意。

过几天，茅盾因为忙而未及时与生活书店联系，不料鲁迅催得紧，问办的进展情况如何。于是，茅盾把黄源推荐给鲁迅，并要黄源与生活书店徐伯听联系一下。经黄源联系，生活书店表示愿意出版《译文》，并把生活书店“先试办三期，不给稿费和编辑费，若销路好，再订合同补算”的条件告诉鲁迅，不料鲁迅一口应承，并爽快地说：“就照他们的条件办，头上三期，我们三个发起人尽义务包办了。”并赞扬生活书店“他们还算有魄力的，其他书店恐怕更不愿意出版了。”并由鲁迅提议《译文》编辑人用黄源的名字。实际终审把关是鲁迅。

创刊号十分顺利，于1934年9月如期出版。茅盾积极支持、扶持《译文》，在《译文》这个园地里倾注了不少心血。他在《译文》杂志上，共发表小说13篇、译评12篇，后来把这些译文结集，题名《桃园》出版。

然而，到1935年下半年，内部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使茅盾在内部的夹缝中作艰难的努力。这一年的8月底，邹韬奋回国，看到生活书店经理徐伯听身体不好，便让他休息，并让海盐人毕云程代理。毕云程代理经理后，对此之前徐伯听与《译文》杂志同意鲁迅建议出版一套译文丛书一事，不知情。所以一听说到丛书事，表示不能接受，认为生活书店已在印行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现在又要印行译文丛书，是生活书店内部自相矛盾竞争，经济负担也不行。邹韬奋也认为毕云程有道理，便把这个意见告诉黄源，生活书店

不同意出版译文丛书。对鲁迅绝对尊重的黄源，见译文丛书不能在生活书店出，只好去找老友吴朗西、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表示同意。不料，生活书店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火，认为黄源在背后调花枪，并认为要去其他出版社出，必须生活书店同意才行。当时，鲁迅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火。

9月17日，生活书店在新亚公司宴请茅盾、鲁迅、郑振铎、胡愈之、傅东华。生活书店是邹韬奋、毕云程。黄源没有被邀请。所以，宴会刚开始。毕云程客气一番后就说到正事上，说：“《译文》仍请鲁迅编辑，而不是黄源”。乍一听，似乎是看重鲁迅，但实际上是要撤换黄源。无视发起人的意见，性格刚烈的鲁迅一听这话，十分生气，筷子一放，板起脸，说：“这是吃讲茶的办法！”站起来，头也不回地离席而去。一时，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才好，不欢而散。

第二天，鲁迅又约了黎烈文、茅盾、黄源去他家，当面把已与生活书店签的合同撕了，表示如果生活书店要出《译文》，必须与黄源签。并要茅盾去通知生活书店。于是茅盾又夹在中间去奔波了。后来，郑振铎也为此事的奔波，都没有成功，《译文》终于在无法弥合中停刊了。

文坛上的风风雨雨，给茅盾带来困惑。他一方面要和国民党的压迫作斗争，用各种办法表明自己的主张、观点；另一方面在目标都是为了同一战斗的前提下，又要调解左翼文坛内部的关系，同心协力地工作。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茅盾仍奋力创作，写出了一批有影响、有价值的作品和文章。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检查，茅盾用“风、兰、莆、曼、惠、江、丙、明”等新笔名，在《文学》第二卷上写了书评、作家论等大量评论文章，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参加“小品文论战”、“大众语论战”“伟大作品产生问题的讨论”、“文学遗产问题”、“翻译讨论”等文坛热点的论争。在这中间。茅盾写的作家论《庐隐论》、《冰心论》、《落华生论》等三篇可谓空谷足音，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庐隐论》和他早些时写的《徐志摩论》一样，开庐隐研究先河，也“有点总结庐隐一生创作的意味。”茅盾在这一篇作家论中，充分肯定庐隐是五四时代就注意到文学的社会意义的第一个女作家。因此，字里行间，对庐隐坎坷一生和辉煌成就，作了深刻分析和充分肯定，认为庐隐“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在‘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在庐隐的《海滨故人》集前7篇小说里，她“很注意题材的社会意义。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找题材。”庐隐的第二个短篇集《曼丽》，是她从“颓唐中振起的作品，是闪烁着劫后的余焰。”茅盾肯定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同时，对庐隐的小品文，茅盾也作了充分肯定。在对庐隐作全方位的考察和评论以后，使庐隐这位早慧又早逝的五四女作家，得到了应有的公正的评价。

在写完《庐隐论》之后，茅盾接着又写了《冰心论》，对这位唱着人世的欢娱，“信奉爱的哲学的女作家，作一番考察，认为冰心这位女作家的作品，一类是描写人们生活中的痛苦和快乐的；另一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类作品“在人间不露光芒”，“更没有人注意”。像茅盾这样全面评价冰心作品的文章，当时还不多，因此，茅盾这篇《冰心论》成为当时文坛引人注目的一篇文章。接着，茅盾又写了《落华生论》。

在撰写大量评论、小说时，茅盾又应邀在1934年至35年，为良友画书

公司选编了《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共选了 29 位作家的 58 篇小说，为新文学的第一个 10 年留下了丰厚的史料。

茅盾编完《新文学大系》之后，又准备迁居。新居在信义村四号。由于新居离鲁迅家较远，所以在迁居前一天晚上，专门到鲁迅家里告别。

到了鲁迅家里，茅盾发现鲁迅这天心情忧郁，话不多，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茅盾和鲁迅说了几句后，便起身告辞。这时，鲁迅也站起来，一语不发，拉着茅盾重新坐下，然后压低嗓音说：

“秋白被捕了！”

茅盾一听，怔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消息可靠吗？”茅盾看着脸色憔悴的鲁迅，半晌，才问道。

“他化名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要我设法找铺保营救。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鲁迅说。

“之华知道了吗？”茅盾焦急地问。

“告诉她了，她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上海党组织破坏得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之华也没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现在找这样一片店，又要照我们编的一套话去保释，恐怕难。”说到这里，鲁迅停了停，望了望窗外，接着对茅盾说：“我想来想去，只有自己开它一个铺子。”

茅盾沉吟了一会，说：“就怕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是要靠党方面来想办法。”

不久，秋白被叛徒出卖，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茅盾和鲁迅在万分悲痛中，编辑亡友遗作《海上述林》，以纪念这位革命同志和文学朋友。

1935 年，在夹缝中，茅盾经过努力，成绩斐然，除了一些评论文章外，还写了《有志者》、《尚未成功》、《无题》、《夏夜一点钟》、《拟浪花》《搬的喜剧》等短篇小说，还动手写了《少年印刷工》等中篇小说。

然而，此时还处在夹缝中的他，依然在努力着。

为生活而奔波

作“传话人”，两边不理解，风波平而不息。

鲁迅逝世，茅盾夫人执紼送殡。

“左联”解散与否，功绩俱在。

## 第十六章 抗战前的奔波

对故乡一往情深的茅盾，回到乌镇时，发现故乡观前街老屋后面原来作仓库用的平屋十分幽静，可惜年久失修，已经破烂，“如果翻造一下，让母亲住在这里，比临街楼房还清静；自己在里面创作，也可少些在上海的喧闹和嘈杂。”茅盾起了翻修平屋的念头。1934年春暖花开时，茅盾到乌镇，请“泰兴昌”纸店经理黄妙祥一起来商量翻修后面这三间平房的事。黄妙祥竭力怂恿茅盾趁现在工料便宜的时候，翻造这三间平房。茅盾听后，对黄妙祥说，“我也这样想。不过这件事还想听听我妈妈的想法。”回上海后，茅盾便向母亲汇报：“上海杂事太多，应酬太多，不能定下心来写东西，我打算将老屋后面的三间平房翻造一下，这样，就可以躲起来写小说了，平时，你可以搬进去住。听黄妙祥讲最近的工料也便宜。”茅盾母亲听后沉吟一会儿，觉得儿子讲得有道理，便同意了。于是茅盾写信给黄妙祥，让他去请木匠估价。并寄去日本式风格的草图。后来，在建造过程中，黄妙祥又一再给茅盾去信，说木料涨价了，石灰不够了，瓦片嫌少等等，要求追加经费，结果花了近千元，才算造好。三间平屋造好后，在乌镇这样的小镇上引起小小轰动，一些人好奇地来“参观”，沈家少爷亲自设计的“小洋房”。黄妙祥还煞有介事地领着茅盾去“验收”。茅盾一看这房子的通风和采光条件都不错，大为满意。其实在建造过程中，承包商在暗地里大大偷工减料，直到50年以后，才发现茅盾生前喜欢的这平屋，用料竟是这么扣克和单薄！

在乌镇有了这幽静的居所，茅盾便把上海的一些书及沙发、床、桌子等日用家具运回故里，还专门让木工做了一个可以把房间前后分隔的书橱，把上海带回的线装书，放在这别致、实用的书橱里。一切安排好后，茅盾让母亲住在里面，又从镇上买回花草，又移来天竹、棕榈和葡萄树；把这三间平屋的环境点缀得极有生气。

1935年秋，茅盾下决心离开上海这喧嚣的地方，回到乌镇，躲进这刚刚落成的平屋里，开始写作他那构思已久的小说，在乌镇住了两个月后。茅盾带着一部中篇小说《多角关系》回到上海。《多角关系》以上海附近的小县城为背景，以地主兼资本家唐子嘉1934年年关时节的债务纠纷为线索，引出一连串故事，反映了金融危机下面的人情变化和人情纠葛，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角关系。

后来，《多角关系》这部中篇小说，发表于《文学》1936年6卷1期，1937年5月由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茅盾从乌镇回上海不久，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纪念酒会，鲁迅也去了，史沫特莱特地叫出租车去接茅盾和鲁迅，然后换车进苏联领事馆。

气氛轻松的酒会上，史沫特莱把茅盾拉到一边，悄悄地对茅盾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孙夫人也有这个感觉，苏联同志表示如果他愿意到苏联去休养，他们可以安排好一切，而且可以全家都去。我们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说到这里，史沫特莱停了一下，瞥了一眼在不远

处的鲁迅，有些为难地说：“上次我给鲁迅讲过，但他不同意。所以我想，你沈先生出面，劝劝鲁迅先生，让他同意去苏联养病。”

茅盾听罢，深为感动，并表示愿意去说项。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转达史沫特莱的话，并希望鲁迅去苏联养病。同时认为鲁迅去苏联养病可以把《汉文学史》写完。起初，鲁迅心动了，表示可以考虑。不料过了一个星期，鲁迅回话又不同意去苏联养病了，表示“轻伤不下火线”。

茅盾和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1936年春节里，茅盾去鲁迅家里拜年。告辞时，鲁迅送茅盾下楼，走到楼梯中间，鲁迅忽然止步，悄声对茅盾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好啊！”茅盾一听，立即赞同说，然后转念一想，又问鲁迅“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边走边说：“交给史沫特莱，她总会想办法发出去的。”

此后，茅盾没有再和鲁迅商量此事。但茅盾知道中共方面确实收到过署名鲁迅茅盾的“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报。

茅盾在鲁迅家里看到“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给“左联”的信，信中肯定了“左联”的成绩，也批评了“左联”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也建议解散“左联”而另外成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文学团体。茅盾见到这封信，深有同感，觉得萧三是看到了“左联”存在的问题的。但鲁迅看了这封信以后，却不同意解散“左联”，认为“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

但凭一封信，毕竟不能有什么动作的，况且茅盾和鲁迅看法还不尽一致。1936年春节里，郑振铎告诉茅盾：“夏衍有重要的事要与你谈，时间由你定。”夏衍虽然早几年将茅盾的《春蚕》搬上银幕，但因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加上茅盾这几年搬家频繁，相互已久不联系。于是茅盾便问道：

“夏衍找我有什么事？”

“大概是关于‘左联’的事吧。”郑振铎也不明底里，说道。茅盾想了一下，同意了，便对郑振铎说：“明天上午在你家里与他见面如何？”

郑振铎点点头，忙说：“可以呀。”

第二天上午，夏衍如约来到郑振铎家里，与茅盾晤面。夏衍与郑振铎是朋友，所以与茅盾说话，也不避他。夏衍告诉茅盾：自从上海党组织破坏以后，“左联”已经瘫痪，各自为战。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经组织起来，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加入。末了，夏衍说：“这件事想请你征求鲁迅的意见。”

“那末‘左联’这个名称和组织呢？”茅盾看到过萧三代表共产国际的信，便问夏衍。

“我们也考虑过了，既然要成立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们认为，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小了。我们还准备去报上登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不过，这事要征得鲁迅同意。”

茅盾笑笑，问道：“那么你们去问过鲁迅么？”

“没有，鲁迅不肯见。所以想请你把这意思转告鲁迅。”夏衍说了一句，没等茅盾答腔，又问道：“我们这些想法，不知沈先生你以为如何？”



“这些想法和意见都是很对的，至于具体怎么进行，让我再考虑考虑。同时，我还将与鲁迅商量一下再说。”茅盾说。

第二天，茅盾去鲁迅家里转达夏衍的意见。鲁迅对中共是十分钦佩的，也十分尊重中共的意见，同时对中共也十分坦诚。他听了茅盾转达夏衍的意见以后，爽快地说：“他是想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无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说到这里，停一下，吸了一口烟，又说：“至于解散‘左联’，我认为没有必要。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然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鲁迅深刻的见解，茅盾向来佩服，鲁迅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因此，茅盾在次日又和夏衍在郑振铎家里见面，茅盾把鲁迅的话告诉了夏衍。夏衍一听，连忙辩解道：“解散‘左联’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都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听到这里，茅盾也替鲁迅说了一句：“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告诉鲁迅，我只作个传话人。”于是，夏衍希望茅盾再去鲁迅那里解释一下。

后来，茅盾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鲁迅，鲁迅一听，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言外之音是，有周扬他们在新组织里面作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茅盾见鲁迅态度十分明朗，不好再说什么，再多说，恐怕会引起鲁迅误解。于是茅盾便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托郑振铎转告夏衍，避“说客”之嫌。

后来，鲁迅经徐懋庸的说项，同意解散“左联”了，但提出必须发一个宣言，申明“左联”的解散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自行溃散。当时周扬他们也同意这样做。但结果，“左联”解散了，“宣言”却没有发。因此，鲁迅大为恼火，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同时也迁怒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茅盾被列为文艺家协会发起人后，一度与鲁迅的关系十分尴尬。当周扬他们希望茅盾从中调解鲁迅与周扬、夏衍他们之间的关系时，茅盾婉言推掉了，茅盾觉得自己处在这种境地，已是“没法调解”。

与此同时，当时文坛上还正在热烈讨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当时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织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第三国际刊物上的一些口号，推出了一个“国防文学”的口号，与政治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相呼应。但口号推出后，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内涵十分模糊，而另外又有人把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骂得一文不值，说成这个口号是放弃无产阶级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口号。而徐懋庸等却没有解释清楚。因而文坛上的讨论还十分混乱，但又十分热烈。据说当时，鲁迅曾私下对茅盾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卖的是什么货色。”后来一些评论家认为夏衍的《赛金花》是国防文学的“标本”，鲁迅见后哈哈大笑，对茅盾说：“沈先生，他们的国防文学原来是这样的？”鲁迅是从阶级观点来审视这个国防文学的口号的。

茅盾对此讨论，一开始保持着观望和沉默态度。后来，为了文艺界的团结和廓清理论界的误导，茅盾写了一些匡正谬误和正面阐述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在《文学》杂志上连续写了三篇短文，即《中国文艺的前途是衰亡么》、

《悲观与乐观》、《论奴隶文学》，匡正了理论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后来茅盾和周扬谈过一次后，茅盾认为应该写文章正面阐述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于是连续写了《需要一个中心点》、《进一解》等文章，正面阐述国防文学，认为“国防文学”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产生的，“这是讴歌为祖国而战，鼓励抗战情绪的文学。然而这不是默武的战争文学。”“这是民族文学，咏赞民族自救的文学。然而这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文学。”作为茅盾，当时也是凭直觉凭经验来审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没有直接受到中共的指示。但茅盾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他去投入这个口号的讨论。在鲁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左翼文化人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使本来趋于缓和的左翼文化人内部矛盾，又趋向白热化。因为胡风这篇文章，只字不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另外提了一个口号，这样一件事，原本是鲁迅、茅盾在当时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的帮助下共同策划的，为平衡情绪采取的一个措施。不料，后来背着鲁迅，胡风发了这篇文章，使本来的纠纷，更加复杂了。但作为茅盾仍在为此努力，6月7日下午，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茅盾被选为常务理事和召集人。

冯雪峰经过研究后，认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可以并存，这个意见得到鲁迅和茅盾的同意。鲁迅为此还写了文章，并让冯雪峰请茅盾交《文学界》发表，结果《文学界》没有给予重视，发表时没有放在头条。文学界依然是一片反对声，反对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而继续宣扬国防文学的口号，用贬一褒一的做法，使得文学界双方在杂志上争吵不休。对此，作为双方的调解人，茅盾感到十分为难。

于是，茅盾在7月下旬与冯雪峰谈话，并由其妻舅孔另境帮茅盾整理成文，题目为《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并交徐懋庸在《文学界》上发表。不料，与茅盾的文章同时登出来的还有周扬的一篇反驳文章《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茅盾十分纳闷，原来《文学界》收到茅盾的稿子后，先送周扬看了，因而文章没有印出，反驳文章却写好了，因此茅盾看到出版的《文学界》杂志后，又写了《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发表在8月23日的《生活星期刊》上。这篇文章，茅盾直接参与争论，阐述了什么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三个问题。笔意锐利，坦然而又深刻。文章发表后，周扬曾私下托人向茅盾解释。从此，茅盾与周扬他们的论争，也就告一段落。

但是，9月下旬《今代文艺》上发表《戏改鲁迅茅盾联》后，又惹出一番风波，戏联称是郭沫若写的：“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而提供者金祖同，又别出心裁地说在郭处见到茅盾写给郭沫若的一封长信。这个《戏改鲁迅茅盾联》发表后，文坛议论纷纷。茅盾也捺耐不住怒火，专门写了《谈最近的文坛现象》，刊登在10月10日《大公报》上。茅盾这篇文章发表时，鲁迅正是病情日渐沉重时。茅盾曾和史沫特莱等朋友为鲁迅的病而奔波过。但都因鲁迅的固执而未能及时治疗。终于在10月19日逝世。当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时，茅盾正在故乡乌镇养病和写作，当收到妻子孔德沚从上海发来的“周已故速归”电报时，茅盾的痔疮已发得厉害，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茅盾手捧电报，泪水潸然而下。茅盾本想赶往上海，参加鲁迅葬礼，不料疼痛难熬，母亲也劝他，等病稍好些再去上海。于是，茅盾过了两三天后，急速赶赴上海，与夫人孔德沚和女作家陈学昭等去墓地寄托哀思。茅盾原打算在乌镇写长篇小说《先

驱者》的计划，也中断了。茅盾连续写了《写于悲痛中》等三篇文章，纪念悼念鲁迅。

在两个口号文章论争期间，邹韬奋发起、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这本仿苏联高尔基的《世界的一日》而成的书，以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作为全国征文的内容。这本书于同年9月由生活书店出版。

在抗战前，茅盾在论战纷呈，风云多变的时代里，他依然勤奋创作，写了《大鼻子的故事》、《儿子开会去了》等儿童文学，以及《烟云》、《送考》、《官舱里》等小说。值得一提的是茅盾为日本《改造》杂志写的小说《水藻行》，这是茅盾以故乡为背景的，反映人性觉醒的一个短篇小说，也是茅盾一个唯一先在国外发表的小说。写这个小说的目的，“就是想塑造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形象，他健康、乐观、正直、善良、勇敢，他热爱劳动，他蔑视恶势力，他也不受封建伦常的束缚，他是中国大地上真正的主人。”同时，茅盾还写了不少散文、评论和译文，同时他也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创作体会，写了3万字的一本书：《创作的准备》。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

此时，抗日战争的风暴即将来临。

蒋介石健忘，通缉令未取消，邀请电已到。  
文章代枪炮；虽失文章本色，却是时代使然。  
远走他乡，妻子灯下抱猫苦等——  
只缘烽火连天。

## 第十七章 连天烽火

1937年是个烽火连天的年份！

上一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终于和平解决。蒋介石同意抗日了！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奉下回到南京。消息像一二八时商务印书馆的纸灰一样满天飞的时候，茅盾他们一些在上海的左翼进步文化人，面对各种各样的传闻，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的消息，惘然了。圣诞节的夜晚，茅盾被街上的鞭炮声所惊醒。孔德沚上街一打听，原来是上海的党政警宪奉命庆祝蒋介石被放回南京，一些不明真相的小市民，也跟在后面起哄。茅盾关上门，拧亮电灯，在灯下写了一篇散文：《鞭炮声中》。把蒋介石被放回南京时的那个圣诞节晚上上海小市民的面相刻划得入木三分，留下了一个令人捧腹的片断。

1937年6月底，江南在酷暑笼罩下，热得似乎比以前更早！从西安回来的蒋介石，似乎比以前更活跃了，并且装出一副开明君子的样子，他以领袖身份，邀请全国各党各派各方知名人士上庐山“共商国是”。一天，郑振铎送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寄来给茅盾的邀请信，邀请茅盾参加庐山第三期谈话会。茅盾捏着这封邀请信，向郑振铎苦笑道：“他们给我的通缉令还没有撤销，怎么又来邀请信？”郑振铎也笑了起来，问道：“你准备去不去呢？”

“我想再讲。”茅盾把信朝桌子上一扔，说道。

“我看可以去听听老蒋说些什么。”郑振铎认真地说：“这比报纸上的新闻可靠。”

茅盾敛起笑容，点点头说：“这倒也是，如果他真能抗日，总也是好事，何况也可乘机摸一摸蒋介石抗战的决心究竟有几分。”于是茅盾写了一封表示愿意出席庐山谈话会的回信，仍托郑振铎转寄。

不料，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茅盾收到“鉴三期谈话会因时局关系暂缓举行特此奉闻。”的一纸电报，原先上庐山的打算也就此告吹。

此时，全国烽火蔓延，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平津告急，时局十分危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7月30日，北平、天津沦为敌手，日军从山海关外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增兵。8月7日，日本的川越大使到了上海，日军陆战队和海军集中在上海，9日，日本海军武官士兵强闯虹桥机场，枪击士兵，被中国士兵还击毙命。8月13日，日军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在上海发动大规模侵略进攻，英勇的上海军民奋起抗战，上海街头号外纷飞，人心激昂。茅盾也为这种民族精神的大检阅而激动而欢呼。

14日那天是周末，上海进步文化界照例有个聚餐会，这些文化人都被昨天的战争激动着，也有不少人抱着探听消息和去向而来的，因此，聚餐会比以往多了一桌，气氛仍然十分热烈，探讨文艺家在抗战中的任务以及活动等具体问题。茅盾在席间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人

人都要有拿起枪来的决心，但是在目前，我们不要求作家艺术家投笔从戎，在战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我们要用它来描绘抗日战士的英姿，用它来喊出四万万同胞保卫国土的决心，也用它来揭露汉奸、亲日派的丑恶嘴脸。我们的工作不再在亭子间，而在前线、慰劳队、流动剧团、工厂等。茅盾越说越激动，最后他说“总之，我们要趁这大时代的洪流，把文艺工作深入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的抗战觉悟。开创一个抗战文艺的新局面来。”

茅盾话音刚落，其他朋友纷纷发表意见，希望办一个适应战时的刊物，并推举茅盾担任这个刊物的主编。

不料，正当大家在炮声中热热闹闹、群情激昂地讨论刊物时，外边进来几个迟到的人，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空军雄鹰展翅，轰炸出云舰！这一消息不啻给聚餐的文化界战士带来一付兴奋剂，个个仿佛要上战场去似的，一轰而散，兴奋地离去。

15日，茅盾约冯雪峰去找巴金，商量办刊物的事。茅盾把昨天聚餐会上大家的意思说过以后，巴金连连说：“这很好，这很好。”表示赞同。他还对茅盾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决定《文丛》停刊，听说《中流》、《译文》也已决定停刊。所以，抗战真正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却一片空白，岂不让后人笑话？”

“对，你讲得对。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出个刊物，和这个时代合拍！”茅盾吸了一口烟，接过巴金的话茬说。

巴金又说：“不过当前书店老板都忙着搬家，顾不上出新书和新刊物，看来这个刊物还是我们自己集资来办，好在周刊经费也不多，销路估计也可以的。”

“何不用《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个刊物的同人的名义办起来，资金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冯雪峰说。

“冯先生说得对，就这么办，还可以加一条，写稿尽义务，不付稿酬。”茅盾又兴奋地补充着。这样，一个为顺应抗战形势而诞生的刊物——《呐喊》的雏形初成了。茅盾自告奋勇来写发刊词，又约定由茅盾、巴金、冯雪峰分头去找《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个刊物的主编，讨论合力办刊。茅盾热血沸腾地赶写了《呐喊》的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用充满激情的文笔写道：“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岗位罢！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到8月25日，《呐喊》像一个婴儿一样，呱呱坠地了。它的第一声啼哭，第一声呐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控诉。上海街头一边是炮声隆隆，一边是人们争相购买抗日的报章杂志。但是，这个阵容强大的《呐喊》高知名度的作者阵容，自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出现了租界工部局扣留了抗战报纸和杂志，报童被殴打等等情况，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呐喊》。于是茅盾他们又利用邵力子等老朋友的社会关系，走个形式，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补办个手续。这时，茅盾他们也听到不少朋友对《呐喊》这个刊物名称有不同看法，认为和这个时代不协调，仅仅呐喊是不够的。因此，茅盾趁补办手续的机会，把《呐喊》改为《烽火》，于9月5日正式出版。

从7月到9月这三个月里，茅盾以不可遏制的感情，写下了抗战初期的大量檄文，也写下了大量的扩展抗战文艺的设想和意见。当时《救亡日报》曾有一则令人惊讶的报道，说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战时服务团在静安寺冯存堂药号门口办个壁报，取名《实弹》，宣传抗日。在第一期的壁报上，茅盾也为它写了文章，可见当时茅盾的热情之高。

自八一三以后，战争并没有在上海立即迅速发展，日军和国民党的战场上，处于一种胶着状态。直觉告诉茅盾，“上海不可能久守！”怎么办？茅盾面临着一个离开硝烟弥漫的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茅盾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询问母亲是随茅盾全家逃难呢，还是留在上海租界？此时的租界还是安全的。不料，茅盾母亲托人带信来说，她要留在乌镇，并说，到内地逃难，老了，走不动了，不拖累你们了。住在上海，费用高，不如住在乌镇清静。

茅盾接到母亲信，仍不放心，便让妻子孔德沚去乌镇说服母亲，并接到上海租界里来住。不料，孔德沚去乌镇几天后，仍旧一个人回到上海，茅盾见风尘仆仆的妻子一个人回来，急忙问道：“妈妈呢？”

“妈妈不肯来上海，她说上海打仗，乱哄哄的，不来添忙乱了。”孔德沚一边洗脸，一边说。洗好脸，她又对茅盾说，“妈妈让我们走之前，把一些书等带不走的東西，送到乌镇去。”

茅盾一听，苦笑道：“妈妈一个人在乌镇，我们总归是不放心的。”“也许小鬼子不去那里。”孔德沚自我安慰地说了一句。

这时，邮差送来一封长沙来信，是德沚的朋友陈达人写来的，陈达人是孔德沚爱国女校的同学，她现在随丈夫黄子通在长沙湖南大学。她知道上海已成战场，便邀请茅盾全家去长沙避难。茅盾夫妇觉得这也是个办法，但最好是先将两个读中学的孩子送到长沙，这样走起来也轻松一些。孔德沚把这个想法告诉陈达人，陈达人也及时回电，表示欢迎。

于是，茅盾夫妇俩着手准备孩子行装，并由茅盾护送到长沙。孔德沚则把家里东西清理一下，带不走的，或送人或寄存，并把家里的书装箱后送回乌镇去。

正在手忙脚乱准备离开上海，送孩子去长沙时，突然收到弟媳张琴秋从南京的来信，茅盾急忙展信，只见上面写道：

“茅哥、沚姐，很久没有和你们见面了，而且很久没有和你们通讯了，我心中时常想念你们，时常打听你们的消息，问及你们的近状，但是始终没有得着你们真实的情形和探得你们的通讯地址，今天遇见王君烈文——他是我过去的旧同学，谈到了你们的近况，真使我兴奋万分。拟王君说二月前曾经在沪看见过你们，曾到过你们的家。

我知道你们一定也在问及我，关心我。你们或许已经从报上看到知道我已被杀的消息。不错，我此次能来南京，确实是死中逃生。我已于今年四月中旬在甘北被马步芳的军队所俘，当时被俘的男女几千人，杀死者过半，被俘后解送青海西宁，易名隐匿，帮人煮饭，有三月光景，后觅得同乡一名，才把我设法带至西安。抵西安后，又由行营押送到南京，由中央党部送我们入反省院，住了两个星期，最近有周先生把我保出来，才得着自由，准备明日启程归家。

……

母亲在沪抑在乌？她老人家身体是否强健？阿双阿南等都长得很大，一定不认得我了吧？我很记念他们！

民的消息，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吧！可怜他的一生，为解放人类而奋斗，历尽艰苦，抛弃了私人的利益，日夜工作，积劳成疾，终于离去我们而长逝了，唉，我没有见他最后的一面，实在使我心痛！！……”

茅盾孔德沚夫妇已经五六年没有收到琴秋的信了，突然见到弟媳张琴秋署名“凤生”的来信，又悲又喜，又想起胞弟沈泽民牺牲的事，都唏嘘不已！孔德沚看了信，想到泽民的死，琴秋受的苦，心酸泪下，悲从中来。

10月5日下午，茅盾领着女儿沈霞、儿子沈霜急匆匆地赶到火车西站，赶乘火车去镇江。因为在战时，火车直到暮霭降临才开车，以避免敌机骚扰。从上海到镇江，本来可以直开苏州、镇江，但因上海到苏州已被军车占道，客车要先到嘉兴，绕道到苏州，才能再到镇江。

火车在黑夜里咿咿地喘息着。茅盾和两个孩子挤在拥挤的车厢里，竟意外地碰到左翼文化人郑伯奇一家，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到西安去。

一路上，火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半夜一点钟光景，才到嘉兴站，然后是走苏嘉路，朝苏州方向开去。（这一条苏嘉路是一条新建不久的铁路，后来被毁，一直没有修起来。）过苏州后，天就泛出鱼肚白，经无锡、常州，到镇江时，已是上午9点光景了。茅盾3人坐了一夜火车，带着疲惫的神色，直奔长江码头，买到当天下午去汉口的船票。下午，这艘挂着英国国旗的太古轮船公司的客轮，徐徐朝上游开去。两天两夜的长江航行，终于在10月8日到达汉口。茅盾3人上岸后，找到开明书店，竟意外地见到老朋友叶圣陶和章锡琛，茅盾让开明分店经理章雪舟买去长沙的火车票。

终于在10月10日中午到达长沙，陈达人已经在车站等候，黄子通也替茅盾的儿子女儿联系好长沙的两所名牌中学，即岳云中学和周南女中。在长沙短短的几天中间，茅盾在黄子通的陪伴下，专门应邀去湖南大学讲演；又会见了当时鼎鼎大名的红色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徐老先生此时正在长沙筹办中共驻长沙的办事处。茅盾事后回忆说：当时“我十分激动，因为徐老是我们抗日战争开始第一个接触到的以公开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而这样身份的同志已有十年不见了。”自然，在生活、前途感到困难，要“逃难”这样的生活境遇里，见到与自己奋斗过并一直引为同志的人，能不激动吗？所以茅盾感到“一见如故”，两人倾心而谈。

在长沙安顿好女儿、儿子之后，茅盾便急急忙忙经汉口、杭州，又绕道绍兴，坐船回到上海。此时已是11月12日的掌灯时分了。为了送儿女去长沙，来回足足花了一个多月。而妻子则安排好家里一些东西后，天天在为丈夫的行程而担心，那天茅盾一路艰辛地回到家时，有一段回忆十分感人：

“11月12日上灯时分，我回到家中，只见德沚一个人抱着一只白猫坐在沙发里发呆，旁边的收音机沙沙地响着。她一见我就跳起来高叫：好了，好了，回来了，总算回来了。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问题：怎样回来的？孩子们好吗？路上走了几天？吃过饭没有？又说，这几天把我担心死了。现在心里石头终于落下了。说完又急忙忙要去烧洗澡水。我说，先做饭罢，我一天没有吃了！她又奔到厨房，忽又返回说：刚刚广播，我军已撤出上海！”

茅盾及时地赶回来了，但上海也陷落了，成为孤岛，没有几天，上海的两翼嘉兴、苏州也沦为敌手。在茅盾的家乡，一支敌军从水路向西开拔，路过乌镇，放火烧了西栅的大批房屋，事后才知道，茅盾的外祖父家的房屋也毁于日寇的战火。但茅盾母亲却给茅盾来信，为了让儿子儿媳放心，特地

乌镇平安无事，这样可以让茅盾他们放心。同时叮嘱茅盾夫妇赶快离开上海去内地，对孙女孙子两个孩子在长沙表示不放心。一片慈母之心，令茅盾感动不已。

1937年12月5日，南京陷落后，茅盾夫妇便搬出信义村，住进法租界的一个公寓作难民，同时托人买去香港的船票。在等船票的当中，茅盾应巴金的邀请，回忆这次内地沿途见闻，记录下这个大时代混乱的场面，这就是《苏嘉路上》等一些散文。

直到1937年12月底，茅盾和夫人孔德沚登上去香港的轮船，逃离了满街是火药味的孤岛上海，告别了曾经生活、工作和战斗过20年的上海。



国土沦丧，避难弹丸之地造文章：  
得中共指令；他旗帜初扬，刊物蒸蒸日上，  
但到底“还不够非常”

## 第十八章 香港之行

茫茫大海，孤舟远漂，失去了往年此时的热闹和欢笑，没有新年里那种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也没有声声入耳的恭贺声，阴霾的苍穹下，海天一色，分辨不出哪是天，哪是海，船窗外的拍浪声，一阵一阵地传来，冷冷地令人心寒。茅盾夫妇在这从上海出发去广州的船上，相对无言，船舱里的灯在轻轻地摇晃着，孔德沚望着身边的一堆行李，想起一双儿女，不无忧虑地对茅盾说：“德鸿，到长沙可能要半个月。”“顺利一些，差不多；不顺利的话，不够的。”茅盾抽着烟，回答道。茅盾心里在考虑到了长沙以后，怎么办？现在南京陷落，国民党中央政府已迁往武汉。武汉的那些朋友现在怎么样？因此，从广州到长沙，再可以去武汉看看。

经过三夜两天的颠簸，茅盾夫妇终于在1月3日到达广州。走上码头，发现码头上人山人海，大都是沿海一带南下逃难来的，拖儿带女，挑担提箱。茅盾夫妇背着行李，好不容易挤上一辆三轮车，便直奔火车站，打算买当天的火车北上。不料，当茅盾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火车站时，一打听，去长沙的火车票早就没有了。“何时才有？”“不知道。”售票窗里掷出一句硬邦邦的话来。在外面照看行李的孔德沚听说没有买到票，急了，忙问茅盾：“怎么办？长沙那边在等我们呀！”茅盾望着广州火车站上这副人山人海的逃难场面，以及一个一个的宣传队，不无忧虑地叹口气说道：“我们去找夏衍吧，让他给我们想想办法。”

夏衍此时正在广州《救亡日报》担任主编，已来广州一段时间了。于是，茅盾夫妇拖着行李，去西关长寿路《救亡日报》社编辑部找夏衍。正巧，茅盾他们去时，夏衍正在编辑部看稿子，骤见老朋友来，十分高兴，忙端上两杯茶，送到茅盾夫妇面前。

“路上辛苦吧？”夏衍问。

“还好，坐船慢些，但比火车、汽车轻松。这次来广州，是路过，想去长沙，孩子已经先在那边了。刚才去买车票，说早卖光了。所以想请你想想办法，买两张去长沙的火车票。”茅盾吹了吹茶杯里浮在上面的茶叶，直截了当地向老朋友说买车票的事。

夏衍一听，笑了，对茅盾说：“不急不急，买车票的事包在阿拉身上。不过既然来了，在广州住上几天休整一下，而且我也正好要找你，请你帮忙给《救亡日报》写点文章，这也是抗战工作。住宿我来安排，嫂子你看如何？”夏衍一口气说完，又征询孔德沚。

茅盾一听，急了，放下茶杯，连忙说：“我‘脱离’抗战有3个月了，现在实在无话可说，还是等我到了长沙以后再给你写吧。”

“写什么，由你定吧，《救亡日报》上的文章，你无论如何也得写。”夏衍一边给茅盾倒茶，一边说。“你们坐一会儿，我去关照他们给你们安排旅馆。”夏衍放下水壶出门去了。

一会儿，夏衍回到编辑部，笑道：“我都安排好了，你们歇一会儿就去旅馆。”茅盾无奈地笑笑，同意了夏衍的安排。

旅馆就在报社不远的地方，一会儿就到了。孔德沚一进房间，便把布袋里的东西理出来，碗、盆、毛巾等——放在桌上。这时，茅盾忙阻止说：“德沚，东西不要理了，放着明天再说，说不定复衍会送票子来，马上会走的。你太累了，休息一下吧。”

“哪能休息，累倒不累，东西理好，明天走时也方便些，我第一次到广州来，你先休息一下，我到下面街上看看，广州的东西是不是比上海贵？”孔德沚蛮有精神地说。

“也好，不过早点回来。”茅盾关心地补了一句。

孔德沚出门去之后，茅盾把夏衍那里拿来的几张《救亡日报》翻了一下，突然想起夏衍的要求，又想起几个月的所见所闻所思，涌到笔端，不一会儿，便在旅馆写了一篇《还不够非常》的短文。写完后，又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署上名，就放在一边。

这时，夏衍推门进来，告诉茅盾，车票已经让人去买了，明天能送来，估计起码要待两三天才能起程，让茅盾安心休息一下。同时还告诉茅盾：“在广州的几个朋友明天想和你聚聚，不知你以为如何？”

“好的。”茅盾想在这烽火连天的日子，朋友相聚是难得的，便不假思索地回答。又问夏衍：“哪几个在广州呀？”

“郭沫若、蔡楚生、欧阳山、林林、林焕平他们几位。”夏衍回答说。“明天中午在新亚酒店。我会来陪你去的。”

“那好，你告诉他们，明天我一定去。”茅盾笑着对夏衍说。“噢，对了，你要的文章，刚刚我写了一篇，不知能不能用，你给斧正一下呀。”

夏衍惊讶又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只说了一句“这么快？”便从茅盾手里接过稿子，看了一遍，连连说：“写得太好了，深刻深刻。”茅盾连忙摆摆手，说：“急就章，将就着吧。”

两人又说了些别的事，夏衍告辞了，临走，对茅盾说：“今天您早点休息，明天我来接你。”

这时，夫人孔德沚从外面回来，在门口碰见夏衍，忙说：“怎么就走了？再坐一会儿吧，我买了些点心来，你也尝尝。”夏衍说：“不了，我已经坐了一会儿了，嫂子的点心，我下次再吃吧。”

第二天茅盾夫妇和夏衍一道去新亚酒店参加朋友聚会。在这战乱中相见，朋友们原先一些文字上的不快，早抛到九霄云外了，郭沫若和茅盾紧紧地握着手，茅盾问郭沫若：“什么时候回来的？”郭沫若大声地讲：“我是被他们的炮火送回来的。”郭沫若还告诉茅盾，这次只身回国，那个日本妻子还在日本，她们可能有麻烦。他内心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她们母子们。但国家在哭泣，民族在遭难，自己已经无法安心在敌国国土上生活了。因此，躲过警视厅的耳朵，悄悄地回来了。

茅盾夫妇怀着钦佩的心情，听郭沫若叙述回国的经历。大家相聚甚欢，畅谈国事战事，情绪十分高涨。一直到太阳西下，才握手道别。

茅盾夫妇回到旅馆时，一个矮敦敦的、却显得十分精干的青年已在那里等他们，给他们送火车票来。这个青年叫叶文津，他已经在旅馆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茅盾：“票子已经买好，是8号的。”茅盾拿了车票，十分感谢。这时叶文津说：“8号那天，你们在旅馆等吧，我会来送沈先生的。”

1938年1月8日，茅盾夫妇在叶文津的帮助下，终于登上去长沙的火车。而夏衍约稿的《还不够非常》也在这一天的《救亡日报》上发表。火车走走

停停，4天后才到达长沙。

在长沙，茅盾住在长沙近郊，一个地名很有点诗意的地方——白鹅塘一号。这个地方是孔德沚的同学陈达人的家，此时，茅盾的一对儿女也寄居在此地，陈达人的丈夫黄子通是个教授，房子很大。所以，茅盾夫妇一下车就直奔白鹅塘一号。

茅盾到达长沙以后，下一步去哪儿？黄子通陈达人夫妇十分好客，他们希望茅盾夫妇在长沙过阴历年，在他们家里多呆几天。茅盾觉得再看一下形势，再定行止。于是，他每天上街，看看市面情况，发现此时的长沙，已经有点抗战气氛了。一队一队的宣传队、募捐队，在街头出现了。《毛泽东传》、《朱德传》一类在上海禁售的书，也出现在街头书摊上了。拄着棍子的伤兵也在满街游荡。这一切，茅盾感慨万端。在长沙的那些日子里，他还专门去拜访一些文友。田汉、孙伏园、王鲁彦、廖沫沙、黄源、常任侠等。这些文友见茅盾也来长沙，十分高兴，专门为茅盾的到达举行了一个欢迎会，特地邀请徐特立先生参加。这些友人还告诉茅盾，许杰、朱自清也在长沙。茅盾后来又专门拜访朱自清。两人还一起渡江游览岳麓山。

此时，长沙文化界邀请茅盾在长沙“银宫”作了一次讲演。通过这次活动，茅盾认识了一个叫李南桌的文学青年。李南桌是个聪明绝顶的文学爱好者，与茅盾交谈几次后，深为茅盾赏识，并成为经常来往的“学生”。可惜李南桌在颠沛流离中死于非命。茅盾深为痛惜。

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茅盾决定去武汉探个虚实。2月7日，茅盾到达武汉，此时的武汉已是热血沸腾，歌咏队、宣传队、演剧队，到处可见。标语、彩旗、大规模的工人、青年、妇女、学生的游行，十分热闹。茅盾心里又勾起十年前的回忆，此时此地此境，1927年的武汉何乃相似！

对武汉这种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茅盾毕竟是见到过的。现在的茅盾已非十年前的茅盾了，没有那么多冲动了，更多的是冷静的思索。他想到了中共，走进了中共长江局（即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会见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自己受聘办《文艺阵地》杂志的打算计划，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活动方式，希望得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周恩来副主席听完茅盾的打算笑了笑，说，沈先生的打算很好，我们会动员作家支持沈先生，把刊物办得更好。后来指示吴奚如，凡是延安及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及老干部们写的文艺稿件，汇总长江局后，由吴奚如选择，然后交茅盾所编的《文艺阵地》发表。应该说，周副主席这个指示，是对茅盾的极大支持，在当时能享此条件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武汉，茅盾与生活书店谈妥办《文艺阵地》后，又去拜访老熟人董必武。董必武见到茅盾，十分高兴，问茅盾是否愿意在武汉工作，现在国共合作，如第三厅等，也许茅盾对十年前在武汉的经历还记忆犹新，表示还是去编杂志写小说的好。董必武也非常理解茅盾的选择，说：“这也好，我会尽力向你提供有关反映敌后斗争的稿件的。”

有一次，茅盾与冯乃超相遇，冯乃超知道茅盾过去的经历，便问茅盾，“你想不想见见陈独秀？”茅盾一听，十分惊讶，“他在这里吗？”冯点点头，“我知道他的住址。”茅盾兴奋地说：“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十年不见了。”在冯乃超的陪伴下，茅盾去拜访陈独秀，十年不见，陈独秀明显地衰老了，他想不到会在这里见面，依然健谈，陈独秀高兴地对茅盾说：“我经常从你的小说里见到你！”茅盾请教他对抗战形势的看法，陈说，“武汉是

守不住的，我们都得走。”又说“日本人一定会来轰炸武汉。”茅盾和冯乃超听了陈的分析后，不得不佩服地点点头。

所以，后来茅盾向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徐伯昕提出，《文艺阵地》的编辑出版地点移到广州，认为印刷条件广州比武汉好。而且，汉口并不安全，敌人如沿长江逆水而上，武汉是守不住的。茅盾的潜意识里，十分钦佩陈独秀对战事的分析和见解。

在武汉那轰轰烈烈的日子里，茅盾依然冷静思考，写了9篇文章，对抗战文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包括抗战文艺的走向、趋势以及为抗战服务的形式问题等。

2月19日，茅盾回到长沙，向陈达人一家告别，偕妻子儿女于21日登上南下的火车，直奔广州。临行，张天翼给茅盾送来一篇给《文艺阵地》的小说《华威先生》。24日到达广州，住在珠江边上的爱群大酒店。一到广州，消息传出，夏衍、潘汉年、叶文津、欧阳山、草明、于逢、蒲风、林焕平、林林等朋友都陆续来看望茅盾。战乱年头，友朋相见，分外亲切。晚上，萨空了又来看茅盾，他准备将自己主编的《立报》移到香港去出版，想请茅盾去香港帮他主编《立报》的副刊《言林》，茅盾一听，说：“不行呀，我要在广州编《文艺阵地》。”

“这不矛盾，你可以同时编两种。《文艺阵地》是半月刊，字数不多，占不了你多少时间；《言林》只有2500字一期，你顺手就编好了。还有，你可以到香港去居住，那边环境也比这里安全，用不着天天躲警报。《文艺阵地》在那边编好，再送来广州印刷发行。不是也很好吗。”萨空了苦心劝说。他又劝茅盾，这样编两个，生活上也可应付日愈高涨的物价。

茅盾答应考虑一下再答复。晚上和妻子商量之后，决定迁香港去生活，每月把编好的《文艺阵地》送回广州，而广州则把稿子信件及时送到香港。萨空了知道茅盾同意后，十分高兴，并约茅盾一家一同去香港。

2月27日，茅盾携妻子儿女，到了香港，先住在九龙尖沙咀附近的一条街上，因为在电车路旁，不安静，后又迁到九龙太子道196号四楼。

暂时安顿以后，茅盾把孩子送进华南中学，然后，茅盾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始编辑《文艺阵地》和《立报·言林》。4月1日，《言林》复刊，茅盾在《言林》上开始连载《你往哪里跑》的长篇小说。这个小说，也是应萨空了的要求而动手的，写的是抗战题材，刚刚发生在上海的故事，暴露了8·13之后上海各阶层人士所持的不同态度，其中有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也有汉奸、投机商、托派分子等。这个长篇开始拟名《何去何从》，觉得太刺眼，怕引起麻烦，所以改为《你往哪里跑》。茅盾这种边写边登的办法，还是第一次尝试。后来在《言林》上发表作品的，有不少知名作家：杜埃、林焕平、李南桌、黄绳、袁水拍等。不久，《言林》便成为茅盾在香港为抗日呐喊、助威的一个阵地。

在《言林》复刊编辑工作走上轨道以后，茅盾同时又投入编辑半月刊《文艺阵地》的杂志，因为有长沙、武汉、广州之行，茅盾对创刊号以及以后几期的稿源，充满信心，蛮有把握了。4月16日，创刊号《文艺阵地》出版，上面有叶圣陶从四川寄来的杂志《疏忽转到严谨》、老舍的《忠烈图》、董必武推荐陆定一的报告文学《一件并不轰轰烈烈的故事》、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李南桌的论文《广现实主义》，以及林林、力扬、王亚平等人的诗作，一时蔚为大观。创刊号一出来，引起各方面的热烈反映，一炮打响！尤

其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成为抗战文艺作品中“第一个典型人物”。

不料，一本深受读者欢迎的杂志，竟因印刷质量的不佳而困扰着茅盾这位大编辑家。在编辑这门学科里，茅盾建树颇多，而且多少年的实践，已经有一套丰富的经验，因此，茅盾打算通过关系在香港印刷，不料港英政府怕日本人而拒绝这本抗日杂志的印刷，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茅盾想到上海，想到内弟孔另境，与生活书店商量后，决定秘密送上海印刷，然后再运香港发行。这样虽然路途遥远些，但刊物质量就有保证了。

因此，《文艺阵地》从第四期起，由茅盾编好一期，托人带往上海，由孔另境送厂排印校对。茅盾在编辑上要求很严，一个标点，一个字都仔细推敲过，一篇选用的稿件，都批改得清清楚楚，“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所以，茅盾那段时间，经常坐在太子道那个家里，面对劈开的红色小山，遥控指挥——给孔另境写信，讲如何排版、改字等。

也是坐在太子道那个家里，为《文艺阵地》、为《言林》，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和作品，在香港这段时间，茅盾自己统计一下，短论 20 篇，书评 30 篇，还有长篇连载《你往哪里跑》。

1938 年 4 月的一天，茅盾突然收到上海许广平寄来的信，讲到《鲁迅全集》的事，说原来与商务印书馆有过协议，商量好了。现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焚于炮火，他们不再承印了。请茅盾在香港与商务的香港分店接触一下，看他们能不能承印。同时让茅盾去见蔡元培，请蔡元培为全集作序。4 月 19 日，茅盾拜访在香港的蔡元培，蔡元培先生一口答应为“全集”写序和排印“全集”的事帮忙，并让茅盾去找香港分店经理。蔡元培说了个经理的名字，茅盾一听，笑了，原来这个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店的经理叫黄访书，是茅盾 20 年前在编译所时的小伙伴，同事。

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鲁迅全集》没有在香港印，黄访书与茅盾叙旧时十分热情，谈“全集”就哭丧着脸的情景给茅盾印象很深。《鲁迅全集》经过周折，后来终于在上海出版了，茅盾在其中也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后来茅盾被教育家吴涵真拉去，在一个中华业余学校义务讲课。专门讲授写作和讲解抗战文艺的现状和发展等。茅盾又多了一个宣传抗日主张的阵地。在香港这段岁月里，茅盾充分利用香港这个特殊的环境，建立起一个又一个阵地，为抗日战争作鼓与呼。

一边盛情邀请，一边迟迟不发“通行证”；  
一边一片真心，好似西天取经，磨难难免。  
兰州寂寞，神秘女郎，国民党人的话是真是假？

## 第十九章 西北行

茅盾离开香港去新疆，完全是偶然的，也是被新疆督办盛世才的那种伪装所迷惑的结果。

1938年9月的一天，茅盾在香港一个小型的聚会上，碰到刚从新疆归来的大名鼎鼎的杜重远。杜重远因1935年5月的“新生事件”而被国民党判了一年零两个月的监禁，因此名扬海内外。此时，他与茅盾一见如故，但谈的不是“新生事件”的幕后新闻，而是他到新疆后的感受。杜重远充满激情地向茅盾讲述新疆的情形，他说：现在新疆的督办盛世才是他东北老乡，又一同留学日本。他推翻了金树仁的反动统治以后，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发展新疆，推动各民族的繁荣。盛世才这个人思想也很进步，北依苏联、东联延安，提出了反帝、亲苏、清廉、和平、建设、民族平等的六大政策，他与延安方面关系不错，现在有一批延安过来或从苏联过来的同志在帮助他一起建设新疆。“杜先生去过几趟了呢？”茅盾问。“去过两次了。刚刚从那边回来，把工厂迁往昆明的事办妥以后，我还要去新疆。”停了一会儿，又说：“盛世才以为我在搞实业，想请我去担任建设厅长，不过我没有同意。不是我不会当，而是我以为要把新疆建设起来，首先要办教育，要普遍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要从培养干部着手。所以，我向盛世才建议让我去办新疆学院，学院的林基路已下到县里当县长去了，学院没有人去负责，所以盛世才也赞成我去搞教育。”杜重远说到这里，目光里露出自傲自信的神色，兀自笑了起来，问道：“沈先生你看我能办教育么？”茅盾也笑起来，“能，能，凭杜先生的热情和事业性，一定能办好。”茅盾笑过之后说。

杜重远连忙摆摆手，说道：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想借新疆学院，集中一批人才为新疆的建设服务。在重庆的生活书店总经理张仲实已经答应去新疆教书了，不知沈先生能不能帮助推荐一些人去那边。”茅盾说：“教书应当从大学里去挑，不过，新疆自古是化外之地，我认识的那些教授未必愿意去。”

杜重远一听，点点头，感叹道：“如果能请到您这样的名作家去新疆，号召力就大了，可惜你在编《文艺阵地》，不然，盛世才一定会设宴欢迎的。”

“也许有一个人愿意去。但他不是教书的。”茅盾瞥了一眼其他桌上那些高声谈笑的朋友，说。

“谁？不是教书的也可以。”杜重远露出一副急切的神情。

“萨空了。”茅盾告诉说。

“哈哈”杜重远笑了起来。“空了的处境我知道，他已经答应去新疆帮忙了，《新疆日报》正缺一个内行的领导人呢。”

茅盾一听，也笑起来了。

后来，萨空了辞去《立报》的工作，去新疆了，并为《新疆日报》采购了不少设备带去。他知道茅盾有离开香港的念头，便来劝茅盾也去新疆，“住得惯，住两年，住不惯也就出来。”茅盾表示再想一想。萨空了看茅盾有些松动，又让杜重远亲自来劝茅盾去新疆，并给了茅盾一本宣传新疆的小册子。茅盾一看书名，是《三渡天山》，作者竟是杜重远。

茅盾看了这本小册子，又听了杜重远、萨空了的介绍，仿佛觉得新疆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政治清明，人民幸福，各族人民热气腾腾地建设新新疆。所以，当时左翼人士私下把新疆当作第二个延安。可以想见新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了。

于是，经过左思右想，茅盾决定率全家去新疆，当把这个想法告诉杜重远之后，杜重远很快便寄来了督办盛世才的正式邀请电报。茅盾把《言林》交给杜埃，把《文艺阵地》交给了楼适夷，于1938年年尾离开香港，登上轮船，开始漫长而心焦的从东南到西北的旅途。

1938年12月20日，茅盾一家和杜重远的内弟侯立达及杜重远公司的一位职员，乘上名为“小广东”的法国邮轮，取道越南海防，登上去河内的火车，一路颠簸，直到12月28日上午到达云南昆明。

因为云南文协分会的朋友从杜重远那里知道茅盾要到云南来，车到昆明，认识的穆木天、施蛰存、马子华等文艺界朋友早已在车站迎接茅盾了，云南文协分会负责人、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也亲自到车站迎接。

茅盾一家下榻的西南旅馆，是文协早安排好的昆明第一流旅馆，在昆明护国路上。去兰州的飞机要等到下一周才有，所以要在昆明停留几天。当时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许多从北平、上海等地来的文化人，都住在昆明。因此，茅盾一到，立刻成为昆明文艺界的一件大事，由此而来的日程也被那帮朋友们排得满满的。28号晚上，文协云南分会举行为茅盾洗尘的晚宴，正在昆明的朱自清、沈从文也出席晚宴。第二天，茅盾又出席文协分会的茶话会，下午又有朋友到茅盾下榻处访问叙谈。30号上午顾颉刚来看望茅盾。31号茅盾去西南联大拜访朋友。真是忙得不亦乐乎。1939年元旦，茅盾一家在云南文协分会楚图南的陪同下，游览了昆明西山龙门，并荡舟滇池。第二天，又参加了文协的新年联欢会。3日应联大朋友的邀请，在西南联大座谈。4日去云南大学至公堂演讲。在昆明那几天的日子里，茅盾心情特别好，整天地奔波，毫无倦意，还从抗战文艺大局出发，在文艺界朋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促使在昆明的当地文化人与外来户文化人之间的合作。春城昆明的旖旎景色，战乱时期那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心绪，使茅盾抛却了往日种种不快，全副心血地投入民族解放的大业中。

1939年1月5日，昆明阳光灿烂，碧空万里，暖烘烘的阳光，洒在这战时平和的名城大地上，有如阳春三月，滇池里波光粼粼，风和日丽。茅盾一家和萨空了夫人金秉英及两个女儿，一起登上兰州的飞机。楚图南等文协云南分会的朋友前来送行，大家握手相别，期待着下一次见面和畅叙。

飞机直冲蓝天，茅盾倚在舷窗口，望着机翼下如画如诗的云南大地，山峦起伏，江湖如镜似练，在如絮白云下缓缓地蠕动着。飞机在成都停留时，身材魁梧的张仲实也走上了这架飞机，他也是应杜重远邀请去新疆，正好与茅盾同行。

经过9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4时50分，飞机降落在兰州机场。茅盾一走出机舱，一阵寒风平地袭来，呼啸的西北风，茅盾还是第一次领教。尤其是从西南温暖如春的云南过来，更觉这黄土高原的寒冷。

在瑟瑟发抖的寒风里，茅盾一家、张仲实、金秉英等一起住进当时兰州颇像样的南关外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等待进新疆的飞机。

这个兰州城里最好的招待所，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进门是个小院，左边墙脚下有几墩花坛，右边是一排新建的平房，约五至六间，室内是地砖，

上面没有天花板，一眼可以看到屋顶；正面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楼房，楼上楼下各五间，一个外走廊，可以看院内的一切。茅盾他们就被安排在楼上。

开始，茅盾以为在兰州也像在昆明那样，呆上5—6天，就可以去新疆了。不料，一天二天过去了，去新疆的飞机消息迟迟没有来，因此，茅盾只好耐心等待。

兰州没有昆明那样热闹，也没有昆明那样繁荣，据说当时兰州城里最高的建筑也只有两层楼，而且白天一阵风吹来，遮天蔽日，黄土灰尘飞扬。因此，平时大家很少出门。住进招待所不久，茅盾他们发现有两个青年女子也在招待所住着，一个学生模样，一个看上去年纪稍大一些，穿戴也较时髦。她们的行踪，开始引起了孔德沚、金秉英她们一阵恐慌。不过茅盾和张仲实觉得不必多虑，所以就坦然了。

茅盾他们到达兰州的消息在报纸上刊出以后，陆续有人来拜访，不过没有像在昆明那样热闹。年轻的兰州生活书店的经理薛迪畅第一个来到招待所，当茅盾问起兰州的情况后，薛迪畅向茅盾详细地介绍了兰州文艺界的凄凉情况。他告诉说：兰州没有文化界的组织，文协甘肃分会还没有成立，第三厅派来了战地文化服务团的几个人，正在筹备文协，但终因人少，也没有结果。刊物是有一个，叫《现代评坛》，团结了十几个人，半个月一期，每期500份，也是勉强维持。茅盾听后，也感觉到西北地区发展抗战文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了。

后来，薛迪畅又带了几个当地文学青年来见茅盾，其中有《现代评坛》的编辑赵西。茅盾在与这些文学青年谈话中，希望他们与第三厅的战地文化服务团的同志合作，共同筹备文协。并对《现代评坛》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坚持下去，表示赞赏。他们则向茅盾讲了不少甘肃、兰州文艺青年的思想。后来，应赵西他们要求，茅盾在兰州萃英门的甘肃学院作过两次讲演。第一次的讲题是《抗战与文艺》，第二次是《谈华南文化运动的概况》，介绍华南各地的文化工作者开展文化运动的方法，如上海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广州的文艺通讯网运动，香港举办业余学校等。给甘肃文艺界带来了一阵春风。

除了这两次讲演，在兰州没有人来约稿，也没有热闹的宴请，因此茅盾闲来无事，白天就逛书店、逛商店，买了一批二、三十年代的书，整整装了一木箱！茅盾估计飞机一时走不了，并且新疆驻兰州办事处，也是个不于实事、作作样子的地方。自然也解决不了茅盾进新疆的交通工具。所以茅盾便从书店里弄来一本俄语书，让张仲实教俄语。茅盾学得非常认真。

有时，吃过夜饭，没有事，茅盾他们便踩着寸许厚的浮土，去市内观光。走在这兰州街道上，空气中飘来丝丝腥臭味，茅盾他们觉得奇怪，陪同的薛迪畅告诉说，这是兰州城里老百姓用于牛粪烧炕取暖，所以有这腥臭味。

当时兰州唯一有名的景点是它的黄河大桥，这是黄河上第一座铁桥，所以很有名。茅盾他们白天没有事儿时，就去那里观看，并从桥上走到黄河对岸，又沿着对岸的山脚下，朝下游走上百多公尺，再坐羊皮筏子回来。

时间一晃，春节到了，大年三十，招待所经理招待旅客吃年夜饭。春节过后，兰州纷纷扬扬地下起雪来。这时，前天刚来过的老熟人胡公冕来了，他曾在杭州一师当过体育教员，与陈望道是同事，后来做过蒋介石的卫队营长，清党后给个闲职。此时他正在兰州。今天他踏雪来访，也主要是来叙旧。



和茅盾聊了一会儿过去的人和事以后，胡公冕忽然问茅盾：“老兄为何这次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去新疆？”

“是那边发来邀请。”茅盾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说了一遍。

“我接触到的人都说，新疆去不得，那地方很复杂，进去不容易，出来更困难。”胡公冕讲出了自己的看法，说。

“能否具体些？”茅盾希望听得仔细些。不料，胡公冕说：“这是听人家说的，具体也讲不清楚。”

这是茅盾进新疆途中，第一次听到劝进疆要慎重的话。

有一天，西北公路局长到招待所来看望茅盾。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自己也姓沈，并和茅盾的胞弟沈泽民是南京同学。茅盾一听，忙问道：

“真的？和阿二同学？”

因为自泽民牺牲之后，有不少熟人一碰到茅盾，就讲起沈泽民，为他的牺牲而扼腕叹息。不料在西北黄土高原上，也有泽民同学，感慨万端。茅盾一边给沈局长倒茶，一边说：“泽民南京读书时，我也去过你们那个学校，不过我不是读书，我是随一个老先生去南京图书馆查资料编书，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这个沈局长对沈泽民在学校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描绘得有声有色，沈局长是个健谈而且开朗的人，和茅盾、张仲实他们虽然初次见面，就一见如故，更因和茅盾弟弟同学这一层关系，显得更亲近。如此来过几次，沈局长倒成了茅盾、张仲实的常客，沈局长一来，大家就谈笑半天，打发了等飞机的那种寂寞。

有一次，沈局长来了，说到新疆风土人情时，沈局长敛起笑容，郑重地问茅盾：

“沈先生去新疆有把握么？”

茅盾一听，感到愕然。

“你们有把握进去，有把握出来吗？”沈局长以为茅盾没有领悟，又补充道。

“有什么情况吗？”茅盾敏感地问。

“噢，情况倒没有。只是兰州的人都说，新疆自古乃化外之地，从前进去的都是冒险家和亡命徒，不管在那里如何飞黄腾达，最后都葬身异域，没有几个跑回来的。”沈局长说到这里，停了停，又说，“盛世才上台以后，情形一变，把新疆封锁起来，里面准确的消息一点也传不出来，只是听说照样乱得很，你们这样贸然进去，不是太冒险吗？”

茅盾一听，笑道：“杜重远进去三次都出来了，你看过他写的书吗？”

“看过，不过我们这里的人都不相信。”沈局长一脸认真他说。

“以沈局长之见呢？”茅盾问道。

“您至少应该把家眷留在内地，单身前去，这样将来也有个脱身的借口。”沈局长深思熟虑地说。

“谢谢沈局长的好意，我们会留心的。”茅盾一边给沈局长续茶水，一边表示感谢，觉得沈局长还是十分真诚的。

困在兰州的茅盾一家和张仲实、金秉英等都十分焦急。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没有飞机的确切消息。所以，茅盾一度想沿河西走廊进新疆，因为汽车比飞机好找。

又过了十多天，茅盾他们一行终于被告知：有一架从兰州到哈密飞机

可以搭乘。杜重远也来电报，对茅盾他们劝说道，从哈密到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的交通工具容易解决。

2月20日，兰州洁净的天，万里晴空。茅盾一家和张仲实、金秉英及其孩子，登上了翘首盼望已久的飞机。轰鸣中朝西飞去。终于上路了，一颗等待得焦急的心，放下了。忽然，飞机抖动起来，困乏的茅盾，睁开沉重的眼皮，朝舷窗口望去，机翼下是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和沙漠，高低起伏，沙海金浪，十分壮观。山峦低处偶尔看见一、二土堆，那是当地农民的住户。高处是山，一片苍凉和焦黄，仿佛是一幅年代久远的国画，铺展在西北大地，又仿佛是一盘黄沙堆垒的模型。

“沈先生，这是星星峡！”与茅盾他们同机去新疆的新疆土产公司经理，从后座伸过头来，告诉茅盾。茅盾朝机翼下望去，原来是南北走向的山峦中间，有一个豁口，旁边有几间土屋。就这么普通的地方，竟是当时进新疆的唯一通道！

飞机到哈密后，新疆盛世才派来迎接茅盾他们的汽车，也随后到了。茅盾他们对千里迢迢赶来迎接他们的副官，表示感谢，副官笑道，督办和杜院长都非常欢迎沈先生和各位早日到新疆，但路上很辛苦，所以一定要我们照顾好沈先生、张先生。于是，茅盾一行在一个副官陪同下，经鄯善、吐鲁番，穿天山，过达板，于3月11日到达迪化。

茅盾、张仲实即将到达迪化的消息传到盛世才的督办公署，盛世才立刻命令卫队随他出门，郊迎二十里，欢迎口里来的名作家、名教授。身材魁梧、浓眉方脸、留着口髭的盛世才，校服军服外面披着黑色斗篷，在卫队的护卫下，满脸笑容，而又恭谦地欢迎茅盾一行。

茅盾和盛世才握手之后，笑道：“我们来新疆工作，有劳督办亲自迎接，实在不敢当！”

“哪里，哪里！您是文豪，张先生是专家，这次万里迢迢来新疆工作，是我们新疆百姓的荣耀。前几天，重远给我送来一些您的著作，我连夜拜读了，真是了不起啊！”盛世才也一脸和气地寒暄着，仿佛不像一个强悍的军人，而是一个学者官员见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哪里！哪里。”茅盾和张仲实都不约而同地谦让着。

“这次来新疆工作，让你们走了那么多时间，受累了。真对不起啊。”盛世才又说。

“没有什么，对大西北风土，我们还是第一次领略呢，挺新鲜的。”金秉英在旁边插嘴道。引得盛世才和茅盾他们都笑起来。

“沈先生、张先生，外面冷，上车吧。大家上车吧。”盛世才怕茅盾他们站在外面冷，便让进车内。等茅盾他们都上了车，盛世才自己钻进那辆小轿车，在两辆卡车卫兵护卫下，加上茅盾他们两辆车，一路浩浩荡荡地向城里开去。

迪化市内的典型的伊斯兰教的民居和平坦、干燥的马路，墙上那“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民平”的六大政策的标语，把迪化城的气氛营造得欣欣向荣。那种安宁又热烈的气氛，使新来乍到的茅盾、张仲实的原先的疑虑顷刻消掉。

好心好意成泡影，险些送了性命。  
几百个日日夜夜，塞外风云变幻无常；  
传主巧避土皇帝残忍，寻机脱身。  
韬晦。文人的韬晦。

## 第二十章 风雨天山

盛世才热情地亲自把茅盾一家送到早已准备的住宅——迪化南梁一个狭长的大院内，茅盾住在大院坐北朝南的一排平房内，平房有5间，一大4小，有地板。窗户为了御寒，用了双层玻璃窗。盛世才恭恭敬敬地陪茅盾他们进去看了一圈后，指了指一个约三十多岁的军官，对茅盾说：“沈先生有什么事，找这位卢副官长就行。他是专门照顾新疆高级首长的，叫卢毓麟。”

茅盾微笑着，点点头。客气一番，感谢盛世才的周到。

送走盛世才以后，卢毓麟告诉茅盾，督办非常欢迎沈先生的光临，来新疆工作是盛督办六大政策深得人心的体现。最后又说：“生活上，督办已经安排好了，专门给沈先生配了一个厨师，一个工友和一个挑水的伙夫，由他们负责沈先生一家的生活起居。还有什么不方便，请沈先生告诉我。”茅盾一听，忙说：“我还没有给新疆做什么贡献，就给这么高的待遇，不敢当不敢当啊。”

卢毓麟一听，笑道：“沈先生也不必介意。您是厅长一级的首长，就有这样的待遇。我们这里都一样的。”

茅盾也就没有说什么。

“噢，还有件事，明天晚上督办要举行欢迎宴会，欢迎您和张先生的光临。我会派车子来接你们的。”卢毓麟说。

第二天下午，太阳西下，美丽的斜阳，使博格达山峰上的积雪更加雄伟壮丽，茅盾夫妇和张仲实等一行坐着督办公署派来的汽车，直驶督办公署。

督办公署是个威严、神秘的地方，古色古香的大门，此时正门洞开着，进门是一排宽敞的平屋，是督办所属7个处办公的地方，穿过这个大堂屋，是盛世才办公的花厅，是一般很少有人涉足的地方。

不一会儿，到了督办公署。盛世才在门口恭候茅盾他们的到来。并把茅盾他们迎进自己的书房，让他们参观自己的藏书，在书房里，茅盾惊讶地发现盛世才藏书还十分丰实，而且还有不少在上海、香港看不到的马列著作。

随后，省政府的各厅厅长都陆续来了，盛世才以他特有的微笑，把茅盾介绍给前来赴宴的厅长。在宴会上，茅盾见到大革命时代的同事毛泽民，现在改名周彬，担任财政厅长。还有一位双腿自膝盖以下已经截去的教育厅长孟一鸣。后来得知他也是从延安来的，原名徐梦秋，是沈泽民在苏联的同学。这一天，杜重远也特别兴奋，和盛世才他们谈兴甚浓。

事后，盛世才任命茅盾为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张仲实为经济系主任。又让茅盾组织筹备新疆文化协会，并让茅盾担任委员长，张仲实为副委员长。当时盛世才曾非常诚恳地与茅盾谈话：“新疆14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文化促进会，这些文化促进会由教育厅兼管，但又管不过来，所以我早想成立一个全新疆的总的文化协会来统管这些促进会，但一直没有合适人选。现在你们两位光临新疆，又是全国文化界的权威，正好是领导全疆文化建设最理想的人选。”

茅盾表示情况不熟悉，担心开展工作有困难。盛世才笑了，说道：“这点我也替你们想到了，我已经给你们物色个助手，叫李佩珂，让他担个副委员长，兼任秘书长。如何？”

茅盾和张仲实表示赞同，并感谢督办的周到。茅盾末了又说：“关于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和要求，督办有什么指示。”盛世才想了一下，干脆地说：“你们先立个章程，订个一年计划，我想最好能尽快编出一套符合六大政策精神的小学教科书来。”茅盾和张仲实一听，觉得盛世才在这方面的思路非常清晰。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在与毛泽民、孟一鸣等厅长的接触中，茅盾私下向他们打听新疆的真实情况。以便决定自己的工作原则和方针。毛泽民告诉茅盾，盛世才与中共有过协议，但盛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周围有一批亲信。还说，盛世才对中共派来的干部奉为贵宾，但不交心。后来，中共延安方面来的孟一鸣和茅盾私下谈的时候，曾告诫茅盾：“多观察，少说话，多做事，少出风头。”所以，茅盾在新疆期间，孟一鸣成了茅盾的智囊人物，碰到什么问题，都和孟商量。

盛世才是东北辽宁开源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到广东韶关武备学堂任职，曾任教官，科长之微职。其人深谙政治权术。在当科长时曾私下里对其老友赵铁明讲过：“吾必远到边区，另造一个局面，将来或作一东亚红军总司令，亦未可知，不然我就找一老朽长官，假意忠诚，待其死后继承其权利，或认某蒙古王公大人干爸爸，待其死后袭其王公爵位。”后来1930年到新疆，1933年4月12日新疆政变，盛上台，为盛施展抱负提供了一个舞台。并出现不少关于盛世才常胜将军的神话，但当时新疆军阀之中，唯有盛世才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却是事实。执政以后，他在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平息了叛乱，因此，赢得不少人的拥戴。

茅盾来到新疆，盛世才奉为上宾，礼节周到，敬重有加。因此，连“四一二”的所谓“四月革命”六周年庆祝大会，茅盾也在检阅的官员之列。

茅盾一到新疆，热情甚高，除了参加盛世才一些社会活动外，也写了不少歌颂盛世才，歌颂四一二所谓四月革命的文章，同时也应邀去一些单位作演讲。4月12日，茅盾在庆祝四一二大会上，作了抗战形势与新疆建设的讲演，并在《新疆日报》发表《新疆文化发展的展望》一文。5月份，茅盾应新疆妇女协会副委员长的邀请，到女子中学讲《中国新文学运动》，讲演稿后来发表在《新疆日报·女声》第十二期上。5月9日，又到新疆学院讲《五四运动检讨》，讲稿发表在校刊《新芒》杂志上。这时，《新疆日报》副总编找上门来，希望茅盾能到报社去作一次讲演，讲讲自己的创作，像《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推辞不掉，便答应了。同时还答应替《新疆日报》写文章。

茅盾又是写文章，又是讲演，忙得不亦乐乎。不料，这引起了新疆一些人的不快。当孟一鸣把这个消息告诉茅盾时，茅盾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孟一鸣说，“你是新官上任，热情高，到处去讲演，又写文章，又编剧本，可有的人心里却不舒服。”

“可我做的都属文化启蒙工作性质的工作，又没有涉及新疆的政治，究竟触犯着他们什么啦？”茅盾忿忿然地辩解道。“是的，你没有触犯着他们什么。但是，你做的工作反衬出他们的无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从背后向你放冷箭是不足为奇的。不过你还是小心点好。”孟一鸣见茅盾那着急的样

子，笑了，又宽慰道。

“想不到千里迢迢来到新疆，却要同这种小人斗法，实在犯不着，我以后一不讲演，二不写文章。”茅盾向隅冷笑。

“哪里的话，文章还是要写的，你是大作家，一点不写怎么说得过去？”孟一鸣呷了一口茶，敛起笑容，认真地说。

过了一会，茅盾说：“那是气话，您说得极有道理，今后盼多点提醒。”

孟一鸣走后，茅盾觉得新疆并非是一般的什么地方，许多事情引起茅盾深思：一些干部的闪烁其词，一些人的飞扬跋扈，自己讲演写文章，遭到妒嫉，都是极不正常的。但当时盛世才的反共嘴脸还未暴露，对茅盾、张仲实还是礼貌有加，十分周到。暑假来了，本来，茅盾和杜重远他们约好，去新疆伊犁考察，临走时，盛世才把茅盾留下，要茅盾和王宝乾一起，陪英国在中国的总领事去游玩。因此，茅盾陪着总领事游玩了庙儿沟和位于博格达峰的天池。在那里，茅盾领略了新疆地大物博的风情！

在这之前，盛世才把茅盾和张仲实找去，告诉他们，赵丹等一批青年要来新疆工作，向茅盾他们打听赵丹的情况。茅盾觉得自己进疆，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但外界对新疆的情况不了解，想象的成分比较多。所以茅盾并不主张赵丹他们来。因此当盛世才向茅盾他们打听赵丹他们情况时，茅盾说：“我不认识这些人，赵丹好像是个电影演员，其他人大概是演话剧的。这些人都是住惯大城市的艺术家，恐怕过不惯新疆的生活。而且他们来了，除了演戏，也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张仲实也说：“也许他们是凭一时热情，这里的艰苦会吃不消的。”盛世才一听，点点头。又问：“杜院长认识吗？”茅盾和张仲实相互看了一下，说：“大概也不会认识。”

这时，盛世才对茅盾说：“二位讲得有道理，那就麻烦沈先生代拟一封回电，告诉他们这里条件艰苦，劝他们不必来了。”

于是，茅盾拟了个电报，劝赵丹他们，“新疆条件艰苦，要三思而行。”暗示他们不要来。

不料，赵丹他们收到电报以后，又给盛世才发一个电报，表示要为建设新疆贡献自己的一切，再苦再累也不怕。此时，盛世才见这些青年人热情那么高，便不再与茅盾商量，直接复电给赵丹，欢迎来新疆。

所以，茅盾从天池下来，盛世才便告诉茅盾：赵丹他们来了。并要茅盾代表他去看望他们，表示欢迎。

茅盾和夫人孔德沚赶到南梁招待所，见来了一帮人，有四对夫妇，赵丹和叶露茜、徐韬和程畹芬、王为一和俞佩珊、朱今明和陈瑛，以及教音乐的易烈。他们一见茅盾，都十分高兴，那么千里迢迢赶来新疆，见到茅盾分外亲热。当茅盾把自己到新疆来的这段时间观察到的情况向赵丹介绍后，并把第一封电报的背景讲了以后，赵丹后悔莫及！“啊，原来我们以为是客气话呢。”

“盛这个人捉摸不透，非常多疑，你们要谨慎。既然来了，先安心下来，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找机会回去吧。”茅盾像关照小孩似地关照这些热情很高的青年。

在日后的活动和工作中，赵丹他们时常出现“乱子”，引起盛世才的不快。杜重远从伊犁回来后，曾去看望赵丹他们，得知他们要演出没有演员时，拍着胸脯支持赵丹他们，说：“我支援你们，新疆学院的学生，要多少有多

少。”后来演出成功了，也引来非议，认为杜重远在拉势力。冷风吹到杜重远那里，耿直的杜重远咽不下这口气。在一次中秋晚会上，发牢骚，消息立刻传到盛世才那里。有一次，盛与茅盾他们讲完工作后，便找茅盾来查询说：“听说杜院长在茶话会上讲了一些很不妥当的话，说什么在新疆你不能太出风头，太出风头会有人妒嫉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话？”茅盾一听，便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述说了一遍。盛世才说：“尽管如此，客观影响不好，人家来热心工作，怎么能说太出风头不好这种话呢！”

一向谨慎的茅盾一听，觉得不对头，回家后立刻与张仲实商量，并劝杜重远谨慎些。后来，盛世才又在茅盾面前讲起杜重远讲话中的问题。显然杜重远已经被那些“小人”告了，并引起盛世才的注意和不满。

而赵丹他们在演出过程中，也发生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赵丹刚到新疆演出，排演了一部抗日题材的话剧——《故乡》，因原作的背景是在东北，后来演出时，把背景改在无锡一带。据说盛世才很不高兴。

不久，杜重远被软禁了，原来杜的秘书孙某被捕，供出一个所谓阴谋暴动集团，把杜重远以及从内地来的人都牵扯进去了。因此，尽管孟一鸣等中共人士给予茅盾、张仲实他们许多帮助，但盛世才这个虚伪的土皇帝，观看国际风向，一方面不肯放弃苏联对他的援助，另一方面又通过关系积极投靠国民党。所以，新疆的形势从1939年冬开始，急转直下，杜重远冤案的发生，使茅盾、张仲实等如坐针毡，焦虑万分，无法脱身。但当时，盛世才在没有抓到茅盾具体证据时，表面还是非常客气，奉为上宾。本来，茅盾一家想从新疆去苏联，当时也曾经托周恩来、邓颖超带信给在莫斯科的杨之华，希望杨之华能通过关系把他们弄出去。但杨之华也爱莫能助。所以，去苏联的途径断掉以后，茅盾用韬晦之计，小病大养，无所作为等办法，寻找机会离开新疆。杜重远被软禁以后，茅盾、张仲实便辞掉了新疆学院的一切工作。

随着盛世才的伪装逐渐暴露，茅盾越发谨慎，除了文化协会的主要工作外，几乎尽力少和当地一些干部往来，有事和张仲实一起找孟一鸣商量。此时，茅盾在家寂寞地看书，小心地与人交往。他写诗，以排遣那难熬的寂寞：

—

纷飞玉屑到帘拢，  
大地银铺一望中。  
初试爬犁呼女伴：  
阿爹新买玉花骢。

二

晓来试马出南关，  
万树银花照两间。  
昨夜挂枝劳玉手，  
藐姑仙子下天山。

三

博格达山高接天，  
云封雪锁自年年。  
冰川寂寞群仙去，  
瘦骨黄冠灶断烟。

四

四莲雪蛆今何在？

剩有鬻蚊逐队飞。  
三伏月圆湖畔夜，  
高烧篝火御寒威。

1940年4月，茅盾苦苦熬过了一年后，对新疆的政治气氛早已难以忍受，江南已是驾飞草长，桃红柳绿。但新疆依然是一片焦黄，风沙不住地从阿拉山口刮来，城北的红塔山光秃秃的，没有一丝生气。忽然，茅盾收到一份加急电报，是上海二叔沈仲襄发来的，内谓“大嫂已于17号在乌镇去世。丧事已毕。”茅盾一看，泪如泉涌，捶胸顿足，悲痛不已。孔德沚看状，立刻恻哭起来，边哭边数落茅盾：偏偏要到这个地方来，来了回不去。妻子的埋怨，启发了茅盾，他擦干眼泪，冷静地想了想，想到盛世才一向以孝道教人，现在说回去奔丧，他也许会同意（因为当时进出新疆的人，所用交通工具，都要盛世才批准）。果然，当茅盾向盛世才请假回上海时，盛竟一口应承，同时同意茅盾在迪化设帐遥祭母亲的要求，又让卢毓麟去操办。

设帐遥祭之后，盛又设盛宴欢送茅盾一家，并冠冕堂皇地希望茅盾料理母亲后事之后，再来新疆工作。但欢送会之后，盛世才又迟迟没有安排茅盾他们回去，借口说没有飞机。

此时，茅盾把日用东西理好后，寄放在高滔那里，表示自己还要回来。赵丹他们听说茅盾要回去了，已经六神无主。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连赵丹扮演一个丑角，因这个角色的形象和盛世才的岳父的形象酷似，引起盛世才的不满。弄得赵丹他们百口难辩。赵丹他们心情十分沉重，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盛世才加个罪名，打入大牢。因此，他们希望茅盾回去后，尽快将他们弄出去。茅盾答应了，并安慰他们。回去后一定要把新疆的真相告诉世人。

茅盾临走前，又专门去看望软禁中的杜重远，向他表示回去后，尽快把盛的真相、杜的遭遇、告诉重庆的朋友。

1940年5月5日，茅盾一家和张仲实一起飞离迪化。

飞机中途在哈密停了一个晚上。事后才知道，当茅盾他们离开迪化那天夜里，盛世才先后三次给哈密的刘西屏打电话，先要刘扣留茅盾他们。第二次来电话说，先不要动手，让他再考虑一下。后半夜又来第三次电话说：“算了，让他们走吧。”

茅盾终于逃出了盛世才的魔掌。在茅盾离开迪化后不久，杜重远被投入大牢，赵丹他们也遭逮捕，大批共产党员也遭杀戮，盛世才这个土皇帝的伪装也彻底撕去了。

延安欢迎他的到来。感染了他。  
毛泽东与他久别重逢，他希望他到鲁艺去，  
成为一面旗帜。  
他希望成为组织内的人，但成熟的中共想让他留在党外，可以更好地工作。  
来了又要走。  
毛泽东的幽默，一片真诚。

## 第二十一章 延安的阳光

茅盾一家和张仲实终于从新疆飞出来了。1940年5月6日下午3时，飞机徐徐降落在兰州机场。原来打算在兰州过一夜之后，再飞往重庆。谁知刚吃过晚饭，一同从新疆出来的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赶到茅盾他们下榻的招待所，告诉他们，因为傅作义要坐这架飞机去重庆，只好让茅盾迟走几天。实际上把茅盾一家和张仲实半途放掉了。于是茅盾和张仲实商量，决定不去重庆而去向往已久的陕北延安。1940年5月14日，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搭乘青海活佛喜饶嘉措的“专车”，风尘仆仆直奔西安，一路上，虽是5月中旬，进入初夏季节，但却经历了风雪华家岭，翻越六盘山，一路风光尽收眼底，汽车在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原奔驰，“扑入视野的绿色的‘麦浪’和远处一排、一簇傲然耸立的白杨树。他们围绕一口水井或一个死水塘生活。”这种场景，深深地印在茅盾的脑海里。

经过5天的奔波，汽车经过咸阳，到达西安。茅盾一家和张仲实住进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吃过晚饭，茅盾他们意外地去郊外躲了一次警报，目睹了西安人民惊恐之下的生活情状，也品尝了西安一场虚惊的味道，直到晚上12点钟，才一身疲劳地回招待所。

第二天，茅盾他们便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和朱德同志，骤然相见，大家都十分惊喜，周恩来去苏联治伤时，曾路过迪化与茅盾他们见过面，以后就没有音讯，今天突然在这里相见，自然十分惊讶：“沈先生怎么来这里啦？”周恩来又忙将茅盾介绍给朱德同志，茅盾握住朱德同志的手，连连说：“久仰，久仰！”朱德同志那敦厚的形象，给茅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周恩来详细地向茅盾、张仲实了解离开新疆的经过，又打听杜重远的情况。茅盾也敞开心扉，向周恩来说了自己在新疆的种种情况，并希望中共能及时营救杜重远和赵丹他们。周恩来听了茅盾他们的介绍，说：“3月里经过迪化回延安时，我曾向盛世才提出让杜重远搭我们的飞机回内地治病，盛世才没有同意，推托飞机已经满员，说是让杜先生搭下班飞机走。现在你们回来了，杜先生仍未走成，可见盛世才不想让他回内地，这件事现在只好慢慢再想办法。”说到这里，周恩来问茅盾“以后有什么打算？”

“想去延安。”茅盾和张仲实几乎不约而同地回答。周恩来笑了起来，说：“好啊，你们不论是参观还是去工作，我们都欢迎。”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说：“正巧有个好机会，总司令过几天要回延安，你们可以同他一道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也有了保证。”

5月24日，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搭乘总司令的车队，往延安方向去，第二天茅盾和朱德总司令等一起谒拜黄帝陵。茅盾发现朱总司令不仅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而且文学素养很高，又有很好的演说才能。



5月26日下午2时，阳光灿烂。茅盾他们到达延安南郊七里铺时，前面迎接的队伍已簇拥着先到达延安的朱总司令回去了。但几辆小车还停在路边迎候。茅盾从车后面下来时，茅盾夫人却兴奋得像孩子似地朝小车旁边的人奔去，一边兴奋地喊：“闻天，闻天！”茅盾欣喜地看出那个穿灰军装、戴眼镜的高个于是张闻天。茅盾也奔过去，和张闻天紧紧握手。这时，一个身材瘦小的同志走上前来，用上海口音问道：“沈先生还记得我吗？”茅盾觉得面熟，一时却记不起名字。“我就是虹口分店廖陈云”“啊，是你！”茅盾一把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紧接着都笑起来了，笑得那么开心！茅盾从黑暗的中世纪式生活里，来到万里晴空的延安，一股温暖感从胸间漾出，他，回到家了。在欢迎的人群中，茅盾和德沚见到了8年多未见面的弟媳张琴秋。大家百感交集。

茅盾兴奋地在南门外的交际处安顿好后，便去出席晚上举行的欢迎大会。会场设在南门外的广场上，朱总司令充满激情的讲话，不时地被操场上的掌声欢呼打断。茅盾被这热烈的场面感染了，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热烈而质朴的场面：台上挂着两盏汽灯，把简陋的黄土垒成的主席台照得通明，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秩序井然地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他们互相拉着号子，此起彼伏地‘赛’唱歌，有我熟悉的《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也有我第一次听到的《八路军进行曲》。”

到延安的第二天，即5月27日，正在延安女子大学担任教育长的弟媳张琴秋来了。亲人重逢，有说不完的话语，张琴秋建议亚男进女子大学，阿霜进青干校，但儿子阿霜却要进陕北公学。张闻天在百忙之中也来了，当年和茅盾情同手足的张闻天如今已是中央领导。晚上，还在兴奋之中的茅盾又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一组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使茅盾感觉到“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吝啬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就像灵魂洗过一次澡似的”。5月28日，茅盾乘着暖风专程去杨家岭拜访老友张闻天，身材魁梧的张闻天依旧像在上海茅盾家里那样爽朗、热情，睿智的目光里充满友爱和淳朴。两位老友欢聚，谈起了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岁月，也谈起新疆那腥风血雨的日子，也诉说了自己到延安的感受。之后，张闻天问茅盾：“今后作何打算？”

茅盾呷了一口茶，望了一眼窗外明媚的阳光，毫不犹豫地和张闻天表示：“准备在延安长住下去，有机会还想去前线看看”。

“格太好了，太好了。”张闻天一听，笑了，用上海话连连说。从张闻天那口窑洞里出来，茅盾又去拜望毛主席。茅盾和毛泽东早在20年代就在一起共事。毛主席见老朋友来，兴致很高，谈笑风生。茅盾把在新疆的经历和赵丹等人新疆的困境一一作了汇报。毛主席用心听了，并作了指示。过了几天，毛主席到交际处看望茅盾一家，并亲自给茅盾送去一本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老友相聚，其乐融融，一壶茶，一包烟。茅盾抽烟不多，毛主席却一支接一支地抽，一边抽烟，一边谈着文学，那些精辟的见解，使一代文豪为之折服。说着说着，毛主席又关心起茅盾的下一步打算，茅盾告诉他，仍打算搜集些材料，到前线去看看，以便创作。毛主席听了以后，用湖南话爽朗地对茅盾说：“去鲁艺吧，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罢。”茅盾笑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

说得兴致正高时，茅盾夫人已经来请毛主席和茅盾去交际处食堂吃饭。毛主席一边吃饭，一边说笑，手上还夹着烟。在一旁的茅盾夫人便劝主席戒

烟，毛主席幽默地说：“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爽朗的笑声溢满了这黄土高原的窑洞。

后来，茅盾采纳毛主席的意见，搬进了鲁艺。

“鲁艺”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简称。它创建于1938年4月，是毛泽东建议，周恩来、林伯渠、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签名参加发起成立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当茅盾去鲁艺时，院长是吴玉章、副院长是周扬。在老友周扬的精心安排下，鲁艺为茅盾的到来，专门发了公告，并为茅盾准备了两孔窑洞。进城有马，还派一名勤务员照顾茅盾的生活。6月9日下午，鲁艺在该院大礼堂举行两周年校庆，毛泽东、朱德、洛甫、任弼时、康克清等都参加校庆。茅盾和一起从新疆出来的张仲实也应邀前往。会上，茅盾作了讲话，他阐述了抗战文艺理论落后于现实的问题，作家和理论家深入斗争生活问题以及作家批评家之间的联系问题，希望鲁艺真正继承鲁迅精神，努力于创作和批评，以巩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堡垒“鲁艺”。

后来，在周扬同志的邀请下，茅盾又专门为文学系学生讲授《中国市民文学概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中国市民文学的历史嬗变，作了深刻的阐述，深受师生欢迎，可惜当时的讲稿后来在辗转中丢失了。

那个时候，茅盾目睹了延安人民高昂的精神风貌，目睹鲁艺青年朝气蓬勃的生活生产场景，他说：“天不亮，同学们背着草帽，扛着锄头，肃静地沿着沟底的小径，从我的窑洞前经过；而傍晚，当沟底已经黝黑的时候，他们三三两两络绎不绝地回来，在苍茫的暮色中，他们那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歌声和笑语声在两山之间回荡。”这场景深深印在茅盾的脑海里，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素材。

在延安这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茅盾心情舒畅，为解放区的文学大业而奔波着，忙碌着。茅盾住的那口窑洞，灯光时常亮到深夜。当时，延安文学界正开展一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茅盾读过各方面的讨论、反驳、批判文章后，专门写了一篇《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积极参加讨论，纠正某些文章的错误观点，给予正确的指导。与此同时，茅盾还热心扶持青年文学爱好者，修改他们的习作。当时延安有个文学青年叫陈宗凤，写了一篇小说《大概是同志》，写好后，他通过茅盾的儿子沈霜转送茅盾，请茅盾修改。茅盾非常认真，看过以后，专门写了两封长信，详尽地提出具体修改意见。通过帮助修改，茅盾发现延安的一些文学青年，热情很高，但大都不注意炼句，甚至不懂炼句。于是，他专门写了一篇《一点小小的意见》，刊登在萧三、方纪负责的《大众文艺》上，指导延安青年写作。

至于出席各种会议，感受延安清新空气，茅盾也同样十分积极。如：6月21日，延安新哲学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朱德、洛甫都出席了，茅盾、张仲实也被邀请参加；7月14日延安文抗分会专门在俱乐部举行欢迎茶话会，欢迎茅盾、舒群、肖军、孙泱、肖三、胡考等同志；9月8日，《塞上风云》外景拍摄完成后，经延安返回，朱总司令设宴招待，茅盾、丁玲、周扬等都应邀出席作陪；9月20日，延安各界在青年体育场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纪念“九一八”9周年大会，茅盾作为文艺界唯一的代表，被推为主席团成员。这段时间，茅盾虽然十分繁忙，但他的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舒畅。

就在茅盾参加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后没有几天，张闻天到桥儿沟看望茅

盾。张闻天刚坐下，端起茅盾沏好的茶，呷了一口，便拿出一封电报：“雁冰先生，这，你看一下。”茅盾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周恩来从重庆来的电报，为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希望茅盾能到重庆去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周恩来在电报中还认为，茅盾在国统区工作，影响和作用会更大些。

看完电报，茅盾陷入沉思。张闻天知道茅盾舍不得离开延安，便说：“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望了茅盾一眼：“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也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张闻天见茅盾沉默，又补了一句：“你和德沚姐商量商量，过两天再听你的回话。”

“不必商量了，既然那边工作需要，我听从分配，两个孩子就留在这里。”茅盾听了张闻天这番代表组织发自肺腑的话语，一边把电报还给闻天，一边坚毅地说。

“嫂子不放心孩子，也可以留下。”张闻天点点头呷了一口茶说。

这时，在一旁的茅盾夫人立刻接上来说：“不，我同雁冰一起行动，孩子已经大了，托琴秋照顾就行了。”

张闻天一听，笑着道：“嫂子，那样也好，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有照应，孩子留在延安请你们放心，我也会照顾的。”

在送张闻天回去时，茅盾和张闻天肩并肩地沿着沟底走去。路上，茅盾敞开心扉，向张闻天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以便今后可以更直接地接受党的领导。张闻天理解茅盾，答应把茅盾的要求提交中央书记处研究。

不久，茅盾向在延安的朋友——告别后，又到杨家岭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知道茅盾要去重庆，便握住茅盾的手，风趣地说：“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临别延安，茅盾心情十分复杂，他的心已被延安吸住了，但他理智地接受党的安排，把自己想法自觉服从组织的意志。延安的阳光太有吸引力。茅盾已从中共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40年10月10日，鲁艺的学生在门口列队欢送茅盾，齐声高喊：“欢迎茅盾同志下次再来，欢迎茅盾同志下次再来！”欢送声里，茅盾夫妇泪花闪烁，不断地挥手致意。就这样，茅盾夫妇把一双儿女留在延安，怀着无限依恋的心情，随着董必武同志的车队，离开了延安，踏上新的征途。

刚刚来，又要走。  
繁杂的事务，中共暗中保护和安排。  
“皖南事变”，风云变幻。潜离重庆，  
又赴新的战场。

## 第二十二章 雾 重 庆

从10月10日茅盾夫妇随董必武“专车”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宝鸡到重庆，1500公里的路程，车队整整走了一个半月。11月下旬，茅盾他们到达重庆。

此时的山城重庆，已经成为国民党的陪都，许多国民党的达官贵人、鸿贾巨商、文人骚客，都云集重庆，许多国民党中央机关，及在抗战中新冒出来的机关，也都遍布重庆这弹丸之地。起伏的山峦，奔腾的长江，一副不堪重负的情状。冬天的重庆，时常大雾弥漫，把偌大的城市装进这朦胧之中。

茅盾他们在一片浓浓的白雾中，走进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在重庆郊外一个红色的小山上，当地人称它为红岩。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办事处来看望茅盾夫妇。周恩来向茅盾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重庆的情况，同时又对茅盾说：“这次发电报给中央请你来，主要是让你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让你穿件‘官方’外衣，便于工作。”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说：“不过你也不必担心，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发挥你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你可以考虑，大概徐伯听会找你谈的。”

茅盾点点头，说，“好的，我会按照周副主席的要求努力去做好的。”

“编刊物，扩大进步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压迫愈严重，我们愈加要针锋相对地斗争，同时也愈加要讲究斗争艺术，有一些情况，徐冰同志会向你介绍的。”周恩来笑了笑，又认真地交代着。

送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俩，茅盾回到房内，回想起刚才周副主席的话，觉得来重庆的担子还不轻呢。向来对中共充分信赖的茅盾，此时此际，脑际出现和涌动的，是如何做好在重庆的工作，如何做有效的斗争。

过了一会儿，徐冰来告诉茅盾，住房已经找好，就在沈钧儒住的地方，“不过，沈先生不宜直接从这里换到那里，我已经安排好，沈先生可以先到生活书店住几天，过渡一下，然后再换过去。”徐冰未了对茅盾说。

茅盾点点头，客气道：“给周副主席和您添麻烦了。”徐冰连连摆手，“哪里，哪里。”

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两天以后，第三天，茅盾夫妇换到了位于重庆市中心的生活书店门市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

刚安顿好，老朋友邹韬奋、徐伯听便来看望茅盾夫妇。多年不见，在重庆这个地方相见，自然十分欣喜，邹韬奋向茅盾打听杜重远在新疆的处境，也向茅盾打听张仲实在延安的情况。杜、张都是邹韬奋的老朋友。茅盾向他们讲述了新疆的状况，也讲了杜重远的处境。大家都十分气愤。茅盾也向韬奋了解生活书店的状况，邹韬奋大叹苦经，讲了国民党在重庆实行的政治高压政策和扼杀文化的政策，同时，也讲到《文艺阵地》，邹韬奋希望茅盾来重庆后，能为生活书店助一臂之力，茅盾听后一笑，正想回答，徐伯听又接

口道：“我们想把《文艺阵地》从上海搬到重庆出版，请你继续担任主编。”

“适夷一直在编，编得蛮好，何必要我再来插手！”茅盾推辞道。

徐伯听说，“沈先生离开两年多，有些情况你不了解，《文艺阵地》在上海是不能公开发行的，后来国民党借口它未经图书杂志审查会审查，在内地不让发行了。这件事已经拖了半年多了。我们打算在重庆取一张审查证，把刊物迁来；重庆文化人集中，也需要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原来想让楼适夷到重庆来，现在你来到了重庆，《文艺阵地》由你来继续主编，也就顺理成章了。”“既然如此，那就挂个头衔。不过，现在我还有其他事情，你们能不能把适夷从上海召来，仍旧当我的帮手，负责实际的编辑工作？另外，可以组建一个编委会，大家可以商量工作。”茅盾知道此事生活书店和中央有所接触、安排，也就允承下来。邹韬奋和徐伯听一听，都认为这样也可以，便答应了茅盾的要求，同意把适夷召来。

晚上，得知茅盾已到重庆的朋友郭沫若、田汉等人，都来到生活书店楼上来看望茅盾夫妇，因为茅盾刚从两个“热点”地区出来，朋友们便向茅盾打听新疆、延安的一些朋友的情况，茅盾一一向大家介绍延安、新疆的一些经历。田汉还邀请茅盾出席在11月2日召开的一个座谈会，说“沈先生借此可以和在渝的新朋友见面。”

在生活书店楼上住了3天以后，茅盾夫妇又搬到枣子岚垭良庄。这是一栋坐落在小山坡上的小楼，茅盾夫妇搬进去之前，已有3户人家住着，一户是房东，一户是沈钧儒，还有一户是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夫人。在这个住处安顿好后，茅盾即打算把这两年的见闻写出来，不料，忙乱的应酬，竟未能完整地写下去。后来茅盾回忆当时生活时说：“重庆的生活节奏远比延安急速，单单各种社交活动——官方的、半官方的、非官方的，以及私人的集会和会晤，便应接不暇，我常常像‘华威先生’那样写个不停，一天下来，精疲力竭。不过，这些活动多数还是重要的，或者有政治意义，我不得不去的。”

茅盾这里说的，是实话。

搬到枣子岚垭良庄的第二天，茅盾和夫人孔德沚就去天官府街七号参加《戏剧春秋》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在那里，见到了许多新老朋友，除田汉外，还有阳翰笙、老舍、陈望道、洪深、郑伯奇、杜国库、安娥、姚蓬子、胡风等。在会上，茅盾介绍了延安开展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的情况。紧接着，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约见茅盾，和茅盾拉家常，对茅盾母亲的去世表示哀悼，并说，“先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也是旧中国的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使茅盾大为感动，在拉家常中，茅盾感到这位国民党大员“是个有头脑、有识见之人。”

12月4日晚上，陶行知、范长江、吴满真、杨卫玉、沈钧儒及其三公子，沈萧文、沈志远及夫人崔云玉，阎宝航、泮朗等杜重远的一些东北同乡和好友，在一个叫“新陪都”的地方吃“小馆子”，欢迎茅盾夫妇和李公朴。在席间，茅盾回答了杜重远的这些朋友的提问，向大家介绍了杜重远在新疆的一些情况，事后有人评论茅盾当时的姿态：“他的态度的平易、诚恳，与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忠实，不假修饰，不取任何小小俏皮，始终平和、坦白、热情，与家人手足一般情致的流露。”

之后，茅盾和邹韬奋、沈钧儒一起，为营救杜重远而奔波，亲自到周恩来同志公馆，向中共请示办法，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茅盾亲自起草给盛世才的电文，以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沈志远、沈雁冰等人名义发出去，

委婉而又严正地表明态度，并要求引渡杜重远，结果仍遭盛世才的拒绝。

后来，茅盾又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专门和外国进步记者座谈，介绍了杜重远被捕、赵丹他们被捕的一些背景。

茅盾还经常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或中苏文化协会组织的各种集会、讲演。因此，繁忙的社交活动，原先打算写见闻的计划，只开个头，写了《旅途见闻》、《风景谈》之后，就搁浅了。而在繁忙之中，茅盾还要操心《文艺阵地》，徐伯昕告诉茅盾，楼适夷不能来重庆了，但“审查证”已拿来。于是，茅盾又把编委会拉起来，聘了7个人，有叶以群、沙汀、宋之的、章泯、曹靖华、欧阳山等。具体由叶以群负责《文艺阵地》的复刊。叶以群是茅盾在重庆时与周恩来联系的一个联络员。党有什么指示，有什么活动，需要茅盾了解或参加，就由以群来向茅盾传达。茅盾和叶以群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年底，两人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经过紧张的准备，茅盾和叶以群一起把《文艺阵地》6卷1期编就，并于1941年1月10日出版了。复刊的《文艺阵地》，内容丰富、特点鲜明，作者阵容也十分强大，有沙汀的小说《老烟的故事》，有艾青的长诗《玛蒂夫夫人像》，张天翼的论文《论阿Q正传》以及曹靖华、戈宝权的译文，茅盾自己则在复刊的《文艺阵地》上发表了《风景谈》，讴歌陕北根据地人民的动人情景。茅盾这篇散文，笔意洒脱流畅，感情洋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所以当时董必武碰到茅盾，笑着对茅盾说，“你这篇《风景谈》写得很好！那些审查官低能得很，你谈风景，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此后，茅盾接着又针对重庆一股所谓“航空姿态”的浊流，写了一些杂文，如《“时代错误”》，《我的一九四一年》、《谈“中国人真有办法”之类》。不料，正在此时，传来“皖南事变”的消息，情况又急剧变化。1月7日，皖南茂林地区，遵命北移的新四军及军部9000余人，突遭70000国民党军的包围袭击，军长叶挺被俘，大部壮烈牺牲。惨剧发生10天以后，沈钧儒跑到茅盾房间里，关上门，气喘吁吁地说：“刚刚得到消息，国共两党在皖南地区发生冲突，顾祝同把新四军一万人包围并消灭了，叶挺受伤以后被俘。今天老蒋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沈钧儒一口气说完，坐在椅子上，喘着气。茅盾一听，惊呆了，心想，是不是“马日事变”又重演了？

“看来共产党这次吃了大亏。”沈钧儒又说。

“老蒋不打算抗日了，自己一点退路都不留吗？”茅盾缓过神来问。

“是呀，看样子内战又不可避免了。共产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沈钧儒说。

第二天，山城重庆震惊了。各大报都发了为整饬军纪，解散新四军的头条新闻。《新华日报》则开了天窗。天窗上印着周恩来同志的悼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一时，重庆形势骤然紧张，这时，叶以群来告诉茅盾，过两天中央会有应变方针的，周恩来或徐冰会来通知的。

过了几天，徐冰来告诉茅盾，鉴于目前重庆的险恶形势，为防变故，这里的文化人作适当的疏散，一部分留下坚持工作，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去香港。我们初步研究，郭先生留下，你刚从延安来，目标太大，想让你暂时躲避一下。什么时候走，去什么地方，还没有定，想听听你的意见。

茅盾毫不迟疑地说：“我服从工作的需要，去哪里都一样，请你们决定吧。”

“那好，过几天再联系。”徐冰匆匆说完，就起身告辞。“‘这几天，沈先生尽量不要到外面去。’临走，徐冰又关照道。

二月下旬，周恩来把茅盾约到曾家岩40号的小客厅里，对茅盾说：

“很对不起，我刚刚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没想到政局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现在又要请你离开重庆了。这次的目的地是香港。夏衍、范长江、韬奋先生都要到香港去，以群也打算去香港。”说到这里，周恩来停了一下，又说：“孔大姐是不是去延安？这样可以同两个孩子在一起，也免得惦记。怎么去，我们正在组织车队，安全是有保证的。”

茅盾接着表态道：“我没有意见。德沚的事，等我回去问问她，让她自己拿主意。”

这时，在一旁的徐冰对茅盾说：“你恐怕几天之内就要离开家，先搬到郊区一个地方去。戴笠手下的人对你的行踪很注意，为防你突然‘自行失踪’，我们还是早点行动，你在郊区先隐藏一段时间，再离开重庆。这段时间，孔大姐仍旧住在枣子岚垭良庄，照常活动，以迷惑特务们。”

茅盾回家，与夫人孔德沚商量之后，孔德沚决定和茅盾一起去香港。徐冰也同意了。

隔了一天，一个小伙子来到茅盾家，秘密送茅盾到离重庆约20公里的南温泉，住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的房子里，等待出发。茅盾一个人住在那里，面对幽静的环境，清闲的日子便决定继续写“见闻录。”由于酝酿已久，一静下来，立刻文思汹涌，一口气写了6篇，即《兰州杂碎》、《风雪华家岭》、《白杨礼赞》、《西京插曲》、《市场》、《“雾重庆”拾零》。其中《白杨礼赞》成为茅盾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写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在南温泉住了20多天以后，于3月中旬在生活书店程浩飞的护送下，乘汽车离开南温泉，经贵阳、桂林，直奔香港。夫人孔德沚则迟半个月动身去香港。在赴桂林途中，茅盾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写下了《渝桂道中口占》一诗：

存亡关头逆流多，  
森严文网意如何？  
驱车我走天南道，  
万里江山一放歌。

假托拾到一束日记，制出一部《腐蚀》，  
倾倒战时男女；  
办《笔谈》，七期留下雪泥鸿爪；  
史沫特莱的预言；  
在战火纷飞中，中共费尽心血，文化人大转移。

## 第二十三章 再到香港

1941年3月底，茅盾到达香港的第二天，朋友得知消息后，便陆续到旅馆来看望他。第一个来到茅盾下榻的旅馆的是正在香港大学教书的许地山。这位身材魁梧的学者兼作家，见到茅盾十分高兴，他向茅盾了解了重庆的一些情况之后，告诉茅盾说：现在正在主持香港文协的工作，请沈先生多加指导。许地山刚走，萧红和端木蕻良双双来了，萧红是茅盾在上海时的老朋友，此时因患肺结核，正在休养。茅盾关切地询问了萧红的生活和病情，关照端木蕻良和萧红，要抓紧治疗和休养。端木蕻良此时正和周鲸文一起主编《时代文学》，他希望茅盾给他稿子，支持他的工作。茅盾点点头，笑道：“这次恐怕要呆上一段时间了，有稿子自然会给你的。”端木满意地笑了。

隔了一天，正在筹备《华商报》的范长江和夏衍来看望茅盾，并向茅盾约稿。茅盾一听夏衍他们办《华商报》，十分高兴，夏衍告诉说，《华商报》有个副刊“灯塔”，沈先生是否给个稿子，夏衍并把一份“灯塔”的宗旨递给茅盾。茅盾接过那份宗旨一看，上面写道：“内容力求真实与公道，素材力求丰富而隽趣，特别注重正确而生动地反映并批判社会上变动不息的日常事故的短小精悍的短篇杂文，绝对避免一些无关现实的长篇大论。”茅盾把“宗旨”还给夏衍，说：“这个宗旨不错，很有现实性，那么‘灯塔，多少天一期呢？”

夏衍忙接上去说：“每个星期出5期。现在我们这里还缺一个长篇小说，你能否给我们一个连载。”“是啊，有沈先生支持《华商报》，我们有再大的困难也不难了。”范长江也附和道。

茅盾笑了，“莫非你们以为我筐中有一部长篇小说打着埋伏？”

“我们听说沈先生在南温泉时，天天伏案疾书，想来总有可以发表的东西。”夏衍也笑了起来，承认自己已探得情报。

“是写了一点东西，但不是小说，是杂感式的散文，记录这两年在内地的见闻，而且没有写完，只写了一两万字。”茅盾笑过以后，也承认道。

“够了够了。”夏衍一听茅盾手头有这批文章，忙说道：“没有写完也不要紧，可以先登起来，你一边继续往下写。”

茅盾觉得支持《华商报》也是分内事，便说道：“好罢，你后天派人来取稿，我要从头至尾看一遍，再写一个前言。这样，你们就可以用了。”

这时，范长江说：“好，现在我们有二个连载了，邹先生也答应给我们一个连载，题目叫《抗战以来》，《华商报》有了你们两位的鼎力支撑，一定开张大吉，声势夺人！”

茅盾一听邹韬奋也已答应给连载稿子，便问道：“韬奋到香港多久了？”范长江答道：“比你早到半个月，住在九龙，正在筹办《大众生活》。”

夏衍，范长江都满意而归。望着他们的背影，茅盾感慨万端，觉得现在的香港已不同于往日了，变得热闹和活跃起来了。抗战已经成为全民共同的



认识。回到房间，茅盾把已在重庆南温泉时写的几篇，重新看了一遍，又改了几个字。然后又写了一个“弁言”，作为连载时的开头话，在“弁言”中，茅盾感情激愤地揭露国民党文网森严的罪行，又对自己这组《如是我见我闻》文章作了解释和“自嘲”，他说：

“这不是什么游记。”“然则到底是什么呢？说来很简单，就是七零八落的杂记。也许描几笔花草鸟兽，也许画个把人脸，也许讲点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事’，讲点人们如何‘穿’，如何‘吃’，又如何发昏作梦，或者如何傻头傻脑卖力气，——总之；好比是制片厂剪下仍掉的废片，有的一二尺，有的七八尺，没头没脑，毫无联贯，这边几棵树半个窗洞，那边一个人头，或半身或一条腿，只有太天真的孩子才会当一件事去赏鉴猜详。”

“因此，作者的我，未便在此自吹这些七零八落的记述，是什么‘观察’，或什么‘印象’，老实一句话，只是所见所闻的流水帐；不过我自信，闻时既未重听，见时也没有戴眼镜，形诸笔墨，意在存真，故曰《如是我见我闻》。”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副刊创刊，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开始连载，开场除了他写“弁言”外，编者也作了广告：“名作家茅盾先生，年来漫游大西北及新新疆，长征万里，深入民间。……《如是我见我闻》长篇笔记，以其年来随时精密而正确的观察，用充满着爱与力的能笔，作深刻而隽永的叙述。尤其注意的是抗战中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斗争与消长，暴露着黑暗社会孕育着危机与没落，指示出新中华民族的生长与出路。”

这一组共18篇的《如是我见我闻》，一直连载到5月16日。后来结集出版时，改题为《见闻杂记》。因为5月份茅盾又碰到另外一个任务，因而这个《如是我见我闻》只好中断。许多如昆明见闻、新疆见闻、延安见闻等都未能及时写出。

4月的一天，阳光灿烂，风和日丽。茅盾夫人孔德沚也在茅盾到香港半个月后，风尘仆仆地赶到香港，和茅盾团聚。于是，茅盾便从旅馆换到香港半山的坚尼地道寓所。一天，邹韬奋来看望茅盾，并告诉茅盾，他准备办一个像《生活》周刊那样的刊物，亲自主编。并正式来邀请茅盾参加编委会。茅盾一听邹韬奋的打算，十分高兴，忙说：“邹先生气魄很大，这个刊物一定能办好。哎，邹先生办的这个杂志叫什么名字？”

“嗨，你看，我糊涂得连刊物名字都没有向你讲了。”邹韬奋也笑起来。“刊物名称就叫《大众生活》，算是对原来的《生活》周刊的复刊。”

“编委会还有那些人呢？”茅盾点点头问。

“除你之外，还有你的老乡金仲华，有夏衍、千家驹、胡绳、乔冠华。”邹韬奋又说。“今后，我设想，编委会每周开一次会，检讨上一期的得失和确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编委除了自己要写稿外，还要拉稿。不知沈先生以为行否？”

“好的，好的。”茅盾说，“到时开会时，通知一下就行。”

后来，邹韬奋把这些编委全部请去开会，商量《大众生活》出版事宜。会后，邹韬奋向茅盾约稿，希望茅盾给《大众生活》一个可以连载的长篇小说。茅盾答应了邹韬奋的要求。

写什么题材呢？茅盾想到了在重庆听到的一些人和事，也考虑到香港和南洋读者的口味，决定采用日记体来写特务机关的内幕，把在重庆听到的故事放进小说。后来，小说取名《腐蚀》，写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经历与所见所闻，刻画了赵惠明这个青年女特务的复杂性

格，写出了人性中爱与恨、人性与兽性、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的复杂性。

1941年5月，经邹韬奋催促的《腐蚀》开始在新创刊的《大众生活》上连载。茅盾在小说开始时，别出心裁，假托在重庆某公共防空洞的岩壁上发现了“一束断续不全的日记”，日记主人不知为谁，日记中夹有一男一女的两张照片。这个虚构说明，把读者吸引住了，许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写信给茅盾：“《腐蚀》当真是你从防空洞中得到的一册日记吗？赵惠明何以如此粗心，竟把日记遗在防空洞？赵惠明后来下落如何？”小说连载后，还有不少读者给《大众生活》写信，希望茅盾给女特务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后来茅盾觉得读者的要求也有道理，就给她一条出路。不过，解放后，有些读者又批评茅盾：为什么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责问得茅盾啼笑皆非。

1941年10月，上海华夏书店出版了《腐蚀》的单行本，不久传到延安，中共翻印后曾供干部阅读，作为干部的一种必读书，成为茅盾在国内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当《腐蚀》写得差不多时，茅盾又根据中共组织的要求，开始筹办一个小品文刊物——《笔谈》，因港府对刊物登记要求，必须是港绅，所以茅盾和邹韬奋他们一样，也请了曹克安担任名誉社长和督印人，这样，总算办妥了办刊物的手续。到8月中旬《笔谈》创刊号的稿件已齐，茅盾决定在9月1日创刊。

为此，茅盾还写了“征稿简约”，把《笔谈》宗旨和内容要求体现在里面，开宗明义地说：“一，这是个文艺性的综合刊物，半月出版一次，每期约四万字；经常供给的，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庄谐并收，辛甘兼备，也谈天说地，也画龙画狗。也有创作，也有翻译。不敢自诩多么富于营养，但敢保证没有麻醉也没有毒。二，内容如果要分类，则第一，关于游记或地方印象；第二，人物志，以及逸闻轶事；第三，杂感随笔，上下古今，政治社会，各从所好；第四，读书摘论，书报春秋；第五，文艺作品，诗歌，小说，戏曲，报告；第六，时论拔萃。……。”同时，茅盾又找到柳亚子，向柳亚子约稿，柳亚子答应为《笔谈》提供一个专栏文章，连载。于是，《笔谈》专门开了一个以柳亚子居所命名的“羿楼日札”的栏目，由柳亚子先生介绍辛亥革命时的掌故。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同时，茅盾又编又写，受亚子先生的启发，在《笔谈》杂志上开了自己的一个栏目，叫“客座杂忆”，专门介绍1927年大革命时的掌故，十分新鲜有趣。

9月1日，《笔谈》创刊号如期出版发行。出版后，这个茅盾称为“杂拌式”的杂志大受读者青睐，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创刊号就再版了一次。许多名人纷纷为《笔谈》写稿，郭沫若、陈此生、胡绳、于毅夫、张铁生、乔冠华、杨刚、叶以群、戈宝权、胡风、袁水拍、林焕平、骆宾基、凤子、柳无垢、高荒、孙源、胡考、了聪等等，这些朋友的支持，给百忙之中的茅盾留下了时间，茅盾除了写“客座杂忆”之外，写书评，写时论等，成果累累。据统计，《笔谈》从1941年9月创刊，到12月1日终刊，共出版七期，茅盾在这七期《笔谈》里，共发表散文、杂文、书评63篇，在这又编又写中，是何等辛勤呀！

还在写《腐蚀》时，即8月初，传来一个令人扼腕的消息，身高马大的许地山因心脏病而去世了。茅盾在3月底刚来香港时，许地山还来看望过他，相谈甚欢，想不到会突然猝逝！在悲痛之余，茅盾立刻丢下其他工作，写

下了《悼许地山先生》，发表在9月21日《星洲日报·晨星》上，后又写了《国粹与扶箕之迷信——纪念许地山先生》，《论地山的小说》等两篇，以寄托对亡友的思念。

1941年11月初的一天，茅盾家的门突然响起来，传来咚咚咚的叩门声。茅盾开门一看，原来是5年不见的史沫特莱上门来了。茅盾忙把史沫特莱迎进屋，十分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也到香港来了？5年不见，哪里去了？”

史沫特莱端起孔德沚沚的茶，说道：“说来话长。我1936年离开上海去了陕北，抗战爆发后，从延安随朱总司令来到山西八路军总部，作为随军记者多次到前线采访。后来又离开华北到华中，经武汉到江南新四军军部，因身体不好，胃病复发，取道重庆来香港治病。”史沫特莱一口气把经历告诉茅盾，眼神里还流露出一种离开新四军八路军的依恋情愫。

茅盾点点头，关切地问道：“怪不得你这么消瘦，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早来香港了，住在山上一个朋友的家里。这次是要回美国去治病，也想把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所见所闻写成文章，让全世界知道八路军新四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了怎样辉煌的业绩。”史沫特莱依然十分高兴地谈着。“我还准备为朱总司令写一部传记呢。”史沫特莱神秘地笑笑又说。

“那你为什么不在香港写呀？”茅盾希望史沫特莱能在香港住下来。

“不，香港就要发生战争了。”史沫特莱敛起笑容，一脸正经地说：“这次日美谈判不会有结果，也许是个烟幕弹。日美一开战，日本就会进攻香港，而香港顶多守两个月。你也应该离开香港，可以到新加坡去。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的堡垒，他们会死守的。”史沫特莱似乎胸有成竹，而茅盾则将信将疑，因为此时茅盾也在研究国际问题，而尚未看出香港要成为战场的端倪，便说：“我还不能离开香港，我在这里有工作。”

茅盾又向史沫特莱打听一些熟人的情况，史沫特莱则直率地向茅盾这个老朋友谈了自己在陕北，在新四军的看法。茅盾听后，笑而不答。

史沫特莱走后，茅盾一直记着史沫特莱关于香港要发生战争的事，正巧有一次探讨国际问题的聚会，茅盾把史沫特莱的看法说了一下，几个国际问题专家却认为她太武断了，怎能断定日本人进攻香港事在不久呢。

但史沫特莱的看法，却被太平洋战争爆发所证实了。12月8日清晨，日本军队沿广九进攻九龙新界，同时轰炸启德机场。香港已经是一片混乱。《笔谈》只好停刊。叶以群带来中共意见，党将全力安排好茅盾等文化人的撤退工作，保证这些知名人士的人身安全。

于是，茅盾立即得到通知，要求去山下轩尼诗道一所设在三层楼上的跳舞学校集中待命。茅盾夫妇便又忙开了，夫人孔德沚沚则去银行取款和采购“逃难”时所必需的物品，茅盾则去原居所取地下室那两篮书信。结果发现两篮书信已被胆小怕事的房东付之一炬了。

在撤离香港时，茅盾见重病中的萧红住进医院，无法跟着撤退，心情十分沉重。在乱哄哄的日子里，茅盾和一大群文化人在那个跳舞厅里“睡觉、吃饭、躲炮弹”，一呆就是15天。终于在叶以群的陪伴下，带着一本《新旧的全书》，装扮成商人模样，通过秘密管道，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开始了大转移。

“两部鼓吹”的历史幽默，大文豪住进厨房间；  
《霜叶红似二月花》文采斐然，故乡情结的宣泄方式。  
刘百闵自鸣得意，中共早有函来。  
文佳，诗亦佳，向来不作诗的他，在桂林友情风情里，  
诗兴大发。

## 第二十四章 桂林春秋

1942年正月初九，茅盾夫妇换着黑色短衫裤的唐装，成为港商模样，茅盾化名孙家禄，孔德沚化名孙陈氏提着两个小包裹和一只小藤筐，里面除了简单的日用品外，一代文豪只带了一本《新旧约全书》，走进难民潮，消失在暮霜里，偷渡到深圳，在东江游击队的精心安排和保护下，开始长达两个月的大转移。

这次大转移，是中共保护大批文化人而秘密进行的一个重大措施。在转移过程中，东江游击队司令员曾生亲自部署安排，保证成千上万的知名人士，从这条由香港通向桂林的最佳路线上万无一失。茅盾夫妇和其他一批文化人，昼伏夜行，穿行在羊肠小道，爬山涉水，终于在3月9日那天，到达广西桂林。

抗战时期的桂林，一度成为抗战文化的大后方。广西当局在抗战开始后，招揽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到桂林，创办了许多进步刊物，一时桂林成为一个民主空气比较浓厚、文化生活比较活跃的城市。茅盾一到桂林，许多在桂林的朋友立刻到旅馆来看望茅盾夫妇，当中有田汉、欧阳予倩、王鲁彦、孟超、宋云彬、艾芜、司马文森以及先到桂林的夏衍、金仲华等。

朋友们都希望茅盾能在桂林住下来。茅盾笑而不答。觉得在桂林先要观察一下国民党对自己到来的反映、态度。同时，3个月的长途奔波，茅盾觉得也要在这大后方“好好休整一下”。但茅盾夫妇此时正闹“饥荒”，无法在“旅馆”这样的地方居住，必须寻房子，才能在桂林“休整”。于是，茅盾夫人孔德沚开始在桂林到处奔波，结果，一个星期下来，毫无结果。茅盾更是束手无策。邵荃麟知道了茅盾窘境，把自己住的一间厨房清理一下，让出来给茅盾夫妇住。厨房仅8、9个平方米的大小，仅容一桌一床，茅盾夫妇将要在这么个简陋得再也不能简陋的地方，开始他们的“桂林春秋”生涯。

茅盾刚刚安顿好，柳亚子闻讯赶来丽君路南一巷，参观茅盾的住处。走进茅盾夫妇那8、9个平方的房间，带着浓厚的吴江口音，连连叫道“转不开身，转不开身。”茅盾笑道，“这还是邵荃麟先生让出来给我们的呢，否则真要去住马路了。”

柳亚子临走，希望茅盾常去他那里玩，他住在一个仓库似的大厅里，非常宽敞。后来，柳亚子和茅盾常常在一起谈诗谈史，吟诗唱和，成为茅盾在桂林的一个特点。

安顿好住处，茅盾一改以往的做法，即每到一地，就应付各种约稿，赶写短论和杂文。而是采取观望态度，怕写短文授人于柄。但不写文章，经济来源又受影响，妻子在等米下锅。因此，茅盾决定写一个中篇报告文学，把香港战争前前后后的形形色色和花花絮絮写出来，茅盾后来回顾当时创作心境时曾说：“我试图给这个从未经受过战火洗礼的小岛上的芸芸众生在15天战争中的各种面相画一张速写。”

因此，在摆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的桌子上，开始了到桂林后的写作。同时，也开始了他那繁忙的社会活动。4月26日，文协桂林分会召开一个文艺家座谈会，要求提高作家的稿酬和版税，并推举茅盾来主持这个会议。在座谈会上，茅盾报告了保障作家合法权益，争取提高版税和稿费的建议酝酿和提出经过，与会者发言踊跃、热烈。会后，茅盾、田汉、胡风、宋云彬、艾芜等被推为与出版商交涉的成员。

6月15日，茅盾把香港战争前后那段生活已经写出来，并以《劫后拾遗》为题，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许多在桂林的文学朋友，见茅盾这部“虽非真人真事，然而也近于纪实”的作品，已经问世，又来催促茅盾为他们写稿了。茅盾后来还记得，孟超为集美书店编《艺术新丛》向茅盾约稿，凤子编《人世间》也要茅盾供稿，周鸣钢编《种子》文艺月刊，也向茅盾约稿，连像《山水文艺》这样的刊物，也来请茅盾供稿。茅盾似乎被那些约稿者所包围了，而在此时，桂林的天气正是阴雨连绵，湿润的春天的气息，茅盾在这斗室里，更觉得阴晦和无奈，而且前楼宋云彬他们的深夜的牌声、笑骂声，时时来吵扰茅盾宁静的心境，吵得烦而腻，有时茅盾跑上去发了一通火，才算平息一些。但素来颇想得开的茅盾，戏称楼上是“两部鼓吹”即喻为唐代的立部伎和坐部伎，十分形象和生动。茅盾此时为应付稿约，专门写了一组杂文，取题为《雨天杂写》，借古喻今，把秦始皇、汉武帝、姚兴、鸠摩罗什、拿破仑和希特勒、李斯和董仲舒等，嬉笑怒骂，妙趣横生。

6月底的一天，茅盾忽然收到一份请柬，一看，是桂林中国旅行社在乐群社请客，招待在桂林的作家画家。茅盾和夫人孔德沚都在应邀之列。主人是新上任的《旅行杂志》主编孙春台，杂志社请客是约稿，杂志社认为茅盾这几年走南闯北，应该有许多旅行游记可写。茅盾答应写稿。后来，茅盾写了《新疆风土杂记》约8千字，这是茅盾离开新疆后第一篇详细介绍新疆的文章，并从此与《旅行杂志》建立起关系。

写完《劫后拾遗》之后，萦绕在茅盾脑际的长篇又在脑际盘旋。这部长篇是多少年来一直藏在茅盾心底，由于奔波和生活中没有契机，一直没有动笔。在文学生涯和革命社会活动中，茅盾打算史诗般地反映中国从本世纪以来的历史画卷。大革命结束后，茅盾隐居在上海，创作了《蚀》三部曲，把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画卷展示给读者，塑造了一群现代女性形象。从日本回国后，茅盾又创作了《子夜》展现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画卷，刻划了赵伯韬、吴荪甫那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之后，茅盾曾设想把自己熟悉而记忆深刻的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用小说艺术再现出来，以求完整地再现中国社会从20世纪初20、30、40年代的历史。但抗战前的这个宏伟计划，茅盾一直没有实现，仅仅在心里酝酿着、筹划着。现在客居桂林，茅盾觉得计划中的小说，孕育成熟了，尤其在时间上的沉淀，对在世纪初发生在故乡的故人故事，更加明确清晰了。母亲的性格、形象，舅父舅母，表姐表嫂等等许多亲朋故旧的形象、个性及他们的生活习惯，清晰地凸现在茅盾的脑际，于是，茅盾在1942年8月，开始写《霜叶红似二月花》，并在《文艺阵地》上连载，成功地塑造了赵守义、王伯申、黄和光、张婉卿、张恂如和恂少奶奶及钱良材等人物。在茅盾的笔下，书中的不少人物，如婉小姐、钱良材等，“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认不清方向。当革命的浪涛袭来时，他们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茫，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因此，茅盾把这部小说取名为《霜叶红似二月花》。从这部气势恢宏

而又委婉细腻的小说中，我们从其人物中，窥见到作品人物的生活原型，如张婉卿这个果断有远见的女性，取材于作家自己的母亲，再现了其母亲年轻时代的风采。其他如王会悟的影子，都可从其一笔一笔中寻到影子。再从恂少奶奶的举止和性格中，可以见到茅盾那命运多蹇、却善良贤惠美貌的舅母陈宝珠的影子；而钱良材的言行个性，又有点卢表叔在乌镇那一段不甘寂寞、热情奔放的生活的影子。总之，从这部《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我们可以看到茅盾的故乡情结，也看到客居桂林的茅盾内心的风云。

《霜叶红似二月花》原来计划颇宏伟，预计分三部，第一部写“五四”前后，第二部写北伐战争，第三部写大革命失败以后。但茅盾这个史诗般的宏伟计划，后来因为离开桂林未能如愿。从现在出版的《霜叶红似二月花》中只能看到“五四”前后江南城乡新旧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还看不出作者原来的整个写作意图，霜叶还没有红，围绕男主人公钱良材的故事刚刚展开，女主人公张婉卿的性格还有待发展，而另一位女主人公张今觉则尚未登场。

正当茅盾挤在小桌边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时，文化服务社社长，CC系的文化特务刘百闵专程从重庆到桂林。刘百闵邀请茅盾夫妇到乐群社共进午餐，代表国民党中央对茅盾表示慰问，并“恳请”茅盾回到重庆，中央有所借重。茅盾婉拒了刘百闵的邀请，表示手头在写一部小说，走不开。茅盾和其他人如张友渔、沈志远、千家驹、金仲华、梁漱溟等，都觉得重庆国民党方面不可靠。其实，中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一大批文化人从香港解救出来，好不容易聚合到桂林，国民党在香港陷落时，毫无半点关注，置这一大批中华民族宝贵财富于不顾。现在倒好，被中共解救出来以后，他们倒要来“诚恳邀请”了。因此，许多文化人都拒绝了刘百闵的“恳请”。

《霜叶红似二月花》出版后，立即在桂林引起了轰动，《自学》杂志和《读者俱乐部》就联合举行一次座谈会，并给已离桂林的茅盾发去慰问祝贺电：

茅盾先生：

《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在桂出版，同人等特于10月20日举行座谈，共认先生此作，为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除将纪录及摘记分别刊载《自学》杂志及广西日报读者俱乐部外，先电驰贺：并盼早竟全功。此祝笔健。

桂林那沉闷的政治气氛也压得茅盾内心十分孤独郁闷。在和柳亚子唱和时的一首诗，十分代表当时茅盾的心情：

偶遣吟兴到三秋，  
未许闲情赋远游。  
罗带水枯仍系恨，  
剑铓山老岂 愁。  
搏天鹰隼困藩溷，  
拜月狐狸戴冕旒。  
落落人间啼笑寂，  
侧身北望思悠悠。

诗中表达自己对远在延安的一双儿女的思念及自己在桂林那种氛围下的郁闷！当《霜叶红似二月花》发表后，原来熟识的戏剧家熊佛西找到茅盾，

打算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杂志，取名《文学创作》，以充实西南的文艺生活，他自任总编辑，要求茅盾每月提供稿子。茅盾答应了熊佛西的要求。熊佛西见茅盾答应支持，十分高兴，又说“沈先生是小说家，你的长篇已经杀青，能否再为《文学创作》写些短篇小说？”茅盾也爽快地答应了。后来，茅盾专门和柳亚子、田汉等商量，认为支持熊佛西创办大型期刊，比自己挥枪上阵更为有利有效。于是3人共同商定，大力支持熊佛西创办《文学创作》，每月至少写一篇。后来《文学创作》创刊后，茅盾果然不食言，一二三期上都有茅盾新写的短篇小说，第一期上发表了《耶稣之死》，第二期上发表了《列那和吉地》，第三期上发表了《虚惊》，即使后来离开桂林，仍为《文学创作》供稿，如《委屈》、《船上》、《过年》等。并从此和熊佛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天，茅盾忽然收到一份个人画展的请柬，茅盾拆开一看，是一个自称是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会总干事，叫沈逸千的人送来的。茅盾似乎不认识这个人。在一旁的妻子提醒道：“这个人是不是在延安见到过的那个画家呀。”这时，茅盾也想起来，前年离开延安时，在交际处的邻居中，就有这位画家，曾让茅盾观赏过他自己写生的毛泽东、朱德、贺龙的肖像画，还非常热情地替茅盾画了一张肖像，又让茅盾给签字。

过了几天，茅盾去正阳楼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的教室参观沈逸千的画展，都是画家近半年来在滇缅战场以及在青海、宁夏等地旅行所作之新作品。两年不见，沈逸千十分热情，陪茅盾参观讲解之后，又请茅盾到他寓所，并拿出一幅题名《白杨图》的水墨画让茅盾鉴赏。他告诉茅盾，这幅画是读了散文《白杨礼赞》后取其意而画的，茅盾一看，十分高兴。沈逸千又说：“沈先生能否在上面题几个字？”茅盾笑道：“见笑了。”兴致甚高，取笔在这幅白杨图上题道：

北方的佳树，挺立揽斜晖。  
叶叶皆团结，枝枝争上游。  
羞挤楠枋死，甘居榆枣俦。  
丹青留风格，感此倍徘徊。

沈逸千在一旁看了，抚掌致谢，连声说好！说完，又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茅盾在延安时的肖像照片，送给茅盾作个纪念。同时，又希望茅盾写点文章，谈谈对画展的感想。茅盾也爽快地答应了。茅盾后来将此诗收进集子，又作了改动。

茅盾困居斗室，眼看抗战形势，十分思念留在延安的儿女，两年来，可谓日思夜想。当时茅盾曾在这八九个平方的斗室里，写过一首感怀诗，寄托茅盾夫妇对两个孩子的思念：

炎夏忽已尽，金风扇萧瑟。  
渐觉心情移，坐立常咄咄。  
凝望剑钐山，愁肠不可割。  
煎迫讷足论，但悲智能竭。  
桓桓彼多士，引颈向北国。  
双双小儿女，弛书诉契阔。

梦晤如生平，欢笔复呜咽。  
感此倍怆神，但祝健且硕。

茅盾的心向往延安，心系延安。但在桂林，在此地此时，茅盾知道国民党不可能让他去延安。而一直住在桂林的蒋介石派来的刘百闵，十分殷勤地一次又一次往茅盾那里跑，希望茅盾去重庆，并抱怨桂林这地方住房太挤窄。茅盾和他周旋了几个月后，也终于下决心离开桂林去重庆。对于离开桂林去重庆原因，他有一段回忆：

我是经过反复权衡才下的决心。我考虑：从政治环境讲，桂林比重庆较为开放，国民党特务组织顾虑到广西派的实力，还不敢在桂林横行。但桂林毕竟不是香港，它与重庆是五十步与百步，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而从蒋介石遣特使刘百闵来桂林再三请我们去重庆这件事分析，老蒋是想把我们控制起来，置于特务组织的监视之下，日前尚无意向我们挥动屠刀。重庆又是陪都，驻有各国外交使节和新闻机构，蒋介石碍于国际舆论，也不会轻率地对我这位被“请”去的“无党派人士”下毒手。到了重庆我可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中共办事处和恩来同志又近在咫尺，还有郭沫若、老舍、阳翰笙等一大批朋友在那里坚持工作，我可以配合他们。只要注意斗争策略，特务的监视并不能妨碍我的工作。相反，留在桂林，他们倒可以采用秘密绑架的手段把我投入监牢，甚至“就地处置”，然后对外谎称我不听“蒋委员长的劝告”，以至使中央无法保护而遭此厄运。

茅盾的这段心理独自，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同时还有一个因素，即他已得到中共让他去重庆工作的通知：叶以群从重庆来信，要求茅盾去重庆编《文艺阵地》，这个通知，促使茅盾去重庆，而刘百闵则认为自己是游说的成功还沾沾自喜呢。

茅盾要离开桂林了，茅盾心情似乎还在《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情景里，尚不能自拔，在和柳亚子、陈此生一起时，茅盾临别赠诗，他在赠柳亚子诗中，赠人表意，寄寓了自己的情绪和思想：

—

两难啼笑唤荷荷，  
尚有豪情论史么？  
寂寞文坛人寂寞，  
何当买醉一高歌。

二

尚有豪情论史么？  
南明旧事费嗟哦，  
职方如狗满街走，  
剑佩“成仁”奈则那。

三

南明旧事岂虚诬，  
十万倭骑过鉴湖。  
闻道仙霞天设险，



将军高卧拥铜符！

四

鱼龙曼衍夸韬略，  
吞火跳丸寿总戎。  
却忆清凉山下路，  
千红万紫斗春风。

在赠陈此生的一首诗中，也同样寄寓了自己的情感：

岂缘离别故依依，  
但恨重逢未可期。  
刍狗无灵怨圣德，  
木龙有洞且潜居。  
忧时不忍效乡愿，  
论史非为惊陋儒。  
南国人间啼笑寂，  
鸡鸣风雨寸心知。

柳亚子他们知道茅盾要去重庆，便在 11 月 29 日邀茅盾夫妇到月牙山品尝桂林名菜豆腐，并邀田汉夫妇等友人作陪，为茅盾远行饯行。月牙山为桂林名胜之一，紧傍漓江，山上有寺，殿堂筑于山洞中，山前有一素菜馆，卖的豆腐闻名遐迩，被誉为桂林三宝之一。七八个友人一起，品尝滑嫩鲜美的豆腐，远眺笔立的群山，耳听漓江水的喧哗，大家不禁为这几年国事艰难，文网森严以及朋辈聚散无常而感叹，唏嘘。席间，酒过三巡，即兴赋诗赠茅盾。柳亚子放下酒杯，唱道：

远道驰驱入蜀京，  
月牙山下送君行；  
离情别绪浑难说，  
惜少当筵醉巨觥。

茅盾听罢，赶忙起身，抚掌致谢。田汉对茅盾说，他的长子海男也要去重庆，愿和茅盾夫妇同行，路上可以照应。茅盾自然感激不尽。

1942 年 12 月初，茅盾夫妇在田海男的陪伴下，离开桂林去重庆。12 月 23 日，茅盾风尘仆仆地回到两年前秘密离开的重庆。

在桂林这大半年的时间里，茅盾共写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短篇小说《耶稣之死》、《参孙的复仇》、《列那和吉地》以及《劫后拾遗》等杂文、评论 75 篇，共计 50 多万字的作品。

五十初度，重庆一大新闻，人生辉煌。  
与张道藩客客气气，招来误解。  
“昨夜东风来入梦，横塘十里桨声狂。”是  
心愿，是诤语，还是另有所寄。  
人，有幸，有不幸；他的选择是对的。

## 第二十五章 再居重庆

经过颠簸和周折，茅盾再到重庆。

山城重庆和两年前一样，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人如潮涌，衙门林立。黄昏的一层暮霭，把山城重庆遮盖得严严实实，万家灯火，朦朦胧胧，闪闪烁烁，陪都的一片太平景象，似乎闻不到一丝战争的气息。茅盾夫妇为找住房而奔波了几天后，终于在生活书店的帮助下，在重庆郊区唐家沱找到了住房。唐家沱在长江边上，距重庆市中心约30华里，每天有两班轮船进城，当天可以返回。住处是唐家沱天津路一号，这是个二层一栋小楼，楼上住着国讯书店的小伙计，楼下是茅盾夫妇居住。茅盾非常中意这个外有草坪、交通方便但又幽静的地方。但茅盾在唐家沱住下后，国民党特务组织为了监视茅盾，特地在茅盾住处不远的地方搭了个草棚，并摆起了烟摊。因此茅盾自嘲说：“特务机关对我的重视，使我因祸得福；白天，流氓、乞丐不上门；夜间梁上君子也不敢光顾。”

茅盾虽然是受蒋介石的邀请来重庆的，但实际上是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反蒋和抗日活动。为了能在重庆进一步开展工作，茅盾不得不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保持“合作”姿态。茅盾刚刚到重庆时，即1943年1月14日，国民党中宣部为庆祝英美取消不平等条约，另订平等新约而举行文化界茶话会，会上，茅盾应邀出席，并和张道藩见了一面，张道藩一副礼贤的面孔，和茅盾握手寒暄，表示仰慕，大约又过了半个月，刘百闵来看茅盾，并拿出张道藩邀请茅盾赴便宴的请柬。当时茅盾觉得，既然是请吃饭，想必还有其他内容，有必要去一次。于是茅盾便去张道藩公馆赴家宴。

张道藩表面上对茅盾十分热情。那天，他早在门口迎候茅盾了，除了茅盾外，还有刘百闵。席间，张道藩满脸笑容，称赞茅盾应蒋委员长的邀请，率先来到重庆，是有眼光、顾全大局的行动。未了，他说：“你沈先生这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怎能寄居于西南一隅，只有在陪都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能充分发挥先生的才智。”谈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又朗声道：“这次沈先生来重庆，我真的非常高兴，我也代表政府表示欢迎，希望沈先生以后多与我们合作。”说完，一边给茅盾夹菜，一边看着茅盾，等茅盾的反应。

茅盾听完张道藩的恭维，淡淡一笑，“感谢政府对我的器重，也感谢张部长的热情。在桂林时，我也以为到了重庆能多为抗战出力，可是到了这里才知道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我是《文艺阵地》主编，原想到重庆继续编这个刊物，可现在才知道这个杂志出了重庆市就被查扣，无法办下去了。”

“啊，有这等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张道藩故作惊讶，“百闵你知道有这事吗？”

“我也是风闻，似乎社会上传说《文艺阵地》是共产党的刊物，下面一些办事人出于义愤，就乱来了。”刘百闵也顺着张道藩的话说。

张道藩苦笑道：“沈先生你看，真是胡闹，我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沈先生也许不知道，抗战以来，军政警宪，各成系统，我这个管宣传工作的部长想管也管不了啊。不过，近一年来，《文艺阵地》也有点太那个，……。”

“噢，有什么文章不对么？”茅盾听到这里，也故作惊讶，问道。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请吃菜，来来。”刘百闵从边上打圆场。

“哈哈，沈先生，我这个人年青时也向往攀登艺术殿堂，后来阴差阳错当上了这个文化宫，实在力不从心。我觉得艺术家的心都是相通的，为求纯正的真善美，就应该摆脱世俗的偏见。”张道藩打个哈哈，话锋一转，又说道。

机敏的茅盾也不转弯抹角，放下筷子，转脸问道：“张先生这话可有所指？”

“只是泛泛而论。”张道藩说道：“不过，沈先生一到重庆就给《新华日报》写文章，容易引起误会。”

茅盾笑道：“张先生当然知道，我是《新华日报》的老朋友，前几天又是创刊5周年，我能不写文章？”张道藩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先生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们也清楚。只是政府这次请先生来重庆，是希望先生多方面地为抗战文化工作做贡献。”

“当然，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团结的事，我都乐于从命。”茅盾边吃边答道。

“有沈先生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放心了。”张道藩说。

后来，茅盾给由张道藩创办、王进珊主编的《文艺先锋》写了文章；3月18日，又应约到中央文化会堂对张道藩部下作了讲演，题目叫《认识与学习》。后来，又把中篇小说《走上岗位》给《文艺先锋》连载。

对茅盾的这些“合作”，张道藩当然十分高兴，他对茅盾也十分客气，认为茅盾帮了他的忙，给了他面子。自然，在白色恐怖的重庆，那些负责监视茅盾的小特务，见这个架势，看到茅盾，也点头哈腰。但是，令茅盾烦恼的是，因为在表面与张道藩取“合作”态度，引起一些朋友的非议，有些闲言碎语。当叶以群提醒茅盾时，一向心中自有主张的茅盾十分恼火，气呼呼地对叶以群说：“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只能是剑拔弩张呢？我们不是还在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吗？只凭热情去革命是容易的，但革命不是去牺牲，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要我与张道藩翻脸，这很容易，然而我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想当初让我到重庆来，不是要我来拼命，而是要我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尽可能多做些工作。”

叶以群连忙说：“沈先生不必介意，我只是把听到的一些话传给先生听听，没有别的意思。”

“这是我的气话，其实我与张道藩来往，‘合作’，有一定规矩，心里把握着。”茅盾停了一下又说。

“其实，我们都清楚的。”叶以群也笑了。的确，茅盾当时采取这种“合作”态度，事实证明是对的，据萨空了《从香港到新疆》一书披露，1945年6月，萨空了被中统特务绑架囚禁出狱时，中统局长徐恩曾特托人传来话对萨空了说：“人有幸有不幸，你并不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杜重远，他已在迪化被盛世才杀了，勒死的，还用利刃划破了他因勒而膨胀了的肚皮。最幸运的是茅盾，他因为应蒋委员长之召到了重庆，所以不好意思再把他关起来。你现在在这里，只是幸与不幸之间。”可见在白色恐怖下，茅盾的做法

是对的。

在为《文艺先锋》写完《走上岗位》以后，在中苏文化协会主编《苏联文学丛书》的曹靖华找到茅盾，闲谈中把一本巴甫连科的《复仇的火焰》给了茅盾，茅盾一看，是一本英文版小说。希望茅盾能翻译出来。当时在进步作家圈内，懂俄文的人不少，翻译苏联小说，一般都从原文翻译，而不是转译。因此，一时茅盾笑而不答，有些踌躇。但曹靖华认为译品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译者的中外文修养和对作品风格的理解。茅盾被曹靖华说动了，后来竟一口气把《复仇的火焰》翻译出来。从此，茅盾二度重庆中，又多了一项文学活动，并一发而不可收，翻译了不少苏联作品，为中苏友好作了杰出贡献。1943年11月光景，曹靖华又约茅盾翻译格罗斯曼的长篇《人民是不朽的》，后来，在戈宝权的支持下，茅盾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翻译了这个长篇小说，后来收入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学丛书”，由重庆文光书局在1945年6月出版。对这个译作，茅盾极为满意，因为经过戈宝权的校阅，译文与原文“达到极准确的程度”。

茅盾的这些工作，并没有减轻国民党对茅盾的监视。冷清和寂寞，恐怖和压迫，在唐家沱这个地方，茅盾尚可忍受，有时写作起来，又会忘掉一切，忘掉这令人恐怖的世界的存在。但是夫人孔德沚对此难以忍受，加之对一对儿女的思念，她得了神经衰弱症，常常失眠、烦躁、心慌，有时又疑神疑鬼，怕每个人都是特务，任凭茅盾怎样安抚，仍无济于事，有时还向茅盾发一些无名火，扰得茅盾十分烦恼。有一次，作家何其芳、沙汀二位四川作家到茅盾家里拜访，茅盾悄悄地对二位客人说：“请你们在外边给孔德沚找个工作来做，工资由我来付给你们，你们转给她。她在家无聊，会疑心所有的人都是特务，精神失常，折腾得我也不安生。”两位客人听得啼笑皆非。

这时，茅盾收到周扬让人捎来的一封信和一摞稿子。打开一看，原来是在延安的青年严文井的一部长篇小说稿。周扬的信就是向茅盾推荐这部书稿的。“延安来的稿子”，这对茅盾来说，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连忙读原稿，觉得这部小说人物描写生动细腻，文字朴素且委婉多姿。于是茅盾一篇推荐文章，以《光影交织下的知识青年——严文井著（一个人的烦恼）序》为题，作了介绍。先发表在《天下文章》第二卷第三期。因为有茅盾的推荐，并且有茅盾的序言，建国书店便欣然接受并出版。

后来，叶以群创办自强出版社，约茅盾主编一套无名作家丛书，名称叫《新绿丛辑》，并且丛书每本书由茅盾写序。于是茅盾又全副心血扑在丛书看稿选稿上面，先后出版了《脱缰的马》和《遥远的爱》、《没有结局的故事》、《小城风月》，茅盾不仅仔细看稿子，而且还写了序言。于是，扶持无名作者，成了茅盾在重庆的又一个贡献。茅盾从唐家沱进城，又从城里返唐家沱，都必须坐船渡江。时间一长，茅盾感触甚多，曾作诗一首：“南腔北调话家常，眉黛唇红斗靓妆。昨夜东风来入梦，横塘十里桨声狂。”勾勒了战时的另一面。

1944年早春时节，当时重庆响当当的女企业家胡子婴来到唐家沱茅盾家里，向茅盾请教写小说的方法，说要写一部小说。茅盾夫妇和胡子婴是老朋友，孔德沚认为胡子婴是中国妇女界少有的人杰。听说这位“人杰”要写小说，茅盾夫妇都十分意外。不料胡子婴挺认真他讲了她心中酝酿已久的小说题材，她想把民族工商业者在抗战中的苦难经历用小说形式写出来。但她不知道该怎样写。于是，茅盾像辅导小学生一样，把写小说的ABC的东西讲了

一遍，胡子婴也听得十分认真，又觉得十分新鲜。

后来胡子婴把小说初稿写出来后，被茅盾否定了。胡子婴又推倒重写，从5万字扩大到10万字后，小说基本成功了，茅盾夫人又催促茅盾代为修改定稿。此事，茅盾无奈，只好像改作文卷子一样，在胡子婴的原稿上作了细密的文字修饰，并由茅盾推荐给开明书店出版，书名叫《滩》，胡子婴用了个“宋霖”的笔名。当时胡子婴用这个笔名，据说是为了纪念她的母亲。

帮助胡子婴改完小说以后，国内国际局势已发生不少变化，日军作疯狂进攻，重庆这个陪都已是人心惶惶，国民党的一些机关已在作迁都打算。而此时的民主运动却日愈高涨起来，1945年2月22日，重庆文化界郭沫若、茅盾等312人发表了联合宣言——《文化界时局进言》。这个宣言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公开发表之后，在重庆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蒋介石把梁寒操、张道藩骂了一顿后，追查了这件事，发现这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发起的，更是怒不可遏。于3月30日下午悍然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

文化工作委员会解散以后，茅盾等进步文化人的活动更自由、更活跃了。各种座谈会、集会、讨论会应接不暇。写文章也更显露其战斗力了。其中，抗战胜利前夕，为茅盾庆贺五十大寿的活动，更为热闹和更为有影响。

在此前一二年，中共先后为郭沫若、老舍作寿，庆祝他们创作的光辉历程。当时，中共准备为茅盾作寿和搞庆祝活动。1945年春暖花开时，叶以群又专门向茅盾提出作五十大寿的事。起先茅盾谢绝了叶以群等朋友们的好意，表示自己非常看淡此事。但到6月初，徐冰和廖沫沙专程到唐家沱来看望茅盾，并专门和茅盾谈五十周岁祝寿和庆贺创作十五周年的活动事宜，并告诉茅盾，这个活动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为个人祝寿，并不是个人的意思，是对当前民主运动的一个推动。对中共素来向往和信赖的茅盾一听是中共组织上的意思，点头同意了。

茅盾同意后，次日即在《新华日报》登出一则消息：“本年6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五十初度，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正积极筹备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

又过了几天，筹备会发布了通启，兹定于6月24日下午2时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庆祝茶会。

6月24日，茅盾夫妇吃过午饭就从唐家沱赶往城里，赶到会场，五六百位新老朋友把大厅挤得满满的，楼上楼下，厅内厅外，都是人。其中有刚从新疆监狱中死里逃生的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老朋友邵力子，知名人士沈钧儒、柳亚子、马寅初、章伯钧、邓初民、刘清扬、胡子婴等，张道藩也来了。美国新闻处窦爱士、苏联大使馆费德林都来参加盛会，会上，有不少贺词贺幛，其中冯玉祥的贺幛上写着：

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作寿桃，文化战士当大衍，祝君寿过期颐高。

老舍的贺联说：

鸡鸣茅屋听风雨，  
戈盾文章起斗争。

郭沫若的贺词说：

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

庆祝会进行得十分热烈，由沈钧儒主持，柳亚子、费德林、马寅初、冯雪峰等等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茅盾的文德。

会上，重庆正大纺织染厂陈之一先生委托沈钩儒和沙千里，将一张十万元的支票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在热烈的气氛中，茅盾也致了十分感人的答谢词。

同一天，中共决定在《新华日报》上编发纪念专刊，王若飞在上面发表了《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的文章，高度评价茅盾的成就和贡献，肯定了茅盾的方向。他指出：茅盾先生“他所走的方向，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大众解放服务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中国人民应当把茅盾先生 25 年来的成就看成是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中国人民的光荣。”同时又发表了叶圣陶的《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张恨水《一段旅途回忆》、吴组缃《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祝贺》、柳亚子《祝茅盾先生五十双寿》。

在重庆文艺界大张旗鼓地庆祝茅盾五十诞辰时，陕甘宁边区、延安、成都、昆明等文艺界也发贺电或举行庆祝活动。重庆的民主运动，也在茅盾的五十诞辰庆祝活动中，汹涌向前。同时也把茅盾二度重庆生活推向辉煌的高潮。

轰动山城的演出，他被老板们捧为代言人。

爱女青春早逝，夫妇悲恸万分。

夫人深明大义，送子上前线。

他一家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付出了生命的  
代价——沈泽民和沈霞。

## 第二十六章 《清明前后》

1945年的政治风云，似乎变化来得比预料的还要快，还要复杂。国民党的统治也更加黑暗，连民族工业也在这黑暗统治下遭受灭顶之灾，它“不但得不到政府的扶植与支持，相反却在官僚资本的排挤下，在通货膨胀、统制统管、官价反常、成本太高、高利贷盘剥的种种重压下，被抽干了血，不得不减产、停工、关厂，或者被迫把资金转移到做囤积、投机生意，以苟延残喘。”以写《子夜》的深刻性著称的茅盾，对中国社会这些的经济状况，自然有独到的见解，觉得可用艺术形式表现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关系变化。

茅盾在观察这些社会现象，等待落笔的契机。

恰在这时，即1945年清明前后，重庆发生一桩黄金提价泄密案，轰动山城。当时国民党财政部把黄金提价的密令泄露出去，一些要员就乘机抢购，致使在提价前一天的中国、中央两银行售出的黄金总数陡增一倍，立刻舆论哗然。国民党为了搪塞舆论，只得由监察院出面查帐，结果抢购黄金的大户只是退款了事，而那些只买了几十两黄金的银行小职员作了牺牲品。这一事件，又深深地刺激了茅盾的创作欲望。他决定“通过这桩黄金舞弊案，揭示官僚资本及其爪牙的卑劣无耻，民族资本家的挣扎与幻灭，以及安分守己穷困潦倒的小职员又如何变成了替罪羊，从而向读者展示出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战时首都的一幅社会缩影。”茅盾经过反复思索、考虑，决定舍去写小说的长处，把这个素材写成剧本，以求得直接的、集中的、爆发性的影响。为此，茅盾作了认真的准备，写了27000字的大纲，又专门向曹禺、吴祖光请教写剧本方法和技巧。从6月下旬开始，到8月中旬，茅盾写完了五幕《清明前后》文学剧本。

这时，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青年文艺工作者刚从新疆出来，他们受尽磨难，妻离子散，险些送了性命。但他们对艺术的追求仍然很执著，他们一到重庆，就组织了一个“中国艺术剧社”，并决定把茅盾的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作为剧社的第一个戏来上演。并由赵丹导演，王为一、顾而已、秦怡、赵蕴如、孙坚白等主演。

赵丹他们密锣紧鼓地排练《清明前后》时，茅盾时常到现场观看指导。有时天色晚了，便在张家花园文协的宿舍里过夜，和叶以群谈天。

一天，茅盾进城后身体不适，就躺在文协的宿舍里休息，并等夫人孔德沚来接他回唐家沱。叶以群边陪着茅盾，边说些文协里面工作的事。忽然，老友、版画家刘岷夫妇带着5岁的女儿，上楼来看望茅盾。刘岷是刚从延安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所以，一见面，大家都十分高兴，茅盾向刘岷打听延安的情况，刘岷侃侃而谈，他并说，认识沈先生的孩子。说着说着，忽然刘岷喟叹道：“只是沈霞同志牺牲得太可惜了！”

话音刚落，茅盾猛地一怔，忙问：“你说什么？！”

“沈先生，你还不知道？”刘岷见茅盾这副样子，不知所措，讷讷他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听说，你快说，究竟出了什么事？”茅盾心跳加快，从床上坐了起来，气急胸闷，喘不过气来。

刘岷十分尴尬，想开口又不敢开口，眼睛觑着叶以群，向以群求援。

“这是真的，沈霞同志牺牲了，恩来同志叮嘱我们暂时不要告诉您，怕你们过分伤心，弄坏了身体。前一阵您正好又在赶写《清明前后》。”以群只好出来说话，告诉茅盾。

“怎么会死的？出了什么事？”茅盾噙着泪花，压住悲痛，又问。

“据说因为人工流产，手术不慎，出了事故。详细情形我也不清楚。”刘岷讷讷他说。

茅盾的脑子轰地一下，泪水不由自主地潸然而下，不相信这是真的，前一封信中，女儿亚男还在说，“爸、妈，我很高兴，敌人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等得十分心焦的见面日子等到了，我们一定不久就可以见面。”茅盾想着女儿的音容笑貌，流着泪问：“什么时候？”“8月20日。”

“8月20日？”茅盾默默地重复着这个时间。记着这令人心碎的日子。这时，叶以群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沈先生，这是张仲实托人带来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及时交给你。”

其实早在8月25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就登了沈霞牺牲的消息：“本报讯老革命作家茅盾先生之爱女沈霞同志，不幸于本月20日病歿于和平医院。编译局全体同志21日曾举行追悼。只是当时茅盾没有见到。”

茅盾双手颤抖着，接过信，正想抽信纸时，楼下忽然传来夫人孔德沚的声音，茅盾脑海里闪过一念，“现在不能让德沚知道，否则她会受不了的。”于是，茅盾对大家做了个手势，把信放进床底下。不料，孔德沚上来，见客人在，见到刘岷的小女儿，竟开心他说：“看，刘先生这小姑娘多么像亚男小时候，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刘岷一听不妙，连忙把活盆开，寒暄几句，逃也似地走了。

茅盾真的病了，昏沉沉地回到唐家沱，躺在床上，避开德沚，暗自饮泣。第二天早上，孔德沚惊讶地问茅盾：“昨天晚上你怎么啦，做了什么梦？”茅盾诧异地反问：“怎么啦？”“昨夜我觉得你在哭。”茅盾编了个谎：“是做了个梦，梦见小时候，梦见了妈妈。”

第二天，茅盾拖着虚弱的身体，又进城去找徐冰。在周公馆，见到徐冰，徐冰让茅盾坐下后，告诉说：“这件事发生得太意外了，责任完全在我们，是那医生玩忽职守，洛甫同志来电说，已给那医生处分，这件事迟迟没有告诉您，除了怕对你们的打击太大，影响你们的健康，还因为恩来同志想亲自将这不幸的事件告诉你们，向你们道歉。你们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却没有照顾好，可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茅盾一听，感动了，忙道：“请转告恩来同志，我完全能料理好这件事，倘若为我私人的事而分了他的心，那就使我不安了。”

徐冰点点头，“沈太太知道了吗？”

“还没有，我不敢告诉她，今天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您商量的。”茅盾自己想把儿子接来重庆，再告诉德沚的想法向徐冰讲了。徐冰说，“这好办。”

这时，茅盾的《清明前后》于9月26日正式公演，立刻引起广泛注意，越演越火爆，星期天还加演场次，许多在重庆的工厂老板认为茅盾写出了这



些老板的苦衷，大受感动，慷慨解囊，包场子招待本厂职工和工人。10月8日，在重庆的工业家吴梅羹、胡西园、胡光尘等6人，特地招待茅盾和演出人员。吴梅羹说：“我们工业界的人看过《清明前后》后，很多人被感动得流泪。这是因为我们工业界的困难在戏里面讲了出来，全都是真实的。”还有人希望茅盾再写一个《中秋前后》。后来周恩来副主席称赞茅盾时说，“你的笔是犀利的投枪，方向很准呀！什么样式都可以试一试，都可以发挥应有的力量啊！”茅盾说：“我从来没写过戏，真是贻笑大方！”

10月8日，徐冰找到茅盾，告诉茅盾，“重庆会谈即将结束，恩来同志已给延安去电，请他们让您儿子到重庆来，很可能搭乘毛主席回延安的那架回程飞机。”同时，将张琴秋的两封信交给茅盾，其中一封是给恩来同志的，这两封信，是琴秋分别在8月24日和9月19日写的。张琴秋在8月24日的信中，沉痛地向兄嫂写道：

泚姊：

冰哥：

不幸的消息，想必你们已在电报中知道了，希望您俩不要过分地怨伤！这种不幸的遭遇是不可能不使人难过的，是不能不令人惋惜的！我和霜，肖逸都二三日不能进食，不能安睡，后来又想只有更加努力更加保护自己的健康，才对得起已离去我们的阿囡！他们住在我这里，我时时劝他们。泚姊冰哥，希望你们心放宽些！因为现在事情已不能挽回了，您俩身体都不好，希望您们多加注意！

我对不起霞，也对不起您们！因为我没有尽最大的力量去照顾她！您们时常来信，同时我也应该多关顾她，可是这次不幸又发生这种突变啊？！详情除副主席当面和您们说外，以后再告。因时间不容多写。附信及照片及东西请收！

琴秋

八月廿四日

茅盾一边看信，一边潸然泪下，手抖着，又看琴秋给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信这样写道：

副主席：

前接茅盾9月2日来信，并未提及霞死的事，而且还给霞写了信，可见他们尚未得知霞死的消息，现在我将沈霞死的经过情形，详细地向他们写了个信，请副主席看了之后认为妥当适时再交给茅盾他们。因为迟早会把这消息传到他们耳边。我想还是早点据实报告他们为好。不知您觉得怎样？

霞的死，确系鲁子俊的严重错误，由于消毒不严而发生肠杆菌的传染，事后又未及时发觉，如早发觉尚可救，实所痛惜！经检讨后已给鲁子处分并召开会议教育别的医生。

沈霞的爱人肖逸很快去华北工作，沈霜仍在文工团未允许其调动。副主席！在您百忙中还要来麻烦您，真对不起！

敬祝谈判胜利

琴秋

九月十九日

茅盾读完信，泪还顺着脸颊淌下来，沉浸在悲痛中。不久，茅盾又收到张琴秋在这封信中提到的给茅盾的信，这封信比给周副主席的信还早一天，即写于9月18日。在这封信中，张琴秋详细地向茅盾夫妇报告沈霞牺牲的过程。信中写道：

8月份写给你们的信因心情沉痛和仓促的缘故，没有详细地告诉你们霞死的经过，现在我比较能够冷静一点，将经过情形报告您们：

霞怀孕近两月，因为不愿意耽误学习，她决心要把孩子打掉，先要肖逸找我，要我帮忙设法解决，我向肖劝说最好不要打，要霞来我和她商量，在8月13日那天，霞、肖都来我处，我劝霞不要打，我曾向她这样说：“孩子生后送给你妈妈去亦可，或者交给我，由我负责带。”她说：“就算这样，那怀孕期间怎么办呢？根本不能学习，我不干，我在校中见到这样的女同志可多咧，张先生，不要紧，我看见人家手术后只要两个星期就可复原，一点没有什么。”我又说，“这样做，你妈妈一定不赞成。”她说：“嘿！妈妈自己也打过咧，为了我的学习，为了我前途的进步，她不会不赞成我的！……。”这样，我们谈到深夜，劝阻不住的结果，我也同意了，我在什么条件上同意的呢？第一，我尊重她的上进心，她曾比较给我听，牺牲两个星期和9个多月的怀孕时间，长痛不如短痛，这样，我仍可跟上学习，不会掉队，我觉得这理由当然是为了将来的进步；第二，霞和我都觉得平日堕胎不是什么大手术，正常的手续两星期后即可复原，只要手术后将营养搞好些就会恢复得快。在这两个条件下我同意了她去打，没有想到会发生意外，故未事先去电得你们同意。

此地堕胎本来规定甚严，近来因很多人去前方，比较宽一些，我当面托付一位外科手术在此地来说比较好的一位医生，16日早饭后我帮她上马，叫人送她到医院，我替她准备东西——买鸡、买西瓜、红糖等物，同时找房子，以便她一星期后出院住在我附近，可注意搞好营养，17日下午动手术，18日上午我去看她，她告诉我肚子胀痛，胃也不舒服，我（此处原件字迹模糊）了她开水，用热水敷，我问了医生，说“是手术后的反映（应），我们已打了止痛药，”我因为自己要检查病故而回来了，19日是礼拜天，河水涨得大，不能渡河，阿霜来，因水大没法过河去看姐姐，廿日河水仍大，约10时左右，得医院电话，说霞的病重，快请另一位医生过去，等我们回电要他们设法急救，我们再请医生去，谁知把医生请好，骑马又过不得河时，忽又接电话，说急救已无效，而于11时牺牲了，闻此恶讯，我几乎昏过去了，太突然！太意外！后来，我一面派人去叫阿霜、肖逸，一面去电话通报副主席，要请他打电报给您们！因为天气热，不能久停，故于廿一日早晨，我和阿霜、肖逸亲自入殓，把灵柩用大车送至俄校，下午开了追悼会，全体同学莫不悲痛流泪，3时许安葬于俄校山顶上，现正在作墓碑。

霜和肖逸在我家住了五六天以后才回去，我们都很悲痛，但是想到您们听到此噩耗以后会比我们更难过！所以趁副主席去渝的机会，我们三人都草草的写了几个字给您们。大概您们已经看到了。

死后要医生们检查其原因，才知道消毒不严，传染上了肠杆菌，而事后发觉太迟以致急救无效，主持医生都受了处罚。让姊冰哥！霞的不幸遭遇，我要负很大责任，我没有照顾得好，我非常对不起你们！我不知道怎样给您们讲才好！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不幸！过去我父亲死，我不在跟前，泽民死我也不在跟前，只有事后难受，而这次霞的牺牲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最难受的，近来

神经不十分好，睡眠也不太好，最近在乡里休息。霜我常看见，他没病，还健壮，请放心！他仍在文工团。希望您们不要过分难过！事已如此，无法再挽救了，你们身体不十分好，事情又多，千万要注意保重身体！尤其是让姊啊！我当更加注意霜的身体，并勉励霜和肖逸的上进！继承霞的未完成的事业！

你们应该责备我，你们应该批评我，因为我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因此，我心中更觉难受。一方面我痛惜她年青夭折，她这样有为的女孩子，前途是不可限量，特别是她近年来的锻炼，修养得很好，她完全是循着你们希望而前进着，发展着，取得了大家对她的好感！她不该死，应该让我们较老一辈的先死才对呵！另一方面我觉得对你们不起！你们走了，离开了边区，把他们姊妹（弟）俩留在边区，一切都由组织上照顾，此外还有许多朋友的关怀照顾（如副主席、超姐、两位大张先生及其他）但是他们都比较忙，所以在平日他们姊妹（弟）俩的进步和身体健康等问题，我有责任帮助和照顾他们，哪知道出了这样大的岔子？去年霞割痔疮，也是请今年那位医生手术的，事后还是平安无事，谁知道今年会发生这等不幸事呵！总之，我没尽到责。在这点来说，也是使我日夜不安而特别难受的！但求你们不要过分伤心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那我亦会稍安。

日本投降了，整个世界快走向和平、团结、民主的时期，万想不到霞与我们永别了！此地许多同志闻之无不惋惜！可见霞平日之为人也。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馀言再说，敬祝健康

琴秋

九月十八日

茅盾读罢弟媳张琴秋的长信，眼前又浮现出活泼、聪慧的女儿的脸庞，悲从中来，泪滴在信纸上，漫成一片。

10月11日，茅盾接到通知，儿子阿霜12号到达重庆，住在“山上”。茅盾此时也刚刚从住了三年的唐家沱换到城里，即1940年住过的枣子岚垭良庄。第二天傍晚，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的夫人来接茅盾夫妇上山，去接儿子。

茅盾夫妇在薄暮中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在主任钱之光夫妇的陪同下，走进办事处一间小客厅，阿霜和衣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见茅盾他们进来，急忙起来叫道“爸爸”、“妈妈”。德滤一见长得十分健壮的儿子，喜冲冲地奔过去，抱着儿子边端详边叫道，“长高了，也长壮了。”同时问儿子：“亚男呢？你阿姐在那儿？”

阿霜不知道母亲还不知道姐姐去世的消息，一时怔在那里，讷讷地不知道怎样回答。这时，德滤预感到有什么不祥的事发生了，转身扫了大家一眼，发现个个都阴沉着脸。

“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要瞒我！”孔德滤转身对茅盾他们叫道。

“姐姐已经死了。”沈霜讷讷地回答母亲。“死了？怎么会死的？这不可能！”孔德滤依然不相信地叫道。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真的，妈妈，姐姐真的死了，所以让我来重庆。”沈霜说。这时，孔德滤楞了几秒钟，突然号啕恸哭起来。

这时，钱之光夫妇和茅盾都来劝孔德滤。茅盾说：“亚男是没有了，可是还有阿霜，他就在你身边呢。”这时，孔德滤突然悟到什么，抬起泪眼盯

着茅盾：“怪不得好几次夜里发现你在哭，原来你早知道了，为什么你要瞒着我呀！”说着又痛哭起来。

毕竟有一个壮壮实实的儿子在身边，孔德沚和茅盾把悲伤埋在心底。阿霜随父母回到家里后，把在延安临走前张琴秋给茅盾夫妇的一封信交给父亲，并详细地向父母报告了姐姐沈霞牺牲的经过。茅盾拆开琴秋那封信，一看，是10月10日写的，正是阿霜临走时，知道琴秋为霞的事，心力憔悴，十分感动。

面对失去爱女的巨大悲痛，茅盾夫妇又深明大义，同意儿子奔赴前线参加革命的要求，1946年1月12日，夫妇俩送儿子上路，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在周恩来、徐冰的安排下，沈霜被直接派到北平军调处，参加北平《解放三日刊》的编辑工作。

在准备离开重庆前，茅盾积极投身民主政治运动中去，并出面提议成立“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推动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同时，写了《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对8年抗战文艺工作进行探索。后来，茅盾在整理女儿遗物时，在女儿的信中发现这样一段话：“《劫后拾遗》我们已经读到。我自己觉得遗憾的是这里面竟没有谈到我所关心的学生与文化人的情况，在这中间我也找不出什么你们在那时究竟是怎样的一点影子来。”过去，茅盾忽略了这段话，现在，爱女去世了，茅盾觉得过去没有满足女儿的愿望，是个遗憾。因此，茅盾忍着丧女的巨大悲痛，用一个多月时间写出一本三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生活之一页》，忠实、详细地记述了香港战争时期茅盾夫妇的生活。3月16日茅盾夫妇飞抵广州，在广州逗留一段时间后，于4月13日从广州乘佛山轮到香港，住在铜锣湾海景酒店，在香港时，应亲戚柯麟的邀请，专门去澳门散散心，后来从香港坐船启程，于5月26日到达上海，回到阔别8年的第二故乡！

梦寐以求，访苏终于成行。

见到从未见过的亲人，语言不通，只好借字典对话。

畅游苏联各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 第二十七章 访问苏联

1946年5月26日茅盾到达上海时，开明书店的傅彬然、内弟孔另境夫妇和欧阳翠等亲友到码头迎接。欧阳翠特地把自己大陆新村二楼的正房让出来给茅盾夫妇，自己搬到三楼。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茅盾又恢复了以往的繁忙，事后他回忆说：“回到上海的头两个月，几乎天天都忙于接待客人，出席家宴，拜访亲友，参加集会。我只能在晚上挤出时间写文章，而这些文章又是非写不可的。”

这些文章，大都是杂文，从6月15日至10月15日的4个月中，茅盾写了近30篇杂文，如《十五天后能和平吗？》、《美国对华政策》、《下关暴行与人民最后的希望》、《从原子弹演习说起》、《请问这就是“反美”吗？》、《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周报何罪》、《谈平等与自由》、《美丽的梦如何美化了丑恶的现实》、《一年间的认识》、《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等等。刚到上海的文学活动中，茅盾译完了《团的儿子》，又编了《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同时，又写了一些评论和序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肖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一文，文情并茂，文采斐然，他写道：

20多年来，我也颇经历了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即使有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但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这次第三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一看蝴蝶谷这意念，也是无聊的；可资怀念的地方岂止这一处，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边埋葬了悲哀。

这一段至情至美文字，茅盾借为纪念萧红的小说而表达了对女儿沈霞刻骨铭心的爱和忆念。

8月初的一天，苏联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费德林专程从南京来到上海，交给茅盾一封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邀请信，邀请茅盾夫妇访问苏联。后来茅盾亲自去南京办理护照，结果一拖两个月，幸亏沈钧儒从中斡旋，才得以要求在10月份去办护照。在去南京办护照前，茅盾夫妇与赵清阁、凤子、葛一虹、阳翰笙、洪深、陈白尘等8个人，免费去杭州旅游，畅游西湖。茅盾最后的中学时代是在杭州度过的，从中学毕业到现在相隔30多年，弹指一挥间，世事沧桑，西湖依旧，青山依然，茅盾感慨万端。从杭州回到上海后，茅盾便搭周恩来的飞机，去南京办护照。

当时从上海去苏联的途径，最为便捷的路，还是坐船到海参崴，然后再取道西伯利亚到莫斯科。于是茅盾定了这条路线。到11月下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沪代表克留科夫通知茅盾，船12月5日启航。

茅盾赴苏联的行程确定以后，接连应邀赴宴，许多团体和友人，纷纷举行宴会和家宴，欢送茅盾夫妇赴苏访问。11月23日，中苏文化协会为茅盾饯行。24日下午，中华全国文联、剧协、音协、漫协、诗音协、学术联谊会、杂志界联谊会、新出版业联谊会等10个民间文艺团体，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欢送会，郭沫若、马寅初、叶圣陶、熊佛西、潘梓年、侯外庐、许广平、阳翰笙等两百余人，出席欢送会，气氛热烈而亲切。25日晚，苏联总领事哈林夫妇在外白渡桥头的总领事馆设宴为茅盾夫妇饯行。苏方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华代表乌拉索金，驻沪代表克留科夫夫妇，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罗果夫等；中方有外交界宿耆颜惠庆、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的会长黎照寰、沈钧儒、郭沫若夫妇、田汉夫妇、叶圣陶、洪深、阳翰笙、潘梓年、戈宝权、葛一虹、叶以群等。席间，其情浓浓，其意融融。在酒酣兴浓之际，纷纷赋诗唱和，预祝茅盾访苏成功。黎照寰率先赋诗：

滨楼此夜酒千杯，  
为爱人和万意开。  
两国英雄醒复醉！  
醉中同敬特殊才！

接着郭沫若步原韵唱和道：

不辞美酒几倾杯，  
顿觉心花带怒开。  
今日天涯人尽醉，  
澄清总得赖群才！

田汉也唱道：

几度新亭举百杯，  
愁颜偏许对花开。  
何须痛恨张君迈，  
扭转乾坤有霸才！

沈钧儒也唱和道：

一杯一杯复一杯，  
贺君万里旅程开。  
从知领导归文化，  
旋转乾坤仗众才！

叶圣陶也十分激动，唱道：

今宵不惜醉千杯，  
语各相投襟抱开。  
为送雁冰致一语，

幸将慧识发天才！

外交界宿耆颜惠庆老人也十分兴奋，站起来唱道：

红白旨酒满玉杯，  
宾主相对笑颜开。  
敬祝伉俪征万里，  
不愧我国有奇才！

最后，潘梓年站起来唱和道：

文化交流酒满杯，  
中苏合作鸿运开。  
问谁好战追希墨，  
举世人民骂蠢才！

茅盾被这种真诚的感动得泪花闪烁，频频举杯，感谢大家的厚爱和期望。12月3日，茅盾夫妇又到马斯南路中共上海办事处辞行，主任陈家康和茅盾都十分感慨，陈说：“沈先生，这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相见。全面内战已成定局，这一战不打出个结局来，大概不会收场，我们上海办事处已作好撤退的准备，恐怕等不到你们回来我们就要离开。”言辞间不胜感慨。茅盾接着说：“那就预祝我们在人民胜利之日再见吧。”“对，我们总会见面的！”陈家康又说“昨天我凑了几句，算是赠别吧。”说完，递过一首七律，茅盾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满园缙骑残葺草，  
一叶春秋定战和。  
耿耿归心唯玉帛，  
茫茫来日识干戈。  
遥闻新贵朱衣好，  
猛觉苍生菜色多。  
剩有亭林书百卷，  
中原利病再摩挲。

茅盾吟罢，连声致谢。两人握手道别。

1946年12月5日，一清早，朋友们早早来到大陆新村欢送茅盾夫妇访苏，一间屋里挤满了来欢送的人，一些出版社托茅盾带到苏联的书，也早已装箱待运。在谈笑间，苏联领事馆派来的汽车已在楼下鸣叫，他们是专门来接茅盾上船的。这天，阳光灿烂，微风轻拂。江海关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朋友和新闻记者、郭沫若夫妇、叶圣陶、叶以群、臧克家、葛一虹、任钧等友人早早等候在那里，苏联总领事夫妇、罗果夫等朋友也专程来欢送茅盾访苏。

大家见茅盾夫妇的车子来了，便簇拥上前，郭沫若笑容满面地握住茅盾的手，一边示意身边的夫人于立群说：“献花、献花！”把一篮康乃馨鲜花献给茅盾夫妇，人群里立刻爆发出一阵掌声。随后，茅盾和大家一起坐上登陆艇到斯摩尔纳号。一上船，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和茅盾夫妇合影。然后，茅盾送别新闻界朋友，只剩下叶圣陶、郭沫若等好友。这时，大家都默默地坐

在茅盾身边，谁都没有大声说话，怕打破友情的温馨，宁愿默默地沉浸在依依不舍的友情里，郭沫若忽然轻松地说：

“等着吧，也许明年9月联合政府成立，10月里我们就可以组织‘访苏团’一起到苏联去！”

“好的，明年我就同你们‘访苏团’一起回国。”茅盾接着说。

郭沫若轻松的神态，诙谐的话语，一下子，船舱客厅里又活跃起来，大家又都会心地笑了。

这时，忽然有人提议，请郭沫若代表大家送几句话给茅盾夫妇，郭沫若推让一会儿后，见推辞不掉，便提笔写了起来，写完后，又让于立群朗诵：

寒流过去暖流来，今天就和春天一样。这真是多么喜欢的一天，我们在  
这斯摩尔纳号上欢笑得和孩子一样，大家都感觉着自由了！

这不是离别，因为我们的情感永远不会离开。

我们也没有什么临别赠言，因为你就是我们卓越的灵魂的工程师，我们的  
言语都在你们心里。

别了，明年春夏之交的时候，请你们从自由天地更多地地带些温暖回来。

于立群那流利而富有感情的朗诵，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面对这些几十年患难中的朋友，面对这火样的友情，茅盾心潮澎湃，他慢慢地掏出笔，回赠朋友：

离开了这么多的敬爱的师长，虽然我是到温暖自由的天地去，我的心情  
是难过的，我依依不舍，因为你们将在祖国度过阴暗的季节。谢谢我的敬爱的  
师友，为了你们给我的友爱和鼓励。

这时，甲板上传来一阵喧闹，原来，是时代出版社送来几十册玫瑰红封面的小册子，书名叫《欢送茅盾先生访苏唱和诗辑》，是上次在苏联驻沪领事馆欢送会上，黎照寰、郭沫若、田汉等7人的七言诗作。茅盾见书，十分高兴，要求友人签名。郭沫若签名后，忽然诗兴大发，在小册子的扉页上提笔写了一首诗：

乘风万里廓心胸，  
祖国灵魂待铸中。  
明年鸿雁来宾日，  
预卜九州已大同。

这时，汽笛在鸣号，茅盾夫妇一一送别友人。茅盾心里涌起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

船经过5天5夜的航行，12月10日下午抵达海参崴，在海参崴停留两天，住在乞留司金旅馆。13日下午，茅盾夫妇终于登上西去的列车，在整整12天的旅程中，穿越了西伯利亚无穷无尽的平原，饱览了异域风光。

1946年12月25日清晨，茅盾夫妇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下榻一个名叫萨伏伊的旅馆。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和协会东方部主任叶洛菲也夫陪伴和招待。旅途的疲劳，茅盾夫妇洗澡后，便很快进入梦乡。整整睡了一个下午。傍晚时分，红霞映红天边，莫斯科的近黄昏十分壮丽，古朴、雄伟的



俄罗斯建筑，在晚霞里，十分迷人。茅盾夫妇在叶洛菲也夫的陪同下，踏上莫斯科的街道，呼吸着这自由国家的自由空气，心情十分激动，也觉得十分新鲜。多少年来向往的地方，今天总算遂愿，能目睹这个伟大国度的伟大精神。他们来到红场散步，又去参观红场附近的新年临时市场。

第二天，茅盾先去参观高尔基文化公园的“红军战利品展览会”，后又去拜访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凯会长，并转致了郭沫若、曹靖华、戈宝权的问候，凯会长表示要全力安排好茅盾的访问计划。茅盾也向叶洛菲也夫提出，自己有个侄女，在苏联，名叫玛亚，请找来见见面。叶洛菲也夫一听，爽快地同意了。

在12月27日上午参观了列宁博物馆和红军博物馆后，茅盾又去拜访中国驻苏联的大使傅秉常。傅大使后来派秘书胡济邦专门把茅盾夫妇接到大使馆，宴请茅盾夫妇。胡济邦告诉茅盾：“苏联方面对您这次访问很重视，你们到达的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作了广播，第二天《真理报》又发了消息，并且派出叶洛菲也夫这样的高级官员来陪同，这是很少见的。胡济邦的话也引起茅盾的深思。

在莫斯科的几天里，茅盾主要是参观，赴宴会，忙得不亦乐乎。在1947年元旦的上一天，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设宴，介绍茅盾和苏联作家会面，在宴会上，茅盾见到了吉洪诺夫、列昂诺夫、戈尔巴托夫、苏尔科夫等，相见甚欢。在郊外休养的法捷耶夫的代表，也专程赶来，代表法捷耶夫邀请茅盾和夫人参加1月2日苏联作协为欢迎茅盾而举行的茶会。

茅盾在忙碌几天后，迎来了1947年的元旦。茅盾在旅馆休息。中午时分，主任叶洛菲也夫忽然来了，说是来给茅盾拜年，并要送茅盾一件礼物。茅盾正要讲何必客气时，叶洛菲也夫却向外招招手，说了几句俄语，一个中国姑娘走了进来。原来是叶洛菲也夫把玛亚当作礼物给茅盾夫妇送来了。异国他乡遇见亲人，茅盾和夫人都十分激动，孔德沚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一见到玛亚，就哭了起来。20年来思念记挂的亲人，骤然见到，能不激动！孔德沚见到玛亚，想起情同手足的小叔子泽民，也想起牺牲不久的女儿沈霞，也想起情同亲娘的婆婆。孔德沚一边哭，一边抱住玛亚，生怕玛亚会再跑掉似的。茅盾在一边提醒夫人：“玛亚来了，我们进房里去坐吧。”孔德沚才算擦了擦眼泪，拉着侄女进去。这时，叶洛菲也夫告辞了，说让茅盾夫妇和玛亚好好叙叙。

孔德沚拉着玛亚的手，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可是玛亚一句都听不懂，茅盾原想用英语与她交谈，一问，玛亚不懂英语。于是在干着急时，茅盾忽然想起兜里那本俄英字典，茅盾和玛亚通过字典，弄清了一些简单的情况，茅盾知道了玛亚在上大学，学无线电，还没有男朋友等。茅盾也通过字典告诉玛亚，奶奶去世了，曾用俄文给玛亚写过信的姐姐也去世了，哥哥在解放区等。

茅盾夫妇用急切的心情艰难地和玛亚交谈着，开午饭的时间到了，茅盾夫妇留玛亚在旅馆吃饭，玛亚不肯，似乎有什么规定。茅盾夫妇连拖带拉地把玛亚带到餐厅，吃了顿法国大菜。临走，玛亚表示明天带翻译来。茅盾夫妇依依不舍地目送侄女的离去。

第二天一早，玛亚带了张太雷的儿子和刘少奇的儿子来了，他们俩都会中文。因此，茅盾夫妇和侄女玛亚谈了半天，玛亚谈了自己的经历、生活和学习，茅盾夫妇向玛亚讲了沈家的家族，讲了玛亚父亲沈泽民的一生，也讲

了故乡老家的情状。整整交谈了半天，余兴未尽，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茅盾夫妇让他们三个青年人吃午饭，结果三人都坚决不肯，怕违反什么纪律似的。茅盾在莫斯科访问中，了却了这桩私愿——会见玛亚。

元旦过后，茅盾又进行繁忙的参观访问活动，在列宁图书馆、《儿童真理报》编辑部、高尔基博物馆、红十月工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忒列亚考夫画廊等，都留下了茅盾的足迹。茅盾还在苏联友人的陪伴下，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天鹅湖》，对这个芭蕾舞赞不绝口。茅盾被这美妙的音乐、迷人的舞姿和瑰丽的场面所折服了。在一旁的苏联友人告诉茅盾，《天鹅湖》从187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演了整整70年，而每次演出，都场场爆满。

由于莫斯科的天气寒冷，茅盾夫妇不太适应这种寒冷而干燥的气候，尤其是夫人孔德沁，不时感冒。于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东方部主任叶洛菲也夫来和茅盾夫妇商量，决定先去苏联南方高加索的两个加盟共和国参观，即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待天气转暖以后再回莫斯科。

1947年1月16日从莫斯科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车行4昼夜才到达。第比利斯是斯大林的故乡，一到那里，在格鲁吉亚对外文化协会的安排下，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参观了斯大林博物馆、第比利斯电影制片厂、儿童宫、格鲁吉亚国立大学、马恩列斯学院格鲁吉亚分院及斯大林革命活动遗迹——第比利斯地

下印刷所。26日那天下午，茅盾仔细地观看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革命遗址，翻译详细而又绘声绘色地作了介绍，使茅盾在参观中产生许多联想，也更加流连忘返，直到晚6时才离开这个革命遗址。后来，茅盾的这篇散文《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建国以后收进中学教科书，当作范文，作教材使用。

在格鲁吉亚共和国，茅盾除参观外，还参加文化界聚会，看戏和出席音乐会，依然是十分繁忙。

1月29日茅盾到达亚美尼亚访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茅盾夫妇同样受到亚美尼亚对外文化协会的热烈欢迎。茅盾和亚美尼亚共和国艺术家广泛接触，也参观了国立艺术馆，学校科学院等，也拜访了亚美尼亚的教育部长。直到2月2日，茅盾才告别亚美尼亚，又坐火车回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茅盾夫妇又忙于拜访苏联一些知名作家，2月15日，茅盾访问《团的儿子》作者卡达耶夫。茅盾把自己译的中译本《团的儿子》赠送给卡达耶夫。16日，茅盾去拜访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马尔夏克是个老作家，他对中国的情况十分感兴趣，并赠送茅盾一本《马凡陀山歌》。17日，茅盾又去访问西蒙诺夫。19日又访问吉洪诺夫。这些作家的努力和勤奋，都给茅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忙于参观访问时，侄女玛亚又来看望茅盾夫妇，并带了陈昌浩的儿子作翻译。茅盾夫妇兴致勃勃地和玛亚一起上街，拍了几张照片，留下一份温情。

2月22日，中国大使馆举行宴会，对苏联这次邀请茅盾夫妇访问表示感谢，苏联对外文协的朋友和作家艺术家朋友都就应邀赴宴，大家欢聚一堂，畅叙友情和感想。第二天，茅盾夫妇去列宁格勒。在那里，茅盾夫妇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儿童宫、冬宫艺术馆、红旗棉织厂及一些有名的博物馆、图书馆等。4月初又回到莫斯科，叶洛菲也夫见茅盾夫妇精神尚好，就建议茅盾夫妇再去中亚细亚的塔什干和巴库参观。塔什干是乌兹

别克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巴库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茅盾在那里访问也同样受到热烈欢迎。

3月22日，茅盾夫妇从阿塞拜疆又回到莫斯科，等待回国的交通工具，当时到中国最为经济的路线，是取道西伯利亚，坐轮船回上海。但船很少，茅盾回到莫斯科时，“斯摩尔纳号”刚刚开走，因此要等到4月20日才有船去上海。这样，茅盾有几天时间来休整。4月5日，茅盾与中国大使傅先生话别，又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辞行，晚上登上横穿西伯利亚的列车，离开莫斯科。卡拉介诺夫、叶洛菲也夫、史君、胡济邦、玛亚等都来车站送行。茅盾夫妇在苏联访问的这段时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建立了友谊，大家都依依不舍，挥手告别。4月17日到达海参崴，20日上午登上“斯摩尔纳号”轮船。事后茅盾曾回忆说：

“船行5天，没有遇到大风浪。25日下午2时船通过吴淞口，5时驶抵江海关码头的江面，远远望去，只见码头上一大群朋友已在迎候，我激动得呼吸急促起来，又高兴，又惆怅。啊，我回来了，又回来了！”

回到上海以后，茅盾写了大量的介绍、宣传苏联的文章，其中有游记、访问记等，不久，汇集出版了《苏联见闻录》和《杂谈苏联》两本书，记录了他们这次苏联之行的感想和踪迹。

香港挥笔，前所未有的舒畅；  
炮声隆隆，兴奋中北上。  
女婿喜逢又离别，天地永隔，悲从中来；  
为民族、国家，周恩来苦口婆心，力劝他当文化部长；

## 第二十八章 迎接新的曙光

茅盾回到上海，立刻被朋友们所包围，大陆新村的家里，挤满了欢迎茅盾夫妇归来的亲朋好友，戈主权、叶以群、孔另境等等，都围着茅盾，问这问那，茅盾感慨苏联的发展，也感慨苏联作家地位之高，收入之丰。讲得大家咋舌。讲得大家羡慕不已。

4月28日晚上，即茅盾回到上海的第4天，郭沫若在家里邀请20来位文化人，为茅盾夫妇洗尘。郭沫若亲自裁好一块洁白的宣纸，并题上“为茅盾先生及夫人洗尘小集”一行字，作为来宾签名纸。郑振铎、洪深、熊佛西、沈钧儒、廖梦醒、史东山、许广平、陈白尘、叶圣陶、叶以群、戈宝权、田汉、傅彬然、阳翰笙、丁聪等都应邀赴宴。聚餐后，大家又提许多问题，茅盾也向朋友们报告苏联见闻和观感，气氛十分融洽、热烈。之后，茅盾又应邀去各大学和文化团体作访苏讲演，同时，陆续撰写访苏见闻，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章，在茅盾笔底流淌，汨汨而来，半年之内，写了22篇介绍和宣传苏联的文章，成为当时的“苏联专家”。同时，茅盾的《游苏日记》亦在《时代日报》上连载。这时，同乡老友金仲华捧着一本西蒙诺夫的剧本《俄罗斯问题》来找茅盾：“雁冰兄，这个剧本麻烦你赶出来，我的《世界知识》正等着用。”金仲华开门见山地说。

“噢，正好，西蒙诺夫先生我刚刚在苏联会见过。”茅盾爽快地答应了。

“你译一节，我登一节，这又要麻烦老兄了。”金仲华急呼呼地说。

“好、好，金公的吩咐，一定抓紧。”茅盾也笑了。果然，茅盾没有食言，不仅译了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剧本，而且还写了前记、译后记和《K·西蒙诺夫访问记》和《关于 俄罗斯问题 》。

正当茅盾在上海大力宣传苏联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上已开始从防御转入进攻。这年的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了，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同时宣布八项基本政策，这消息，犹似和煦的春风，给茅盾莫大的鼓舞，而茅盾那些充满激情和好感的访苏文章，仿佛在为中国文艺大厦的建设提供一个蓝本。而11月7日发表在《时代日报》上的政论《祝伟大的苏联人民更大更多之成功与胜利》，似乎是站在更高层次，欢呼着新中国的未来。

然而，国民党政府面对江山的失落，人心的丧失，变本加厉地实行白色恐怖。10月26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等3位同学突然被捕，旋即被杀害于狱中，同时，国民党政府以“民盟参加匪方叛乱组织”的罪名，悍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

对此，中共很快有了反应，党决定把茅盾、郭沫若等无党派知名人士陆续转移到解放区去，第一步先去香港，作为过渡，免得他们遭国民党绑架和杀害。中共的这个举措，有力地保护了茅盾等一大批左翼文化人。茅盾依然在叶以群的精心安排下，秘密独自离开上海去香港，妻子孔德沚则留在上海，放出风声，对人说“雁冰去桐乡乌镇了。”半个月后，孔德沚也秘密到了香

港。

1948年元旦，茅盾夫妇是在香港度过的。这次在香港，茅盾没有孤独感。上千的文化知名人士，在中共的安排下，齐聚在这里，大家感到建立新中国曙光已近在眼前，都异常兴奋。尤其使茅盾感到兴奋的是，香港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左翼进步文化人，都可以不必忌讳，敞开心扉，大谈政治。后来回忆那段生活时，他说：

1948年的香港，在我们这些政治流亡者的眼里，又是个小小的自由天地。在报刊上，只要不反对港英当局，不干涉香港事务，你什么都能讲。包括骂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英帝国，元气大损，自顾不暇，对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中立的不介入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在《华商报》上，《文汇报》上大登新华社的电讯，可以大张旗鼓地报道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可以把“国军”直呼为蒋家军队或国民党军队。这样便利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握了半辈子笔杆却始终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来说，真像升入了“天堂”。

这种写作环境以及写作心境，给茅盾提供了十分舒畅的条件。当时因文化人突然涌到香港，一时，这个弹丸之地，人满为患，住房十分紧张，后来在周鸣钢的帮助下，在九龙弥敦道租到了住房。于是茅盾又全身心地投入文艺活动中去，担任了文协香港分会的常务理事。同时，又把《苏联见闻录》写完，接着又写了《杂谈苏联》，后由致用书店出版。

写完《杂谈苏联》以后，茅盾又把在东江游击队保护下脱险经过，写成《脱险杂记》。之后，茅盾又投入相当精力，创作长篇小说《锻炼》，主编《文汇报》副刊《文艺周报》；担任《小说》月刊的编委等。这样，1948年下半年的茅盾，又忙得不可开交。

《锻炼》是茅盾的最后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早在6年前茅盾就有这个设想，打算写一部反映抗战全貌的、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后来在重庆时，曾把部分素材写成《走上岗位》，现在香港有相对安定的生活，茅盾就再发宏愿，写一部连贯五卷的长篇，预计150万字，3年完成。现在茅盾着手写第一部《锻炼》，这部作品以上海八一三战争为背景，写出了各个阶层在抗战初期的心态，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这血与火中经受考验。书中也塑造了苏辛佳等一批出身于知识分子乃至资产阶级家庭的爱国青年形象。也塑造了一批工业家的形象。这部长篇小说在《文汇报》上连载了110天以后，才全部登完。但此时，因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茅盾又面临着新的任务，打算写5部长篇的计划，又落空了，又成为《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二。

接着，茅盾的苏联情结和被不断传来的解放军胜利的消息所鼓舞。写了一篇《春天》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用预言的方式，憧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种种情景。但小说中的苏联情结影响印痕太深，似乎是苏联革命后的场景。这篇小说发表后，在国内似乎反响不大，因为中国广大读者对苏联的感性认识太浅，也想象不出如此这般的情景，相反，国外的反响倒十分敏感，日本文学评论界把《春天》称为茅盾的“幻想小说”。而茅盾后来自己则更正说：它不是我的“幻想”，而是我的“预言”。

当茅盾这个《春天》写完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已得到中共方面的通知，

决定分期分批地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沈钧儒是第一批乘船北上的民主人士；11月下旬，郭沫若等是第二批离开香港的民主人士。等第二批人秘密北上以后，整个香港又似乎冷落起来，茅盾夫妇也似乎焦急起来，翘首盼望北上的日子早日来临。12月下旬，终于得到通知，与李济深、章乃器、邓初民、朱蕴山、卢绪章、洪深、彭泽民、梅龚彬、施复亮、吴茂荪、孙起孟等20多人，于1948年除夕晚上，秘密上了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船。此时此情，大家心情都十分激动，在北上的船上，大家欢度元旦，茅盾在船上过元旦已是多次，最早的1926年元旦，是在上海到广州的醒狮号轮船上，去出席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还有一次是在去香港途中，那时是带着惘然和忧虑的心情去的，而今天则是北上，参加筹备新中国，大局已定，走向光明，几十年来追求的，女儿、胞弟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即将实现了，心情十分激动。茅盾拿出笔记手册，请李济深题词，李济深颌首微笔，提笔在茅盾送过去的手册上题道：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船在万顷碧波的中国大陆东部海面航行，风浪的颠簸，无所畏惧，勇往直前，1949年元月7日，船平稳地驶往大连港，人们都蜂拥到甲板上，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船徐徐拢岸，岸上一大堆欢迎的人群，眼尖的夫人孔德沚兴奋地对茅盾说：“快看，闻天，闻天在迎接我们！”随着夫人的手望去，茅盾也发现了人群中颀长的张闻天的身影，他正挥动双手，向这些来自香港的民族精英致意。茅盾眼眶里噙满了泪花。

中共对这批知名人士十分器重，在大连稍许休息后，立刻组织他们去哈尔滨、小丰满水电站参观，然后送到沈阳。27日那天，沈阳市举行欢迎会，欢迎李济深、茅盾等知名人士抵达沈阳，茅盾作了《打到海南岛》的讲话。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茅盾等更加兴奋。

2月下旬，茅盾等35人终于登上中共中央派来的专列“天津解放号”，满怀喜悦地进京。2月25日，抵达北平。茅盾、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知名人士的到来，在车站受到热烈欢迎，罗荣桓、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将领亲自到车站迎接他们，并接到北京饭店住下。

在北京饭店住了没有几天，一天，儿子沈霜突然出现在茅盾夫妇面前，夫妇俩十分惊喜。原来，沈霜已在《东北日报》工作，知道父母已来北平，便来看望父母。

此时，茅盾夫妇还未见过女婿萧逸，只是通信和照片上见到过。正当茅盾夫妇盼女婿来时，女婿萧逸真的来了，他来拜见从未见过面的岳父岳母，孔德沚见到女婿，想到女儿，立刻哭了起来，茅盾心情也十分伤感，茅盾十分疼爱女儿，见到这位身着解放军服装的英俊女婿，又十分喜欢。在交谈中，茅盾更确切地知道了女儿生前的一些情况，以及牺牲的经过，谈到难过处，萧逸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对爱妻的感情，眼眶里噙满了泪水，萧逸表示希望能留在岳父岳母身边，照顾茅盾夫妇，并打算在岳父的指导下，把自己这几年的战斗生活用小说形式再现出来。

茅盾十分赞许女婿的才华和志向，但同时又替女婿分析了整个国家的形势，鼓励女婿：“你最好是参加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然后再进行创作，这样视野会更开阔，经验会更丰富。”

萧逸含笑点头。听从岳父的指点，愉快地奔赴太原前线。临行，萧逸为

岳父母拍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詎料，这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萧逸告别岳父母后，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六兵团开往山西，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作为记者，萧逸随军采访就可以了。但萧逸直接上前线阵地，参加战斗，英勇无畏。4月15日那天，他站在新占领的水泥碉堡里，参加对敌喊话，不料，敌人诈降，一梭冷枪打来，萧逸光荣地牺牲在阵地上。

萧逸牺牲后的第二天，他的战友张帆把他的遗物和照片寄给茅盾，茅盾夫妇得到这个噩耗，又大哭一场。茅盾内心觉得更加难过，感到自己没有保护好他而悔恨万分！

在萧逸牺牲后17天的5月2日，茅盾给张帆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欲掩还露的悲痛心情：

张帆先生：

4月16日来信收到了。感谢你不怕麻烦，把萧逸为我们拍的照片寄来。萧逸此番在前线牺牲，太出意外，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一有为的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张帆（恕我直呼大名），我想你也和我一样，觉得萧逸如果死后有知，一定也恨恨不已，因为他不是死在总攻时的炮火下，而死在敌人假投降的诈谋中。正如昔年小女沈霞为鲁莽之医生所误，同样的死不瞑目罢？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成愤怒，但萧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萧逸的朋友在此间者都来看我，这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你的来信也同样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感动的心情你当然了解，至于安慰则是代萧逸感到安慰。一个人死后，有他的战友来悼念他，他在地下一定感到安慰的！我和你虽然不识面，但我觉得我们好像相知已久，朋友，为国珍重，为贵志而没的您的战友珍重！日来事冗，恕不多谈。顺祝健康

茅盾上  
5月2日北平

茅盾写完信，把悲痛深埋在心底，泪水往肚里咽，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国文化大厦的建设，迎接新中国的曙光里。在工作中忘却家庭中的烦恼，忘却失去爱女爱婿的创痛，他和郭沫若、周扬等一起，把来自新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筹备全国性的文艺家组织。与此同时，茅盾于5月22日和30日，两次主持《文艺报》（试刊）主办的座谈会，听取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茅盾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当选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也同时成立（即中国作协前身），茅盾当选为主席。担起全国文艺领导工作的重担。

同时，茅盾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建国大业尽心尽力。9月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调会议共同纲领》。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调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调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决定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会议选举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180人，毛泽东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茅盾被推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新中国的曙光已经照耀中国大地，面对这

曙光，茅盾内心十分兴奋和激动，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时，他曾激昂地说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揭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统治从此结束。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像初升的太阳照耀着亚洲、照耀着世界”。

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受命组阁新中国首届政府，便动员茅盾出任文化部长。当时，茅盾婉言推辞，说自己不会做官，打算继续他的创作生涯。后来，毛泽东亲自出面，找茅盾谈话，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茅盾举荐郭沫若：“那为何不请郭老担任？”毛泽东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文化部长，别人更有意见了。”又说：“听说你不愿做官，这好解决，你可以挂个名，我们给你配备个得力的助手，实际工作由他去做。”这样，茅盾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有同意了。

新中国的曙光，普照中华大地。茅盾是沐浴在这曙光里，走进新中国的。



对电影《腐蚀》的禁映，保持沉默；再版时不改一字。  
春夏秋冬，他竭尽全力扶持新人，关注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保护文物，弘扬国粹，为后人添砖加瓦。  
一部《夜读偶记》，见大国文化部长的功底，任后人评说。

## 第二十九章 文化部长

还在毛泽东、周恩来动员茅盾担任文化部长时，茅盾已在为繁荣中国文化事业而操心了。茅盾当选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后，为创办《人民文学》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请求毛主席为《人民文学》题词和写刊头。9月23日，毛泽东回了一信，信中说：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9月23日

题词写在另一笺宣纸上：

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毛泽东的鼓励，茅盾自然更加兴奋。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茅盾夫妇接到通知，出席天安门的开国大典。礼炮声、欢呼声，响彻天安门广场。毛泽东那宏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久久回荡在广场上空，欢声雷动。茅盾夫妇也沉浸在这喜悦之中，噙着泪花，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可以告慰早逝的女儿、女婿和胞弟了。

开国典礼后，茅盾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长，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新中国文化部于1949年11月2日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从此，茅盾开始他那长达15年的筚路蓝缕，殚精竭虑的文化部长生涯。

天下底定，新中国开创之初，国民党留下的一个千孔百疮的旧中国。许多工作已是到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程度。文化工作方面也同样，茅盾和他的同事，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同时，开国之初那种热火朝天的干劲，也深深地感染着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她见许多女同志都走上革命工作岗位，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显身手，羡慕不已。一次，她见到周恩来总理，当面要求工作。周恩来听了以后，点点头，沉吟一会儿，认真地对她说：“好，我给您安排一个对您最重要也是最合适的工作——照顾好茅盾同志。他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今后要他为新中国描蓝图，为新中国作出新贡献。您要好好照顾他，这是党交给您的任务，这比您做任何工作都重要！”

在一旁的茅盾听了以后，谦虚地笑了一笑。孔德沚却认真地记住了总理交给的任务。从此，她再也没有向组织提出要求工作。牢记周总理的嘱托，新中国的部长夫人，依旧保持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作风，亲自上菜场买菜，

她一边料理家务，一边带孙女、孙子，毫无怨言地过着平民生活，竭尽全力照顾茅盾，让茅盾全心身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大业中去。

但是，新中国的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并非想象和凭热情能够做好的。前进的路上，还有风风雨雨，还有霜和雪，有春天，也有寒冬。茅盾，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化部长，总是兢兢业业地为构建这个共和国的文艺大厦，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劳和怨，委屈和代人受过。

解放了，许多艺术家的积极性非常高涨。1950年元旦刚过，剧作家柯灵、导演黄佐临来拜访茅盾，他们打算把《腐蚀》改编成电影，想征求茅盾意见。茅盾的小说改编成电影，30年代夏衍将《春蚕》改编后，还没有拍摄过，茅盾听了改编者柯灵的想法后，欣然同意了。

1950年6月25日，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茅盾和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击美帝。11月16日，茅盾和丁玲等145名文艺界人士联名发表《在京文艺工作者宣言》，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积极动员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斗争。

这时，上半年柯灵来谈过的电影《腐蚀》已由香港文华公司拍成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映，观众踊跃，盛况空前。然而，刚刚热闹一阵子，忽又风闻这个影片禁映了。而且作为文化部长的作者茅盾，不知此事。柯灵去打听，答复是这个影片有问题，认为特务应该憎恨，而《腐蚀》这个特务女主角却让人同情。

当茅盾得知这情况后，却保持沉默，没有当场表态，他知道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中，这种情况出现，恐怕是意料之中的，只是降在茅盾头上，有些意外，感到不公正。但他心里却有个尺码在衡量着社会是非标准。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茅盾自有准则，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所以，停映《腐蚀》事件发生两年后，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腐蚀》时，出版社征求茅盾意见，是否需要修改，茅盾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作任何修改”。实际上，这是茅盾公开表明对《腐蚀》电影停映的态度。

《腐蚀》电影的停映，并未影响茅盾的工作热情，作为文化部长，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茅盾心里天平上，总是放在第一的。1951年1月8日，茅盾欣然出席中央文学研究所大会并讲话，建立新中国第一个培养自己作家的摇篮。3月的北京，正是风的季节，茅盾刚刚出席“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开幕典礼，以文化部长的身份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紧接着，又欣然担任开明版“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的主编，为五四以后的文化积累，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建设提供一个借鉴。

文化部的工作千头万绪，牵涉方方面面，这对办事向来一丝不苟的茅盾，真是忙得团团转。1950年上任伊始，茅盾以文化部长的身份，前往北京团城参观“虢季子白盘”特展，并向捐赠者刘肃曾颁发奖状。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保护文物的任务十分繁重，茅盾十分注重祖国文物遗产的保护。1951年5、6月里，茅盾先是出面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参观在北京的敦煌文物展览，之后，又出席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嘉奖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为文物保护倾注了一腔热血。在文化部内专门设立国家文物局，在好友郑振铎先生的主持下，取得斐然的成绩，防止文物流失，保护文物方面，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文化部长，做好群众文化工作，茅盾也是不遗余力。中国一方面老

百姓的文化素质不高，文盲半文盲的占大多数，尤其是农村，文化生活更是枯燥；另一方面，中共创立的解放区或根据地，对群众文化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好办法。因此，茅盾在新中国的文化工作中，把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放在共和国文化部长的议事日程上，从其简略的“年谱”看，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时候，群众文化工作始终没有放松。1949年11月2日文化部成立后第三天即11月4日，茅盾就出席欢送出国文工团的宴会，并发表讲话。1958年，作为一个63岁的老人，茅盾赴东北调查访问。在沈阳，茅盾出席青年业余作者大会，并作报告；他又深入哈尔滨工人中间，与工人文学小组进行座谈，在哈尔滨第一工具厂，茅盾为工人中的“萌芽”文学小组题词：“前年萌芽，去年开花，今年结果，在党的阳光照射之下，在厂党委的辛勤培养之下，萌芽将在全厂广播种子。”东北调查回来，茅盾在文化部部务会议上作了《文化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发言。1959年3月，茅盾写诗祝贺内蒙草原上的赛诗会。尽管这种做法实践行不通，违反艺术规律的，但在当时形势下，牧民中有此努力，茅盾仍然感到十分欣慰。对普及牧民的文化，还是有裨益的。1960年6月1日，中央及时召开了全国文教群英会，推动群众文化的普及工作，茅盾在群英会上作了《不断革命，争取文化艺术工作的持续跃进》的专题报告，继续为文化的普及工作鼓与呼。1959年1月，作家出版社将茅盾在建国后十年间写的评论、言论收集成一册，题书名为《鼓吹集》，茅盾在书的后记中，对书名作这样的解释：宣传党的文艺方针的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里，可以看到茅盾为新中国文艺大厦建设的心血。

新中国的文化工作，和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而且，许多政治运动往往从最为敏感的文艺界着手。因此，茅盾作为文化界的最高行政长官，往往要分心应付那些运动和人事，而不能专心致志地为繁荣文化而努力。但茅盾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仍感受到了新中国的人民，在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地工作着，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也为老百姓那种精神所感动，于是，在无法进行写作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培养青年作家的办法，甘当人梯。事后，事实证明，茅盾这一选择，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尽管刚解放时，茅盾为部队作家白刃的《战斗到明天》写了序而遭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执着地为培养文学新人而不遗余力。

作为作家，作为文化部长，茅盾不时流露出作家本质，对一些青年作者寄来稿件，他总是认真阅读，并给予指导。1954年春天，一个叫聂继三的作者写了一篇小说《期望》，尽管这个小说不象小说，但茅盾还是看了，并具体地给作者写了一封信，指出这个稿子的毛病所在。1956年，茅盾在与作者孟繁瑶通信中，仔细地指出其作品的不足之处，又给怎样提高指点迷津，“学习写作没有秘诀。要多读多写。看来你是勤写的，但还应当多读各种的文艺名著，读完一篇或一本后，要自己问自己：好在哪里？要分析它的结构和人物描写等等。”

在指导青年作者写作过程中，茅盾努力摒弃概念化的东西，努力按照艺术规律去指点，1956年6月茅盾收到一个叫刘或的作者来信，信中对茅盾说，他打算以合作化初期为背景写小说，问是否过时。茅盾在几天后即复信说：“我认为这就要看你写来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当然这是包括了艺术的概括）。如果把写作和配合当前中心工作看得太机械，那就缩小了文艺作品的教育作用，所以‘过时’的题材也可以写。”同时又提醒这个作者：“我想提出一点来请你注意：就是关于人物个性的塑造。如果人物写不好，

弄成概念化，那么小说就可以变成政策的图解，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在 1956 年的夏天，茅盾还充分注意到艺术个性问题，实在难能可贵。

在指导文学爱好者写作的同时，又给那些好高务远的青年以人生的指点。1957 年，一个叫袁家铤的青年，因为想当作家而要求到北京来，茅盾认真规劝这个青年，“你只有 19 岁，应当好好地劳动锻炼七八年，然后再谈什么‘作家’。现在许多成名的作家（比你年龄大了一倍多，生活经验丰富得多，写作有成绩）都纷纷下乡劳动锻炼，而且长期在农村落户。……我劝你……安心在农村劳动。”

茅盾这种关怀和关心，在新中国的成名不成名的作家作者中，都留下极佳的口碑。康濯原在《华北文艺》工作，在向茅盾约稿时，茅盾给予他极大的鼓励，从而坚定了康濯的文学道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作家中，王愿坚、王汶石、吴强、管桦、陆文夫、茹志鹃等等，有不少作家在茅盾的指导下，取得好成绩的。《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是一个名气不大的青年女作家，当时因丈夫右派问题，而心灰意冷。这个时候，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 1958 年 6 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肯定了《百合花》，给茹志鹃以极大的生活信心，因为茅盾的高度评价，茹志鹃一个“已经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会有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扶着那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所以，茅盾不仅评论了一个作品，也解救了一户人家！差不多新中国的作家都受过茅盾的惠泽和关怀。自然，茅盾把培养文学新人，作为共和国文艺大厦的基石来看待的，只要有人，中国不愁文艺不发展。

对青年作家这样扶持，这样关心，对已有成就的作家，茅盾也总是尽自己的力量，给予保护和帮助。对丁玲，茅盾自然知道，丁玲是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丁玲最困难的时候，茅盾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尽自己的力，暗中帮助丁玲。作家陈沂在上海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批评，茅盾知道后，托人带口信给他，要他善自珍重，陈沂极为感动。50 年代初，作家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碧野思想十分消沉，十分痛苦。茅盾得知他的情况后，特地邀请碧野参加作协迎春大会，并在人群中四顾找人，见碧野一个人脸色凝重地呆立在那里，特地过去，当众向碧野举杯祝酒：“碧野，祝你继续写出好作品来！”使碧野大为感动，并从此振作起来，又投身文学事业中。

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中央虽然为茅盾配备了助手，但新中国成立后的繁重的文化工作任务，搞不完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茅盾原先想创作的念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茅盾站在国家高度，发现新中国文艺理论的薄弱，不利于新中国文艺建设；另一方面，茅盾又发现文艺界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文艺的认识还不尽一致。自此，茅盾带头读书，在文学理论方面作出新贡献。在茅盾当文化部长中间，可以发现，凡是茅盾自己起草的讲话文稿，大多数是谈文学创作和文艺规律的，很少孤立他讲空话大话的。1950 年 1 月 8 日，在北京大众文艺讲座上，茅盾没有侈谈许多路人皆知的大道理，而是像一个教师一般，娓娓讲授“欣赏与创作”，他在讲座上一开始就说：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看到某些自然物或人造的艺术品，我们往往要发生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许是愉快兴奋，也许是悲哀激昂，不管是前者，

还是后者,总之我们是被感动了,这样的情感上的激动(对艺术品或自然物),叫作欣赏,也就是,我们对所看到的事物起了美感。”

咋看这段话,茅盾仿佛是一个老师,在向学生娓娓而谈。给人于一种亲切,而没有一种官气,比如在1956年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茅盾讲的仍是《关于艺术的技巧》。这些后来茅盾专门出版了一本17.8万字的《鼓吹集》,把自己的艺术观点,都溶解在这本集子里。但是,茅盾对这种零敲碎打的表述方式,不以为然,想努力系统地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1956年开始,他利用点滴业余时间,认真而系统地撰写论文——《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他》,文章长达6万余字,以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发展的大量事实,论证了现实主义自古有之;认为“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从远古开始的。认为中外文艺的发展中始终贯穿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同时也论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特点、局限性及其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阶级基础和表现特点以及未来主义和现代派等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流派的特点和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等关系。这部理论著作,对廓清50年代理论上的迷雾,为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篇长文,发表于1958年《文艺报》1、2、8、9、10期上。在这个大跃进年代里,文化上出现这样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实属不易。

1961年,国内经济开始调整,国家经济形势开始逐步走上轨道,而文艺界却开展一场关于历史剧的讨论。茅盾针对文艺界在历史剧问题上的理论问题、古为今用问题、历史上人民作用问题、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问题、历史剧的文学语言问题,逐一进行论述。对历史剧创作有着现实意义。

在进行理论指导的过程中,作为文化部长,茅盾又十分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西藏、新疆、内蒙等地的少数民族作家,茅盾一直积极扶持、帮助,蒙族的敖德斯尔、玛拉沁夫,藏族的益希卓玛等,都受到过茅盾的关心和鼓励。即使茅盾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不忘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1964年11月至12月,茅盾最后一次以文化部长身份主持并出席会议,还是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11月26日,观摩演出会开幕时,茅盾以文化部长身份,为大会致词。12月29日,茅盾还出席了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观摩演出会闭幕式。他在文化部长的任上,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尽到自己最后的职责。

茅盾在15年的文化部长的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文艺大厦的建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留下了于国于民的无量功德。

和新生的共和国共同走在艰难的创业路上；  
一波一浪，接连的政治运动，使他感到困惑不解。  
对批判《武训传》的缄口，对批丁玲的婉言，称病不动笔。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气节和人格，演绎出一个文学巨匠的政治故事。

### 第三十章 政治运动中的困惑

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但自幼年养成的“谨言慎行”的习惯未变。作为泱泱大国的文化部长，绝没有那些人一阔脸就变的市侩气息，也没有那些趾高气昂的官僚习气，而依然是一介书生，谨言慎行，恪尽职守。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闻所未闻，从未经历过的政治运动接踵向茅盾扑来，批《武训传》，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反右倾，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些无数从未经历过的政治运动，茅盾有时首当其冲，有时避之不及，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这些政治运动，起初茅盾总是满腔热情投入，但稍经岁月，便困惑起来，发现许多文艺界朋友，在莫名其妙中打成“敌人”，乃至流放。这些不能不使身在高位的茅盾陷入沉思。

1950年，上海私营昆仑影业公司拍出一部电影《武训传》，此片原来的剧本是中宣部审查通过的，影片放映后，受到广泛的好评，但到了195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改定的。

然而，身为文化部长的茅盾，对武训其事其人，并非不了解，也并非没有自己的观点，但对这场明显带有批判性的“讨论”，后来发展到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并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政治高度的讨论。对此，茅盾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态，也没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批判文章，从某个方面保持沉默，而照常出席“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仪式和晚会，照常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办的“德中友好月”酒会。

10月份秋高气爽时，照常飞往维也纳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一切似乎和茅盾这个文化部长无关紧要似的。茅盾的一切政务活动，外事活动，都在按计划进行之中。在安排好了的计划里，一个个的会议，一桩桩的事务，都在有序地进行。茅盾尽管对武训传的批判表示困惑，表示沉默，但仍不能躲过政治风浪的颠簸。

原来，1951年初，部队作家白刃专程拜访茅盾，并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的校样送给茅盾，请求茅盾为这部小说写序。茅盾在文化部长的位子上，爱才心切，爱小说更是没有话说，便答应为之写序。谁知，在批判武训传之后不久，作者白刃受到粗暴的批判，后来也株连到为此书作序的茅盾，虽然没有到公开批判的程度，却也接到几封“觉悟很高”的读者来信，指责茅盾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对此，茅盾又重读小说，反省自己的序言，觉得无大错，但既然有人来信，总得对人家负责，于是，他给转来来信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谦虚地认为自己对序没有写好，是“匆匆翻看一遍，就写了一篇序”。“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责的。这又是不负责，不严肃的表现。”同时又说，这“又与我之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最后，又“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这次教训后，能以很大的勇气将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改写。因为，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

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茅盾这样一封非常谦虚,非常诚恳的回信,寄给了《人民日报》。但是得到的是另一种“回报”。过了几天,即1952年3月13日,《人民日报》以《茅盾关于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的检讨》这样的标题,登出了茅盾给编辑部的复信,这样做法令茅盾瞠目结舌,但也令茅盾无可奈何。这件牵涉到茅盾自己的“小事”,使茅盾这位文化界最高行政长官,也够开眼界。从此,茅盾没有再就此事讲话。

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化部长,作为处在政治第一线的领导,又处在最为敏感的文化战线,对政治运动自然首当其冲,在某个时期,某个事件上,又不能不表态。经过对《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批判,中共中央针对文艺界的状况,发出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改造思想”的号召。此时,茅盾不能不表态了,不能再沉默了,也无法沉默了。他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而选择了在自己的“选集”中,给自己扣上“没有把自己改造好”的帽子,当众自责。但这种自责,没有减轻茅盾内心的困惑和不解。1954年文艺界对《〈红楼梦〉研究》及俞平伯的批判,由此涉及到对《文艺报》及其主编冯雪峰的批判;1955年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上升到政治斗争,以及随后开展的全国性的反右斗争,这些目不暇接的政治斗争中,茅盾只被动参加,只有招架。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茅盾作了《良好的开端》的总结发言,发言是代表个人的,把这几年文艺界的政治运动尽量拉到学术讨论上去,而且,一个短短的发言,还大量引用别人的讲话,借用人家的观点,让人看了以后,有点忍俊不禁,他说:“5年来,党中央屡次为我们敲起警钟: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直到此次的‘红楼梦’批评。党这样地鞭策、督促,都为的是关心我们,教育我们,提高我们。”“郭主席(指郭沫若)又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老年人只要‘肯努力学习,同新生的力量站在一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认真地武装自己,端正我们的立场观点,提高我们的工作热情,加强我们的战斗性,健全我们的好胜心,即使接受新鲜事物的敏感性要迟钝一些,但总不至于过早地陷落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我愿意上了年纪的人都把这几句话当作座右铭。”因为茅盾也感到郭主席的话里,有自己的影子。至于《文艺报》的问题,为了保护冯雪峰他们茅盾主动承担责任,“作为作家协会主席的我,应当负重大责任。”

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茅盾尽管不熟悉,不理解,但还是在一定场合下,不多不少地表态,如《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领导》、《提高警惕,挖尽一切潜藏的敌人》、《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思想改造》、《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等,都是在各个政治运动中的表态文章。如对丁玲的粗暴批判中,茅盾内心十分痛苦,丁玲是茅盾在平民女校和上大讲课时的学生,对丁玲的了解,莫过于老师了,丁玲的每一点成绩,茅盾心里都清楚。但在1957年全国性的批丁、陈(企霞)时,一下子把丁陈打成反党集团,对此,茅盾大惑不解,丁玲怎会反党?但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不能不讲话,又不能昧着良心讲话!因此,他在1957年8月3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了《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的关》发言,他说:“我不明白丁玲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坦白交代,回到党的怀抱,洗心革面,而宁愿这样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难道她不感到精神上痛苦吗?……对丁玲的态度,我实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的方法混过关去。她为什么面对着这

许多铁的事实，还企图狡赖？她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分析的很深刻。”仔细分析茅盾这篇批判丁玲的发言，很耐人寻味，实际上，茅盾对丁玲是了解的，因在位上，不得不发言。但是，即使像这样的违心发言，后来茅盾也是能避则避，拒绝写文章。在8月3日发言后，他以有病为由，拒绝写批判文章。并写信给邵荃麟，请他出面给有关部门打招呼，不要来向他催写稿子。

荃麟同志：

最近的几次丁、陈问题扩大会议我都没有参加，原因是“脑子病”（西医这样说，因其和一般神经衰弱不同），病情是：用脑（开会、看书、写作——包括写信），过了半小时，就头晕目眩，额角两穴胀痛；于是要休息半小时多，然后再能用脑。但这次却只能用半小时的一半或多些就不能再用了，如此递减。因此，一篇长文（万言以上），我非分两次看不可，不然，尽管看完了，脑中毫无印象，这样的痛状，表面看来能吃，能起来，不发烧，和健康人一样，就是不能用脑——倒可以体力劳动。如擦皮鞋、扫地等。我家有一周时间没有女工了，我自己房间就归我扫、抹等等。我今天向你诉苦，就是要请你转告《人民日报》八版和《中国青年》编辑部，我现在不能为他们写文章，他们几乎天天来电话催，我告以病了，他们好像不相信（当然，也难怪，一般说来，不住医院是不能称病的；但我这病，住医院不解决问题，徒然占了床位，不如我不进医院）。可否请你便中转告：不要来催了，一旦我脑病好了，能写，自然会写，像现在这样，只能用脑半小时（而只能写一百字就必须搁笔，过了一小时再写一百字），实在不是写文，而是榨脑子，榨时固然苦，榨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像样（我试验过，至多写一百字，就写不下去了，头晕，额角穴膨胀，跳痛）。

好了，不多写了，因为这封信也是分两次写的，中间（休息实际是僵卧）了半小时，匆此，顺颂健康。

茅盾

八月廿八日

邵荃麟接到这封信后，在信末批示“请告《人民日报》等不要去催促。”从这封信中，也可看出当时茅盾对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困惑和痛苦心情。这种情况，在茅盾身上并非是初次，十多年前在新疆时，茅盾为避免祸从口出，称病不写文章，而现在，面对这种政治运动，茅盾不理解，但又不能直说；对了解的人和事，茅盾又不忍心说违心话，硬把朋友往监狱里推，于良心，于道德，于情于理，都不忍！因此，茅盾只好称病，不出席批判会，不写批判文章。所以，粉碎四人帮后，丁玲回到北京，赶快去看望自己的老领导、老师茅盾。

1956年，中共中央先是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肯定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接着发动全民帮助中共进行整风。对中共这个举措，茅盾举双手拥护。所以，到1957年，在一次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茅盾用北方人不大懂的乌镇官话，批评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其种种表现。不料，这个一片赤诚之心发言之后，引起一些人的议论和批评。后来，茅盾也有些后悔作这样的发言。但话已说过，已无法收回了。

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文艺界也在紧跟形势中出现浮夸风，出现违



背艺术规律的事情。对此，起初茅盾是觉得新鲜的，认为文艺上的跃进，是文艺事业兴旺的表现。但没有多少时间，就发现其中的问题。但在当时的特定的政治背景下，茅盾作为文化部长，又不便反对或在公开场合提出异议。轰轰烈烈之时，茅盾离开北京，带了中国作协李仲旺等人，去东北作社会调查和视察工作，了解东北业余文化活动的情况。在东北调查研究中，充分肯定东北业余作者的创作热情的同时，也从另外角度，指出业余作者的不足。茅盾像一个传道者，到东北为文艺工作者启蒙，为文艺工作者指点；又像一个老师，给那些业余作者讲述文艺创作的规律。这一年的6月10日，茅盾在作协沈阳分会座谈会上，专门像老师一样，给与会者讲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从理论上给予规范，告诫大家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革命浪漫主义，不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片前辈心。

在长春工人文化宫大礼堂里，茅盾专门讲了文艺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他那浓重的桐乡口音，在演讲时还请了两个浙江籍的吉林大学学生郑启幕、翁方颐作记录，在这次讲话中，茅盾同样指导吉林的文艺工作者怎样认识文艺与劳动的关系。在东北，茅盾还专门讲了关于短篇小说创作问题。

所以，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茅盾确实是尽心尽责。在这样轰轰烈烈、不着边际的浮夸风中，茅盾处处以宣示文艺创作规律而奔走，确实难能可贵。从东北回京，茅盾在9月11日的文化部部务会议上，专门作了《文艺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这些材料表明，茅盾在大跃进年代里，并没有像反右时那样，称病拒绝写文章，而在此时，茅盾在困惑中，表示出一种积极的姿态，努力想把已经调动起来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健康正确的艺术创作轨道上来，不遗余力地宣传一些创作的基本方法和要求。从另一个方面，保持一个五四老作家的人格和操行。

今天，尽管当时的历史印痕，无可避免地在茅盾的文章、讲话中体现出来。但从历史角度看，仍可作这样的历史解释。

茅盾对许多政治运动表示困惑，只能用曲折的方法表示。在他的现存的67本日记中，也表示出某种困惑。如社会上一些人对“改造思想”的庸俗理解，茅盾在1961年5月30日的日记中说：

“……每日早起洒扫，原亦不坏，至少可医便秘（恐怕这些劳动对改造思想未必有功，不但这些劳动，我曾见下放农村劳动一年者，脸晒黑了，手粗糙了，农业生产懂一点，会一点了，嘴巴上讲一套，比过去更能干了，然而思想深处如何？恐怕——不，不光是恐怕而是仍然和从前一样）。矛盾之处在于清晨精神较好之时少读一小时的书了。”

这种困惑，茅盾只有悄悄地记在自己的日记里，偶尔流露。

1961年12月，茅盾偕夫人孔德沚去海南岛避寒，在困惑中寻找轻松。从海口走东路，经万泉河、东山岭，到三亚市，后又经通什返海口，海岛风光，热带情调，给在繁杂的政治生涯中忙碌的茅盾莫大的慰藉。在当时他给海南文联等题的诗中，可以想见其心情：

## 海南之行

久闻宝岛大名，今始得畅游；从东路至鹿回头，居六日，又由西路回海口。观感所及，成俚句若干，非以为诗焉，聊以志感耳。

## 海南颂

琼崖雄峙海南疆，  
气概峥嵘五指张。  
公元一九又二七，  
红旗招展满山岗。  
后来奋斗廿余年，  
星星之火已燎原。  
日寇猖狂何足数，  
琼崖纵队力回天。  
大军南下扫烟尘，  
宝岛从此归人民。  
山容海色都非故，  
蕉雨椰风岁月新。  
八茧之蚕三熟稻，  
地下蕴藏无价宝。  
归侨有家今兴隆，  
热带作物争长雄。  
敢为国防效微力，  
更因外贸奏肤功。  
水坝高耸称第一，  
海底夺油资源阔。  
八所吐吞万吨舰，  
英歌之盐石碌钢。  
黎苗回汉同心德，  
十年建设费周章。  
共产大道何荡荡，  
领导英明全赖党。

茅盾这首《海南颂》，也是时代之作，但其中无忧心情可见。1962年元旦，茅盾在通什这个充满温馨阳光的山城里度过，倍觉新鲜，同时也感叹时光的流逝，记元旦，写了两首诗，可以见其当时的心境：

### （一）六二年元旦

莫向双丸怨逝波，  
只愁岁月等闲过。  
读诗渐少多读史，  
不为愚忠唱挽歌。

### （二）六二年元旦访通什

花鸟山城庆岁朝，  
州名自治汇黎苗。

千年合亩公社化，  
三级分劳干劲高。  
敢作非缘蚬胆助，  
争雄全仗赤旗招。  
树人十载宏观在，  
化雨春风多冶陶。

这在当时，确是难得的日子，据说，茅盾夫妇的海南之行，是自费的。

新中国的多难，政治风云起伏，茅盾经历了许多连想都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运动，身在位上，既困惑，又无奈。

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地球村的情结。  
飞来又飞去，为世界和平；  
文化交流遗下一个个辉煌成果。

### 第三十一章 和平的文化使者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作为首任文化部长，对外的文化交流，作世界和平的使者，自然成了茅盾这位文化部长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10月23日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始，至1962年7月1日去莫斯科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为止，共出国16次。其内容是争取世界和平和文化交流两大类，因此，茅盾在文化部长任上，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人类进步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是他一生中较为辉煌的一个方面。也因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平的文化使者。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经济，整顿社会秩序，制订新的秩序方针政策，使一代开国元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自然，茅盾也不例外。待新中国万业待兴的工作稍有头绪后，中共就立即参与世界和平事业。频频出访，在国际事务中尽一个大国的责任和使命。1950年3月8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开会，茅盾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1月，茅盾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1年3月，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又决定茅盾任理事，这一年的10月，茅盾受任为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代表团理事，于23日早晨6时从北京乘飞机转道莫斯科去维也纳。在莫斯科，旧地重游，茅盾感慨万端，戈宝权等在机场迎接代表团成员，但公务在身的茅盾，在莫斯科稍事休息后，于27日飞抵奥地利的维也纳。在大会上，茅盾代表中国代表团，作了《巩固和发展各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的发言。在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中，茅盾感到新中国应该有刊物，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阵地。1952年12月11日，茅盾再度赴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会后，坐火车取道莫斯科回国。在火车上，同行的代表陈冰夷和茅盾谈起办一个刊物，专门介绍外国文学。茅盾一听，十分兴奋，与自己平时所谋不谋而合。于是茅盾专门向陈冰夷介绍了鲁迅当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下创办《译文》的艰难情景，说“今天情况大不相同了，如果办新的《译文》，一定能办得更好。”在茅盾关怀下，新中国的《译文》终于在1953年7月1日正式创刊，茅盾担任主编，陈冰夷、董秋斯为副主编。

50年代初，茅盾的出访任务，大部分是参加国际性会议，有时刚回来，又要整理行装，出发去国外。1953年4月，北京春意盎然的时候，茅盾刚刚接待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来华演出，第二天，即4月30日就离开北京，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会议，5月14日返回北京。6月9日，茅盾又和郭沫若一起，乘机离开北京，取道莫斯科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匈牙利，茅盾除了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之外，还参加郭沫若主持的“向匈牙利全国和平理事会献礼”仪式，出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部长会议举行的招待会，6月19日，茅盾又出席匈牙利布达佩斯市民为庆祝世界和平理事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在匈牙利参观访问近一个月时间。回国后，茅盾又及时写了《人民匈牙利的电影》一文，发表在8月20日《人民日报》，宣传匈牙利的文化事业。没有几个月，茅盾在11月17日，又率团去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上，茅盾作了

《为进一步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而努力》的发言，赢得代表的热烈掌声。12月中旬返回北京，出色地完成任务，19日，周恩来亲自接见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并招待代表团成员，给予充分肯定。

1960年8月25日，茅盾应波兰政府的邀请，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去波兰访问，在波兰访问期间，茅盾受到波兰人民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给茅盾留下深刻印象，萧邦故里，波兰音乐学院的少女、高材生，为中国贵宾演奏了萧邦名曲；在凯纳尔工艺美术中学里，茅盾观看了工艺美术中学生的杰作，欣然赋诗：

源泉艺术在民间，  
吸取精英先着鞭。  
古拙非缘哗世俗，  
诡奇最怕坠魔关。  
创新毕竟开潜力，  
摹效由来毁异材。  
卓见奠基凯纳尔，  
独标一帜更无前。

茅盾对于波兰人民的智慧，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去苏联访问，组成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11月2日，茅盾和宋庆龄、郭沫若等随毛泽东主席赴苏。在苏联期间，随毛泽东主席等拜会苏联党政领导人，谒列宁墓并献花圈，出席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参加阅兵式，宴会，以及声势浩大、壮观的群众大会。同时，又和毛主席等领导一起，观看著名的芭蕾舞《天鹅湖》。茅盾第一次看《天鹅湖》时，是1947年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距此时已经有10年，茅盾一边看，一边想，不胜感慨系之。

在出访过程中，茅盾平易近人的作风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1962年2月，茅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埃及开罗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夏衍为副团长，成员有杜宣等16个作家，飞机转道香港，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去开罗，抵开罗后，茅盾和夏衍下榻在一个叫“牧羊人”的饭店。代表团其他成员杜宣等住一个叫“阿塔拉斯”饭店。当时，杜宣对“阿塔拉斯”是什么意思，不大了解，就问茅盾。茅盾笑笑，看了看这个店名，说：“这个么，是这样的，‘阿塔拉斯’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个大力士。所以是大力士的意思。”杜宣他们一听，都笑起来，有人忙提议，“那么，我们不要叫它阿塔拉斯，干脆叫大力士饭店吧。”大家一阵欢笑。2月16日，代表团圆满完成任务返国。大家登上飞机后，忽然发现茅盾的座位空着，杜宣等人忙问：“沈部长呢”，结果大家都说不知道。夏衍让几个青年人去找找看。结果在飞机的行李舱里找到茅盾，原来他在同机上的服务员一起查看代表团的行李是否同机启运，一个66岁的老人，在一件一件地查看行李，几个年青人见了，十分感动。

1962年，茅盾受命组团，率王力、金仲华、朱子奇等组成的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对这种政治性很强，业务又不熟悉的差使；加上当时中苏友好关系已经破裂，双方论战已酣之际。茅盾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度。临行，细心负责的周恩来总理专门召开会议，确定代表团成员，拟定发言提纲，并指定王力执笔发言稿。

在7月9日下午的大会上，茅盾宣读了王力为他写好的发言稿，申述了普遍裁军的重要意义，要求那些拥有大量军备的国家率先裁减军备，以利于世界和平。这个发言后来刊登在国内《人民日报》上，题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在国内刊登以后，中央一位负责人认为代表团的发言太软弱，对赫鲁晓夫的态度太软弱，认为这是一次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失误，否定了代表团的作用。因此，这次去苏联，成为茅盾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在他出访史上，划上一个句号。但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

回顾茅盾新中国成立后屡次出国，或访问，或出席会议，在共和国的文艺史上、外交史上，都有这位文化部长的汗水和功劳。这里，不妨罗列一下茅盾作和平文化使者的足迹：

1951年10月23日，以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代表团理事的身份，乘机去莫斯科转道维也纳，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2年3月21日，转道莫斯科，去奥斯陆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同年12月，茅盾又去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会后又到波兰访问。

1953年4月30日，茅盾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同年6月5日，又与郭沫若等同机取道莫斯科去布达佩斯参加和平理事会。同年11月17日，茅盾率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代表团，离京去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4年5月15日，茅盾赴柏林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特别会议。6月，又转道莫斯科，去斯德哥尔摩出席缓和局势国际会议。

1955年6月15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团体决定组成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茅盾为团长，并以15日启程去芬兰的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1956年12月，茅盾与周扬、老舍率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

1957年11月，茅盾和宋庆龄、郭沫若等随毛泽东出访苏联，参加苏联40周年国庆。

1958年10月，茅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在会上，茅盾作了《为民族独立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斗争的中国文学》的报告，指出：“保卫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中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亚洲各国人民和作家在这个庄严的伟大的斗争中，更进一步建立了友好的文化关系。”

1959年5月，苏联作家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茅盾又亲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会，并在会议上代表中国作协“祝词”。

1960年8月，茅盾应波兰政府邀请，亲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去波兰访问，并留下几首访问波兰的诗章。

1962年2月，以茅盾为团长，夏衍为副团长的16人作家代表团，赴开罗出席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为风云变幻时代的亚非文学灿烂前景而祝福》的发言，指出“亚非两大洲是人类文化最古的发源地，是人类文化的摇篮”。同年7月，茅盾在苏联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世界和平大会，并在会上发言。

尽管茅盾主政文化部期间，除了代表新生的共和国政府，新中国的作家

出访国外外，还在职权范围内，大力促进文化交流，接待国外文化团体，文化界领导人，繁荣、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事业。新中国成立的礼炮，还在天安门广场回荡时，10月2日，茅盾就前往车站欢迎新中国第一批外国文化代表团——苏联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此后，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日愈提高，国外文化代表频频来访，中国举行世界性的文艺活动也愈增加。1952年5月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全国文联等7个团体，联合举行世界文化名人阿维森纳诞生一百五十年、果戈里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这个纪念活动过程中，茅盾写了《我们为什么喜爱雨果的作品》，《果戈里在中国》等文章。认为“中国人民同情于雨果作品中的这些人物，中国人民也从自己的斗争经验中看出了这些人物的优点及其时代的局限性。吸收其优秀进步的成分，而批判地舍弃其不合时代需要、不合中国现实的成分，——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于世界文化的态度。”

1953年9月，全国文联、中国作协等5个团体联合举行世界文化名人——中国诗人屈原逝世2230周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410周年、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逝世400周年、古巴作家何塞·马蒂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茅盾在纪念会上作了《纪念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的报告。指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盛大纪念屈原、哥白尼、拉伯雷和马蒂，正因为这些文化巨人的贡献都是属于全人类的。纪念他们，将会鼓舞各国人民保卫并发扬自己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加强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促进互相了解，同时学习他们坚持正义、奋斗不屈的精神，为保卫世界文化、保卫世界和平而作更大的努力。”1954年7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等5个团体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茅盾在会上作了《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报告，号召中国作家向契诃夫学习。1955年3月5日，中国文联等单位举行世界文化名人席勒、密茨凯维奇、孟德斯鸠、安徒生纪念大会。茅盾作了《为了和平、民主和人类的进步事业》的报告。

50年代，“左”的影响虽然也影响了文艺界，但文艺界在茅盾等一大批五四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主持下，对外文化交流成就依然辉煌，十分活跃，差不多每年都有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每年的纪念规模都很大。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茅盾作为文化行政最高长官，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场浩劫，虽有周恩来保护，也未免冲击；  
弟媳惨死长安街，五十多年相依相伴的爱妻，撒手  
西去；侄女死在重光前夜。  
两个批示，一场劫难。他难以言表的恶梦。  
春风吹起，老树定能发新枝。留下了人们的期待。

### 第三十二章 在文革浩劫中

1963年12月23日，是茅盾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

在前一天，茅盾接到全国文联通知，说有重要文件传达。什么重要文件，通知里没有说。

23日上午，茅盾准时出席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12月12日在看了中宣部文艺处编写打印的《文艺汇报》后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个批示：

“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气氛下，显然是至高无上的。茅盾在会上听了这个批示，如坐针毡，如临深渊，他感到惧怕，更感到委屈。十多年来，为新生的共和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放弃自己的创作，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为中外文化交流，为培养新中国的作家群，为指导群众文化，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茅盾几乎都是不遗余力的，现在竟然成了“死人”？茅盾内心陷入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但茅盾没有在会上表现出来，表情冷冷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林默涵传达。传达完了，散会了，他又默默地走出会场，临别，和周扬、林默涵、邵荃麟握了握手，上了汽车，一言不发，就回家去。

本来就常常失眠，靠安眠药度日的茅盾，这天，加倍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他从大风大浪中过来了，他忧虑的，倒不是自己个人荣辱进退，而是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更担心中国文艺界的一场风暴的到来，又会损失一批人啊。

过了几天，1964年元旦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中央名义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茅盾也去了，坐在那边，静静地听这几位中央领导讲话，中央要求文艺界对照毛泽东的批示，整风、检查。

于是，文艺界又开始无休止的会议、检查、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中，茅盾、邵荃麟等1962年8月在大连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被定为黑会，硬把“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写中间人物论”两顶帽子，套在“大连会议”头上，对此，茅盾没有辩解，而是用沉默来对付那些无限上纲的批判，他觉得自己在大连会议上的讲话发言，尽管是前年的事，但仍没有错。经过半年多对照批示的整风、批判、揭发之后，1964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整理了一份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6月27日，



毛泽东看了这份题为《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材料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周扬、林默涵又郑重地传达了这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连同去年12月的那个批示，后来史称“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对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茅盾来说，不啻是一记闷棍，所有的责任，罪恶都往这位大作家身上套。

茅盾在沉默中，悄悄地作着挨整的准备，一篇评论《南方日报》上杜埃的《冰消春暖》文章，成了茅盾在文革前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茅盾的笔，除了写一点起居日记外，谢绝了一切约稿，开始了长达12年的沉默！

这时，又传来毛泽东在与毛远新谈话中，批评文化部的消息，毛泽东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显然是不满意文化部的工作。

不久，江青等人又把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等定为毒草，下令批判。也就在这时，茅盾在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之后，刚要走，周恩来总理走过来，把茅盾留下，和茅盾作了一次谈话。刚开始，茅盾就猜出是什么事情，周恩来说：

“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推崇资本主义文化。我知道你一开始就不愿意当这部长，后来又提出过辞职，当时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适人选。现在打算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卸下这副担子，轻松轻松，请你出任政协副主席，你有什么意见吗？”说完，周总理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茅盾。

“好啊，我拥护总理意见。”茅盾早有准备，不假思索地回答。

周总理点点头，又说：“新的文化部长很难找，目前尚无合适对象，只好暂时让陆定一兼任，另外打算从军队调几个人来，不过完全由当兵的人来管文化工作怕也不行，所以准备从上海调石西民来，石西民你认识吗？这人过去也犯过错误，不过这几年在上海干得还不错。”

茅盾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却又向总理提出：“我这个作家协会主席也已经当了十几年了，工作没有做好，可不可以这次也一起调换调换？”

周恩来笑了一笑，敛起笑容：“那就不必了，作协的问题主要也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当作协主席还有谁能当？”

茅盾和周恩来两人谈话后，茅盾默默地走出国务院会议室。回家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隔了个把星期，周扬专门到茅盾的小楼里来一次，向茅盾介绍文艺界学习和贯彻毛主席两个指示的情形，也谈了夏衍、田汉、阳翰笙所犯的错误。又说：“主席对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批评，主要责任在党员领导干部，是他们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犯了错误。听说您要离开文化部，这样也好，以后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来领导作协和文联各协会的工作了。”茅盾听后，笑笑，没有再说什么。

1964年12月，茅盾以山东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会上，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国家主席 1965 年第二号主席令，任命陆定一为文化部长。茅盾被同时召开的第四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选为副主席。

从此，茅盾在文艺界的活动逐渐稀少、疏远了。应酬活动也少了许多，除了节庆、国宴等活动外，茅盾基本上过着赋闲生活。在家打扫卫生，为孙女小钢煮牛奶，看管蜂窝煤炉。

但尽管如此，江青等人仍不放过茅盾等一大批 20、30 年代作家。在茅盾卸任不到半年的 5 月 29 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以及天津的《大公报》等 5 家报纸在同一天，分别刊登了《影片〈林家铺子〉是一株美化资产阶级的毒草》、《职工批判电影〈林家铺子〉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背道而驰》等批判文章，将原来属内部批判的，完全公开化了。紧接着，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批判电影《林家铺子》，全国所有的省级报刊，都发表了批判，声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当时 5—9 月的 3 个月时间内，各地发表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文章，达 137 篇以上。甚至有人专门到茅盾家乡杭嘉湖一带作社会调查，以证明电影《林家铺子》的反动和这篇小说是如何美化资本家的。当时批判的矛头十分明显，茅盾心里也十分清楚。但据茅盾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回忆，“我们周末看爸爸，希望能谈谈这件事。我们发现爸爸仍旧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也不谈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事，就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我们心里纳闷，只好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们爸爸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的确，茅盾对那种甚嚣尘上的批判，冷眼向洋，置之不理，表现出少有的冷静，连日记中也不记上一句。直到文革结束后，茅盾在回忆录中，才忿忿不平写道：“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30 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而 60 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这，算是茅盾对 60 年代那场围攻电影《林家铺子》的一点看法。作为一代文豪，仅此而已，心胸是何等广阔！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降临在中国大地。1966 年 4 月 18 日，《解放军报》首先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 月 16 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8 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此，中国大地掀起一场内乱和浩劫。茅盾作为一位已经赋闲的文化名人，从 8 月 18 日开始，常被邀去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自然，这种例行公事式的活动，茅盾也仅仅是出席而已。茅盾静静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不断思索。

1966 年 8 月 24 日，茅盾的老友、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含冤自尽太平湖，消息传到茅盾耳朵里，茅盾惊呆了，望了望窗外青天，长叹一声：“平日见老舍随和、幽默、开朗，想不到还是一个性格刚烈，自尊极强的人。他是受不了横加在他身上的对人格的极大侮辱啊！他自杀在太平湖，显然，是对这

种不公平的无声的抗议。不过，自杀终究不是办法，为何不坚持一下，亲眼看看这世事究竟怎样发展变化呢？我是相信即使沧海桑田，最终逃不脱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茅盾这位年届70的老人，内心是多么苍凉和悲愤。

社会上的大串联，大动乱，也涉及到了茅盾家里，8月28日上午，一批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敲开茅盾家的门，撕掉了《红楼梦》、《西游记》两本书，还恶狠狠地指着书架上的书，对在茅盾家做服务工作的阿姨说：“这些书全是大毒草，统统烧掉！”

8月30日清晨，原来在茅盾家做服务工作的老白也造反了，他叫了红卫兵来茅盾家扫四旧。有一个女红卫兵指着满屋的书架问茅盾，“这些书你都看过？”没等茅盾回答，旁边那个拿军刀的头头进来说：“这些全是大毒草，看得越多中毒越深。我们只要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一本顶一万本！”

面对这种狂热和愚昧，茅盾只有苦笑和愤怒！这时，一个小瘦子从人群里钻出来，指着墙上萧逸同志的照片，尖着嗓子问：“这个穿国民党军服的家伙是谁？”这时茅盾不禁怒火中烧，冷冷地反问道：“你知道国民党是什么样子吗？”转身又看了看萧逸遗像，说道：“他穿的是八路军军服，他是新华社战地记者，是我的女婿，他是老八路，他在前线牺牲了，是国民党打死的！”茅盾的脸色板起来，一字一句地回答着。

那个小瘦子的嚣张气焰被噎回去了。见没有捞着什么东西，这些家伙又东翻西寻，把一尊三尺多高的紫檀木雕老寿星，一些瓷器，水晶花瓶，照相机及一些小工艺品，被摆到小楼外面的书库里封存起来，并写上“不准用”三个大字。又把墙上的印有文物的挂历翻过去，写上“不准看”三个大字。面对这些毛孩子野蛮无理，粗暴的行动，茅盾拄着拐杖，呆在一边，叹着气。而茅盾夫人孔德沚，却吓得缩在一边，不敢出声，心里呼呼直跳，她觉得今天家里遭抄家，完全是她与服务员老白争论引起的，心里又气又恨又怕又难过，而隔壁阳翰笙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残酷野蛮的场面，也使孔德沚惊吓不已，神经受到刺激，以致后来忧郁成疾。后来连一盏用煤精做的维纳斯像的台灯，也做了件衣服给像“遮羞”。

不久，“最高指示”一条一条地在报纸、广播中公布，人们狂热的程度，也一阵高一阵。从串联到砸四旧，到揪斗走资派，斗争在“深入”，世事沧桑，茅盾是五四以来历史的证人，一些另有用心的的人，千方百计想从茅盾那里找一点材料，作为整人的借口。对此，茅盾这位70多岁的老人，决不昧着良心讲话作证。鲁子俊是当年在延安为茅盾爱女沈霞做人工流产手术的医生，由于消毒不严和这位医生的责任心不强，沈霞因医疗事故而亡。对此，茅盾夫妇曾痛心疾首，悲痛万分。20年后，鲁子俊当上了某医院的院长，文革一开始，鲁子俊首当其冲，那些造反派专门派人四出罗织罪名，也找到了茅盾，要茅盾证明，沈霞之死是被鲁子俊害死的。茅盾一听来访者的要求，义正词严地回答：“你们这个说得不对，不是这么一回事。据我所知，是因为手术时消毒不严，受感染而死的。”

有一次，文艺界几个造反派气势汹汹的推开茅盾家的大门，一屁股坐在沙发里，威逼茅盾作证，30年代《译文》的停刊，是周扬反对鲁迅的罪证。茅盾严正地告诉来人，“这件事与周扬毫无关系，是因为生活书店想另外出版一套《世界文库》，把《译文》停了。我们请胡愈之去作交涉没有成功。”一席正气凛然的话，说得来人灰溜溜地走了。

有一次，几个外调人员又来敲开茅盾家的门，硬要茅盾证明曹靖华同志在重庆期间与苏联大使馆过从甚密。因而有苏修特务之嫌。茅盾坚决拒绝：“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我不能证明。”对方没有满足，便恼羞成怒，竟拍着桌子吼着，威胁茅盾。茅盾也站起来，义正词严地说：“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你是怎样理解的。我对一切调查所抱定的态度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条原则我决不会改变。”来人只得悻悻而去。

在抄家、来访、大字报等轮番“轰炸”下，茅盾夫妇精神上、生活上都受到很大打击，尤其是1968年4月底，听到自己弟媳张琴秋被迫害至死的噩耗，茅盾夫妇震惊了。张琴秋是中国共产党2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也是红军女将领，解放后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工作谦和、负责，深受群众爱戴，但因参加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并担任组长，受到株连，又把她在战争中被俘历史翻出来，打成“叛徒”，后来，即1968年4月22日夜里，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大楼4楼上摔下，惨死在东长安街上。

造反派马上宣称张琴秋畏罪自杀。当时茅盾夫妇得到消息，孔德沚泪如泉涌，连连叫道：“不可能，不可能！琴秋不会自杀的！”茅盾也认为“琴秋性格坚强，当年再艰难的环境都挺过来了，怎么会想不开而自杀呢？这里肯定有文章！”表示悲痛和愤怒。

茅盾昆仲的好友，中共早期活动家徐梅坤，听到老友张琴秋的噩耗，私下去纺织工业部大楼现场察看，后来他告诉茅盾：据他分析，张琴秋决不可能是自杀。认为张琴秋是重点审查对象，昼夜24个小时都有两个人在她身边看守，她没有自杀机会；二是她从四楼男厕所“跳楼”的，而且穿的是睡衣，这不合乎一般自杀者的心理。茅盾唏嘘不已，在那无法无天的岁月里，向谁去诉说呢？只能仰首问苍天！

这一连串的打击，茅盾更沉默了，而孔德沚却受气受惊吓，身体垮了，除本来的糖尿病外，又有了心脏病、高血压等，她心悸，睡不着觉，老是仿佛大祸临头那种紧张感。没有多久，本来偏胖的身体也憔悴起来，瘦下去了。1969年秋后，人消瘦，下肢却浮肿起来，不久，手也浮肿。茅盾陪她去医院看了几次病，服中药西药，仍不见效。医院里也在闹革命，医生都是问了问以后，见这两个70多岁的老人，便给些常用药，打发了。到1970年1月24日，孔德沚忽然觉得昏昏欲睡，吃不进东西。茅盾听别人说，“这是酸中毒的现象！”急忙送妻子进医院，但为时已晚。孔德沚神智昏迷，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1970年1月28日凌晨2时27分，与茅盾相伴50多年的爱妻孔德沚，撒手离开人世。

茅盾赶到医院时，已是人去室空，孔德沚的遗体已经移太平间，茅盾双手颤抖着，亲手替老伴揩身换衣，此时，经历风风雨雨的茅盾，望着夫人紧闭的双眼，熟悉而又满脸皱纹的脸庞，悲从中来，老泪潸然，禁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1月31日下午，风，刺骨地在刮，太阳淡淡的冷冷的，没有一丝暖气，茅盾在家人的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在老友叶圣陶和在京的几个至亲陪伴下，为夫人孔德沚送灵。

悲痛，劳累，茅盾在2月7日也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孔德沚去世以后，东四头条5号大院那幢小楼，似乎更冷清了，青灰色砖墙上布满了爬山虎，此时，绿叶落尽，枯枝摇曳，紧邻的2号3号小楼上，玻璃破碎，不住传来窗户随风吹动的撞碰声，深夜里，风声夹杂着窗户撞碰

声，格外让人冷清和孤独。此时，儿子儿媳和孙女孙子等搬来，和茅盾住一起，一时，小楼里又热闹起来，给晚年茅盾一些慰藉。

1971年9月13日事件发生后，野心家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政治形势稍有松动，中国老百姓仿佛看到，中国政坛上林彪这个毒瘤割掉了，祈盼天下太平。1973年7月，茅盾在儿子的劝说下，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和想法。信是寄邓颖超转送的。此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四届人大。内部传来消息，在已选出代表的基础上，再增补宋庆龄、胡愈之、沈雁冰等20多位知名人士为四届人大代表，茅盾由三届时的山东代表，变为四届上海代表，9月，全国政协李金德副秘书长来看茅盾了。寒暄后，李金德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四届人大将在年底召开，组织上让我来正式通知您，您已经当选为四届人大的代表了。”茅盾不觉一愣，马上联想到给总理的信，就问道：“那么我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据说我还有一个‘叛徒’问题。”李金德一听，“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刚刚调到政协，许多情况还不了解。不过，既然您已经当选为人大代表，说明那些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解决了。”茅盾没有再问下去。

1974年4月的一天，北京春暖花开，风和日丽。胡愈之约了一些老友相聚，茅盾、叶圣陶、楚图南、唐弢、沈兹九、臧克家等都来了。席间，老朋友相见，茅盾显得特别高兴，神采奕奕。沈兹九悄悄地告诉臧克家：茅公今天特别高兴，是因为组织上已通知他四届人大有他，就要见报。沈兹九的话尽管是迟到的消息，却也许是对的，由于总理过问，茅盾能够继续参加人大，能不欣喜吗？

自1969年9月到越南使馆吊唁胡志明逝世活动后，整整4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直到1973年，才被通知参加集会。紧接着，大参考也送来了，朋友间的信函也多起来了。许多几十年的老朋友，也时常登门晤谈，说些陈年往事，也谈些外界情况。

但是，茅盾确实是一个自己站在雪地里，还给别人送温暖的人。已经被打倒的老朋友冯雪峰来看他，两人多年不见，骤一见面，好生感慨，茅盾觉得冯雪峰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十分关切。后来骆宾基为聂绀弩的冤案，托茅盾转诉周总理。茅盾听完后说：“聂绀弩这个人我是知道的，鲁迅先生也很器重他。让我向周恩来总理讲几句话，也是愿意的。可是，总理正在住医院，能不能在最近见到还是问题，就是有机会见着了，是不是能说上几句话，能提出这个问题，也得看机宜。”

骆宾基又和茅盾说起冯雪峰，骆宾基告诉茅盾：“我刚去看望过冯雪峰，他已确诊肺癌，吃中药必须得配麝香，但这药很珍贵，又难买，家里人正为此犯愁呢！”

“麝香，我倒是有的，是50年代尼泊尔王族代表团的贵宾赠给的礼物，我留着没有用。等我找出来就给他送去。请你劝他安心养病，不要烦躁。”茅盾一听，说道。

骆宾基告辞后，茅盾立刻拖着年迈的身子，让人给找出麝香，正巧胡愈之来，就托胡愈之立即给冯雪峰送去。

1974年，姚雪垠在艰苦条件下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初稿，在困境重重的情况下，寄给茅盾审阅，茅盾尽管自己右目0.3视力，左目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仔细辨认了姚雪垠的初稿，并记下要点和修改意见然后给姚雪垠写信，从艺术构思，人物描写，都提得切中肯綮，对此，姚雪垠感激得难以言

表，他曾用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对茅盾的无限敬佩和爱戴之情：

笔阵驰驱六十载，  
功垂青史仰高岑。  
平生情谊兼师友，  
晚岁书函泛古今。  
少作虚邀贺监赏，  
暮琴幸获子期心。  
手浇桃李千行绿，  
点缀春光满上林。

姚雪垠这种感激之情，在茅盾寂寞的晚年，添了一抹春色，也给茅盾许些慰藉。

1974年12月12日，茅盾离开了住了25年的文化部小楼，迁到交道口南大街后园恩寺胡同13号。茅盾离开小楼时，把夫人孔德沚的骨灰盒也迁到新居，仍和往常一样，放在自己的卧室里，朝夕相伴。

这一段时间，茅盾在与一些老友晤谈，与亲戚通信外，余暇时，也专门读史，以寄托自己的心情。1973年夏天，茅盾读史有感，写了一首七律《咏史》：

湖海浮沉词千首，  
老去牢骚岂偶然。  
漫忆纵横穿故垒，  
却怜容与过江船。  
美芹十论徒传世，  
京口壮猷但隔年。  
扰扰鱼虾豪杰尽，  
放翁同甫共婵娟。

这首咏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诗，表露诗人茅盾愤慨心情和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这首诗，在身处逆境的友朋中广为流传，给许多老朋友于信心和力量。

1973年11月，茅盾又作诗一首，以经验之人，表露自己的心声和信念：

沉舟破釜决雌雄，  
旧耻重重一扫空。  
正喜阵前初砍纛，  
却传幕后谋藏弓。  
仰人鼻息难为计，  
自力更生终见功。  
两霸声威朝露耳，  
万方共仰东方红。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病逝了，举国哀痛。茅盾听到消息，老泪纵横，悲痛万分，他含泪写了《周总理挽诗》：

—

万人号咷哲人萎，  
竟传举世颂功勋。  
灵前恸极神思乱，  
挥泪难成哀挽文。

二

衣冠佩剑今何在？  
伟绩丰功万古存。  
锦绣江山添异彩，  
骨灰撒处见忠魂。

知茅盾者，周恩来也。当年延安生活，重庆岁月，女儿意外，担任文化部长，卸任文化部长，都得到周总理的悉心安排和关照。茅盾像敬佩毛泽东那样，敬佩周恩来总理。因此，周恩来的逝世，茅盾万分悲恸，诗中寄托了自己浓浓的哀思。

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文化专制更加变本加厉，天安门的四五运动，遭到“四人帮”的镇压，茅盾的唯一侄女玛亚，在这年遭迫害而去世，这对茅盾身心上，又一次打击。茅盾又深深地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

1976年是茅盾诞辰80周年，当友人提出要为他祝八十大寿时，他在深思中认为“杯酒话旧，于今不宜。”他还要看看形势的发展。茅盾八十大寿，在这个形势下，没有鲜花，没有花篮，也没有不绝于耳的恭贺声。茅盾和家人、几个至亲一起吃了寿面，并写了一首《八十自述》诗：

忽然已八十，  
始愿所未及。  
俯仰愧平生，  
虚名不副实。  
昔我少也孤，  
慈母兼父职。  
管教虽从严，  
母心常戚戚。  
儿幼偶游戏，  
何忍便扑责。  
旁人冷言语，  
谓此乃姑息。  
众口可铄金，  
母心亦稍惑。  
沉思忽展颜，  
我自有准则。  
大节贵不亏，  
小德许出入。  
课儿攻诗史，

岁终勤考绩。

人到晚年，往事如烟，更思念含辛茹苦的母亲，80年往事，一首小诗，解剖自己，深深感谢母亲的培养和管教。几年前，茅盾在家赋闲，除了读史，写诗词，写信外，萌发了写自己一生回忆录的念头。因而自己在八十大寿时，首先想到母亲的功德。

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消息传来，茅盾一阵轻松，从心底里感觉到，中国有希望了，中华民族有希望了，茅盾看到了这一天。

1976年，北京的冬季，银装素裹，凛冽的空气格外清新。茅盾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望着苍穹，望着白雪，仿佛听到春天的脚步。



春天来了，老枝新叶倍珍惜。  
拨乱反正，显五四风采；  
故乡情结，他说：千里迢迢的远隔，  
从未遮断过我的乡思。  
牵挂的，是一生往事如何相传。

### 第三十三章 春天又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茅盾迈着蹒跚的步子，又出现在中国亿万读者面前。经过十年浩劫，经历爱妻逝世的孤寂，茅盾老了，胡髯拉碴，也许长久没有刮了，本来不胖的茅盾，此时仿佛更瘦了。但是，茅盾在此时，依然目光炯炯，青春焕发。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起先是内部小道消息传来，茅盾听说后，十分惊喜：“啊，有这事吗？”过了一会，又说：“他们搞的天怒人怨，全国人民早就有此愿望了，你说是吗？”内心很不平静。后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证实了，茅盾怀着难以遏制的兴奋心情写下了一首诗：

寰宇同悲失导师，  
四人逆谋急燃眉。  
乌云滚滚危疑日，  
正是中枢决策时。  
蓦地春雷震八方，  
兆民歌颂党中央。  
长安街上喧锣鼓，  
万里江山又重光。

茅盾对党中央这种为党除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的功德，表示深深的敬意。10月24日，茅盾出席首都百万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目睹了群众对四人帮的痛恨和对党中央的拥护。隔了两天，即26日，茅盾又出席首都各界爱国人士庆祝粉碎四人帮座谈会，茅盾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立即作了摘要发表。从此，茅盾的名字，又时不时出现在首都的中央的媒体上，人们也都惊喜地发现，这位20世纪中国文豪，依旧在北京，并躲过了那场浩劫；在他的家乡浙江乌镇，人们又记起了这位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长，记起了家乡的骄傲。出版部门又重新记起作家茅盾，又开始酝酿出版茅盾20、30年代的著作，那些光彩照人的小说人物形象，给粉碎“四人帮”后那段时光带来缕缕清风，也给新时斯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融贯五四的基础。

1977年春节，全国政协举行春节联欢会。联欢会上，灯火辉煌，欢声笑语，虽然许多劫后重逢的朋友，大都步履蹒跚，白发苍苍，但仍掩饰不住这种重逢的喜悦。茅盾以八一高龄，主持了这次春节联欢会，并在会上致词。王昆、郭兰英优美的歌声，又勾起茅盾对过去峥嵘岁月的怀念：茅盾为此，写下一首诗：

闻歌有作  
为王昆、郭兰英重登舞台

早岁歌喉动八方，  
延安儿女不寻常。  
新人旧鬼白毛女，  
陕北江南大垦荒。  
白骨妖精空施虐，  
丹心兰蕙自芬芳。  
若非粉碎奸帮四，  
安得余韵又绕梁。

茅盾这种心情，和当时的时代气氛有密切的关系，茅盾似乎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感，国务活动、政协活动、文艺界活动，友人往来、赋诗作词，茅盾也特别忙碌起来。晚霞似乎特别绚丽。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关于开除“四人帮”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会议刚结束，茅盾在24日立即出席并主持在京爱国人士座谈会，庆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8月中旬，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大会回顾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了“文革”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中共的根本任务，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会议结束，茅盾听了传达以后，十分兴奋，填《满江红》词一首，题目为《欢呼十一大胜利召开》

八亿神州，  
早翘盼，  
天下喜事。  
百年计，  
高瞻远瞩，  
盱衡寰宇。  
治国抓纲初奏效，  
生产跃进旗高举。  
看风雪，  
锻炼出群众，  
共磨砺。

三全会，  
开先路；  
十一大，  
创新纪。  
作世界革命，  
坚强堡垒。  
三要三不誓坚持，  
扫除四害须彻底。  
颂中央，  
垂万代楷模，  
昭青史。

这首歌颂中共十一大的词，尽管口号多于艺术，但作为一个五四老作家，作为在文革浩劫中被靠边，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共和国第一代高级政府官员来讲，应该说是由衷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拥护。而此时，茅盾沈雁冰的名字，常常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见诸报端。1977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在进行肃清“四人帮”的影响，拨乱反正。文艺界受害最深、最广、也最复杂，对此，茅盾一直是痛心疾首，希望能改变十年浩劫留下的困窘。1977年11月，《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茅盾欣然参加，并作了题为《老兵的希望》的发言，希望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希望文艺评论方面改变“一言堂”这种不正常的局面。茅盾的讲话，给与会者极大鼓舞。会上，马烽同志提了个问题，文革前17年，文艺界究竟是红线占统治地位，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这个问题在1977年提出，还有一定风险性，中央还顾不上对文艺界的全部拨乱反正，许多评价、估价，尤其是文革中那套荒谬估价，在人们头脑里还存在着，尽管心中不服，但公开场合，谁也没有来翻文革中定的调子。因此，马烽提出这个问题后，主持会议的同志向茅盾提出来。当茅盾听清楚是什么问题时，淡淡一笑，毫不犹豫他说：“17年的文艺创作成绩是巨大的，当然是红线占统治地位了。”茅盾这个答复，给与会者极大鼓舞，他用实事求是的勇气，说出了大家想讲又没有讲的话，会上响起了一阵热烈掌声。

这一年的12月，茅盾故乡桐乡县有两位同志来京布置农业展览，桐乡是个农业先进县，应邀来北京农展馆参展。这两位同志专程拜访茅盾，并给茅盾送上一套家乡桐乡及乌镇的新貌照片，茅盾一边看、一边问，十分高兴。后来这两位同志在离京前，专门向茅盾要求墨宝，留作纪念，茅盾欣然答应，雪后天晴，阳光灿烂时，两首《西江月》怀乡诗在茅盾笔底流出：

## 西江月·故乡新貌

—

大寨红花开遍，  
故乡喜沾余妍。  
新装改换旧垄阡，  
县委领导关键。

双季稻香洋溢，  
五蚕蚕忙喧阗。  
工农子弟竟攻坚，  
那怕科技艰险。

二

唐代银杏宛在，  
昭明书室依稀。  
往昔风流嗟式微，  
历史经验记取。

解放花开灿烂，  
四凶霜冻百卉。  
抓纲治国布春晖，  
又见千红万紫。

茅盾题写给故乡人的诗，并不多见。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故乡的情愫，梦魂牵萦，故乡的一树一木，对晚年茅盾来讲，是极为珍惜的。自从抗战开始后，茅盾远走广州香港，度天山，去苏联，回上海，解放后在北京，都未能回老家乌镇去看看，因此，故乡情，故乡貌，哪怕从照片上，从来人介绍中，也可聊慰老人的恩乡情。所以，故乡有什么事情，向茅盾求字，求题签等，都尽量满足故乡人的要求。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在视力不佳的情况下，先后为桐乡的《中学生习作选》、《桐乡地理》、《桐乡团讯》、“石门中学”、“乌镇中学”、“乌镇电影院”等题字。

一段时间以来，可以说，茅盾以孱弱的身体，为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界的流毒和谬论，不遗余力。在1977年12月底，《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在京作家座谈会，茅盾应邀主持和讲话，驳斥了“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谬论，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他说：“四人帮”不承认“作协”，“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他及时建议中央，尽快恢复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并建议《文艺报》及时恢复工作。

许多国务活动，外事活动，也和50年代一样，忙碌起来。1978年2月，茅盾出席全国政协会议，28日又出席“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座谈会。3月9日，茅盾又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接见五届人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委员。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掀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事关思想解放，端正全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大讨论，茅盾积极参与，联系文艺创作实际，推进文艺界拨乱反正。他在《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说：“作家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去从事创作，都一刻也离不开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成功，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作家世界观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大法门，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茅盾的这篇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以后，引起文艺界的热烈反响，《人民日报》在同年12月5日作了转载。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清理了左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党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茅盾为之兴奋和鼓舞。1979年3月26日，以茅盾为评委主任的全0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在京召开，茅盾看到这种热烈的场面，十分兴奋，他发奖，发言，始终洋溢着内心的喜悦。他说：“得奖的25位同志中，有老年的、中年的，而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写作的，是新生力量。”说到这里，茅盾停了一下，又提高声音说：“我相信，在这些人中间，会产生未来的鲁迅，未来的郭沫若。”这时，在

茅盾身边主持会议的诗人李季插话说：“也产生未来的茅盾。”霎时，响起一阵热烈、兴奋的掌声。茅盾微微一笑，接着李季的话说：“李季同志把我拉上来，实际上我是不足道的，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我们应该向鲁迅、郭沫若学习。”

茅盾的谦虚，令在场的文艺界朋友为之动容。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筹备时，茅盾给林默涵同志写信，要求采取措施，尽快解放老作家老艺人。后来，这封信转送给胡耀邦同志后，中组部曾专门开会进行研究。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筹备委员会推定茅盾作大会开幕词，秘书处拟个开幕词稿本，26日那天专程送给茅盾审阅。茅盾接过秘书处起草的开幕词，翻了一遍，对来人说：“噢，有4000字，太长了，1000多字就可以了，有些问题，别的报告里要讲到的”。送稿子的人刚想说什么，茅盾又说：“这么吧，稿子留下，我再看看。明天来拿稿子吧。”第二天，茅盾把稿子改好，压缩到千把字左右，他对来取稿的秘书处的同志说：“写这类文章要干净、简朴、重点突出，切忌面面俱到，同时，要有个性，表达方式和语气要力求符合讲话人的习惯。”10月30日，83岁的茅盾，在四次文代会上作开幕词，之后又作了“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的发言，进一步表露了老一辈作家的心声。

宽松的政治环境，茅盾不顾自己年迈和体衰，关心国家，关心儿童，也关心大陆台湾两岸的文化交流。他接见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并合影留念。1980年春节，茅盾原来工作过的商务印书馆在北京召开一个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100周年的座谈会，他们邀请茅盾、胡愈之、周建人等老编辑，举行座谈。会上，茅盾呼吁“应该与台湾学人进行学术交流。”后来茅盾的呼吁在港台引起反响，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一篇题为《国共两党合作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响应茅盾的呼吁。中国红学会理事会发表了《致台湾红学界同仁书》呼吁通过红学研究，沟通两岸交往。

春天又来了，春风骀荡。

茅盾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文学责任心，即使在他垂暮之年，依然是那样，迎着春天，焕发着春天的活力，写文章，会客人。在中国文坛上，荒废得太多了，而这春天般的舒畅，又来得太迟了。一股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时时牵挂在这位80多高龄的五四老人心头，这，就是回忆录的写作。

茅盾要把自己一生所见所闻的人事，以及亲身经历，吐给亲爱的朋友，亲爱的读者。

往事历历，沧桑世纪梦；  
执新文学回忆录牛耳，开新时期文学回忆录先河。得力五四精神。  
故乡，故人，战友、师生，共演在 20 世纪舞台上；  
煌煌巨著，熬尽一代文豪心血。

### 第三十四章 回忆录巨著的诞生

还在 70 年代初时，茅盾在政治上稍稍有些松动，四届人大代表的证书也送到茅盾手里。但茅盾依旧赋闲，无来访，也无会议，整天无事可做。于是，韦韬便持证去书店买内部读物，如《丘吉尔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等，在读这些回忆录过程中，茅盾也萌发了写回忆录的念头。

茅盾一生，经历的事件，都是本世纪的一些重大事件。风云激荡的 20 世纪，许多事件，茅盾都是亲身参加者，许多人，许多事，像电影片断那样，在茅盾脑海中闪来闪去，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广东革命，武汉军校，一二八上海战事，抗日烽火，新疆教书，重庆岁月，一桩桩往事，一件件事情，人来人去，中共历尽艰辛，夺取政权，解放后当新中国文化部长的酸甜苦辣等等。茅盾决心写出自己一生的经历。

起先，茅盾在儿孙们的帮助下，从 1975 年底到 1976 年底，关起门来一边口述，一边录音，用近一年的时间，录制了 20 多盘磁带。对解放后的回忆，茅盾只讲了怎样当上文化部长，1957 年随毛泽东去苏联访问等重要事件。

1978 年 3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出版《新文学史料》季刊，旨在保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料。编辑组的同志专程登门拜访茅盾，并希望茅盾写点“文坛回忆”之类文章。编辑组此时还不知道茅盾已为写回忆录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茅盾一听，爽快地答应为《新文学史料》写回忆录。

五四以来，中国名作家群星灿烂，数以千百计，但个人写回忆录以存世传世，似乎还不多见，特别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之后，许多人都是视回忆录为望而生畏的东西，不敢冒险动笔。而此时茅盾答应并率先写回忆录，又属开中国新文学史料之先河，茅盾向《新文学史料》编辑同志讲了自己的想法，打算从进商务印书馆写起，重点放在 30 年代，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来的编辑同志一听，也大喜过望，十分兴奋。当时的《新文学史料》杂志，只能内部发行。而且只发行到那一级。

茅盾开始着手整理史料，动手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但要整理，谈何容易？已经 80 多岁高龄，长期患哮喘，左眼几乎失明，右眼也只有 0.3 的视力。他想到对自己一生最了解，对自己生平事迹、交往最为熟悉的儿子韦韬。当时，韦韬在部队解放军政治院校刊当编辑，如果能让他来当自己写回忆录的助手，再适当没有了。茅盾考虑再三，便给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写信，希望罗秘书长同意借调韦韬到自己身边工作。给罗瑞卿的信发出后，茅盾在 1978 年 7 月 19 日又给周而复写信，诉说写回忆录情形：“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我现在都记不真了），工作量很大，而且我精力日衰，左目失明，右目仅 0.3 的视力，阅写都极慢，用脑也不能持久，用脑半小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帮助搜集材料，笔录我的口授。恐已往的经验，从外找人，都不合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韦韬（在延安时他叫沈霜，也许您认识）；他

是我大半生活动中以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一个人了。有些事或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常能提供线索。我觉得要助手，只有他合适。他现名韦韬，在解放军政治院校刊当编辑，我想借调到身边工作，一二年。为此，我已写信给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希望他能同意借调。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希望您从中大力促进。……。”

不久，中央知道茅盾将写回忆录，十分支持和关心，于1978年秋，派胡乔木前往茅盾家中，看望茅盾，并代表中央，对茅盾写回忆录表示支持。同时，罗瑞卿也同意茅盾的要求，借调韦韬到茅盾身边工作。此时，领导上还决定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茅盾的儿媳陈小曼派到茅盾身边，协助茅盾写回忆录。中央创造的这些条件，茅盾信心更足了。

由于有儿子儿媳的协助，茅盾的写作工作，开始走上正轨。生活与写作，会客等也开始较有规律，他在卧室边上，放上一只书桌，这样可以少走动。一般情况下，他坚持早上7时起床，用过早餐后，9时开始写作，一直写到11时。午睡到3时，再写两个小时。有时看看旧杂志旧报纸，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回往昔的情形。从这些逝去的岁月里，又寻到了昔日的辉煌。

1978年11月出版的内部发行的《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上，开始发表他的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这个刊物是季刊，以后，编辑部及时收到茅盾的稿件，打出校样后，他又亲自仔细地阅改校样。回忆录的还极稀罕的情况下，茅盾的回忆录弥足珍贵。许多20、30年代的作家，也从茅盾回忆录中唤起对往日的回忆，也从茅盾回忆录的发表中，得到自我清除束缚的勇气，也从茅盾回忆录中得到某种启迪，之后，陆续有些老人也开始回忆自己往昔的经历。所以，80年代初回忆录的繁荣，应该说，归功于茅盾率先突破左的框框，以及他的率先示范作用。

在写作过程中，往事如烟。茅盾从浩瀚的资料中，寻找自己昔年的身影，寻找战友，寻找师友和亲人。但茅盾惟恐记忆不准，便向每个来访的老友询问当时当事，印证自己的记忆和判断。

有一次，阳翰笙去茅盾家拜访，茅盾和阳翰笙叙谈起来，阳翰笙刚说了几句，茅盾突然问起1926年北伐军打到汉口时的事情，并问道：

“那时是不是有一个人叫陈启修？”

“有的，是《民国日报》的主编。”阳翰笙回答说。

“他的另一个名字是不是叫陈豹隐？”茅盾又忙问。

“是啊，是一个人。”阳翰笙肯定回答。当时阳翰笙觉得奇怪，茅盾怎么突然打听这个人茅盾“噢”了一声。又讲起其他的事了。原来他在询问知情人，印证当时情况和自己的记忆。

有时，孔罗荪去看望茅盾，茅盾也曾托罗荪去代为查一下资料，查黎烈文是什么时候接手主编《自由谈》的，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去主编《中流》的？后来孔罗荪在向唐弢了解了情况后告诉了茅盾，茅盾十分高兴。

有一次，葛一虹去拜访茅盾，茅盾看了葛一虹带来的当年的游西湖的照片，很感兴趣，和葛一虹详细回忆了40年代游西湖的情景。葛一虹临走时，茅盾突然记起什么似地问道：“记得在桂林时曾经有一封信托你带往重庆，是不是？”

葛一虹想了想说：“是的，那信是我面呈总理的，谅必传送到延安无疑。”

这时，茅盾似释重负，笑道：“我一直不能确定带信的人是以群还是你，现在总算弄明白了。”

茅盾就是这样，一丝不苟。甚至发表以后，一些知情人给茅盾来信，指出某些错误，茅盾立即改正。商务印书馆生活回忆中，茅盾记得有个茶房是南浔人，好像叫来宝。结果回忆录发表后，熟人告知，此茶房是南浔人没有错，但不叫来宝，而叫通宝。所以，茅盾后来在结集出版回忆录时，及时作了更改。这么一桩小事，茅盾也不轻易放过。

正当茅盾争分夺秒地写回忆录时，毕竟不是当年一人主编《小说月报》的时候了，80多岁高龄和虚弱的身体，也时时折磨和困扰着他。他必须争分夺秒地工作，他知道，再不抓紧就无法完成这个宏愿。莫实，当时茅盾已经虚弱得双手发抖，无法执笔。但来求他题字题词，求教的人络绎不绝，但素来不使人失望的茅盾，也勉力为之，耗去茅盾不少精力。

有一天，茅盾半夜里起床小解，腿一软就跌倒在床前地上，他想爬起来，两条腿却不听使唤，不属于自己似的，怎么也不能动弹，周围又没有人，想爬过去揷电铃叫人，电铃按钮又够不着，他只好在床前地上喘息一会儿，一点一点地挣扎着扶着床柱，爬在床上。此时，天已蒙蒙亮了。第二天，儿媳陈小曼来了，她得知公公昨夜跌跤的情形后，急得哭了起来。儿子韦韬听说后，也急忙表示要搬进父亲的房间，陪伴茅盾。可是，茅盾淡淡一笑，反而宽慰儿子儿媳，说：“不要紧的，我没有这个习惯，你们在我旁边，我反要睡不着”。

上午，茅盾照常写回忆录。

198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将茅盾写好的一部分回忆录结集出版，并请茅盾为回忆录题书名和为回忆录写序言。

茅盾同意了。

他为自己的回忆录题名为《我走过的道路》。他没有用《茅盾回忆录》这样又俗又无味的书名，他一向喜欢自己的书名新颖别致一些。并用毛笔习惯地题了字。接着，他又写了序言，作为回忆录的一个交代。序言是这样写的：

人到了老年，自知来日无多，回忆过去，凡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一时都如断烂影片，呈现脑海。此时百感交集，又百无聊赖。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者写出来的意念。

但行年50而知40之非。我今年实足年龄84，如果10岁知人事，则74年的所作所为，实多内疚。幼年禀承慈训，谨言慎行。青年时甫出学校，即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4年后主编并改革《小说月报》，可谓一帆风顺。我是有多方面的嗜好的。在学术上也曾读经读史，读诸子百家，也曾学作诗填词。中年稍经忧患，虽有抱负，早成泡影。不得已而舞文弄墨，当年又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情势，其不足观，自不待言。然而尚欲写回忆录，一因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之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二则我之一生，虽不足法，尚可戒。此在读者自己领会，不待繁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

出版社今将已发表部分出单行本，嘱写序言，因草此数行以答，并将回忆录题名曰：《我走过的道路》。此道路之起点是我的幼年，其终点则为1948



年冬我从香港到大连。

茅盾这个“百感交集”的序言，也同样令人叫绝，同样令人感慨万端！

1980年下半年，桑弧准备把《子夜》搬上银幕，写出初稿以后，专门去北京听取茅盾意见，桑弧向茅盾讲了自己的构思和设想。茅盾非常认真地听桑弧的汇报后，鼓励桑弧根据电影特性的要求，放开来写，不必太拘泥原作。同时，他提醒桑弧，出场人物不宜太多。太多，观众在有限的时间内弄不清楚。桑弧听了以后，大为感动。回到上海后，很快又拿出《子夜》电影剧本第二稿，并让茅盾审阅后，立即投入拍摄。

有一次，茅盾写回忆录累了，儿子儿媳便劝他休息一会儿。茅盾躺着，儿子儿媳和茅盾说些外面的情况。讲着讲着，讲到社会上一些年轻人，思想方法片面，更多的是看到社会上的黑暗面，加上10年浩劫的影响，他们对党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甚至不那么信任了，甚至有人不愿入党。茅盾听了以后，十分痛心。他向儿子儿媳谈了自己青年时代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以及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奋斗。末了，他十分感慨他说：看来，在今天这种形势下，自己应该站在党的行列里。并说要再次考虑自己的党籍问题。

1981年2月8日，茅盾写完《1934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一章后，身体虚弱，不得不中断写作，躺在床上休息。这时，儿子韦韬发现《小说月报》有一封关于《虹》等创作及计划写《霞》的构想致郑振铎的信，韦韬把这个材料送给茅盾看了，茅盾看后，觉得有价值。可以补进《亡命生活》那一节里。并把信中那一节话录进回忆录里：“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一座桥；‘虹’又常见于傍晚，是黑夜前的幻美，然而易散；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这些便是《虹》的命意；一个象征主义的题目。从这点，你尚可以想见《虹》在题材上，在思想上，都是‘三部曲’以后将移转到新方向的过渡；所谓新方向，便是那凝思甚久而终于不敢贸然下笔的《霞》。”

茅盾补写完这段文字时，已是1981年2月18日。早春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茅盾补写完后，再也无力提笔了。又躺倒床上。第二天，由于过度劳累，开始发烧。20日那天，实在无力支撑了，这才同意住院治疗。这次住院，茅盾本想和往常一样，住一段时间，身体稳定了，再回来，继续写回忆录。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去住院，离开交道口家里那张熟悉的书桌后，再也没有回来！

茅盾为写回忆录，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耗尽了自己的一切。茅盾，是用生命在写回忆录，是用生命在记录他光辉而坎坷的一生。在这部煌煌巨著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巨匠毕生的心血。

奋斗到最后的一息，梦呓中仍是笔和纸。  
两封信，寄寓了他一生的追求和精神。  
80年代的党中央：恢复他的中共党籍，  
党龄从1921年算起。  
1400万字，40卷全集，他一生无愧，  
亦当含笑于九天。

### 第三十五章 最后的奉献

茅盾住进了北京医院119病房后，大夫立即进行检查，发现茅盾病得不轻，并马上给茅盾输氧，输液。第3天，老朋友孔罗荪来看望茅盾，茅盾对罗荪说：“老年病，气喘，肺气肿，缺氧，现在每隔一刻钟就吸一次氧。但这次还有低烧。”

“大夫们正在给您想办法，低烧会降下来的。”孔罗荪握着茅盾那枯瘦的双手，安慰道。

“低烧退了，我就可以出院去写回忆录了。”茅盾目光里露出一种焦灼的神色，“不写完，对我精神上是个负担。”茅盾喃喃地说。

茅盾人在病房，但仍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常叫儿媳在他病床边读《参考消息》。有一次，陈小曼怕茅盾累，念了一段全国政协常委讨论陈云讲话的反映后，停了下来，没想到，茅盾睁开眼睛，问道：

“刚才读到那个常委发言，还没有完哩，怎么不读下去？”

但是，住在医院里后，茅盾的病情，仍旧一天一天严重起来。北京医院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刘梓荣、裕东结、吴阶平等专家来会诊了，并进行全面检查，发现茅盾的身体正在全面衰竭。新的治疗方案出来后，茅盾的病情有所好转。

此时，茅盾知道自己这次病得与以往不一样，就乘自己清醒时，向儿子韦韬交代回忆录的整理情况，并又提起他的党籍和捐献稿酬等事。3月14日，他让儿子拿笔和纸来，笔录他的口述。他想了一会儿，先口述给胡耀邦暨党中央的一封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韦韬笔录完后，茅盾又让韦韬笔录另一封给作家协会的信：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致最高的敬礼！

两封信笔录抄清后，给茅盾过目，茅盾看过后，用颤抖的手，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上，习惯地签上“沈雁冰”三个字，给作协的信上签上“茅盾”。

签上名，茅盾又关照儿子儿媳，请他们在他身后交给中央和作家协会。

写完遗嘱的当天晚上，茅盾又陷入昏迷状态。经抢救以后，才有所好转。3月20日，茅盾又呈亢奋状态，并出现幻觉，断断续续，喃喃自语：

“总理的病怎样？……好一些了吧……他身体很好……姐姐，唉，……她的手术没搞好……作家……他是谁？告诉他，我不能见……”

过了一会儿，茅盾又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墙上，用抖瑟的手指着，语无伦次，问“那墙上写的什么？一张张纸上……很多字……？”

“爸爸，墙上什么字都没有写。”儿媳陈小曼轻声回答。

“哦。”茅盾似知非知地应了一下，又昏睡过去。

隔了一会儿，茅盾又醒来，护理人员劝他休息，茅盾却问：“晚上了吗？是睡觉的时候吗？”

护士顺着他：“是的，晚上，沈老，你睡吧。”

“那大家睡觉去吧。”茅盾又想到辛苦侍候他的护理人员。

茅盾病情严重！消息传进中南海。牵动了中央领导的心。日理万机的胡耀邦来看望茅盾了，彭真来了，周扬来了。

有一次，昏迷后的茅盾突然醒过来，两只手不住地在身上摸着，“笔，笔，钢笔呢？”他自言自语地说。他离不开那枝笔，他要笔来写作。过了一会儿，茅盾在嘴里反复嘀咕着：“四月差不多了，……可以出院……五、六、七、八、九、九月写完，一定写完……。”

在床边的儿媳陈小曼见状，俯身安慰道：“爸爸，4月可以出院，9月写完回忆录，你该到南方休养休养。”

“一定到南方去休养……。”茅盾神志迷糊地自语道。又进入昏迷状态。苏醒后，茅盾神志又清醒了。

曹禺来看他了。茅盾声音微弱，喃喃他说“曹禺，谢谢。”

赵清阁来看茅盾了，她见茅盾那痛苦状，难过得啜泣起来。茅盾睁眼见赵清阁在垂泪，便唤道：“清阁！”赵清阁转身拭泪，坐在茅盾身边，看护士给茅盾喂饭。

法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于儒伯先生来了。

日本的茅盾研究专家松井博光来了。

茅盾忽而亢奋，忽而昏迷。医生大夫们也千方百计救治。3月26日晚上10时40分。茅盾的病情急速恶化，一分钟只有几次呼吸，这时，院长来了，内科主任来了，医务人员连夜进行紧急抢救……然而，药石无灵，1981年3月27日早晨5时55分茅盾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宗师撒手人间，走完了他那坎坷而又辉煌的85年人生历程，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周扬同志闻噩耗，首先赶到北京医院，韦韬含着眼泪，忍着悲痛，将父亲茅盾的两份遗嘱郑重地交给周扬同志，请他转呈党中央和中国作协。

茅盾的逝世，举国哀悼，几代作家们，都含着泪，追思哀悼茅盾这位宗师的功德和伟绩。

3月31日，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定：

“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

党员之一。1928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临终以前还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

4月10日，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和首都各界人士两千人前往北京医院，向茅盾遗体告别，茅盾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4月11日下午，茅盾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

茅盾被公认为“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又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茅盾精神不死。茅盾的最后奉献，永远记在人们心里。后 记

茅盾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他也是我所景仰的乡里先贤。写一部较为全面的茅盾传记，是我十七八年来一直萦绕心头的夙愿。在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出版界老前辈吴道弘先生的关怀和支持下，给我实现这个夙愿的机会，在完成这个夙愿过程中，茅公的儿子韦韬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怀我，在百忙中审读初稿并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并永远记在心里。

茅盾是人不是神，他也生活在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里，时代风云，历史的际遇，他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人们尊他为巨匠；然而他早年丧父，尝过人生的苦涩，培育了那种谨言慎行，百折不挠的个性。他亡命日本时的那种孤寂和浪漫，显示了作为一个被通缉文人的真实生命；成熟而又辉煌的文学家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始终连在一起，一起走过20世纪那些辉煌而又艰难的岁月；新中国成立后的喜悦和沉默，包括那些自慰方式，在今人看来，似乎不解，而在当时热度很高，压力很大的背景里，也多少能看出文学家的政治水平。在那场灾难里，茅盾被迫过着隐居的生活，为儿孙讲古诗，早起生煤炉，这些生活，本身耐人寻味，然而却是生活的真实。这种真实也同样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索。

茅盾也是一个不一般的人，他的早慧，他对生活的敏感、深刻，似乎又异于常人。少年时代的那些光彩夺目的作文，一种对世俗的反叛，包括对社会的反叛，显得老气横秋，却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不一般的作文，回报的又是不一般的鼓励和激赏！茅盾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显示出来的那种锐气，翻翻少年时代那些作文，或许能寻到某种渊源。茅盾年轻时即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之一，成为五四新文坛风云人物。政治上遭挫折后，却成为一个小说大家，顿时，中国知识界都傻了眼：“茅盾”是谁？历史的际遇，让茅盾从一个舞台转到另一个舞台，并成为这后一舞台的主要角色。茅盾继续发挥他那不一般才气，青睐时代生活，用预见性的目光，审视生活，审视时代，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不朽的小说。然而，当他在文学这个舞台发挥不一般的非凡才华时，新中国来临，但此时、彼时，茅盾又显得异常兴奋异常努力，回报的有喜悦，也有困惑。即使这样，青年时代确立的那种信念，那种追求，依然没有变。直至临终，他把重新回到中

国共产党的怀抱，视为一生中最大荣耀！这，也是他不一般之处。这不一般也是真实的。

在写作中，我追求真实。利用业余的业余时间，努力从他自己的介绍，别人的回忆中，寻找回原来的茅盾，把一个受器重，遭误解，受通缉，走过辉煌，被赋闲以及晚霞绚烂、向亲爱的读者奉献自己一生的茅盾重写出来，献给这个世纪熟悉、敬爱他的人，也献给下个世纪依然喜欢、依然怀念他的人。繁星布满了西子湖上空，城市的喧嚣渐渐静寂下来了，我细细回想过去这一切，真要谢谢天时地利给我的厚爱，也谢谢英雄辈出的 20 世纪。

1995 年 11 月 杭州

